



以文学之名

卷三十七 2024. 1

小小鳥

## 如何在苏联体制下写出好小说 | 作家之爱

新年快乐 | 小鸟问答

做题家张心怡的心理分析 | 田野中国

情感之泉 | 新书推荐





## 小说

- 新书试读 | P.03 鱼类学 大卫·范恩  
P.09 蟋蟀小姐 尾崎翠  
P.17 夏物语 川上未映子  
P.25 情感之泉 梅芙·布伦南  
P.33 家乡博物馆 西格弗里德·伦茨

## 非虚构

- 田野中国 | P.39 谁是 loser ? | 手里拿着锤子的人③ /  
P.45 做题家张心怡的心理分析 /  
P.49 想像中的自由 | 做题家张心怡的心理分析② 伊险峰  
新书试读 | P.55 “未经删节”，20 世纪最杰出的编辑回忆录 戴安娜·阿西尔  
P.61 色情、权力、欲望……我们应该如何谈论性？ 埃米娅·斯里尼瓦桑  
P.71 40 天，550 公里，重走父亲的逃亡之旅 克里斯蒂安娜·霍夫曼  
P.79 当我们谈论中产阶级时，我们在谈论什么 豪道斯·魏斯  
P.89 了解中国的现代性，从晚清民国铁路入手 李思逸

## 专栏

- 作家之爱 | P.95 如何在苏联体制下写出好小说 陈冠中  
接力访问 | P.113 086 贺子珂：一个人探索记忆存储之地，可能会被带向哪里？ /  
P.119 087 廖细雄：一个在小区里摆公共借阅书摊的人 /  
P.123 088 Luly：如果不在老家开这个书店，我的生活没法继续 /  
P.127 089 蔡所：生活这事不可规划，但你的内在需要会牵引它的走向 杨樱



题图为电影《飞屋环游记》(2009)剧照

# 新年快乐，每个人 | 小鸟问答 Vol.37

## 小鸟 | 小鸟问答

我们已经进入到第四年了。

i

继续提醒大家：接部分应用商店通知，小鸟文学 app 内容生产相关资质即将到期。鉴于我们无法继续更新资质，届时（大约是 2024 年 1 月 1 日左右）小鸟文学 app 可能无法继续在应用商店被下载、更新。因为各商店管理流程不同，最终下架时间也不会一致。

ii

好消息是，已经下载小鸟 app 的用户，目前还可以正常使用。  
如果你换了手机，而且没有迁移过去软件的话，可能难以下载；如果发生比较大的操作系统升级，而我们因为没办法在应用商店上新版本，可能会丧失一些重要功能，直至无法使用。

iii

2023 年以及以前的各卷小鸟文学，大家可以继续下载并保存。  
新一年每月一卷会继续出现在书架上，付费用户可以随时下载。  
我们大约在下一个月十号左右，推出前一个月的 PDF。  
因为眼下小鸟文学还处于使用正常状态，目前还没有为用户邮箱推送 PDF 文件。  
如果还有其他疑问，上个月的“小鸟问答”有更详细的解释，[你可以参看上一期](#)。

iv

其它一切正常。

v

《我们》的作者顾嘉怡，给小鸟发来了第三篇小说。

小鸟：你比以前写得要有耐心。这个很厉害。

嘉怡：我觉得真的很离奇，因为我完全没有写什么政治小说的志愿，没避嫌写出来就是这样！然后感觉哪哪都发不了。

小鸟：我觉得没有当初《我们》给我的强烈刺激，但不能这么要求自己。

嘉怡：你看我总体而言有进步吗？

小鸟：当然有进步了。写更有耐心的东西都是进步啊。

嘉怡：《我们》确实很简单很清澈，我感觉无法回去了。

小鸟：相对来说，《我们》是简单的。回不去也对，总得弄更复杂的东西。

是不是？

vi

在我们还有“作家之爱”这个栏目的时候，我们曾经约作家陈冠中先生的稿子，他可能苦于无感而发，一直没有动笔。现在他联络了我们。

他发过来一篇讲座的文字稿，讲座主持人是诗人廖伟棠先生，题目叫做《如何在苏联体制下写出好小说》。

读完我们觉得，可能触及到的话题好像都囊括进去了，而且很坦荡。

我们会在这一卷里分三期发布。

vii

新一年我们的封面还是各种鸟。这一次它们来自一本童书，The Burgess bird book for children, 1919 年出版，作者叫桑顿·伯吉斯，美国环境保护主义者，也是儿童文学作家。你可能读过他的作品，《彼得兔奇遇记》。

一月的小鸟叫黄扑翅鶲，Gilded Flicker，一种大型啄木鸟。

viii

“接力访问”系列还会持续一段时间，完成 100 个编号的人物故事。

“田野中国”里年轻人的调研故事接近尾声，不过在三四月份左右，我们可能会推出一个新的栏目。

ix

联系我们

微博留言 @ 小鸟文学，微信公众号“小鸟与好奇心”，或写邮件到 info@aves.art

如果在阅读使用小鸟文学 app 时遇到什么什么问题，请随时与我们联系，以便我们启动相关应对措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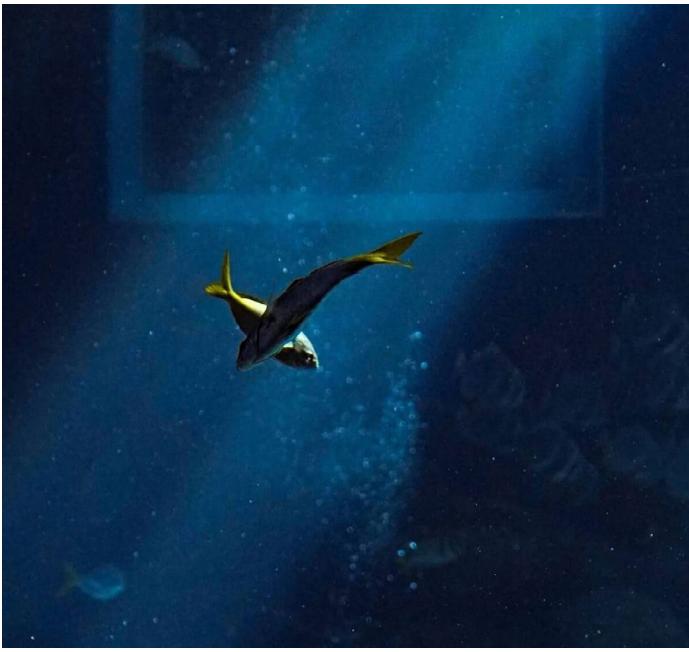
小鸟

一份新文学杂志。注意，不是文艺杂志。  
我们最大的愿望是找到最好的文学作品和作者，并呈现出来。

小鸟问答

这个栏目每月一次，回答来自读者的各种问题。  
它放在每月的第一篇，兼有告知功能。





题图来自 [Eugenio Clara](#) on Unsplash

## 小说

# 鱼类学

### 大卫·范恩 | 新书推荐

根据作者真实经历写就，  
一部结构精巧的短篇小说集

1980 年,一个名叫詹姆斯·埃德温·范恩的男子自杀身亡;十五年后,他的儿子大卫·范恩以父亲当年的亲身经历为蓝本写下了这些故事;又过了十二年,这些原本无人问津的故事因获得格蕾丝·佩雷短篇小说奖首奖而最终得以出版,即为《一个自杀者的传说》。

小说集由五个短篇小说和一个中篇小说构成,但这六个故事的编排有其自身清晰的逻辑脉络,绝非随意的集合。整部小说的主线是叙述者罗伊费恩的父亲与别人有染,家庭破裂,两度离婚,后来他在阿拉斯加的一座无人小岛上买下一间木屋,请儿子罗伊去那里住一年,他们的生活条件日益恶劣,也导致父子关系渐趋紧张。

作者的故乡阿拉斯加大地,成为这六个故事构成的拼贴画最理想的背景,也映照出作者不安的内心。阿拉斯加的冰冷酷寒与荒野以及侵噬人心的伤痛在文字冰层下微微发光,美丽、残酷,却又散发出一种奇异的温暖。

经 99 读书人授权,我们摘选了第一个故事《鱼类学》分享给读者。



我的母亲是在埃达克岛上生下我的。埃达克岛在白令海峡的尽头,只是阿留申群岛尽头积雪覆盖的小块陆地。我父亲当时正以牙医的身份,在海军服两年的兵役;他之所以选择去阿拉斯加,是因为他喜欢打猎和钓鱼。但是当他提出这项申请时,他显然对埃达克岛一无所知。如果我母亲早知道那里的情况,她一定亲手把这个申请划去。只要掌握充分的信息,我母亲从来没有做过错误的选择。所以她拒绝自己发烧的、生着黄疸的婴儿被拉出埃达克岛的地下海军医院,塞进那架在跑道上等候了六个多小时的喷气式飞机。因为我的体温已经达到 105 华氏度,并且还在攀升,医生们和我父亲都建议把我运回美国本土,住进一家真正的医院(我们住在那里时,埃达克岛上没有人能挺过一场轻微的心脏病,没有人)。但是我母亲拒绝了。带着一种本能的恐惧(我父亲常将之形容为动物性的),她很确定一旦被运到高空中,我就会死去。她将我放在一只普通的白色澡盆里,里面注满了凉水,我活了下来,甚至变得更强壮。我那橘色的斑斑点点的皮肤逐渐平缓,变成健康婴儿拥有的粉红色;我的四肢不再蜷缩,两条腿甚至在水里拍打着,直到她把我抱出去。然后我们都睡着了。

等我父亲服完海军兵役,我们搬去了凯奇坎,那是位于阿拉斯加东南部的一座海岛,他在那里买下了一间牙医诊所。三年之后,他又买下一艘渔船。那是一艘崭新的二十三英尺长的玻璃纤维游艇,有可住宿的舱房。有个星期五的下午,他把船驶了回来。我们在岸边朝他欢呼,他的夹克里面还穿着牙医的工作服。他将游艇滑向码头的船位,第二天一早,他站在船坞的尽头,垂视着阿拉斯加清澈、刺骨的海水,在三十英尺之外,“雪鹅”盘踞在灰色的圆石中间,像一场白色的海市蜃楼。我父亲将他的船命名为“雪鹅”,是因为他满脑子都梦想着白色的船身翱翔于水面。但是那天下午他发动船体的时候,他忘记放排水塞了。和我母亲不同,他从来看不见也听不到事物表面之下的问题。

那个夏天,当我们结束了一天的捕鱼,疾驰过浪尖回家时(我父亲已经将“雪鹅”重新清洗过了,以此证明有时候坚持能够弥补缺乏远见),我就会和我们捕到的比目鱼待在开阔、船沿很高的后甲板上。当我父亲驶过一道波浪、迎向下一道时,我和比目鱼们就会跌向空中。比目鱼就像灰绿色的大狗,直直地躺在甲板上,它们巨大的灰色眼睛充满希望地看着我,直到我用锤子重重地敲向它们。我的工作就是看住它们,不让它们从船上逃脱。它们宽扁的身体拥有可怕的力气,只要用尾鳍啪嗒几下,就能飞出去两三英尺。它们的鱼腹亮莹莹的。我和比目鱼之间开始产生一种默契:如果它们不翻腾,我就不用锤子敲它们的头。但有时候,当海浪变得凶猛时,我们一次次地被抛向空中,它们的血和黏液会沾到我全身,我就会多敲它们几次。如今我为自己的这种倾向而感到羞耻。那时候,其余的比目鱼带着灰色的圆眼珠和审慎的长嘴巴,目击着这一切。

那些旅行结束后,我们停靠在码头,我母亲就会检查一切,包括排水塞。我父亲只是在一旁站着。我独自蹲在码头风化的石头上玩耍。有一次当我敲击一只生锈的铁罐时,看到一只可怕的生物从里面爬出来。我被它骇人的足部吓坏了,号哭着跌到了水里。很快我就被及时捞上来,然后淋了热水澡,但我无法忘记看到的一切。没有人跟我讲过蜥蜴的事——老实说我从来没有梦到过爬行动物,但是我看到它们的第一眼,就知道它们走错一步路了。

这件事之后不久,我快五岁的时候,我父亲开始相信他也走错了方向,于是他开始探索那些他认为自己此前没有机会体验的经历。我母亲只是他约会过的第二个女人,但是在这个名单上,他现在加上了为他工作的牙科保健师。不久,在夜晚,我们家里充斥着之前无法想象的各种持续的哭泣声。

一天晚上,当我的父亲独自在起居室里啜泣,我母亲在卧室里砸东西时,我离开家这个港湾。我母亲一声不吭,但我通过想象木头和玻璃碎裂的声音,还有灰泥剥落的位置,来追踪她在屋子里的走向。我悄悄走进阿拉斯加雨林温柔而氤氲的夜晚,阒无声息,除了雨声。我穿着睡衣在街道的另外一边游荡,在黑暗里窥视起居室低矮的窗户,听着各家房门的声音,直到我在一家门前听到陌生的低鸣。

我绕到房子的一边,打开纱门,将我的耳朵压在冰凉的木头上。嗡嗡声现在变弱了,几乎只是一丝呻吟,耳朵很难捕捉到。

门是锁着的,但是我抬起门前橡胶擦鞋垫的一角,和我们家一样,钥匙就在那里。我走了进去。

我发现那嗡嗡的声音来自一只鱼缸的气泵过滤器。在别人家中独自徘徊的感觉有点可怕,我严肃地穿过油地毯,在厨房的凳子上坐了下来。我看着橘黑色条纹的鱼吞下鹅卵石子,又吐出来。鱼缸里也有大块的石头——有着阴暗洞穴和裂缝的火山岩,很多细小、如金箔闪烁的鱼眼正透过这些窥伺着我。有的鱼拥有明亮的红蓝色身体,有的则是橘黄色的。

我想鱼群也许是饿了。我走到冰箱那儿,看到有腌黄瓜。我打开罐子,拿回鱼缸前面给它们看。我发现了鱼缸的插槽,就在鱼缸后面,我把黄瓜丢了进去。开始只丢了一两片,然

后是一整罐，最后我将酱汁也倒进去。这导致鱼缸里的水漫出来，四壁开始有水珠游走。

我看着那些黄瓜片和鱼群一起明晃晃地漂浮在水面上，有的开始下沉、翻滚。它们缓慢地从身体下方那些亮粉的、蓝色的石头上弹开。在我倒进黄瓜的时候，那些橘色条纹的鱼在鱼缸里快速游动，但是它们现在速度也很缓慢了。它们游动时，身体微微向一边倾斜。有些则在石头上休憩。其余的每隔片刻就朝水面张开它们那长长的、透明的软骨口腔吸气。它们的边鳍在水中荡起涟漪，细致如上好的蕾丝。

更多黄瓜片沉下去了，看起来就像一群睡着的鱼在粉色和蓝的砂石上方摇晃。而真正的鱼则在它们旁边摇晃，就像身处由蔓草和沉没的睡莲叶子织成的坟墓中。画面是如此美丽，在那个美丽的瞬间，我身体用力地前倾。

我将头和手压在玻璃上，凝视着其中一只银色眼睛中无声、黑色的眼核。我感觉自己仿佛也漂浮着，并不协调地微微摇晃。在一闪而过的瞬间，我捕捉到自己正在感受那种摇晃，也察觉到自己正在理解，意识到我就是我。这让我分心；然后我忘记了是什么分散了我的注意力，也失去了对鱼类的兴趣。然后我重重地踩过厨房地面的油毡布，走进温柔、灰暗的雨中。

三年后，在我和母亲搬到加利福尼亚之后，我有了一只属于自己的鱼缸，并决定成为一名鱼类学家。当然，我的父母已经离婚。我做过的事情，几乎和他们自己一直在做的事情一样惊吓到他们。他们全然不知，我的破坏欲和他们的夜间交流有什么样的联系。

我的第一只鱼缸只是一个干净的塑料托盘，人们似乎经常用它来盛螺母和螺栓。我在乡间集市上赢得的两条金鱼放进去，还有我母亲在回家路上从萨尔水族世界买的一些砂石。

我看守着这些瘦弱苍白的金鱼，但是托盘没有盖子。我们的猫“史默基”用它的爪子抓住这些鱼，在我们厨房的工作台上吃掉它们的时候，我目击了整个过程，无法挪动一步。后来我母亲带我去了萨尔水族世界，买了一只大小合适、有气泡过滤器的十加仑鱼缸，里面有更多的砂石，宽叶的塑料植物，还有一块有洞眼的火山岩，一些金鱼。其中一种橘黑色条纹的金鱼我在凯奇坎就认识了——现在我知道这种鱼叫丑鯧鱼。

每天晚上我们都会照看这些鱼类，每个周末清理一次鱼缸，还要让他们在偶发的白点病瘟疫中存活下来：那种瘟疫会让鱼的鳍和尾部突然长出不明的白点，可能导致所有的鱼类都死亡。

我们为第一批死去的鱼举行了复杂的葬礼：整个过程中，我母亲和我一样，跪在泥地里。我裹着一条旧的白色床单。死去的鱼们总是被包在一层层的卫生纸里，放进小盒子，埋到地下六英寸的地方，这样猫就不会把它们挖出来。

很快，我们只是把死去的鱼放进马桶冲走，然后更换一批新的。但那时它们是我的全部牵挂。在学校里，在该写读书报告的时候我总写着我的鱼类报告，我的小学老师们似乎从来没有真正理解过这些，不过他们显然相信我读过标题为诸如《丑鯧鱼》《银币》《彩虹鲨》《清道夫》，还有《底部吸盘》之类的书。人类生活中的一切都可以在那只鱼缸里找到。黄黑色的天使鱼优雅地漂浮着，光芒四射，它们身后拖着长条状的排泄物。鱼缸底部的吸盘鱼吃下这些排泄物，又厌恶地吐出来，然后继续漫游，仍然饥饿。在我将两条新的银币鱼投进鱼缸不到五分钟的时间里，我看到了真正的残酷。银币鱼是一种体大而又扁平的鱼，在形状和亮度上几乎和它因之被命名的硬币一模一样。它们一离开萨尔水族世界的塑料袋，就立刻游到我的那条懒惰而又突眼的彩虹鲨两侧。彩虹鲨的名字是个极大的错误：事实上它只不过是一条有着扁长闪亮的身体，还有两只大大的球茎一样双眼的金鱼。银币鱼技术很娴熟，也很无情，它们知道如何团队合作。在一个快速的闪回里，每条银币鱼分别扑向彩虹鲨的一只眼睛，将它们吸出来。它们甚至没有吞下眼睛，而是任由那两只圆圆的、台球一样的眼球，梦幻般地沉向岩石，吸盘鱼会在那里摄取它们。

我母亲的惩罚也非常迅速几分钟之内银币鱼们就被网捞起来被马桶冲走了那天晚上，我们一起看着彩虹鲨盲目地撞向鱼缸的四壁，等待它死去。

我们在加利福尼亚度过的那些年正稳步朝向一种更受局限的生活，而我父亲在阿拉斯加的生活却延伸得越来越远，并且他做的每件事看起来都不着调。他从来没有喜欢过牙医这个职业，现在他觉得也许捕鱼是他更想做的事情。在这点上我相信他是对的，他当然很急切，但是他事先没有考虑周到。他卖掉了自己的诊所，订造了一艘漂亮又昂贵的、六十三英尺长的铝制商业渔船，那艘船将在比目鱼的鱼季到来之前完工。我父亲说服了我叔叔担任船员。他们此前一直一起钓鱼，但只是当作一种娱乐。他们都没有操作商业

渔船的经验，船上就只有他们两个人。如果我父亲一开始是去另一艘船上工作或是聘请一位船长的话，那他心中那个孤身探险者的自我形象也许会被削弱。

他将那条船命名为“鱼鹰”。鉴于“雪鹅”适合于一两天短程的业余捕鱼之旅，它像只鸟一样在水上展开白色的翅膀，“鱼鹰”的用途则更广泛。它的双翼有六英尺。众所周知，鱼鹰可以大弧度地在水上飞翔到很远的地方，并且它们经常是独自飞翔。

“鱼鹰”没有及时完工，所以我父亲和叔叔比鱼季晚了一个半月才开始。匆忙之中，他们弄乱了原本准备捕捉大比目鱼的渔网，因而卡住了巨大的水压轮，而那是用来将鱼捞上船的。当然他们几乎一无所获。那一年光是在捕鱼上，我父亲就损失了十万美金，但他毫不畏惧，因为他已经进入了他人生中最后几次美丽、绝望而又辽远的循环。

我叔叔说起有一天晚上，他们在驾驶台那里玩金拉米纸牌，我父亲连输十七次。他看起来并没有闷闷不乐或是违心地恭维，相反他突然弓起背，张开双臂。他站到雷达和声纳投射的蓝白光中间，站到他的船长椅上，伸直他的下巴（我叔叔到今天都还记得那看起来像是一只弯得很明显的鸟嘴），粗声喊道：“往右转舵三度！”我叔叔听命调整了自动驾驶仪，第二天早上，他们成功地布下了渔线，而他们的旅途中只有三四次下网是成功的。

我父亲的预言和实际的成功很少沾边。那年他投资的五金店也倒闭了，金价在下跌，国税局对他在南美国家避税也失去了耐心（他对缴纳社会保险感到很愤怒，但讽刺的是，在他去世后，正是这笔钱支撑着我们的生活）。还有，他和未婚妻（之前是他诊所的前台）的关系也在僵化。简单地说，那一年不是幸运的一年。在一月中旬，我和他在一起待了四天。

那个假期的每天晚上，当我躺在旅馆地上他床边的睡袋里时都听到他辗转反侧直到很晚。带着孩子有时具备的某种确信，我感觉不久之后他就不再是我的父亲了。他的动作循环往复，禁锢着他。他发狂地踢着床单，叹息里带着受挫、愤怒和失望，如近海的风暴那样翻腾汹涌，先是湮没了他的脸，最后他偃旗息鼓，把头埋进枕头里哭泣。然后他又开始同样的循环。我一直都假定他以为我睡着了，因为据我所知他从不会让自己在别人面前流泪。但是有一天晚上他对我说话了。

“我不知道，”他大声说，“罗伊，你醒着吗？”

“是的。”

“天哪，我真不知道。”

那是我们最后的交流。我也不知道。我唯一想做的就是深深地缩回睡袋里。他一直有可怕的头痛，止痛片也无法抑制。他空洞的声音只是变得越来越空洞，我也不想看到、听到那些导致他失望的原因。我知道他在走向何方，我们都知道，但是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要这样做。我也不想知道。

第二年，我父亲驾着“鱼鹰”去了越来越远的地方，他改装了渔船的传动装置去捕捞墨西哥湾的金枪鱼，后来再次去白令海捕捞帝王蟹。他开始在又高又宽的后舱钓鱼，有一天他捕到了几条大鲑鱼，他就在那儿掏空了它们的内脏。回到港口以后卖掉失败的“鱼鹰”迫在眉睫（那两年里他经历的失败，让他无法再从一家银行获得贷款），鉴于国税局一直盯着他，他无法想象还能坐飞机去更远的地方。他从船舱里拿起他那把点44马格南手枪，一个人走向亮银色的船尾，头顶厚重、灰白的天空，海鸥正在嘶鸣，他的短靴被新捕获的鲑鱼暗红的鱼血浸透。他也许停下来思考了片刻，但是我怀疑这点他的冲动是凭空而起的，没有考虑现实。我父亲把自己炸碎、溅落在鲑鱼的内脏中间。后来的几个小时里，在我叔叔从引擎间出来发现他之前，他的残骸在被海鸥们啄食。

留下了我母亲和我。因为从未飞到任何高度，我们也无处坠落。当我叔叔打来电话，告诉我们这个消息之后，我们喝了牛肉清汤，汤里漂着一些豌豆。那天晚上，随着天色逐渐由蓝变黑，我们坐在起居室里，在鱼缸荧光灯的照射下，看着它们。彩虹鲨现在已经知道如何前行了，不像之前那样频繁地撞向玻璃。它空空的眼窝破损的地方原先充满淡淡的血迹，后来逐渐平复，被一层模糊的白色薄膜覆盖。只有一半下颌和尾巴的虎纹喷水鱼总是以四十五度角游向水面，它能喷出可观的水球。它正用有力的下唇滑过水面，等待着。在某个点——我不知道什么时候，自从死亡发生之后时间似乎静止了，我感觉不到它的流逝——我起身拿起苍蝇罐。我将其中一只放入鱼缸顶盖和水面之间的空间，用胶带盖住洞眼，然后坐到我母亲旁边观看这场熟悉的仪式，这是我们过往生活的一种纪念，但我知道自己已经对它失去了兴趣。喷水鱼紧张起来，不安地绕圈游动，钩状的嘴唇到达了最关键的水面，安静而有预谋地追踪着那只疯狂飞舞的苍蝇，然后它迅速地喷出水球，动作小到像一切都没有发生过。然后是那只苍蝇，落入水中，释放着数百万道传达它的痛苦的细密涟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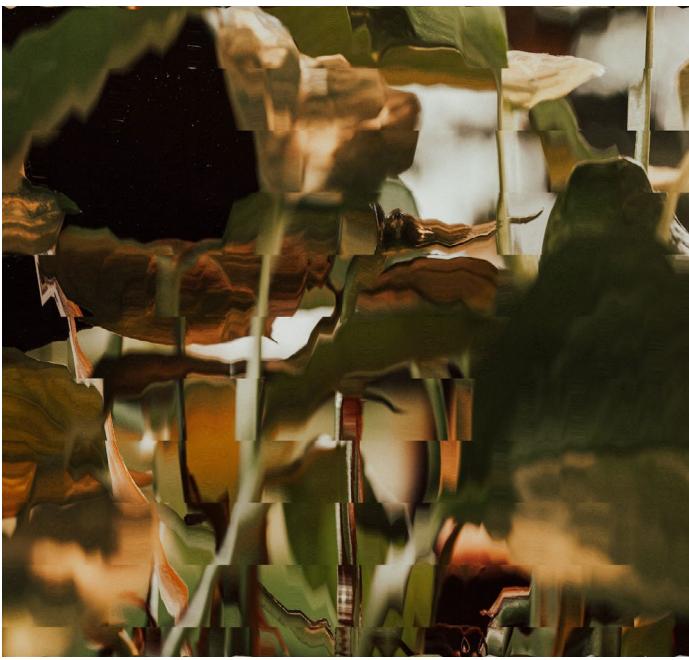


大卫·范恩

美国作家，生于阿拉斯加阿留申群岛，成长于凯奇坎，毕业于斯坦福大学英文系，并获得康奈尔大学创意写作硕士。他曾先后执教于斯坦福大学、康奈尔大学、佛罗里达州立大学和旧金山大学，目前是英国华威大学创意写作教授。自二〇一一年出版首部长篇小说《驯鹿岛》以来，大卫·范恩以近乎每年一部的速度写作长篇小说，截至目前已出版《尘土》（2012）、《公羊山》（2013）、《水族馆》（2016）等，并曾凭《驯鹿岛》、《尘土》两度入围国际IMPAC都柏林文学奖。他的最新长篇是出版于二〇一九年的《月球上的大比目鱼》。此外，他还出版了回忆录《下沉一英里》（2005）和反思美国校园枪击案的纪实作品《人间末日》（2011）。

新书试读

来自新近好书的试读章节，由小鸟文学编辑部从近期出版物中挑选而来。祝阅读愉快。



题图来自 [Marjan Blan](#) on Unsplash

## 小说

# 蟋蟀小姐

尾崎翠 | 新书推荐

幻想文学派代表作家尾崎翠作品首次在国内集结出版

一头红色鬈发的少女小野町子，与研究分裂心理的大哥、研究苔藓恋爱的二哥、热衷于演唱歌剧的表哥同住，一边照顾着他们的起居，一边想要写出超越五感和第六感的诗作，触及第七感官的世界。家中肥料的臭味与走调的琴声交织，刺激着人的神经；住户们个性格怪异，心中怀揣着羞于启齿的单相思……

《第七官界彷徨》是尾崎翠的作品首次在国内集结出版，收录其代表性的五篇中短篇小说。五篇小说中的主人公仿佛同一位少女散落镜中的多重分身，时而以复眼窥探人类世界，时而以量杯调配心的解药。滑稽荒诞的布景转换之间，浪漫轻盈的幻梦间隙之中，现实坚硬的底色一晃而过。

经明室 Lucida 授权，我们摘选了第一个故事《蟋蟀小姐》分享给读者。



我们这故事的女主人公，即便说出她的名字，大抵也不会有几人知道。我们这故事的女主人公，在这世上鲜有知己，就许多种意义而言皆是一种飘忽无常的生物。要问缘由，想必纷纷扬扬多得很，但是，这些东西，对这故事来说没有什么价值。不过曾有一个时刻，

我们耳中飘来过一两段极轻极小的、风递来的消息。依凭这些风言风语，有一种说法，称我们这位女主人公诞生到这世界上来的时候，那几位司掌社交的神明，主管人与人知己关系的神明，错弄了调配的分量。也有一种说法，道是她实在不走运，偏巧就在那几个神明编织一场午间小梦的片刻工夫，我们这女主人公降生到了这个世界上。另外，还有一阵有些喜欢刨根究底的风，很像那么回事儿地告诉我们：这飘忽无常的故事的女主人公刚出生那会儿，刚好赶上诸神的国度流行一种什么思想。估计是这思想的碎片，一个不留神，飘进了女主人公脑袋里的某个角落。抑或是飘进了心脏里的某个角落。关于那什么思想（喜欢刨根究底的风，还在对我们讲个不停），有说是一种殊为静默的思想，也有说是一种殊为喧闹的思想。神明国度的真相，不是我们这些风能闹明白的，且暂留给那些神明大人吧。总之就是这样，我们这位女主人公，要么因为身体里带上了神明们静默思想的碎片，所以对那些吵吵闹闹的地方诸如人挤人的地方嫌恶得不行；要么因为神明们吵吵闹闹的思想，而把耳朵给闹聋了。所谓聋这种状态，归根结底（我们这位喜欢刨根究底的客人，稍稍把声音抬高了一些，给出最后的论断），乃是缺乏社交天性！乃是容易陷入厌人情结！乃是逃避型人格！

这喜欢刨根究底的风的见解，我们听下来感觉大抵也就一知半解。至于不解的部分，我们也一样留给神明的国度，且让它留在迷雾中吧。就这样，我们恍恍惚惚间冒出一个念头：这故事的女主人公，据我们猜测，应该相当不喜与人打交道。既然如此，我们与她相处也必须相当仔细谨慎。为了紧追她的影子以免跟丢，我们打算安安静静地追随在她的身后。

虽然故事一开头就被诸般风言风语搅得乌七八糟，但我们还是，又听到了那么一些关于药物的传言。传言说，我们这故事的女主人公，惯用一种褐色药粉。关于这药粉的颜色，也是众说纷纭，我们也闹不清该采信何种。有说不是褐色药粉而是一种黄黄的药，也有说是白色细碎的晶体。还有说看似褐色是因为瓶子的颜色，可见里边装的定是烈性药物。另有一些风声说，看着发黄实为米纸的颜色。说到底，此种问题恐怕也只能交给司管那些烦琐细节的神明大人，再没有别的法子。身为地上凡人的孩子，我们能做的只有祈祷主理药物的颜色呀形状之类的神明大人，神经可以稍微再细那么一点点，这样他所有的感官工作起来的时候也可以更加花样繁多一些。

总之不论那东西是什么颜色，我们这位女主人公惯用一种药粉。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但是关于它的效用我们似乎没法给出确切的消息。前面已有交代，我们这故事的女主人公，可能因为身边那些吵吵闹闹的思想，而导致耳朵被闹聋了。你可以说，她是为了从耳聋的愁苦中拯救自己，所以开始使用此种药粉；也可以说她是为了让自己聋得更甚，故而长期用药。但不论哪一种说法，这药都确实属于精神麻醉剂的一种，是伤风败德的玩意儿。想想也不会是心智健全、感官完备的人会放进嘴里的东西。

而且，关于这药粉的副作用，我们也听到了一小撮风言风语。说这药粉会作用于人的什么小脑组织、什么毛细血管，让人生出好些怪癖，诸如觉得太阳刺眼，觉得人群讨厌，等等。久而久之，惯用此药的人，会渐渐开始嫌恶白天外出，非要等到刺眼的太阳从地面消失不见时，他们才终于能找回身而为人的那颗心，才会从二楼的租赁房中走出来。（我们听说，大凡长期服用此药的人，都住在二楼的租赁房之类的地方。）至于他们走出租赁房之后的去向，我们听到的净是些极度伤风败俗的事情。此类药粉中毒的人，不论是谁，都不愿去抓那些伸伸手便能够得着的空气，而非要幻想去抓那不知在哪儿的、远远的、渺远的空气。对于身边这个实实在在、鲜活会动的世界，偏要加上他们那一套一厢情愿的解释，害怕、逃避，甚至轻蔑，末了，还是觉着电影院银幕里或者图书馆书桌上的世界住着更舒服。虽说是药物影响，但这副作用可真够糟的。第一次听闻此种传言时，我们深深地吐出一声叹息，而后低声咕哝起下边这番话：这药粉，怎么想都是恶魔的发明，绝对错不了。明明生在人世却对人世又轻蔑又拒斥，这不是亵渎是什么？不是大逆不道又是什么？他们这些用药成性的家伙若再不停用这恶魔的发明，下一秒地球的中心必会长出一根长长的鞭子，狠狠抽在他们这些人的心脏上。不管怎么说，哪怕只是这故事的女主人公一人，我们也一定要将她从对药粉的沉溺中拯救出来。

然而，尽管我们带着此番念想，可日子一天天过去，之后却一直不曾遇见她。结果这段时间，她果然勤勤恳恳去起了图书馆，看那样子似乎还带着某种殊为重大的目的。

罢了，我们毫无意义地罗列了这一路的流言蜚语，占去好些时间。不过，诸君也不用因为这几段话，便认定我们这故事的女主人公是一个败德辱行的女子。为什么这么说？因为我们罗列的这些事情，不过是路上的风递来的消息。现在我们回到故事起首，这位女主人公，因为这般那般的原因，属于那种名字可说可不说的生物。

时值五月。荒草地的角落里开出一片泡桐花，只要一下雨，泡桐花的气味便会一直传到

蟋蟀小姐的住处来。蟋蟀小姐居于二楼一间租赁房，三坪大小。格窗外的廊台木头已经古旧得不行，房间女主人哪怕静静地走上几步，也会“吱呀吱呀”一通乱叫。

这天刚好是个切盼的雨日，天光也不那么晃眼。蟋蟀小姐决意趁天亮动身去一趟图书馆。大约一小时前她忙东忙西换好衣装，开始揣度天色的变化。想着想着，我们这位蟋蟀小姐迷迷糊糊犯起了困，于是在桌底下伸直了腿，在脑袋下边垫了几本杂志当靠台，恰好在这临时拼凑的枕头上小睡了一个小时。待她再度睁开眼，刚刚好雨声响起，身边弥漫的泡桐花气味也比先前那会儿多少泛了白，褪了色。于是，她只消披上一件外套便可以收拾停当。蟋蟀小姐的外套不是什么新品，刚好就跟泡桐花薰在枝头一般薰在她身上。左边口袋里，那只小手包比她这外套还更经历了一些时日。右边口袋露出一小截叠了四叠的厚衣服的边角。蟋蟀小姐的外表大抵便是这般模样，没有什么清新锐利的风采。而这外套里头的蟋蟀小姐本人，在我们看来，清新度也就和这外套差不多。

出了门来到下着雨的荒草地。泡桐的气味，满满钻进了蟋蟀小姐的雨伞。这也实在无可奈何。因为在这荒草地上，这个时节，哪里有空气，哪里便有泡桐花的气味。然而，蟋蟀小姐似乎并不怎么中意这里的空气。她从鼻孔深处，急吼吼地喷出两三下鼻息，不断将它归还到大气中。可是只要蟋蟀小姐一刻不踏出此片荒草地，她吸进去的每一口气息，便都是薰薰的泡桐花的味道。就这样，蟋蟀小姐不知不觉用左手捏住左口袋里的小手包，重复了好几次鼻息的运动。

在这下着雨的荒草地上赶路的当口，我们打算多少解释一下蟋蟀小姐为何拒斥泡桐花的气味。据我们所知，泡桐这种花相当了得，古往今来时不时便会停驻在情感派或者其他什么诗人的笔端。居然拒斥如此这般的芬芳，这态度着实该遭不少天谴。话是这么说，可眼下罩在蟋蟀小姐周身的泡桐气味，已经临近凋零，疲累而蔫软，甚至罹患上了神经症，这也是无可辩驳的事实。而蟋蟀小姐那厢，也因为靠着恶魔药粉维系生活，到这会儿多少也已经患上了重度的神经症。

稍稍再把话题扯远些，我们从前认识一位供职于名曰“分裂心理医院”的医师——幸田当八大夫。曾有一段时间，幸田当八大夫研究分裂心理研究得过于痴迷，抱着一大摞戏剧全集和一册笔记游历各地。他到某地后找上一位年轻姑娘，让她诵读了好几出殊为激情的爱情戏剧，将她的发音与心理变化记在笔记上。总之，这是一个对司掌神秘的神明多多少少有过一些亵渎的医生。关于幸田当八大夫的笔记，我们倒是握着一小撮让人欢喜的话题，不过那些还是留待别的日子再说。眼下，为了解释冒雨走去图书馆的蟋蟀小姐的某种心理，我们想要回忆幸田当八大夫曾经在旅途中创立的一种学说，追想起他那学说的一小点边角。五月的荒草地细雨迷蒙，疲于季节的泡桐气味弥漫。蟋蟀小姐那件褪了色的春日外套，在走出租赁房超过两分钟后，便已整个湿漉漉的。听人说，人的背影，有时也会打湿观者的心。这会儿，看着这五月荒草地上的景象，我们不由自主地吐出一声叹息。蟋蟀小姐的姿仪，与这春日的光景实在不怎么相称。裹住她背影的，确是一件春日外套，可这外套已经褪色，那色调更适合被唤作秋日外套。而我们，也正琢磨着不如就把这蟋蟀小姐的姿仪放到秋风里去吧。言归正传，幸田当八大夫的学说大抵如下：人一旦因为药物副作用或沉重的心理负担等因素导致脑神经秩序遭到扰乱，便会一个劲地想要逃避夏日艳阳那般强烈炽热的东西；同时，也会拒斥临近凋谢的花朵散发的香气那般纤弱微妙的东西。这是由患病者的体质所造成的必然心理反应，绝不是我等分裂心理学徒的牵强附会！如若病患不得不在太阳光线异常强烈的季节外出，他会将白天的外出推迟至夜晚，或者紧闭门窗窝在房中等待雨日，不论等上多久。另外，他若不得不从晚春的泡桐花下等诸如此类的地方经过，他的鼻孔会频频发出声响，希望通过急促的鼻息来避免将罹患神经症的泡桐香气吸入体内。总而言之，此乃神经症患者对神经症患者的拒斥反应。其目的是防患于未然，以免同类相悲。虽说病患与泡桐花一方为人一方为植物，本就有别，但基于同被神经症侵扰这一点，是为同类云云。

由于记忆恍惚，说不定我们歪曲了幸田当八大夫的学说，总之蟋蟀小姐努力不去吸入泡桐的气味，正是出于上边这种心理。她走过泡桐树边，穿过停车场走去了图书馆。

且让我们用极轻极小的声音道破这个秘密吧。在恶魔制剂的驱使下，我们这故事的女主人公，这段时间恋爱了。此段恋情的开端要我们怎么说才能说得明白？这可真是一场弯弯绕绕的恋情。

有一日，蟋蟀小姐因着一个不经意的偶然，发现了下边这样一篇故事。

古时有一男一女，敏慧互敬情投意合，从无异心。

故事由此开篇，自有一种古风古韵，讲述了一个古怪诗人的情爱经历。诗人名叫威廉夏普，

因为内心一次不经意的萌动，对当红女诗人菲奥娜·麦克劳德产生了情愫。二人的恋情绵柔细密，胜过世间任何一场爱恋。据说你来我往，互通了不少情意绵绵的书信，末了还写了诗。若依从我国惯例，大抵就是互赠一些诸如下边两首和歌这样的诗歌。

遇君方知此心情  
世人皆道系恋情  
返  
不识恋爱何滋味  
敢问世人爱为何

不过这里边有一件事很是神秘，世间众人，从没有谁见过麦克劳德的样貌。也出于这个缘故，在同时代的人看来，麦克劳德是一位仿若空气一般的女诗人。故事里说，她生活在一处不为人知的隐秘角落，创作着白蒙蒙的被称为神秘派的诗篇。有时，麦克劳德也会来到心上人夏普的住处，小居几日。在这里，麦克劳德究竟度过了一段怎样的时光？她只是埋头写诗，自始至终，依旧是个不得见真容的神秘诗人。就因为这样，夏普的那些熟人一有机会便向他抗议。这群人纯属一丘之貉，绝不容许这世上存在诸如神秘派这样的东西，为说服夏普还搬出了一套说辞：“久闻菲奥娜·麦克劳德小姐乃是一位姿容秀美、灼灼其华的女诗人。然阁下对吾等友人吝啬至极，一次都未曾让吾等窥见麦克劳德小姐的风采。今日吾等势必要一睹小姐之芳容。为达此愿，吾等候上多少个钟点皆在所不惜。”

威廉·夏普听了此话，额前生出硕大一片阴云，也不看对方的脸便自顾自言语起来。看他这模样怕是并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这自言自语断了又续，续了又断，恍如晚秋的芭蕉“啊，此般萎靡颓唐的愿望该不应该。麦克劳德她，此刻，已然踏上旅途。她现今，早已经，不在我身旁。恰在昨日傍晚，啊，我，不知为何丢了魂魄，渐渐遗忘，时间，时间的长短，依稀记得似是昨日黄昏。菲奥娜与我，依偎一处，啊，相依相偎，看那苍穹中的恒星。近旁稍远处，那行星也……”

“夏普！来客终于忍不住提醒道吾等所求之事皆是这地面上的事与天文全无干系恒星！还扯什么行星！你这算什么意思。所谓指天胡诌，说的断然就是阁下这副德行。所以才说恋爱中的人不知廉耻，且精明狡诈。炫恩爱的话甩出一半，之后便拿天文做避难所。夏普啊夏普！你们相依相偎，而后阁下就……”

话到此处，夏普给出了回应。此种类型的来客，说到底，不抖出些接吻、床第之事便不会善罢甘休。威廉·夏普连着一声叹息说道：

“自然，我们接吻了。呜呼，于我和菲奥娜而言，接吻又有什么意义？”

“恰在我眼望行星的时候，啊，我的菲奥娜，钻出了我的心脏，不知去往了何方……”

“呵，此般萎靡颓唐的痴话该听不该听。吾等眼下只想要一杯猛摇出泡的希特隆，外加一柄团扇。这团扇，必须是给东洋小炭炉煽风点火的涩团扇。速速给吾等取一柄来，愈大愈好。吾等听闻，这东西的颜色就跟人愁眉苦脸时的面色差不多，在耳朵被灌进炫恩爱的痴言乱语之后，可以为吾等送来一习清风。”

夏普终于沉默了。客人们依然叫嚣着要见麦克劳德小姐：“吾等这鼻子对红粉佳人殊为敏感。她与吾等之间的距离不超过九尺，呵呵，正是此等香气！麦克劳德小姐定然就在相邻的房间，正废寝忘食地沉溺于妆饰！这味道，呵呵，早在图坦卡蒙的时代便已存在，乃是绵绵久久流传于世的那什么香料！当它与佳人肌肤的芳香混合在一起时，便会让吾等风流男士苦恼至死！夏普！快将麦克劳德小姐从梳妆室里带出来！”客人们高声喧嚷。夏普始终沉默。

就这样，威廉·夏普与菲奥娜·麦克劳德，悠悠岁月在二人之间流逝而去。在这岁月的间隙，人们终究，不曾一睹麦克劳德的姿仪。之后终有一日，在夏普离世后又过了一段时日，人们才终于知晓，菲奥娜·麦克劳德，已经与她心爱的威廉·夏普，在同一天的同一时刻，被召去了亘古恒久的神的领地。她离去时，与威廉同卧一张睡榻，患同一种疾病。只不过，映入众人眼中的唯一具尸骨：男人威廉·夏普的尸骸。

好了，我们该回到读过这篇古风故事的蟋蟀小姐身边了。蟋蟀小姐一页一页翻读这古风的文章，只觉一阵秋风拂过身心。此般感觉，一直以来，皆是蟋蟀小姐被某样东西深深打动时才有的体会。这究竟是一种心理作用，还是真实感受？我们也无从断言。而这秋风拂过之后，很快，蟋蟀小姐必然会陷入一场恋爱。对象一直都是，送来秋风拂过她身心的物、事，还有人。

因为大脑一次不经意的跳跃，我们似乎把恋爱的边界扩展至了无限大。不论怎么说，依照一贯的程序，我们这位女主人公恋上了异国的诗人。

再回过头说一说，这篇古风故事以下边这般结尾告终：一具尸骸送走了两个灵魂，这样的死绝非世间惯有。然而，这微不足道的隐衷又有何人能知？人们埋葬的，终究只是生于大地而向往苍穹的诗人威廉·夏普的尸骸。（故事里说，他，也与他心爱的菲奥娜·麦克劳德一样，是一位神秘的诗人，将一腔诗魂托付给了太阳的游走与行星的嬉戏。）好几人一边致哀，一边暗自琢磨：麦克劳德小姐，此刻又在哪一方土地，为威廉的死而悲叹？还有一些绅士总在腰间口袋里塞满法国火腿，满得几乎溢出来，他们在送葬的队列中愈发胖出一大圈，在心底肆无忌惮地大声思忖：哎哟哟，你们看，这一年到头云啊霞啊呻吟不已的夏普，终于也被老天爷给召去了！这苍白的灵魂，还真以为自己魂归故里了是吗？什么月亮星星太阳的通道无限悠久远茫惘！这都什么玩意儿！净将些莫名其妙的东西罗列在一起！所以才会衍生出，灵魂伴风行走在天涯的天空！简直就是疯言疯语！话说回来，待这送葬的队伍到了该到的地方，吾等还要代表发胖绅士，为夏普的在天之灵献上一份悼词！这不是自相矛盾嘛！送葬的队伍马上就要到该到的地方了！献词就献词吧！届时，吾等就把这平日里的大嗓门多少搞得湿腻些，给他这样说：

列席葬礼的诸位先生们女士们！

威廉·夏普

乃是一位气性诗人！

据说在他荣耀的一生中

写就了三本，抑或是七本诗集，

悉数皆是

抽象名词罗列而成的高贵思想！

还有那位菲奥娜·麦克劳德小姐！哦，我亲爱的麦克劳德小姐！因为夏普的吝啬，吾等这许多年来终究没能触摸到小姐的半截眉毛！都怪夏普那个浑蛋，总是顾左右而言他，到头来竟未让吾等与麦克劳德小姐见上一面！真是何等强烈的嫉妒！亲爱的麦克劳德小姐！今时今日，你终于从夏普的嫉妒中解放出来，想必正自由自在地在某处土地上伸着懒腰吧！总之，女人这种生物，失去心爱之人的第二日，便可以餐饭不误！此乃吾等亲历千名女子后确立的亘古不变的哲理！那些个贱人，眼睛里虽然流着眼泪，嘴巴里却已经吃起了新碗碟里的饭食！吾等最亲爱的麦克劳德小姐，啊，你究竟在哪一方土地上等待着新的碗碟！啊，吾等的鼻子里，又一次，传来图坦卡蒙的香料气味！吾等不惜掘地三尺也势必要将你的身姿找出来！而后，该用何种香料铺地，吾等已经迷失在选择之中！谁让女人这种生物，每一个皆因体质不同而散发迥异的体香！啊！就因为夏普那平白无故的嫉妒，吾等至今都不知道麦克劳德小姐有着怎样的体香！嫉妒至此，世间可曾还有第二人！吾等无论如何不惜掘地三尺也一定要把麦克劳德小姐找出来！虽然她在诗的层面，与夏普一样成天絮叨些云啊雾啊，可若真的掘地三尺将她找寻出来，保不定反倒有一副意想不到的肉体！传言说，她写给夏普的情书，有一些与她的诗境截然相反，分外炽烈燃情！没错，就该这样！想必这麦克劳德小姐一定不是什么云啊雾啊的柳腰女子！听说近来在那东洋的什么地方建起了一座怪异的医院！那里的一介医师幸田当八在报告里云，柳腰女子写的诗反倒脂肥玉润，而腰身肥硕的女人写的诗却如同丝缕青烟！这理论真是何等伟大！吾等终于要不惜掘地三尺寻出麦克劳德小姐的身姿了！

就这样，静静的送葬队列，载着各式各样的心思，朝该去的地方流淌而去。然而，关于菲奥娜麦克劳德身居何处，人们却都料想错了。如今，她正在那不为人知的地方，在威廉·夏普的尸骸里，化作一个不具肉身的死者横卧着，接受着不为人知的送葬。菲奥娜·麦克劳德，本就是个虚幻的女诗人，是诗人夏普的“分心”塑造出来的没有肉体的女诗人，所以此刻，她已与心爱的夏普一起消匿于这片大地。不过在世时，二人以情书互诉衷肠，却是无可置疑的事实。当“分心”诗人威廉·夏普的心是男人时，便拿起夏普的笔给心爱的麦克劳德写情书；而当诗人的心变作女人时，则拿起麦克劳德的笔给心爱的夏普写情书。关于此种往来，之后再过些年月，想必会出现一位心理医生给之冠上“托培尔根格尔”这般晦涩的名字，以此剖析夏普的灵魂。或者，说不定，会有那么一个住在东洋阁楼小屋里的飘忽无常的女诗人，心血来潮地，循着她飘忽无常的诗境，用她那简陋的笔来书写这位异域和水晶的女诗人。心理医生，还有诗人。真是何等亵渎的一群人。无论哪个时代，他们在厄洛斯与缪斯的神的领地，总是一味施加负面效应。他们越是行动，恐怕威廉·夏普生前居住的神秘世界便越是会分崩离析。

——蟋蟀小姐阅读的古风故事到此处便结束了。

图书馆偏离普通街区，坐落在多少更靠近苍穹的山上。整座建筑罩着一层灰色。在蟋

蟀小姐看来，此栋建筑的风貌如同一只任性善变的火鸡——太阳照耀下是一座神气活现的亮色象牙塔，下过雨之后则会变成殊为引人亲近的暗色。在雨中暗沉下来的灰色，对于因药粉而萎靡疲累的大脑，也不会锤击得过于猛烈。

话虽如此，可这位捕获蟋蟀小姐芳心的威廉·夏普先生，在这座图书馆建筑里，却是个存在感殊为薄弱的诗人。尽管已经查阅数日，蟋蟀小姐的笔记本，却全然不曾丰富起来。于是蟋蟀小姐朝暮去陷入深深的悲愁，在笔记本空空旷旷的空白处画下心头飘来荡去的种种云朵的残片。她在阅读庞大的文学史读到一半时停下了（因为蟋蟀小姐悲伤地发现，文学史的体系越是浩繁，作者对蟋蟀小姐正在搜寻的这位诗人越是只字不提），进而思索起文学史家的品位。而后我们这故事的女主人公，沉默得像一株植物，开始毫无用地杀起了时间。她的此种行为无助于地球上的任何一个人。

基于前边提到的此般种种，蟋蟀小姐关于夏普先生的笔记极度贫乏。终于，在蟋蟀小姐捧起的不知第几册文学史上，附了这样一篇能给她的哀愁一个回应的序文：

最末须申明一点，此出版书店的主人抱有一种高贵的思想，他对吾等明言：但凡那些不健康的文学，那些罹患神经症的文学等，一行字都不予出版。为此，吾等不得不从备下的稿件中删去两三名令书店主人嫌恶的诗人。在此谨列出本次割爱的诗人之名，以慰吾等之心。以下排名不分先后：“思考的芦苇集团”三人，“黄色神经派”数人，“可卡因后期派”所有人。奥斯卡·王尔德，因其离经叛道。威廉·夏普，因其一有机会便化身女子，迷惑世人。

可此般序文于蟋蟀小姐又有何用？不过就是让脑袋疼得更厉害而已。人在悲伤或失望之际平日里的病灶便会愈发增重吧。出于这个缘故，蟋蟀小姐不得不跌跌撞撞走出阅览室，去到地下室昏暗的空气里。

蟋蟀小姐走下狭窄的石阶，转入右手边的廊道。右边是一条室内地下街道，有两三家小店。往左走，身体不由自主进了妇人食堂。只要不是吃饭时间，此地总是静悄悄的，昏暗的空气凝滞不动。更妙的是，还为蟋蟀小姐常备了冲药粉的白开水。白开水从大大的热水器中源源不断地涌出，经窗户上稀薄的光一照，灰蒙蒙一片。蟋蟀小姐服下旧手包里的药粉。别人应该都看见了吧。这房间里的空气真是老旧得可以。窗玻璃的另一边，地下室外的庭院里，五月细雨迷蒙。此种时候，人类这种生物，要么高声吼唱，要么找人聊天，要么就会想吃一个面包。我们这故事的女主人公，平日住在租赁房，有着这样的经历，自然很是清楚人类的这种心思。所以这一刻，蟋蟀小姐思量着至少弄个面包啃啃。恰在此时，地下室的角落，响起一阵削铅笔的声音。在地下室一角最浓重的昏暗里，一位客人先到一步。蟋蟀小姐，一丝疑念都未起，坚信对方正是背诵产婆学的那位。这对蟋蟀小姐来说恰是一个合适的交谈对象。可对方，没有半点要接受蟋蟀小姐问候的迹象，只是一门心思、片刻不停地闷头学习。曾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蟋蟀小姐并不知悉对方的存在，而比这更长的是，看样子对方到现在都未曾注意到她。这可真叫人伤心。无奈之下，蟋蟀小姐走出食堂去了面包房。

“给我一根麻花面包。”

几乎快忘记如何与人说话的蟋蟀小姐，从喉咙里吐出一串冰冷的声音。面包房的女孩略微一愣，抬眼看看蟋蟀小姐，递上了装在袋子里的面包。

蟋蟀小姐在食堂里啃掉半根麻花面包，关于她内心的色调，我们无话可说。她一心专注于那根面包。先前那会儿因为那篇文学史序文而遭受重击的事实，似乎也已忘在了脑后。面包吃得差不多时，蟋蟀小姐啃食的动作变得极度缓慢，紧接着，她一边兴致缺缺地舔着巧克力馅料，一边主动向对面角落里的那位发起一场不出声的对话：

“你好，产婆学，真的，特别难吗？”

然而，对方依然没完没了地伏在那些要背诵的东西上，无论多久皆是同一个姿势。蟋蟀小姐隔开两张餐桌，朝着对方昏暗的额头，又送去最后一段不动用声音的话语：“热心学习的未亡人（面对这黑黑瘦瘦的对象，蟋蟀小姐除此以外想不出别的称呼），等秋日差不多到来时，希望你已经成为一名产婆。愿你那时踩着黎明破晓前的蟋蟀，日早早晨生意兴隆。若我嘴里真蹦出‘蟋蟀’这么一个词，你大抵会笑话我吧。可是，我要用很小很小的声音跟你说说我的心里话。我这个人，一整年，皆会在意蟋蟀之类的东西。就因为这样，我一年到头，全在思考那些无用的事情。可就算是这样的思考，终究还是，需要面包。因为这样，我一整年，都不得不用电报惊扰我的阿母。书信啊明信片什么的，既费事又叫人难为情。我阿母住在乡下。未亡人，你也有母亲吧？啊，愿她长命百岁。不过，未亡人，不论在哪个时代，母亲似乎都不是一个好差事呢。女儿脑袋得了病，阿母会患上好几倍的心病。唉，菲奥娜·麦克劳德！你作为一个女诗人活着的那会儿，难道就不曾想过，向科学家提

出这样一个要求——找到吸入霞霭便可延续人生命的办法？我一整年皆在渴盼。我只是，  
不愿再一次一次‘面包！面包！面包！’地吵扰下去了。”

地下室食堂已是傍晚。

(一九三二年七月)



### 尾崎翠

一八九六年生于日本鸟取县，十八岁便开始在杂志上发表作品。一九三一年前后在日本文坛逐渐崭露头角，连载中的《第七官界彷徨》反响热烈，备受好评；次年发表的《蟋蟀小姐》受到太宰治的极高评价。但当时她身体欠佳，深受幻觉的困扰，一九三二年九月被长兄从东京带回鸟取养病，之后逐渐沉寂。一九六九年，文艺评论家平野谦和花田清辉将《第七官界彷徨》收录于《全集·现代文学的发现》第六卷《黑色幽默》，以此为契机，人们重新认识到其作品的文学价值。尾崎翠拒绝了纷至沓来的采访邀约，于一九七一年安静离世，享年七十五岁。

### 新书试读

来自新近好书的试读章节，由小鸟文学编辑部  
从近期出版物中挑选而来。祝阅读愉快。



题图来自 [Eea Ikeda](#) on Unsplash

## 小说

# 夏物语

## 川上未映子 | 新书推荐

我无法决定自己的出生，  
却能够决定是否成为母亲。

《夏物语》是川上未映子芥川奖获奖小说《乳与卵》的续作，分为上下两部。上半部改写了《乳与卵》，以原作为基础添加了新的情节，并划分了章节。下半部讲述了八年之后，立志成为作家的夏子终于出版了一本短篇小说集，开始通过写作维持生计。然而没有交往对象的三十八岁的夏子突然强烈地“想见自己的孩子”，她开始寻找未婚生子的方法。在此过程中，她遇到了形形色色的人，其中既有单身妈妈，也有通过人工授精诞生的人。这些人动摇了夏子期盼的心，促使她对生育及生命的意义有了新的思考。

作为《乳与卵》的续作，本书继承了前作特有的文学表述方式与思想内涵，更深入描述女性特别是年轻女性的生活状态、她们的情感世界、她们关心的问题，为其事业、家庭、未来指引方向。

经上海译文出版社授权，我们节选了第十三章分享给读者。



新年的第一个月就这样过去了。

我自己也在写着每天都不知道写了什么、能写多少的小说，十分疲惫。我也想过，我从

一开始就默默无闻，虽然也有好几部连载作品，而且第一本书在两年前稍微畅销了一点，但是到了现在已经谁都不记得我了吧。虽说仙川小姐不聊小说确实让我松了一口气，但另一方面，实际上也就是已经没有什么期待了不是吗？这样一想我有些沮丧。

每天都像找借口似的看资料、做笔记，不断地重写同一个地方。书店每天都摆放着几十本新书，不断地诞生着新人作家。围绕着不孕治疗的博客不断增加又减少，同时也诞生了很多婴儿。随时随地都有人邂逅了和到昨天为止都不同的人生和感情，并且迈出了新的一步。只有我丝毫未变。只是不动而已，就仿佛让人每一秒都想从那耀眼得不由让人眯起眼睛的事情上抽离。

在工作的间隙，晚上睡觉之前，我反复读了逢泽润的采访报道。上网一搜索，虽然出现了他所属的协会的网站、SNS 和负责人的采访报道，但是关于逢泽先生自己的信息却近乎没有。这是他的本名还是用于活动的假名，我也不知道。只有一条，在以前的研讨会上报告中使用的照片的角落里，发现了虽然低着头看不见脸，但是发型和身高像是逢泽的人。在逢泽所属的协会的网站上可以阅读当事人们投稿的文章，但是追溯过去的内容调查了一下，好像没有登载逢泽先生的文章。

我打开了手机的日历，点击了只有一个记号的二十九日。那是上个月逢泽先生告诉我的研讨会的开幕日，我本来打算去看看。但是，一想到那天的事情我的心情就灰暗了一点。我想我们应该更多地去了解当事者和像我这样别无选择而察觉到了 AID 的可能性的人们，或者反对 AID 的人们的心情和想法，但是一想到去年圣诞节的聚会，我就心情郁闷了。我渐渐不知道该不该去了。

但是，我心想，不是有想问逢泽先生的事情吗？通过采访的书和圣诞节那天的话，我已经知道了逢泽先生对于 AID 的想法，但是应该还有其他想问的事情。比如说，通过 AID 出生的人们，在不知道真相的情况下活着，被欺骗深深地伤害着。那么，如果一开始就毫不隐瞒地说出来的话会怎么样呢？如果孩子能保障获得捐献者个人信息的权利的话，大家是否会赞成这项技术呢？不清楚自己的身世的人不仅限于 AID，其他还有很多，但是 AID 和那些状况的区别在哪里呢——很多事情在脑海中浮现出来又消失了，可哪个问题作为对当事人的提问较为妥当，哪个问题是不应该问的，我越想越不明白。但是，最后我还是决定去讨论会看看。

会场里有很多人，感觉和上个月的聚会完全不一样。虽然没有那么大，不过也是能容纳两百人的大厅的规模，像是围着舞台设置成扇形的观众席入座了一半以上。我坐在最后一排靠边的座位上，等待报告会开始。

第一个议程是题为《日本非配偶者间的人工授精的现状和课题》的专家发言。用幻灯片对三年前秋天自民党制定的关于生殖辅助医疗的法案，以及过去各项议会上的成果进行了说明。内容是从各个角度指出了日本关于生殖伦理的讨论和法律建立是多么的落后，要求尽快进行改革。

第二位上台的也是专家。他叙述除了一般以 AID 的方法生下的孩子，还有用丈夫生前抽取并冻结的精子生下的孩子的认知问题，以及国家如何对待通过捐卵、代理孕母出生的孩子。他列举了过去发生过的审判事例，说明了审判的经过和结果。无论哪一种情况，都是把出生的孩子的福利放在第一位，最终落在主张不能把人用作生殖的手段，排除商业主义，保护人类的尊严。

这两个环节结束后有十分钟的休息时间，听众们稀稀拉拉地离开座位，四处活动。几个像是工作人员的人在舞台旁边整理麦克风的电线，移动台上的桌子和椅子，但是哪里都看不见像是逢泽先生的人的身影。在会场入口的接待处也没有看到。虽然他总说自己是做事务性工作的但那是像更新网站 Facebook 之类的宣传性工作，所以今天可能没来。我从手提包里取出塑料瓶装的茶，像要确保液体湿润了喉咙内侧似的，慢慢地喝下去。

从第一位专家讲话的中途开始，我的太阳穴就开始嘶嘶拉拉地疼，第二位专家开始发言后，我的头就一直固定着，一动不动地侧耳倾听，变得十分痛苦。我最近睡眠浅，夜里会醒好几次。我漫不经心地看了看会场，人们回到了座位上。会场的照明情况发生了变化，昭告着第三部分议程的开始。是研究人员、当事者和医疗相关人员的三方对谈。说起来，对我来说这应该是最重要的，可是听了三方对谈开始十五分钟后还没结束的以研究者为基调的演讲，我的头痛就越来越厉害了。虽然知道这些都是很重要的发言，但是因为实在坐不住了就离开了座位。

我走出会场，在厕所仔细地洗手，然后看了看映在镜子里的自己的脸。我的脸很难看。没有打理过的头发看上去毫无光泽，而且乱蓬蓬的，本打算好好画一画的眉毛，左右也不平衡。虽然也涂了粉底，但是雀斑和暗斑都看得一清二楚，粉底的效果一点也没有发挥出

来。因为是好几年前买的，所以可能是渗油变质了。我看着自己血色不好、皮肤也没有张力、不净透的脸，觉得和什么很相似。像慢煮的茄子。不是皮，而是像极了浅绿色的软趴又有弹力的瓤。我怎么也想不到眼前这个干巴巴的疲乏女人会孕育出新的生命。想象起来也觉得十分空虚。然后我把手放在洗脸台上，花了很长时间拉伸脖子。“啪嗒”发出了没有感情的声音。

然后我又仔细地洗了一次手后走了出去，在空无一人的走廊尽头，看到摆了接待处桌子的大厅长椅上坐着一个男人，是逢泽润。要乘坐自动扶梯就必须从那张长椅前通过，我紧握着手提包走了过去。在我犹豫要不要跟他打招呼的瞬间，我们的视线交汇了，我条件反射性地向他点头示意，而逢泽先生也比我稍迟一些低下了头。正当我觉得只能硬着头皮走过去的时候，逢泽先生开口说话了。

“您来了啊，这就要回去了吗？”

逢泽先生用比上次在电梯里更柔和的语调说道，手里只拿着装有咖啡的纸杯没有拿包，穿着和上次一样的黑色毛衣、深棕色的棉布裤子和黑色运动鞋。

“我本来想听到最后的。”

“时间太长了吗。”

“逢泽先生不进去吗？”

于是，不知道是不是对从只擦肩而过一次的人口中，毫不犹豫地说出了自己的名字这件事感到意外，逢泽先生稍微停顿了一下。然后，他说今天在做休息室周边的工作。

“那个，我叫夏目。”我自我介绍道，“不过没带名片。”

我从包里取出自己的书拿在手上。“我在写小说。”

逢泽先生稍微露出了惊讶的表情，扬起眉毛看着我。

“您是作家吗？”

“作品还只有这一本。”我说着“请您雅正”，把书递给了逢泽先生。逢泽先生伸手接过书，一边说“好厉害啊”，一边盯着封面。然后他的目光移到了书脊的书名上，仔细读了封底和腰封上写的文字后抬起了头。

“真厉害啊。写书这件事我都想象不出来。他说着要把书还给我，我又附上一句‘请您雅正’。”

“可以吗？”

“嗯。”我点了好几次头。

逢泽先生手里拿着咖啡和书向右挪了一下，像是在说“请”一样空出了一个人的座位。我微微点头后坐到长椅上，和逢泽先生一起默默地看了一会儿他手里的书。我很紧张，朝旁边看了一眼，映入眼帘的是正把手肘支在膝盖上，身子前倾着啪啪翻着书的逢泽先生的头。只见中分的头发和之前一样整洁地向后方梳去。在近处看才发现，他的头发比我想象中还要细，不毛糙又服帖。我想起了映在厕所镜子里的自己没有光泽的硬头发。

“您今天心情很好吗？”

“唉？”逢泽先生惊讶地抬起了头。我有些焦虑，觉得必须要说点什么，本来是想表达和上次的气氛不一样的意思，但我察觉到这个说法有些奇怪，于是涨红了脸。尽管我觉得需要补充说明一下，但可能又会说些多余的话，于是什么也没有说。逢泽先生也沉默着。过了一会儿，一个六十多岁戴着遮住耳朵的针织帽的阿姨像传送带上的行李一样，咯噔咯噔地坐着自动扶梯上来了，到了楼层以后就从我们眼前慢慢走过。

“您可能不记得了。”我说，“我只是在一起坐电梯的时候跟您搭过话而已，那个，我在考虑 AID。”

逢泽先生对此什么也没说，只是过了一会儿后点了一下头。虽然逢泽先生并没有露出明显的厌恶表情，但我察觉到他内心对为什么要把这种个人的事情说给毫无关系的自己听感到怪异，或者说对我为什么一定要单方面地说这些话感到近似不快的困惑。这很正常。如果是我，我也会这么想吧。我深呼吸了一下，继续说：

“您可能会想为什么要说这些，也许还会觉得扫兴。”

“没有。”逢泽先生说，“虽然我是做事务性工作的，但毕竟是这个会议的相关人员，经常遇到这种情况。夏目小姐是关西人吗？”

“是的。我是大阪人。”

“一开始我没注意到。您是根据说话对象来选择用标准语还是关西方言吗？”

“虽然没有特别注意，但是严肃或者恭敬地说话的时候，就会用标准语。”

“原来如此。”逢泽先生点头说，“我的可能也和那些有关系吧。”

“我的？”

“您刚才说的关于我心情的事。今天有很多人来，之后也有恳谈会之类，和别人说了相当长时间的话，所以也许有些紧张。”

“紧张的话心情会变好吗？”

“表面上会变好。”逢泽先生笑了，“前几天——那是圣诞节吧，在自由之丘的时候确实迷迷糊糊的呢。”

“不是迷迷糊糊的。”我说，“应该说是在思考别的事情吧，总觉得是那种感觉。”

“你是一九七八年出生的，那跟我同一年啊。”逢泽看着封面勒口上印着的简历说道，“不过好厉害啊。小说全部都是用文字写成的，而且是一个人独立写吧。这是我第一次在现实中见到小说家。”

“如果能成为更优秀的小说家就好了。”我耸了耸肩。于是沉默了一阵子后，我觉得必须要说点什么，“逢泽先生平时……”我刚想问逢泽先生的工作，可又想到，如果是由他自己告诉我的话也就罢了，突然问别人的职业会不会很失礼，我又沉默了。我给逢泽先生书，是因为通过他的采访和演讲，只有我单方面地了解了关于逢泽先生的个人情况，无论如何我都觉得不公平。不过当然了，这是我自己的心里不舒服，和逢泽先生完全没有关系。但是逢泽先生明白了我提问的后半句，告诉我他的工作是内科医生。

“是医生啊。”

“是的。”逢泽先生说，“虽然如此，我没有固定的上班地点。”

“没有固定上班地点的医生。”我重复道，“基本上就是不工作的医生吗？”

“也可以这么说，不过，某种程度上不工作就没法生活啊。”逢泽先生笑道，“一开始是在医院上班的。但是，发生了很多事，所以现在在各处辗转。”

“在各个医院之间吗？”

“是的。登记好后，叫我了就去。就像是医生的派遣兼职吧。新学期的时候去健康体检什么的。还有国家考试的补习班讲师。”

“我以为所有的医生都在医院工作。”我说。

“工作的时候，基本上是在医院没错。”逢泽笑着，“只不过，没有所属单位。倒是有就算到了六七十岁也一心一意专门帮人进行健康体检的医生，过着过一天算一天的生活，我很受鼓舞。”

“也就是说——是时薪制吗？”我在惊讶的同时，把浮现在脑海中的话直接说了出来，意识到自己又说了些欠妥当的话，于是耸了耸肩。“对不起，已经问了您工作的事情，现在就连薪资都问了。”

“没关系。逢泽先生开心地笑了也许是偏见，不过这对于大阪人来说是很自然的事情吧。”

“不是，怎么说呢。”我着急地说，“但是确实，对于整体上的薪资，该说是有点好奇吗，可能也是有的。想问大概有多少啊。”

“啊，原来如此。用‘多少’来问的话，是啊，大概两万日元左右吧，真的没有人手的紧急情况时大概是三万吧。”

“一天？”

“不，时薪。”

“唉唉唉？”我吃惊得不由弯下腰，大声说道，“时薪两万日元？工作五、五个小时的话就有十万日元？”

“不是每天都有，有时是半天，不定期才有，完全没有任何保障。”

“这……医生执照果然是最厉害的了。”

然后我们又陷入了沉默。我觉得不管怎么想都是我说了、问了多余的话，但是说了具体金额的不是我而是逢泽先生，像这样的借口一直在脑子里转来转去。逢泽先生喝了一口恐怕已经凉透了的咖啡，我也喝了塑料瓶装的茶。

“那个……”我下定决心，把这一个月来自己一直在想的事情坦率地说出来：

“前几天的聚会也是这样，虽然我拜读了采访您的书，想象了很多情况，我以为这样就算了解了，但其实还有很多想问逢泽先生的事情。”

“是想问当事人对吧。”逢泽先生说。

“是的。”我点头同意，“很抱歉这跟逢泽先生完全没有任何关系，只是为了考虑今后自己该怎么做——虽然说是今后，但也没什么时间了。”

“书籍啊关于这些问题的报道之类的都读过了吧。”

“是的，虽然没有读很多。”

“我已经说过了。”逢泽先生说，“无论是站在哪个立场的人都能关心 AID 和其当事人，这就是我们活动的主旨。如果还有什么事情的话请联系我。”

“谢谢。”我低下了头。

“书，谢谢你了。”逢泽先生看了看手里的书，“夏目夏子小姐，您喜欢‘夏’这个汉字吗？”

“那是我的真名。”我说。

“真的吗？”

“真的。”

会场的门开了，很多人喧闹着走出来，挤满了大厅。我注意到了一位女性。穿着长度及膝的黑色连衣裙，头发在后面扎成一束的那位女性仿佛在找人似的看看周围，注意到逢泽先生后就朝这边走来。她身材矮小，全身的线条非常纤细，锁骨看起来像能抓住似的清晰地浮起。白色的皮肤上，深深浅浅的雀斑呈椭圆形从鼻子到脸颊轻柔地散开，其形状和烟雾般的颜色让人想起不知何时在图鉴上看到过的星云。我觉得她的模样好像在哪里见过。我们轻轻点头打了招呼。

“这位是夏目小姐。之前——说起来是去年了吧，她也来了自由之丘的聚会。”

“难道，是最后发言的那位？”那位女性看着我说道。

“啊，是嘛。之前你在会场递过麦克风，所以你们两位见过一面的啊。”逢泽先生点点头，“这位是善小姐，她和我一样也是当事人，是在同一个协会活动的同伴，或者说是成员。”

“你好。”我站起来打了个招呼。

“我是善。”善百合子把名片递给我。

“夏目小姐是小说家哦。”逢泽先生给她看了手里的书说道。

“是嘛。”善百合子像眯起眼睛似的看了一会儿封面，流于表面地微笑了一下。

“只写了一本而已。”我像找借口似的摇了摇头，“之前的聚会也是，其实是有很多事情想问逢泽先生。”

“采访吗？”善百合子真的只是将脸转过很微小的角度来看了看我。

“不是，我在考虑 AID，对此有很多想问的事情。”

善百合子缓缓眨了眨眼，直直地盯了我好一会儿。然后她只微微点了一下头，眯着眼睛露出了微笑，那个表情有种奇妙的压迫感，感觉就好像我变成了等待老师命令的孩子似的。她最终什么也没说。

“差不多该走了吧，老师们也去房间了。”

善百合子对逢泽先生如此说道，接着用眼神略微向我致意后就走开了。逢泽先生确认了一下手表的时间后站了起来，说那我回休息室去了，然后向我低头行礼。

“邮件……”我说，“上个月收到的您的名片上有邮箱地址，我会把问题发到那里。”

“好的，发到那里。”说完逢泽先生就走了。两人的背影混在很多人中间，很快就看不见了。

二月里暖和的日子持续着。虽然小说还是老样子，但是看着从窗户照射进来的冬日平静的阳光，总觉得心情平静了下来。有时和卷子打电话聊一些无关紧要的话，和绿子也在 LINE 上交谈。绿子跟我说了新开始打工的餐厅的事情，还把最近读过的书排列开来拍了照片发给我。

我给逢泽先生也发了好几次邮件。他回复我发过去的邮件说，开始读小说了，看完后会给我发感想的，我对此又发了感谢的邮件过去。与前几天在大厅聊天时的印象相比，逢泽先生的邮件行文很简洁，非要说的话有种和初次见面时更接近的感觉，我不知道该用什么样的态度来写邮件，无法很好地掌握他的情绪。

我觉得那天我们在大厅里说话时那种柔的感觉，也许就是所谓的医生的亲切，或者说对患者的关心之类的一种对应方式吧。接着善百合子的脸浮现了出来，从鼻子到脸颊，如同星云的雾霭般的雀斑轻柔地扩散开来。那个人也说她是当事人。年纪多少岁呢？我一边呆呆地思考着这些事情，一边凝视着地毯上的阳光，突然想到逢泽先生没有找到的精子提供者——逢泽先生的亲生父亲是医学部的学生，也就是说一般来想的话，他现在和逢泽先生一样当着医生的概率很高。

第二周的星期二晚上洗完澡后我发现茶几上的电话在振动，一看来电显示是仙川凉子。我看表，已经晚上十点多了，接起电话，仙川小姐说她刚结束工作，在三轩茶屋的车站前，邀请我现在去稍微喝点酒。从语调来看，仙川小姐明显已经喝得很醉了，我刚洗完澡，头发还是湿的，一瞬间犹豫着是不是说“我打算睡觉了”，然后拒绝比较好。但是感觉仙川小姐似乎是难得的故意没有察觉对方的状况，或者说心里有谱却发出了邀请，所以最终我答应了。我告诉她我把头发弄干后就去，让她找家合适的店进去后发 LINE 给我，然后挂了电话。

那家店是离车站很近的地下酒吧。我白天去超市的时候经常从这栋建筑物前面经过，但也不知道这里有酒吧。走下陡峭的楼梯，面前有扇沉重的铁门，从上方推门进去，店内暗得让人纳闷有必要这么暗吗，到处可见桌上的烛光在微微摇晃。现在应该是酒吧人气旺盛的时间段，客人的身影却稀稀落落的。有人问我是不是一个人，我回答说与人有约，

然后发现了坐在最里面的位子上的仙川小姐。

一见面，仙川小姐就双手合十再道歉，她笑着说在不合常理的时间邀请你真的很抱歉，但是你能来我很高兴。我说完全没问题。

在昏暗的灯光下，仙川小姐的脸上有一块很浓的阴影，它随着蜡烛忽隐忽现地移动着。仙川小姐的面前已经放着装了威士忌的凹凸不平的玻璃杯和水，我点了啤酒。

“话说这里不会太暗吗？”我说。

“不，现在这个时间这样反而更好不是吗？”

“是嘛，总觉得很有洞穴的感觉。”

“确实。蜡烛也像篝火。”

“不过大衣里面，我穿了一身优衣库的睡衣来的，所以可能灯光上蒙混一下也好。”

“呵呵。但是这样看起来，就感觉全身都是吉尔·桑达系列之类的，不是挺好的嘛，是叫极简吧，听现在在女性杂志工作的前同事说过。”仙川小姐高兴地笑了，喝掉了威士忌。

仙川小姐说，直到刚才她还在二子玉和别的作家聚餐。一般出版社和作家的聚餐好像是在晚上七点左右开始，但是那位作家早睡早起，而且相当爱喝酒，再加上他喜欢久坐，所以编辑在下午四点就被叫到店里集合，结果好像比平时喝得多了。我问她喝了多少酒，仙川小姐说不知道，记不起来了，她口齿倒很清楚，但是眼睛完全定住了，随着谈话的节奏，身体动作和手势的幅度变大了——也就是说，无论从什么角度看都是已经结束，或者说已经喝过头的状态了。我笑说还是回去比较好吧，仙川小姐恶作剧似的笑了，说别这么说嘛，可总觉得她的黑眼珠呆滞不动，我默默地喝了啤酒。

虽然是特意叫我出来，但是仙川小姐好像没有今天必须要办的事情要找我，也没有说小说的事情。虽然我有点在意这一点，也有点受伤，但是我觉得对于没有什么特别进展的工作，即使不说宣泄感情的话，也只会让双方都很痛苦，就这样吧。

仙川小姐讲了家里人的事情。她陆陆续续说了些只听一点就知道她是有钱人出身的话题，我对这些话一一发出了感叹。在病弱经常住院的孩提时代有好几个家庭教师在单间里指导她学习；院子应季节变化需要三个园丁；家里的浴室是用大理石铺装的，在那里摔倒后，头部缝了五针的伤痕下雨天还很疼；以前父母的房间里有一个没有上锁的保险箱，那里胡乱插着一捆捆钞票，她和表姐们用那些代替乐高，堆起来又弄倒来玩之类的。虽然现在好像没什么钱了呢，仙川小姐笑着说。

“那、那些财产，都是仙川小姐的吗？”

“我是独生女啊。”仙川小姐眯着眼睛说完后，慢慢地喝下威士忌。接着马上大声咳嗽起来，我等着她停下咳嗽。“啊，威士忌呛到了，呛到了。”

“没事吧？”

“没事没事，哎呀说到哪儿了，如果父母死了的话。”仙川小姐喝了口水点点头。

“是啊，应该会留给我，但是今后还有看护，将来还有养老设施之类的费用，必须要研究一下，可能那样基本上就相互抵消了。那种那么大的充满恶趣味的家就算留下来了，谁又会去住呢？要是在二十三区内的话还行，但是它在八王子的边缘啊。”

“但是万一发生什么，有个不用付房租的地方，心里有底。”我直率地说。

“是啊，如果我有了孩子的话，想法可能会不同吧。”

在仙川小姐说出“孩子”这个词的瞬间，我条件反射般若无其事地随声附和道“孩子啊——”然后装出这也不是什么特别的问题，没什么大不了的气氛提问道：

“关于孩子，你是怎么想的？”

“孩子吗？仙川小姐凝视着没有威士忌的玻璃杯，然后她像想起来了似的大声叫店员来，又点了威士忌。她用双手轻轻地向后抚摸烫得蓬松的头发，带着笑容叹了口气说，孩子啊。

“并不是我不需要，也不是不想要。我是想以我自己的方式努力生活下去，但是这样一来，不知不觉就变成——怎么说呢，生活没有孩子进入的余地了，而且工作也很忙呢。”

我喝了口啤酒，附和道。

“人只要活着，无论如何都要做眼前的事情不是吗？工作嘛，想做的是做不完的，特别是公司职员。生病啦，还有不小心怀孕啦，不发生这种大事的话，生活不是很难有改变吗？我的话，人生中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事情啊。”仙川小姐用双手的手指在眼睛旁边慢慢地揉着说道，“所以，我并不是决定不要孩子。”

我点点头，喝了啤酒。

“但是，我想就顺其自然吧。女人本能地想生孩子啦，是基因的命令啦——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这么说的人，但是这些我是完全没有感觉到。埋头忙着非做不可的事，直到今天，仅此而已。不过我觉得这么说来，依照这个想法，不生孩子不是更自然吗？因为，只要像以前一样自然地过每一天啊。”

“这样说也没错。”我说。

“是啊。”仙川笑着说起大阪方言，“但是……这样的事情，也许我也想过。”

“什么？”

“也许我曾经想过，说不定明天就会发生什么把这一切都彻底改变的事情。”

仙川小姐闭上眼睛轻轻摇了摇头。

“我有想过，也许那就是怀孕之类的事。尽管很模糊，但总有一天我身上可能也会发生、会遇到这类事，就像至今为止大家的人生中遇到过的一样，在我自己的人生中可能也会发生同样的事。但是，那个‘总有一天’并没有降临到我身上。”

仙川小姐沉默了一会儿，盯着放在桌面上的自己的手指。然后她抬起头，微笑着说道：

“夏目小姐也一样吧？”

自此，我们陷入了一阵沉默，喝了各自的酒。我又点了一杯啤酒。仙川小姐看着挂在墙上的海报，过了一会儿说道：

“……但是，现在想起来，没有孩子真是太好了，我反而是这么想的。”

“什么时候会这么想？”

“当然了，我没有孩子，所以无法比较，但是看了周围的人，啊，我经常觉得还好我不用被这种事牵连。虽然不能大声说出来。”仙川小姐说，“当然也有幸福的人吧，但是周围的人动不动为了孩子发高烧或生病被搞得团团转，夹在孩子和工作之间，像字面描述的那样疲惫不堪地上着班。像我们公司有完备的保障都这么累，其他人基本上就连继续工作都不行吧。大家压力都很大，总是抱怨老公。类似的报道或者书不是很多吗？妈妈作家写的是这些吧？生产的书和育儿书之类的，应该说是用辛苦引起读者共鸣的风格吧。谢谢你把我生下来之类的。作家写出这样庸碌的感情到底有什么用呢？在我看来，小说家写那种身边杂记的话，就到此为止了。”

我喝了一口啤酒点点头。

“但是呢，”仙川小姐把威士忌含在嘴里慢慢喝下去，微微一笑，“……每次读这些东西的时候，每当听到因养育孩子而筋疲力尽的同事发牢骚的时候——因为是对夏目小姐我才会这么说，我觉得这些人真是浅薄自私啊。我真的是这样想的。因为不是大体上能察觉到事情会变成这样的吗？而且明明是你们出于喜欢做的事情，事到如今又在说什么呢？还有我同情他们。今后还得辛辛苦苦地不停工作，养育孩子几十年吧。生病啦，考试啦，叛逆期啦，就业啦，好不容易觉得自己人生中的这些事情终于结束了，那些人却又从头开始做同样的事情。真不知道他们是好事还是什么，只能说辛苦你了。我真的是这么想的。我并没有下定决心，但是现在觉得没有孩子也挺好的。”

接下来不知为何话题就变了。我们各自又点了几杯同样的东西，说些无聊的话，互相开玩笑，放声大笑。也聊了游佐的事情。她刚买的电动自行车一天被搬走了两次，弄得狼狈不堪啦，几十张原稿数据都消失了啦之类的事情。眼睛不知不觉间习惯了原先觉得太暗的灯光，挂在墙上的菜单、成排摆着的酒瓶、不知是哪个时代的海报等，各种东西的轮廓清晰地浮现在眼前。仙川小姐默默地站起来，轻轻地抬起右手向厕所走去。穿着西装的一群男性客人和一群有男有女的客人与仙川小姐擦肩而过，店里一下子变得喧闹起来。

等了一会儿仙川小姐也没回来。我听到有人叫店员的声音，到处都能看到手机的液晶屏散发出模糊的光亮。我担心她可能是因为不舒服去呕吐了，就去了洗手间，看到了弯腰支撑在洗脸台上的仙川小姐的背影。

听见我叫她后就抬起头来的仙川小姐在镜子里和我四目相对。灯关着，可我却看见仙川小姐充血的眼睛通红通红的。即便我问她没事吧，她也还是通过镜子紧紧凝视着我，没有回答。我说我去拿水来，仙川小姐摇了摇头。然后她慢慢回头，伸出手臂抱紧了我。一瞬间我不明白发生了什么。在被仙川小姐拥抱的时候，不知为何仙川小姐那长长的手臂向我伸来的那个瞬间的影像在我的脑海中反复重播。我感受到左耳附近仙川小姐的气息，双手悬空着一动也动不了。仙川小姐的肩膀单薄得惊人，环绕在我背上的手臂也同样纤细。只是被拥抱着而已，为什么会如此了解对方的身体呢——我无法理解到底发生了什么，动摇得仿佛能听到心脏的声音，同时也觉得不可思议。

不知道那样大概持续了几秒钟，过了一会儿仙川小姐缓慢地放开了我的身体，又低了一会儿头，然后抬起头来。是平时那个仙川小姐。这时我觉得仙川小姐的嘴唇好像动了一下，似乎说了什么。她应该的确说了什么简短的话，但是没有传到我的耳朵里。

也没有机会确认她说过了什么，她说就喝醉了啊，哎呀喝得太醉了啊，我们结伴回到了座位上，喝掉了剩下的酒，结账后离开了店里。我说要送她上出租车，仙川小姐说：“没关系没关系，天气又冷，你快走吧。”好几次想甩开我。我搀着步履蹒跚的仙川小姐的胳膊，开着玩笑一起走到大街上。仙川小姐乘坐的出租车开走后，我还看了一会儿川流不息的车辆。

虽然不知道怎么样才算够，但我总觉得好像还没喝够。我顺道去了便利店，犹豫了一会儿，从几乎没喝过的威士忌中，选了其中第二小的瓶子。啤酒拿在手里还行，但喝起来太凉了。

我开着空调就出门了，所以房间里很暖和。用手摸了摸头发，刚才明明已经晾干了，不知为什么还是觉得潮。我把外套挂在衣架上，又用吹风机吹了一遍头发，打算想一想刚才在卫生间里发生的事情。仙川小姐醉得很厉害。她工作上可能有很费力的事情。也许她有什么想多说一点的话，也可能刚才是无可奈何地想哭的心情吧。即使将这些事情在脑子里罗列出来，也只有仙川小姐肩膀的单薄和纤瘦，与透过镜子看到的眼睛和灯光的颜色等融合在一起造成的震撼在我的脑海中栩栩如生地复原出来，我不知道如何想象某些东西才能让它们成真。

我把威士忌倒在玻璃杯里喝了。每次喝下去，喉咙只会一下子热起来，一点也不觉得好喝。但是不到二十分钟，瓶子里的酒就剩下不到一半了。我关灯进了被窝。非但没有睡意袭来，脸颊和手脚都发热，怎么也睡不着，明知道这样会更睡不着，可我还是不断地点击手机里各式各样的报道。我看了经常在电脑上看的不孕治疗的博客，顺着贴出来的链接又跳转到了新的博客，就连留言板上展开的毫无结果的对话的细枝末节都看了。在治疗的人、放弃的人以及无关的人，不同的人写下了不同的想法。那些匿名写的不负责任的文章充满了叹息、同情、冷笑、攻击、安慰以及自我怜悯。我越读越兴奋，从太阳穴到头侧都痛得厉害。然后我感到阴暗得瘆人的情绪在胸口盘旋。

在这里诉说痛苦和悲伤，吐露着心情的女人们，不管怎么说还是幸运的。有热心的治疗，有能做的事，有治疗手段，受到认可。就连想要孩子的同性情侣在我看来也是相似的。他们有伴侣不是吗？在这个时间点上，有个一起想要孩子、未来可以一同克服障碍的伴侣，和异性恋者难道不一样吗？既有理解的人，又有网络，应该也有合作的人吧。不管是网络还是书里，到处都是有伴侣的人在发声。现在没有对象，将来也不会有的人的心情在哪里展现呢？谁有生育孩子的权利？你们是在说，只是因为没有对象，只是因为无法做爱，就不被赋予这样的权利吗？

所有人，所有人都进行得不顺利就好了。花了很多钱、很多时间，都就此失败就好了。能做的都做了，所以就死心吧，大家都失望就好了。人变得险恶，互相谩骂，然后乱七八糟地度过剩下的人生就好了，光是把能做的都做了便已强过别人，光是有机会能做就很幸福了，你们是多么的、多么的幸运啊。



川上未映子

日本小说家，年轻女性作家代表人物。1976年8月29日出生于大阪府京桥市，原名川上三枝子。2008年小说《乳与卵》获得第138届芥川奖。2017年和村上春树访谈录《猫头鹰在黄昏起飞》出版。2018年小说《紫藤花和三个女人》出版。曾担任《早稻田文学增刊女性号》编辑。另著有《所有半夜三更的恋人》等。

#### 新书试读

来自新近好书的试读章节，由小鸟文学编辑部从近期出版物中挑选而来。祝阅读愉快。



题图来自 [Alex Padurariu](#) on Unsplash

## 小说

# 家的壁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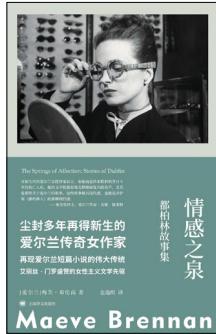
梅芙·布伦南 | 新书推荐

爱尔兰女性主义文学先驱笔下的都柏林故事

《情感之泉》是侨居美国的爱尔兰离散作家梅芙·布伦南去世以后，由出版界重新整理出版的短篇小说集，共收录 21 篇，它们以都柏林某条小街几户中产阶级家庭的生活为轨迹，描摹了极具爱尔兰风情的世俗场景及家庭关系，时而互文，互为补缺。

作者以最汹涌的压抑和最无声的激情借此串联起一个“顺从，但野马也无法从她的体内拽出任何东西来”的女人的一生。这些闪烁着作者童年影子，甚至暗合其父母生平的故事篇篇充满奇迹：她深入夫妻之间每一个隐秘的角落，解剖情感的浮尘，将秘密逼出隐身之地，而一些最感人的故事却奇妙得几乎完全无事发生。其意象之深邃，平淡如水却又残酷尖刻到“能修剪篱笆”的文字，用《纽约时报》书评中的话说，“足以使布伦南回归她缺席已久的虚构小说的世界级宴席上来”。

经群岛图书授权，我们摘选了《家的壁垒》这个故事分享给读者。



连续五天没有下雨，在都柏林，哪怕是在六月份，这也是不寻常的。休伯特·德顿在市中心格雷夫顿街上的一家男装店工作，他今天早晨离开家时带了一件雨衣，但到了商店关门的时间，看到金色的傍晚，他想要一路走回家，而不是坐很久的有轨电车出城。他是一

个遵循习惯的人。他的日常习惯令人感觉舒适，但错过一次电车也不会对他造成任何损害，即使这意味着他将赶不上平时的晚饭时间。休伯特总是想要多走点路。他知道作为一个四十多岁的男人，他锻炼的量远不够。但带着雨衣，他必须决定是拿着它还是把它穿在身上。如果他要开始走路，他不想穿着雨衣走。而且在他的脑海中，他不愿明知前方没有任何值得期待的东西，而在坚硬的人行道上浪费这些锻炼。他想到了山间小径，复杂交错的树林和窄路。他想象自己穿着一件厚厚的套头衫，健步前行，但不是在朝家的方向走。所有的时间里，他一边忙着思考走路，一边匆忙登上他平时坐的电车，站在他一直站的位置，最后，转过他家所在的街角，走过邻居们的房子，来到自家的前门，把钥匙插进锁眼里，在他一贯到家的同一时间。

想着那些健步前行，让他感觉幸福有活力。他感觉健康，心情好，满意于工作一天后回到家，他微笑着踏进前厅。前门的边框上镶嵌着红色的玻璃面板，他总是注意到玻璃，小心地关门。在他把雨衣挂在衣架上的同一瞬间，他瞥了一眼前厅的另一头，看见厨房的门快速被轻轻地关上，但没有快到让他没看到罗斯在那里。她关门时，扭头不看他。

休伯特所站的前厅很狭窄。它不过是一个走道，地上铺着油毡。前厅的另一头有楼梯通往楼上的卧室，更远一点的地方有三级台阶可以走到下面的厨房。前厅很昏暗，尽管外面依然亮着。厨房里开了灯，他在门关上前瞥见了一眼厨房。那是一瞬间的事情，不比瘦成一条线并接着消失的一道光持续得更久。他本也可能根本没看到罗斯，但他却看到她了，他好奇那是否是故意的——像那样给他吃一个闭门羹。他想走到下面的厨房，问些什么，说些什么，什么都可以，但他却沿着前厅，走进后面的起居室里，走到窗边，又立刻在窗边转身，开始盯着门口看。但当然，已经太迟了。到了这个时候，罗斯本该打开门，朝上喊：“是你吗，休伯特？”她一定是听到他走过前厅。你在这栋房子里能听到所有的动静。他听了一下，却压根没听到任何声响。这很奇怪。他至少应该能听到一点点噪声，茶杯和茶碟之类发出的声响，准备晚饭的动静。他可能是一个人在家，虽然他能听到附近有人在活动。他感觉他是独自一人，他希望房间里有人跟他在一起，能给他建议，因为他想要有人叫他径直去下面的厨房里，或者不要去那里，而是立刻坐下来，忽略整件事。

他希望能有人说说话。他感觉到一股冲动——想走到下面的厨房里——他希望有一个他必须服从的命令让他不要实施这股冲动。但他没有收到任何禁令，于是，尽管他知道他不可能下去跟罗斯说话，他也知道这不是被禁止的，他不知道该怎么做。他做不到的是坐下来。他太生气了，无法坐下来。但他在发抖，他在椅子上坐下来，椅子背朝着窗户，在壁炉边，夏季和冬季都摆得靠近炉前砖地，罗斯的安乐椅则摆在他的对面，壁炉前地毯的另一边。壁炉前的地毯是不鲜艳的暖红色，末端有流苏。

休伯特希望他没有看到门关上要是他走路回家的话到家会很晚就不会看到门关上了。但他什么时候下班走路回家过？从来没有。罗斯在她完全有权指望他回家的那一刻，关上门而且她关门时的态度告诉他她看到他自己开门进来，他越是回想，越是肯定他是对的。在他瞥见她的那一瞬，她很仓促，他甚至会说她鬼鬼祟祟的。除非他是在想象事情。但他知道他不是在想象。现在她在下面，好奇他是否看到厨房门被关上，她受到了惊吓，他好奇她是怎么想他的。她没有权力如此表现。这不可容忍。整件事都不可容忍。

然后他听到厨房门打开，楼梯上传来脚步声。当罗斯出现在门口时，休伯特感觉如此厌恶，以至于他微笑了。他看到自己的微笑所造成的困惑，他看到她的手紧握住门把手，就像她的手总是紧握着某样东西一样——比如椅背或她的另一只手——接着她开口说话了。

“晚饭准备好了。”她说。

“我不想吃什么晚饭。”休伯特说。

“怎么了？”她问，“你为什么不想吃晚饭？”

她僵硬地站在那里，脸涨得有点红。显然她明白她是过错方。

“我不想吃什么晚饭，”休伯特说，“就是这么简单，不是吗？而且我可以向你保证这点——下次你像那样给我吃闭门羹，我将离开这个家，不会再回来。我说到做到。”

“休伯特，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她说。

休伯特没说话。

“你要我把饭放在餐盘里端上来吗？”她问。

“不用拿什么餐盘，”休伯特说，“我不要你的什么餐盘。只要你离开这里，让我一个人呆着就行了。”

休伯特一直看到门关上才俯身向前，把手肘支撑在膝盖上，开始审视壁炉前红色的地毯。他开始轻轻地哼唱：

“她远离了她年轻的英雄  
长眠的故土，  
她身边的情侣们在叹息，  
但——”

他叹了一口气，往后靠在椅子上，陷入了沉默。希望自己是按照原计划，走路回家的。那么他就不会看到门关上。要是他没看到它关上就好了——但他看到了，看到后他不得不表明立场。这部分是房子的错，房子太小了。任何房子都会嫌小，但这栋房子实在是太小了。里面没有一个你可以躲着不被提问的角落——那些沉默的问题根本就不是问题，而是责备。

休伯特不可能忽略发生在这个家里的事情。他倒是希望能闭上眼睛。那么他就能控制自己的脾气。罗斯对于自己给他吃闭门羹并不感到羞愧；她只是害怕，因为她关门时被逮到了。

他希望他在看到门关上的那一刻，就理智地走到下面的厨房里，跟她说个明白。他感觉他正走在一条轨道上，一面高得超出视野的玻璃墙将它与另一条同样的轨道分开。他走的这条轨道满是他认识的错误，因为它们都是他自己的错误，但尽管每个错误他都很熟悉，每个错误依然让他震惊，因为一个错误和下一个错误间流逝的时光长短不同。就在他感觉不错并想象一切都会好起来时，就会碰上另一个大错。似乎无法逃避这个家里的争吵和不快。而且他在犯错、被自己绊倒的所有时间里，他都能透过玻璃墙看到那另一条也是他自己的轨道。那条轨道上没有错误，他只在正确的时间做了正确的事情，而且他知道如何处理一切，他走在上面，像一个对自己和自己的生活尽在掌控的男人。有时，似乎休伯特和那个地方之间只隔着一点闪烁的光影，毫无其他，在那个地方他完全理解生活的意义，并知道该如何按照它的意义经营生活。

他的生活中没什么是有意义的。但你一旦说了那句话，你就是说尽了一切。休伯特很难迈步走出家门，走到主路上，拦住一个陌生人说“我什么都不明白。”去做那样的一件事——是一个疯子的行为。

假如他一个人生活，情况还不会这么糟，但一个妻子让一个男人变得显眼，尤其是他没什么作为的话，此时此刻休伯特感觉自己毫无作为。可怜的罗斯，他不怪她，但她用她在她生活中的存在展示了他试图做并希望做的事情，她用她的行为展示了他的希望变成了什么。他对她感到羞耻。没有她，谁知道他可能成就什么呢。他也可能毫不起眼地过完一生，但任何境遇都比在他自己的家里蒙受嘲弄好。这世上的任何境遇都比独自蒙受嘲弄好。他在椅子上感觉不适，感觉生气。倒不是说她要求高或奢侈浪费。她不提任何要求。让他恼火的原因是，每周到了给她家用的时候，她总是带有歉意地收下它，极少数几次他忘记时，她总是胆怯地提醒他。当然，偶尔她的装腔作势也让他恼火，没人知道当她让他恼火到几乎无法忍受时，有多少次他克制住了自己。他无法忍受她吃饭的样子，也不想知道她一共吃了多少，她吃得远比他可能吃的要多。“胃口”一词让他感到尴尬，他对她的胃口的了解，她的胃口远比他的大，让她令他费解，但这种费解并不会激发他的兴趣或爱意。他觉得她的胃口是一种值得羞愧的东西，他不愿去想它。对她他倒不是吝惜那些食物，但他认为她把食物看得太重了。他怕看到她吃东西，因为他无法将目光从她身上移开，有几次他看到当她发现他在看她时，她会脸红并快速把东西咽下去。他总是独自一人吃早饭，中午在城里吃午饭，所以只需熬过晚饭和周日的午饭。

有时，他们坐下来吃晚饭时，休伯特会跟罗斯讲白天发生在店里的事情。这些趣闻主要是关于顾客的，它们逐渐达到的高潮经常是顾客的狼狈崩溃，休伯特觉得这很好玩，或是顾客的无知，休伯特觉得这也很好玩。一些来店里的男人是如此愚蠢，他们不知道自己是在出丑，也不知道离开后大家是如何嘲笑他们的。这些男人，对于喜欢的图案或选定的剪裁和合身度，他们不是太高，就是太矮、太胖、太瘦。休伯特嘲笑愚蠢的顾客，不是因为他们看上去可笑，而是因为他们似乎不知道他们有多可笑。休伯特能原谅任何一个看上去像傻瓜的人，如果他充当傻瓜并表现得他能自嘲且经得起被开玩笑，但他对那些相信或假装相信他们看上去跟任何其他人一样的人，却毫无怜悯之心。在商店之外，休伯特会让人们的短处变得显眼，从而测试他们的幽默感，但在工作中，他自然得克制自己，看到那么多装腔作势的家伙离开时却不知道他们被他——一个目光敏锐、幽默且擅长击败得意忘形的人——观察过，让他几近抓狂。

休伯特听到罗斯回到厨房里，但他没有听到厨房门关上，虽然他知道她一定是关上了它。现在听不到厨房的动静了。“好吧，这很好，”休伯特说，“让她由着她的喜好来吧。”但他不

能一直坐在扶手椅里，无所事事。他不能集中精神。他不能阅读。他也不想阅读。他不想做任何事情。他决意不向她妥协。迟早得有人采取行动，但休伯特感觉决定权已经不在他手上，现在该是罗斯表明态度了。当他刚到家，看到她给他吃闭门羹时，他可以在去下面的厨房或不下去之间二选一。现在那种选择已经不存在了。他没有做出选择，而是让他自己坚信，现在他做出任何动作都会意味着他已经让步。她必须得在某个时刻从厨房里出来。她会想出去最后看一眼她的花园。睡觉的时间也到来。家里的日常惯例将他从被逼入的角落里冲刷出来，只是一个等待的时间问题。任何时候都会是一样的情况，但休伯特明白他这辈子是永远不可能理解为什么罗斯像那样给他吃闭门羹的。他不再好奇为什么她关上门，他只希望自己没有看到它被关上。

他的身后是一面长圆形、几近方形的框格窗，对着他们花园尽头的墙壁。墙的另一边是网球俱乐部的球场。休伯特和罗斯认为网球俱乐部的会员们是一群快乐时尚的人，休伯特说他们是一群一无是处的人。周六夜晚，他们能听到从俱乐部会所新扩建的大房子里传来的跳舞音乐。会员们把这片新场地叫做亭子。跳舞音乐让休伯特心烦，尽管罗斯曾经很喜欢跳舞，当他站起来关上窗户，好让家里安静一点时，她从来不会抗议。俱乐部的入口在德顿家住的这片小房子后面的主路上。俱乐部场地的一边止于贯穿这片小区的一堵墙壁，它是德顿家和他们的邻居们，一共二十六户人家的花园尽头共享的一堵根墙。俱乐部场地的远端是一片小树林。如果休伯特走去站在窗前，他可以看到网球场尽头很远处的树冠，以及树冠之外朝他压来的天空。但他没有动。他坐着，倾听着。窗户的上半截开着，他能听到隔壁喜欢吵架的女人在骂她的中年女儿，她的女儿没有结婚，住在家里，做家务，烧饭，偶尔用一阵大喊大哭来平复她叛逆的愤怒，在德顿家的厨房和后面的起居室里都能听到她的哭喊。隔壁的那个花园是一片乱长的常春藤、荨麻和甘蓝植物。那是一个丢人现眼的家庭。休伯特希望今晚那个不快乐的女儿不会来一阵大喊大哭，他希望那家的两个女人都会被送去疯人院，然后一个从来都不在家的单身男人会搬去隔壁。他听着那个老女人尖细、残忍的声音，他想他听到了她女儿歇斯底里的沉默。他隐约听到网球场上传来的人声，他听到多诺万家的大柯利牧羊犬一边拉拴着它的链子，一边可怜地叫着，从它是只小狗起，它就被这根一头拴在狭小狗屋上的链子拴着。多诺万家养狗是为了防盗。休伯特希望能有一个强盗翻过花园尽头的根墙，解放这只狗，然后狗可以走进他们家，咬死汤姆·多诺万、他的老婆和他家三个没礼貌的女儿，或许它在一生中能吃上一顿饱饭。

他听到的东西，比他能忍受的要多。后面的起居室里满是他鄙视的生活和他厌恶的人，而他却无法抵御其中的任何点滴。他本可以关上窗户，但他肯定他一抬胳膊出现在那里推框格窗把它关紧，罗斯就会打开厨房门，出来去花园里，而他不想看到她。他不想看到她，因为他不关心她。这是他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说的第一句真话，他很高兴终于把它说出口了。他就是不关心她。他根本不关心关于她的任何事情，他不理解为什么他没有早意识到这点。他无法忍受看到她不得不跟她说话，不得不继续跟她生活在同一屋檐下。他现在无法想到她，而不看到她表情中慌乱的不诚实，他好奇是否值得花时间再试着跟她直接谈一下。试着跟她谈话有什么用呢？她从来不说“是”或“不”，总是“按你的喜好来就行”，“我无所谓”，“或许，如果那是你想要的”。接着跟随他的决定而来的是无声的顺从，当然，他的决定从来就不是他想要的，但野马也无法从她体内拽出任何东西。

不，他不会费劲去尝试跟她谈话。不值得他花时间，只会让她莫名其妙。尽管休伯特觉得罗斯毫不重要，他依然明白她比许多人要好——比隔壁的两个女人好，比多诺万一家好，也比网球俱乐部里那群吵闹的、一无是处的人好。他明白她毫无防御力，他感觉他的冷淡让她易受伤害，即使她并不知道这点，但他可怜她，因为她按她的方式尽力了，没人关心关于她的任何事情。她无可救药，好吧，只有他知道这点是一件好事。如果这世上的其他人都像他这样了解她，对罗斯来说后果不堪设想。她总是跟在他后面，这并非偶然。她没有理智。她不能照顾她自己。她一直是同一个样子。

罗斯不是一直是同一个样子的，但现在没人能描述她以前是什么样的，或像以前那样看待她。偶尔她会想到她的父亲，他在她十岁时死了。当她想起他时，她试图想起他的声音，比任何时候看上去都更像是一只找到落脚地的鸟，而不是一只在空中展翅的鸟。她好奇地环顾四周。她很顺从，但这个地方很奇怪。无论她以前是什么样的，欢笑、严肃、满怀希望、忧愁、宁静、焦急、雄心勃勃，无论她变成了什么样子，她现在只是顺从。当她的父亲去世时，她变得顺从，因为她可能背叛了一项她曾经准备好为之献身的事业。她知道她的父亲死了，但她不知道他消失了，即使在她开始知道他消失的时候，她也拒绝相信他从视野中消失了，她用一生的力量竭力把他留在视野中，直到她确定他安全了。在她努力的过程中，

她忘掉了她所熟悉的一切，只为支持那一个让一切变得熟悉的人。她知道他对她有所期待。他说她忠实可靠。她说她永远不会让任何人失望。一次又一次，他说她是一个好孩子，她毫无坏心。他总是在她的母亲面前为她辩护。

罗斯的父亲极其看重她，他总是跟她和任何愿意听的人说，她是一个不同寻常的孩子，她能做成任何她想做的事情。一次她在他们的厨房里卖弄似的跳舞，他说：“总有一天，罗斯将向我们展示鸟儿是如何飞翔的。”他们的谈话永无终结，他们在所有的事情上都意见一致。他死后，当她开始想念他时，她发现她记得他，他在她的脑海里是如此清晰，当她听她的母亲和邻居说起他时，她只要看他们的脑袋上方，就能看到他——不是他以前的样子，而是他现在的样子，他在所有人的上面，朝下对他们微笑，一边听着他们说他的好话，尽管他活着时，他们中没一个对他有什么印象。她恨他们所有人，但她越是恨他们，她越是怕他们，因为她知道假如他们发现了她的梦想，他们会嘲笑她，叫她“骄傲小姐”。她的母亲总是说她自视太高，她太爱想入非非了。

罗斯知道她一定是一个好孩子，但她从来没认识到做一个好孩子不仅仅是按吩咐行事。她不知道她在哪里。她希望被告知她该做什么，当没人告诉她时，她想象她做了错事。她从来都不能按标准应对这个世界——她不够格——她没有自己的标准，也没有试图设立过任何标准。她发现这个世界很棘手，因为，虽然她明白生命很珍贵，必须日夜关注它，否则它就会毫无征兆地消失，但她也明白从长远看，生命是毫无价值的，因为它会毫无征兆地消失。在这两道利刃之间，她力尽所能地在这世上生活。当休伯特初次见到罗斯时，他觉得她的步态非常轻盈明确，她的表情非常坚定。他怎么也没想到她展现出的勇气并非源于天生的希望、天生的自信或任何天生的无知，而是源于她想要避免触及那两种疯狂的决心这两种疯狂一边引领着她，一边太过逼近她让她的道路变成了一道非常细的线。她总是走直线。她从自己在的地方，走向她要去的地方，然后又回到她原来在的地方。她总是离家很近。虽然她感觉到所有的自由，她却可能是在一张网里。

休伯特和罗斯刚结婚时住在萨默维尔街上一栋房子顶层的两居室里，离圣斯蒂芬绿地不远。他们第一次一起走进那里是在他们婚礼的当天晚上。那也是罗斯第一次乘火车——从她生长大的韦克斯福德来到都柏林。休伯特一个名叫弗兰克·格尼的朋友在车站迎接他们，并帮他们搬包裹和箱子。罗斯提着她母亲在最后一刻给她打包的一篮食品。她只提了那个篮子，但休伯特和弗兰克大包小包拎了很多东西。当他们走到大楼的顶层时，他们都因为爬了很长的楼梯而上气不接下气了。休伯特把他提的所有东西都扔在楼梯平台上，手撑着墙，直到他喘上气来。

“你怎么停下来了？”弗兰克对他说，“再过五分钟，我们就在天堂里了。”

罗斯觉得弗兰克很好玩。弗兰克为他们找好了房间，他在车站把钥匙给了休伯特。罗斯看到休伯特小心地把钥匙放进西装马甲的口袋里，现在她看着他又把它拿出来。他非常不自在，急着想要把门打开时，被一个他之前放在地上的箱子绊了一下，差点在罗斯面前摔倒进门内，好在弗兰克抓住他，把他拉了回来，然后罗斯第一个走进去。

“女士优先！”弗兰克喊道，声音大得足以叫醒整个街坊。他们全都大笑起来。罗斯把篮子放在房间中间一张摇晃不稳的圆桌上，她站在那儿环顾四周，等休伯特和弗兰克把行李搬进来。她脚底下的那块薄地毯已经褪色，它很旧很旧，大部分地方都是跟她的篮子一样的稻草色，只有一点点红色和粉色说明它曾经色彩鲜艳。所有的东西都被搬进来后，弗兰克夸张地试图把休伯特抱起来转圈。

“这是一个神奇的包裹，夫人，”休伯特挣扎时，他对罗斯说，“它给人崇高的错觉。它觉得它是活的。”

罗斯这辈子从来没有笑得如此厉害过。她看见休伯特注视着她，欣赏她，她明白他俩都在为她卖弄。然后弗兰克突然认真起来，他从口袋里掏出手表，看看表说他有一个重要的约会，事关生死，他已经迟到了两天零十分钟。他走到外面，在身后关上门时，他依然在说话，而且他不愿听休伯特叫他多留片刻的邀请。然后他消失了，他们听到他跑下楼梯。罗斯看看休伯特。

“弗兰克是一个很好的人，”休伯特说，“但我很高兴他走了。你呢？难道你不高兴吗？”

“高兴的。”罗斯说，然后她转身，快速走到窗前，那是一扇能看到萨默维尔街对面房顶上的天空的方形小窗。

“天空很美。”她说。

“脱掉那顶旧帽子，”休伯特说，“你现在到家了。”

她朝外看时，掀开了窗户上轻薄的绿色网眼窗帘，当她抬起胳膊去把固定帽子的别针取下来时，窗帘又掉回到墙壁上，她发现它们长短不一样。

“瞧，那块窗帘太长了，”她说，“我会把它们搞成一样长。”她把手从帽子上移开，掀起窗帘，退后几步，把它们拉到一起比较它们的长度。

“大概截掉一英寸，”她说，“应该就行了。”

她放开窗帘，当它们落回原处时，她满意地舒了一口气，仿佛它们通过了一项测试，带领整栋房子取得了胜利，现在她知道窗帘、墙壁和向上的长楼梯都会屹立不动，各自坚守阵地，全都是真正让她感觉踏实放心的重要砝码，她再也不会迷失，因为她安全地心有所属了。她转向休伯特，冲他微笑。然后她想起她的帽子，她抬起手，又开始搜寻固定帽子的别针。

“明天我会把那块窗帘改好。”她说。

“绿色的窗帘，搭配你绿色的眼睛。”休伯特说，但他明白这两者毫无可比性，因为窗帘是配菜的绿色，而罗斯的眼睛则是大海的颜色。

罗斯睡着时，她脸上的表情看上去很孤独，醒着时，她看上去也很寂寞。她的孤独透着一种无情的骄傲，但她的寂寞却是无助的。休伯特无法触及她的孤独，他也无法摧毁她的寂寞。他想到大海，却不知道为什么。当她突然醒来，在床上翻身时，那种无情的骄傲会得意洋洋地在她的眼睛里一闪而过，紧接着被寂寞所取代。休伯特对她感到好奇。他不理解她为什么嫁给他，与此同时也不理解她在嫁给他前是怎么过的。

“你在遇见我前，究竟是怎么过的？”他问她。“我不知道，”她说，“我不记得了。”

她总冲他微笑。她停止微笑，只为再度微笑。

一天晚上，吃完晚饭后，他问她是否补好了他的袜子。它们依然躺在桌上——挂着绿色网眼窗帘的房间里的那张摇晃不稳的圆桌。那天是他们结婚两个月的日子，罗斯买了一块红糖水果蛋糕来庆祝纪念日。她把蛋糕切成手指状的细条，他们把蛋糕吃得只剩下一小条躺在他俩之间的盘子上。休伯特知道她想吃，但她也想要他吃。他打算把它给她吃，但他想逗逗她。他问起袜子时，咧嘴一笑。他依然觉得罗斯必须补它们很荒唐。罗斯的手肘撑在桌上，她在端详自己的手，欣赏那只戴着婚戒的手。当她听到他的问题时，她惊讶地看着他，仿佛他故意说了一些他知道会伤害她的话。

“我忘记它们了，”她说，“我忘了补你的袜子。我是不是就是这个样子的，偏偏忘记那一件你叫我做的事情。”

“这根本没那么重要。”休伯特说。

他依然在微笑，但他感觉受伤。她注视着他，仿佛他正在变得跟她的母亲一模一样——抓住她的一个错误不放。

“没关系，”他不耐烦地说，“这里，瞧，把这块好吃的蛋糕吃了。”

“我现在不想吃它。”她说，而且“现在”一词告诉他说他破坏了一切。

“哦，好吧，那么。”他说，他拿起那块蛋糕，把它塞进嘴里，从桌子边站起来，走去站在窗户边。

他把绿色的网眼窗帘推到一边，望出去。他看见街对面房子的烟囱，以及它们后面呈现出一道道灰色的天空。雨断断续续地下了一整天。休伯特眺望的时候，又一阵雨开始下起来，雨滴猛烈地敲打着窗户。他感觉一股寒意穿过他的身体，虽然窗户关着。罗斯依然坐在桌边。刚才，他就那样把她丢了。他为自己感到羞愧。如果他留她一个人的话，她本会吃掉那块蛋糕的，然后她就会更开心。他渴望安慰她，但蛋糕已经被吃掉了，他想不出任何其他可以安慰的办法。他希望他知道该对她说什么。他希望很快她会站起来，开始清理桌子，因为在她给出任何提示前，他不能转身离开窗边，而他却厌倦了站在那里望着外面的雨责备他自己。接着他在不经意间转过身，看到她正低头坐在桌子边，双手放在腿上。

她可怜地看着他，说：“对不起，休伯特。”

他轻柔地说：“这世上没有需要你说对不起的事情。”

她没有表现出任何听到他说的话的迹象，但她继续盯着他看。他感觉她在等他告诉她做什么，她会做任何他说的事情。她的无助让他感到困惑。他感觉他可以应付她——毕竟，她是罗斯，他了解她，她是他的妻子——但他无法应付她的无助。如果他要把这种感觉付诸语言的话，他可能会说：“我娶的是罗斯，不是她的无助。”就像另一个男人可能会说：“我娶的是她，不是她的家庭。”休伯特见过罗斯在她面前摆出那副吃瘪的表情，但现在根本没有必要摆出这种表情，他知道在这种气氛下鼓励她是一件坏事。那对她不好。她的母亲提醒过他，罗斯容易想些有的没的。处理办法就是不要拿她当一回事，不要承认有什么不对。没有任何事情不对。休伯特知道当她处在这种心境下时，应付罗斯的办法不是去安慰或溺爱她，而是去分散她的注意力，于是他没有像他想的那样，去把她抱在怀里，而是说：“雨很快就会停了。我们为什么不忘掉这一切，出去散一会儿步，聊聊总有一天我们会拥有的只属于我们的漂亮房子呢？”

他们找到的房子就是他们现在住的这栋。休伯特坐的后面的起居室地上的油地毡，他们搬进来时就在那儿了，他们为此支付了额外的钱。在搬进这栋房子前，一天他们从萨默维尔街乘有轨电车来到这儿，在他们即将入住的各个空房间里走来走去。来房子里参观一次，对休伯特来说就够了，但罗斯不愿离开，于是他坐在后面起居室的地上，背靠窗户下面的墙壁，告诉她尽管去各处看到爽。

他内心并不感觉轻松，但此时木已成舟——他们买下了房子。他听着罗斯在楼上走来走去。后面的卧室里铺着油地毡，但房子前面的房间里都没有铺。她走在光秃秃的地板上，穿过前面的卧室，然后她停下脚步。她站在楼上的窗户前，望着外面，好奇邻居都是什么人。现在她走回来，走下楼梯。楼梯上窄窄的红地毯让她的脚步声变得沉闷，她慢慢地走下来，小心翼翼地确保每一步都踩在台阶的中间。她继续往下走去厨房。厨房的地上铺着红色的地砖。片刻之后，她离开厨房，回到后面的起居室里，当时他们把这个房间叫作餐厅。

“我喜欢像这样东看西看，”她说，“我永远也不会对这栋房子感到厌倦。我好奇他们是如何选中这些颜色的。”

她低头看着油地毡，它的图案是由米黄色、棕色和褐红色构成的大大小小的羽毛。

“它还没坏，”休伯特阴郁地说，“我怕我们得习惯它。”

“哦，我没有不喜欢它。”罗斯说。

她好奇地注视着其他人曾经欣赏并打理的油地毡。要不是它已经在房子里的话，她永远也不会拥有它。它仿佛是一件从外国某个地方带回来的礼物。她永远也不会选那个图案或那些颜色。它们是某件陌生事物的一部分，来自其他某个人的生活，一个她根本不知道也不想呆的国家的纪念品，因为在那她会感觉胆怯和不安，对她而言，那里没有任何东西会像此时她脚下他们留下的油地毡那样让她感觉真实。她以主人的姿态在上面走来走去。

“我永远也不想离开这栋房子。”她说。

休伯特从椅子上站起来，朝门口走去。他打定了主意。他要上楼，跟平常一样洗手，把西装外套换成羊毛开衫，跟平常一样，然后他会下来，顺其自然。他打定了主意，但即便如此，他在开门前还是犹豫了一下。但一旦门被打开，他就立刻上楼，进入洗手间，用力地洗手，并朝脸上泼冷水。知道他将做正确的事情，他已经感觉好点了。很多瞎胡闹，最好是把一切公开说清楚。现在他要径直去下面的厨房，跟罗斯说清楚。他会笑她，笑到她不再郁闷。只不过得找到合适的话来说。他会让她笑她自己，明白所有这些争吵都是瞎胡闹。他匆忙走下楼梯，走下那三级从前厅通往厨房的台阶，仿佛他是要去宣布一刻也不能等的消息，好消息，最好的消息，但在厨房的门口，他犹豫了，然后他听到里面没有动静，虽然她一定是听到他冲下楼梯了，他像邮递员一样对门一阵咚咚猛敲，接着冲进去却发现房间里空无一人。通往花园的门敞开着。她从那里出去了，他不能去追她。所有的邻居都会从他们的后窗往外看，任何碰巧出来，在附近花园里的人都会听到他说的每个字。

他望了一眼灶台，去看她是否可能把茶壶留在那儿，但灶台上跟桌面上和水池边的滴水板一样，空空如也。厨房一尘不染。她把这里收拾过了。那么，这里不会有任何可吃的东西。

他回到上面的起居室，走进去。她在他们平时一直折叠好、靠在壁炉对面墙上的餐桌上，留了一个餐盘。他走过去，看看它。黑面包和一片火腿。她费心把黄油卷成了带波纹的球状。一个西红柿。三块巧克力饼干。茶壶在壁炉那边，放在炉围的里面，上面罩着一个保温罩。他赶紧跑到茶壶边，拿掉它上面的保温罩，把它拎到桌上，颤抖地在他的杯子里倒上茶，然后把茶壶放回到炉前的砖地上。它太烫了，不能放在桌上。他在茶里倒上牛奶，快速把它喝下去。他想要立刻再喝一杯茶，但这一次他把杯子拿到炉前砖地边，在那里把茶注满杯子。然后他在桌子边坐下来，开始吃光餐盘里的每一样东西。当所有的东西都吃完时，他感觉好一点了，虽然他认为他本可以不吃那三块巧克力饼干的。但他刚才很饿，仅此而已。他之前被饿到了。他不介意每天晚上都像这样一个餐盘上吃他的晚饭。他坐在那里，凝视着吃完饭后乱七八糟的餐盘，想着她是如何趁他在楼上时偷偷把它拿进这个房间里的。她的意思很清楚。她想要他吃晚饭，但她不想面对他。她花了很多心思准备餐盘。

他站起来，走到窗边。她在那里，侧对着他跪在沿着金链花树边的墙壁而建的花坛边。他们搬进来时，金链花和花园另一边的黄色玫瑰就在那儿了。除了金链花和玫瑰，什么都没有。他们第一次见到它时，这块地方杂草丛生，但罗斯立刻就看出来它有变成一个美丽花园的素质。她在花园里取得的成果令人惊叹。休伯特不知道她是从哪里学到园艺知识的。现在她跪在外面，正在把某株小植物安放进它的植床里。她专注地把植物放进它的准确位置里，她对于她在干的活儿感到焦虑，仿佛她的双手间捧着这个世界的未来，她必须一劳永逸地把它校正，因为没有第二次机会——没有第二次机会给她，至少——去证明

假如它被留给她，一切都会很好。这一刻，全世界的重量都从她的肩头卸到了她的双手之中。

她做完后，坐在她的脚跟上，摊开双手互相摩擦，以弄掉手上的泥土。然后她把手放在洒水壶的把手上，开始笨拙地站起来。休伯特将目光从她身上移开，低头看着他自己的双手。他没必要盯着她看，没必要知道她是如何站起来的。他经常看到她在熄灭壁炉后，把手放在煤斗的边缘站起来。当他再度朝外看时，她正背对他站着环顾四周，仿佛是在预测她计划做的一些装修的效果。她拾起一只手去把脖子后面一缕掉下来的头发塞进头上的发髻里。她穿这一件袖子很宽松的白色衬衫，袖子回落，她抬起的胳膊有点发亮。休伯特看见她的手腕和她的手肘，在她的这一小部分身体上，他看到了全部的罗斯，正如新月向任何见过她鼎盛时期的人回忆满月一样。然后罗斯弯下腰，用两只手拎起沉重的洒水壶，开始慢慢地走远，朝根墙走去，边走边给植物浇水。

这天几乎快过完了光线很弱——消逝的光线让一切依然可见。那天傍晚的光线很没用，没有足够的亮光和影子来掩饰一日将尽的事实，残余的日光只能在它永远退出前轻触这个世界。傍晚的光线说话了，它说的是：“没有什么可说的。”没有什么可说的，因为剩下可以说的一定不能说出口。对罗斯而言已经太迟了。

休伯特沉默无语。他没什么可说的，而且不管怎样，也没人听他说。



梅芙·布伦南

梅芙·布伦南（1917—1993），爱尔兰短篇小说家，17岁移民美国。她从1949年起长期担任《纽约客》专职作家，并在《纽约客》发表短篇小说。因为酗酒和精神问题，梅芙·布伦南晚景凄凉。直到她去世以后，她的作品才重新受到文学界重视。

#### 新书试读

来自新近好书的试读章节，由小鸟文学编辑部从近期出版物中挑选而来。祝阅读愉快。



题图来自 [Annie Spratt](#) on Unsplash

## 小说

# 家乡博物馆

西格弗里德·伦茨 | 新书推荐

关于逃亡与驱逐、失落与追寻、  
历史与记忆的一切

《家乡博物馆》是德国国宝级作家西格弗里德·伦茨的长篇小说代表作。一座搜集了马祖里文物的家乡博物馆，在一场突然的大火中毁于一旦，纵火者正是博物馆的建造者、搜集者、守护者齐格蒙特·罗加拉。随着老人齐格蒙特开始漫长的辩白，马祖里和家乡博物馆的故事被缓缓揭开。齐格蒙特从小跟随亚当叔叔在家乡的土地上搜集关于历史的见证，溯回马祖里逝去的时间，用记忆来抵抗遗忘，用证据来认识过去和自身。然而，当战争的炮火和纳粹的铁蹄越来越近，马祖里的人们被迫流亡，远走他乡……

当故土成为远方，当记忆失去见证之物，我们该如何回归家乡，又该如何捍卫我们的记忆？

以下经可以文化授权发布。



不是的，这并不是一场事故。那天傍晚，8月18日的傍晚，是我放了一把火。我别无选择，我必须毁了这里。这座博物馆坐落在埃根隆德的石勒苏益格附近，是马祖里唯一的地方历史博物馆。亲爱的，这一切并不是意外。就像当初我独自一人计划着建造和创办它一样，

如今我又一个人做了决定——我要彻底地摧毁它，连同这座博物馆里存放着的所有证词、证据，以及我和我的人战后数年里在这个地方一起搜集的各种案卷。

在这儿您可以放心地抽烟，烟灰缸就在床头柜上……您说什么？缠着绷带我听着不太清楚……哦是的，她的嗓音听着好像是位严厉的护士，不过等她进来的时候您还是可以随时向她请求的……代我向她请求，那么她立刻就会取新鲜的果汁来，其间您也可以让房间通风……您只需要记得快些把床头柜的抽屉关上就可以了……

不管怎么样，有些事我还是得告诉您：是我把织造车间的废料浸满了汽油，用它们引火，博物馆的地毡室以及存放马祖里老式儿童玩具的展厅全部被我点着了。破布缝的玩具娃娃、木制乐器、彩绘的鸟类雕塑，它们遇火很快就剧烈地燃烧起来了。

只有西蒙·加科知道我的计划，他是一位木工兼车匠，和我一样，他也来自勒克瑙湖畔的勒克瑙。西蒙·加科按照我的要求建造了这座博物馆，室内有可以加热的壁炉，室外还有延伸出去的木质露台……不过，事实上也并非只有我们两个人知道。至少当博物馆被大火焚烧的时候，我的妻子卡罗拉、我曾经的爱徒兼织毯大师马里安·耶罗明以及我的女儿亨丽克，他们也都在现场。当被风卷起的火舌猛烈地蹿出窗外的时候，西蒙·加科跪倒在了地上。没有人试图灭火，我的妻子靠在屋门口，她的脸庞被阴影笼罩着；马里安一动不动地站在山毛榉树下；哦对了，唯一对这一切表示抗议的只有我的女儿亨丽克，她甚至举着拳头威胁我，让我去灭火，她蹲在通往水边的小路上抽泣……

晚些时候，我亲爱的，晚些时候您可以帮我削只苹果。谢谢……

我说了，我是在傍晚时分放的火，在我们的七名织造女徒乘车回家以后；温和的西北风拂过施莱湾，火星和浓烟借着风飘过了水面。大火蔓延至文献室时出乎意料地冒起滚滚浓烟，不过并没有出现什么危险的情况。文件在火场里翻飞，这其中包括大选帝侯允诺勒克瑙举办第四届年市的信函。其余的信函和文书也如意料中的一样随着火焰和风势零散地飘落在水面上，又或者掉落在陡峭海岸边的山楂丛里。有件事很奇怪：当博物馆着火的时候，正巧有两艘渔船驶过埃根隆德，船上的人显然不想留意这场火灾，渔船穿过浓烟和漆黑的灰烬，轻盈地驶向了入海口。

最能承受大火灼烧的是饰品陈列室，那里还收藏着德里加伦的银器，螺纹形的臂饰、马蹄形状的胸针、刻着纵横凹槽的木珠子串成的项圈——您得知道，这是索维维亚人的一种陪葬品；铜制骨灰坛里还残留着焚尸后的遗骸。大火一直没能烧毁我们的饰品陈列室，我猜这可能是因为西蒙·加科——有一天他会来探望我，那时候您也许能更好地了解他。西蒙·加科，他像波斯尼亚人一样坚强，总是佝偻着腰，做任何事都有股波斯尼亚人的耐心和韧劲儿，不过我想说的是……对，当年西蒙·加科在我的建议下为饰品陈列室安装了裹着铁皮的安全门，非参观时间这扇门必须上锁，因此这个房间才能在大火中幸免于难……

当然，您也可以假设，即使没有人敢当着我的面扑灭大火，依然会有人在最后关头试图抢救出一些将被焚毁的零星物品，比如我的女儿亨丽克就恳求我，允许她至少带走马祖里词汇汇编，她曾经为这本词典付出了巨大的心血，为此工整地抄写。我拒绝了……

亨丽克告诉您了吗？好吧……我不得不拒绝为我妻子挽救那只古老精致的黄油搅拌器，它对她来说意义非凡；我也不得不禁止马里安·耶罗明把我那条巨大的蓝白色婚庆地毯拿走……那条蓝白交织的婚庆毯子……大概四十年前，我在勒克瑙把它视为一件杰作交付出去，它曾经多次消失然后又再次出现。这条婚庆地毯是唯一一件织有我名字首字母缩写的作品，Z.R.，代表齐格蒙特·罗加拉。其他所有的作品我都坚持匿名……

您不理解吗？别急，亲爱的，请您听我慢慢地告诉您，等您了解得足够多了以后……不过我想说的是，当博物馆的穹顶被热浪炙烤得向上翻卷，当它断裂、崩塌的时候，武器陈列室里俄罗斯步兵用的弹药爆炸了。这些军火来自马祖里的冬季战役，可见它们非常适合存储；同一展室里波兰、鞑靼和立陶宛的武器被大火烧得发红，我的先祖用来杀死传教士布伦·冯·奎尔福特和他十七名随从的两把弯刀也被烧毁了，那些人来到这儿，是想在勒克瑙宣传更宽厚的民风，或者说，是为了宣传更宽厚的民风他们来到了勒克瑙……

我并没有弄错。如果不是风向变了，如果不是温和的西北风渐渐平息，转而吹来了更加强劲的东南风的话，博物馆的一切都会被烧毁、融化、变成灰烬，并且最终这场大火不会造成任何其他的后果。东南风卷来的浓烟熏得我们的双眼火辣辣得疼，贴着水面飘浮的烟雾也被风给吹散了。然而最重要的是，突然转强的风势唤醒了原本已经奄奄一息的火苗，昏暗的裂缝中随之喷涌出火舌和火星。就是在那个时候火花开始随着大风纷纷扬扬起来，这是出乎我们预料的。伴随着大火带来的上升气流，那些发着光的轻盈物体在空中撕开了一个口子，原本它们已经在空气中慢慢黯淡下去，然而被风卷落在茅草屋顶之后，它们又重新开始闪烁火光……复燃，是的……它们持续燃烧，以至于火焰突然在织造车间的

上空爆燃，随后蹿上了屋顶。火势蔓延至位于屋脊位置的塔楼上，蔓延至阁楼敞开的窗户上，被烧着的干草像雨点般洒落，风把它们吹散在房屋的四周，有些燃烧着撞在了柱子上，有些掉落在门口……

您弄错了。当火蔓延到房屋时，我是第一个冲出来灭火的。我们连成一排组成了一个“水桶链”，我们在走廊、楼梯、一楼织造车间的上方分散开来，接龙传递水桶。我妻子站在水槽旁接水，然后把水桶交给西蒙加科，他再将水桶递到舱门口交给我，然后由我泼水灭火。起初我倒在屋顶上的水似乎能遏制住火势，可升腾的滚滚浓烟让我们不得不撤离。我们也试图斩断部分正在燃烧的屋顶来切断大火的蔓延，但烟雾太大，我们还是失败了。我们还尝试用斧头和撬棒撬起织造车间上方的桁条，然后推下去，但是旧房梁上的角铁太紧了。当塞在嘴里起保护作用的湿手帕也在浓烟里失去作用时，我们被迫撤离。透过窗户我看到了我们留下的浓烟和火海，四处都是火，火光的映照下，牧场上的动物们躁动不安，狂奔向庄园的方向，奔向霍尔姆贝克……

您是什么意思？当然了，这一切当然发生过，马里安·耶罗明已经通知了消防队……

别无他法，我们试图独自又或者一起来抢救贵重物品，我们能够拿走的东西统统搬到了室外，特别是床上用品、家具和衣物，包括我们的织造女工们刚开始着手的纺织物。只要能够忍耐火场的炙热和浓烟，我们就不停地搬运。只有我的女儿拒绝参与到这项工作中来，她独自蹲在木质壁炉的残骸旁，那里曾是我们的博物馆。我们谁也没有办法将她从那儿带走，我们甚至没有让她意识到，会有另一场更大的不幸发生……

我的意思是，关于另一场事故，您应该已经明白了……

为了她，为了我的女儿，一个陌生人突然出现在了山毛榉树下，他问都不问我们，就冲进了屋子，不加选择地把任何引起他注意或碰巧看见的东西都带到了室外安全的地方。也是他，这个陌生人，他帮助我和西蒙·加科拆下了固定织机的零部件，与此同时，燃烧的屋梁在我们四周砸落，它们摔断在地面上并滚落开来，地板很快就被它们烧着了。然而即使在他的帮助下，我们也没能抬出一台织机，羊毛室里喷涌出滚烫的热浪使我们根本无法靠近。那撩人的热浪虽然稍纵即逝，可它使门板炸裂开来，玻璃也在爆破声中粉碎了，窗框上的油漆被烫得发皱并迅速燃烧。我们不得不回到室外……

是您吗？您就是那个帮助我们的陌生人？您想接走亨丽克？我不知道……我认不出您来……不过我想说什么来着？

是的，我们回到了室外。我们在山毛榉树下喘着粗气，周围是被我们抢救出来的各种物品——那情形像是仓皇的逃命——马里安·耶罗明的头发和眉毛都烧焦了，他匆忙地核对抢救出的物品，忽然发现少了那本书。他说话的时候，我已经浸湿了手帕，然后用力拧着，把水挤在头上，根本没有理会他的警告和建议。我用帕子捂住口鼻，冲到了房门口，黄色和蓝色的浓烟正从屋子里冒出来，像是在焚烧土豆根茎。他们一把抱住了我，在我还没踏上抛光的石阶前他们一下子拽住了我的胳膊，他们——西蒙加科和马里安耶罗明，说服我并把我推到了一边，我假装同意，直到他们松开手，直到他们以为我已经放弃了我的计划。啊，哪怕他们是四个人，他们也阻止不了我。一个迅速的转身就足够了，紧接着一推，我脱身了，我穿过浓烟冲进了屋子，顺着楼梯跑上楼，跑向我放置那本书的壁橱……

是的，它对我意义重大——而且我有充分的理由，因为它不是博物馆藏品的一部分。

那本书是索尼娅·图尔克花费三十多年时间亲自手写的，用她工整的聚特林字体，在她将书交给我之前，我亲自修剪了书页，还用红色山羊皮装订了整本书。我是她愿意接收的唯一的弟子……

她是谁？她是马祖里最伟大、最杰出的织毯大师。

书很重，我把它紧紧地贴在身上。污迹斑斑的书页上记载着曾令我们的织毯艺术进入三重鼎盛时期的全部内容：符号的组合以及其久经考验的神奇效果，从一种杜松属植物以及春黄菊和茜草植物中提取色素的秘诀，当然还有我们的双面编制图案以及打结工艺。虽然脚下的楼梯晃得很厉害，我还是成功带着书走进了过道。那是索尼娅·图尔克的遗著，它独具一格，同时书里也有很多的错误，我早就逐渐记住了这本书的全部内容。后来，在楼梯的底部，一截燃烧的栏杆砸中了我，与当年处决失败时子弹击中我的位置一样，几乎有着同样的力道。我摔倒在地，我以为我摔倒时把书牢牢攥在了手里，直到今天，亲爱的，我依然认为我在最后一刻将它压在了身子底下，但是抬我出去的那些人，谁也没能在过道里找到它，马里安·耶罗明也没找到，在将我抬到安全的位置之后，他再一次冲进了燃烧着的屋子——正如我对他所期望的，也是他对自己所期望的——他找了很久很久，直到浓烟迫使他不得不放弃……

这也是我所担忧的，亲爱的马丁·韦特。我也猜想，这本书已经被烧毁了，即使它并不像博物馆里被烧掉的证据一样在真正意义上消失了，因为它已经存在于我的记忆之中，而

且我打算用索尼娅·图尔克的语言把它重新写出来……

您是什么意思？丢失的太多了？无法弥补的东西？想起这些损失您痛苦不已？亲爱的马丁·韦特，做了断的人总要忍受痛苦，我别无选择，只能在那一切发生之后做个了断，是的，在那一切之后……

不管怎样，他们最终将我带到了安全的地方，在山毛榉树下那些抢救出来的东西旁边，他们把我放在床上，我的目光落在水面上，这样我应该就看不见大火了。但是，每当我从短暂的昏迷中苏醒过来时，我总会看到树梢和许多陌生的面孔中映照着火光，这些面孔告诉我到底发生了什么。有一张面孔向我诉说了我的遭遇：那是我妻子的脸，她找到我，俯下身子，又猛地缩了回去，因为惊骇，因为恐惧。我目睹了她脸上的惊惧，她那令人痛苦的难以置信的表情，我明白她是怎么努力克制地忍受着我的目光，然后她抬手捂住脸，一言不发地冲了出去……

我们期待如此，亲爱的，我们期待新长出来的皮肤能很好地愈合，他们给我移植了新的皮肤……我有充分的心理准备，皮肤也有自己的记忆。无论如何我要谢谢您，感谢您的到来。至少您来了，因为亨丽克不会来的——这我已经预想到了……

她毫不知情？您说亨丽克压根儿不知道您在这儿？那我就更要感谢您了。我只希望她不要做任何草率的决定，她是有可能那么做的……

她住在您那儿？那我就放心了，我知道您对亨丽克的影响有多大……她向我讲述过很多有关您的事情……您的影响，是的，影响已经大到让她有一天发现了海洋学，我是指，有可能把它作为大学专业……

您不理解我吗？您不理解我为什么这样做？这只是因为您不了解之前发生的事情。有些事情早就注定了，无论我们选择从哪里开始。道路早已经铺好了，所有的先决条件早已存在并紧密相连。我们似乎只是在执行或者实施某些事情，又或者只是在经历了环环相扣的偶然事件之后成长为了冥冥中我们注定要成为的样子……

彻底地，我已经彻底准备好了，我要将与此有关的一切——没错，我已经准备好告诉您一切事情，即使这会唤醒旧时的痛苦，即使过往的感触会重新涌现。可我该从何处讲起呢？我躺在这里，我可以大胆地追忆非常非常久远的事情，从十字架下穿白袍的先生们讲起，从德意志骑士团的首领们讲起。他们征服了我的同胞，让人们熟悉他们的管理艺术，熟悉他们的十字架，又或者熟悉他们堪称典范的金融体系，正如我们所知，这种体系基于四种收入来源。但我也可以从希罗尼姆斯·罗加拉讲起，他是一位真实且可靠的先祖，凭借着养蜂人和酿酒师的名号闻名于世。有一回他喝得酩酊大醉，倒在一棵松树下沉睡醒酒，别人醉成那样定然是站不起来了，他却因此在鞑靼人对勒克瑙的第二次入侵中幸存，在那次入侵中所有的男人都被杀死了。

那个身披大主教长袍的男子也一样，他自称约翰·冯·罗加拉，马祖里暴发瘟疫后他现身各地，只为了让那些六神无主的幸存者们对自己心生崇拜；他热衷赌博，这最终给他带去了灾祸……

不不，我理解您的兴趣，恰恰是您，亲爱的，我给予您了解情况的特权……只不过，正如我所言，导致这个局面的决定性的起始事件，我恐怕无法确定，因为这个起始事件同时也是某件事的最终结局，某件事情，是的……围绕着这条路的东西实在太多了，人群、局势和舆论，或者只是失去的土地，马祖里——太多的人强迫自己，强迫自己一定要承担责任……我该从哪儿说起呢，我该先说谁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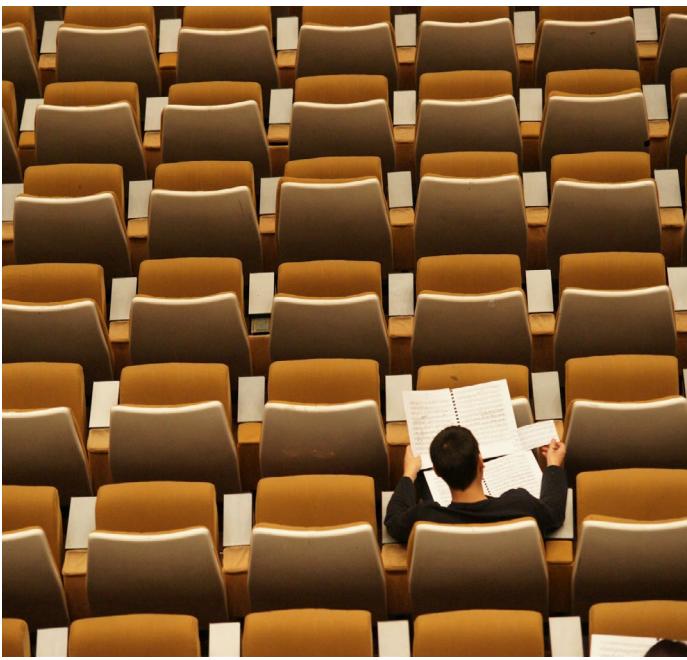


西格弗里德·伦茨

享有世界声誉的德国战后文学巨匠之一，也是德国继承现实主义传统的代表作家，与君特·格拉斯、海因里希·伯尔两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并称“当代德语文学三大家”。伦茨出生于东普鲁士，曾短暂参加过二战，战后在汉堡大学攻读哲学、英国文学和文学史，1951年成为职业作家。代表作有《德语课》《灯塔船》《面包与运动》《楷模》《家乡博物馆》等。

新书试读

来自新近好书的试读章节，由小鸟文学编辑部从近期出版物中挑选而来。祝阅读愉快。



题图来自 [Philippe Bout](#) on Unsplash

## 非虚构

# 谁是 loser？ | 手里拿着锤子的人③

伊险峰 | 田野中国

是不是一个人学不会高数就是 loser？

在那之前，我们曾经探讨过关于“自由”的话题，我们达成了唯一的共识：自由是人的充分发展。那是在有关他的三本书讨论之后。当时是从他的第三本书说起来的：

后来搞学业辅导。那一段我看过的书不是一般的多，心理学的、教育学的、认知心理学的。对我自己是一次根本性的改造。从这个角度来说，问题永远存在，谁学习也不是轻松的事。大一上学期，第三本书（《人的全面发展：从理论到指标体系》）出现，终于豁然开朗。思考人生、不完整的人生意识，这些很早就有，但如果说有完整的答案，我估计很多人到现在也没有。我觉得我很幸运，大一上学期我找到了，找到的答案很早。

什么是共产主义。权威主流的一种说法：物资资料极大丰富，精神境界极大提高，这个听起来有点虚，第三条，每个人都自主而独立地发展。这个东西，我想怎么简洁地说，人呢，什么是自由。简洁地说，是人的充分发展——这是马克思的话，但是这个简洁跟马克思是一样的，代替阶级对立的社会，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前提条件。马克思主义对共产主义的定义，一个人不落下的发展，是整个社会发展的前提条件。落下一个人就不对。这个价值追求，就是，自由，最简单的，由着自己来，心想事成。毛主席简化一下，能够成功地认识世界，并改造世界。对必然的认知和对世界的改造。我解释成，正确地认识世界，想明白一件事，把这事做到了，在具体领域，实现它，是自由。看错了不是自由；看明白了做不到，也不是自由，它是混沌着；啥都想不明白，就知道受苦，还不是自由；所有的东西都明白了，你就全自由了。

我想到前面所形成的“共识”，“所以，你就认为落下的那个人是 loser，非得让他

进入到你的高数不挂科、找个好工作、生活更安定的稳妥的中产阶级价值观里来？你管这个叫自由？”

对于我们直接的质疑，杜斌生气了。

我自己，父母长辈还是同学老师之间，说我特立独行也行，奇葩也罢，所有人都会评价：我跟别人不一样。不是孬与好的区别，每个人都有差别，人遇到问题天然有个性，遇到不同的问题，会有不同表现。跟我同一成绩段的人，我是那个唯一犯错误的人。我对自由的理解，就是免受苦难，心想事成。这是自由。高数挂科的同学，想不想学好。通过我的办法，举手之劳就可以学好。有些人想问，害怕，怕学霸烦，我说不烦，你来问我，blabla 都来问我了。能解决多少解决多少。具体的问题具体解决。

职业规划，无非是说，你走这条路，你需要具备什么样的能力，你可能会有什么待遇，未来你的晋升之路，大概率什么样，小概率什么样，后来什么样。这个过程就看你有能力。技术线，工程线，倒推，你希望你学术上达到什么程度，再倒推。你得准备好工作。

咨询有成功有不成功的，我严格地按规范去做，把我的道行发展到极致，如果对他的人生有所帮助，那是我功德一件；如果没有帮助，不接受，那看这人亲疏远近，亲朋好友，我能盯一把盯一把，如果不再熟的人，缘分已尽，那也就这样了。我把这工作当做咨询工作。心理咨询职业咨询商业咨询，按我的经验我的套路把流程走完，有可能解决也有可能解决不了。做完就拉倒。

我对 loser 的理解就是受苦人哪，苦难深重的无产阶级。因为他自己的话，高数不行，他能力不行，他在这里受苦。相对于有能力有知识的人，他多受了一重苦，我把这种人叫 loser。

他替自己辩解：“我的这个是实操，至于对不对、实不实用，我有没有权力去定义他人的人生——我是这么想的：一方面，你作为患者你自己可能主动求医问药，另一方面，我如果是一个老中医，路上看到一个人，脸色不对，呼吸也有问题，望闻问切，我一望一闻就能发现一些问题，医者仁心，我又不怕挨打，过去，跟他说，兄弟，我看你有什么症状，你要愿意听我就跟给你讲一讲，开个方子。有没有缘分，是不是配合，具体人具体分析。”

他相信他是能妙手回春的老中医，能力不是一个需要考量的问题，主要在于我们所一直纠结的：是不是要去帮助一个 loser。虽然，我们也不觉得高考挂科的学生、后进青年、loser 和患者的概念之间可以互换。

“我各个口都呆过，各个口都经历了。我的知识体系到了，能力到了。你说这世界上有百分之百的正确吗？没有啊，所以说两句，不能因为我担心误诊就不说。”他还是使命在身，“科学地说，我不可能保证每次都对。这还是一个学习的问题。知识如何获取，能力如何磨炼，我接受过系统的思政、心理和职业咨询的培训。”

他再一次强调他的专业性。在我们这次谈完之后，他曾经给我发过一段长长的微信，那其中有一个特别集中的抱怨（更准确地说是“批评”）就是我们忽略了他的专业性，忽视了“术业有专攻”这件事。我开始看以为是我对他的材料学不敬，后来发现说的是思想政治工作的专业性。

不要质疑别人的专业。这一次我是一个受采访的对象，我是 XX 大学的十佳学业辅导师，是北 XX 思想宣讲团的团长，多少届学生是我亲自带完的，多少个学生组织是我亲自建立并且搞活的。这些东西也是现在高校日常工作的重要部分。不了解我们的日常工作可以介绍，怀疑或者不认同我们的有些观点有些工作可以辩论，但是一上来就质疑我们的工作方式，甚至直接对我们的信息来源有质疑，这个就不合适了。虽然我不是辅导员，但我干的是辅导员的事儿，如果把辅导员日常培训整个 deny 掉，那实事求是，和在医生面前说“百度说……”是一样的不合适。用最开诚布公的话说，你们对我的背调没有做足，甚至也不想对我进行背调，这是做社会学访谈的大忌，同样也是做咨询工作的大忌。

虽说他经常表现出是否有效全看“你愿不愿意听我”的缘分，但实际上他对此有更多的自信，或者说是有更大的野心。我回过头去听我们谈话录音，他从一开始介绍什么是“宣讲”时就已经表现出来气吞山河的气度。

我们现在搞宣讲，正好是我讲的题目，要说的话我能说出一大堆来。其实简单一点说，还是那句老话：让天下劳苦人得解放。现在解放的定义和几十年前的定义，历史条件发生改变，不一样了。比如我们现在会讲，“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这“向往”怎么解释？我举个简单例子，毛主席在井冈山的时候写过一篇文章，在五次反围剿最艰难的时候写的，文章名字叫《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编入毛选之后，删了几句原文，原版里面有几句话是什么呢？“要把群众关心的问题都想到，哪家妇女生孩子，红糖水准备好了没有？”这就是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我们得关心这个。

让天下劳苦人得解放。杜斌在说这句话的时候，带有一点戏剧腔，就像他在说到“劳苦人”的时候，一定会说成“劳苦人哪”，他在说到“恨得牙根都痒痒”的时候，一律都有一种现代革命京剧样板戏的入戏感，但我知道他是真心的，并不是有意识地在表演。我们很快就说到了真正的“受苦人”。

那是一阵激烈的争论之后，我们暂时沉默的时候，我们把目光投向窗外。有一个美团的外卖小哥匆匆走进楼里。

“你最近有什么特别关注的社会问题吗？”

“我关注的点太多了。我最关心的，我想想，最关心的问题，恰恰还是人的生存就业问题，包括薪资包括发展。”

“那篇文章看过了吗？”

那天，《人物》杂志微信公众号发布的《外卖骑手，困在系统里》（作者：赖祐萱）的文章正是网络上的热点。那篇文章揭示出外卖平台利用“算法”技术控制或者说“压榨”外卖员的现实，引起公众对外卖员这一工作群体的广泛同情，与此同时也引发舆论对“大资本”的贪婪的批判。

杜斌点点头。“我做过调研，实事求是地说，不是多深入的社会学调研，交了一些外卖小哥朋友，跟他们有过还算深入的交流。”

“交流什么呢？”

“第一，一天的经历，工作情况，听他们讲送餐的故事，自我分享。第二，感受他们全面的生活，问他们每天的劳动。系统，订餐，听他们吐吐槽，对定餐系统实事求是有什么看法。我没有目的和结论性的东西。他们在大城市里工作，有农村来的，有本地的，也有是说其它职业干不好转行过来的，他们收入不能说很可观，但对于底层来说是有诱惑力的。那篇文章说系统给他们造成很多困难，我没有比新闻报道更多的结论，没有超过大家所说的。我跟大家看到的东西一样，这个点单系统，是对外卖小哥的盘剥。”

“你是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你还做了社会调查，你没有更多的思考？”

“实事求是地说，看三和大神也好，看外卖小哥也好，哪怕是看到学校里不合理的管理制度，不是毛泽东思想……”

他停顿下来。

而且，这时间感觉非常久。

他突然把头俯向不大的小圆桌面，把后脑勺呈现在我的面前。

“你摸一下！”

我很紧张。这戏剧化场面在我预期之外。“我摸什么？有什么？你被人打了，头上有没有疤？反骨？”

“欸。”他等到了正确的答案，抬起头。脸憋得痛红。

“这不对。你都毛主席了，你还扯什么反骨啊。这是封建迷信，封资修的东西。”

“马克思主义，归结起来是什么，革命无罪造反有理。”

“还马克思主义呢，你这是麻衣神相。”

“一切不合理的东西都要消灭掉。怎么灭？怎么打？这有一个科学的……”

“回到三和大神，回到外卖小哥，你不能说他们是 loser 对吧？”

“但他们是受苦人啊！”

“是受苦人不假。如果能帮他们好一点，你会怎么做？”

“帮他们好一点我会怎么做，是吧？”他重复了一遍我的问题，“如果我个人来说，我什么都做不了，某种意义上，对我一个个体来说，我支持他，我否定他，我多点一个少点一个外卖，不解决任何问题。”

“但你是有理论的。你觉得问题出在哪？有没有解决方法？”

又是沉默。

他手握住小玻璃杯，咯愣咯愣地响。

“问题出在哪，如果一定有个说法的话……”突然间他重新拾起那个戏剧化的、苦大仇深的语调，“那就是，资本逐利，吃人不吐骨头呐！”

他的脸更红了。是愤怒。我又问了一个不合时宜的问题。“华为不剥削吗？”

“所以说这里……市场经济条件下，哪有不压榨工人剩余价值的企业。如果在学术讨论层面上，我敢说国企都有剥削现象。该说得说。但是，话说回来，毕竟，市场经济不可逾越。资本主义可能逾越，一定程度下，市场经济将会长期存在。跟资本家能闹掰吗？有剥削的资产阶级企业也是我们经济中的一部分。根本的人民立场站稳的情况下，不是要站谁、要打倒谁，我们要在工人和资本家之间建立起来一个平衡。我是一个实操性很强的人，我如果要提一个实操性方案，也要多学几本管理学的书，多见几个实事求是的老板和工人。我现在给不出一个方案。”

这时，他冷静下来了，杯子也不再咯愣咯愣地响了。

后来，我们交流了企业家、创新与新技术、为 200% 的利润铤而走险、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的每个毛孔、工会做什么用、蒙族的语文教学问题、新疆、ISIS 的性奴、领袖、我们是不是西方化的知识分子、集体学汉语扭转局面……“我希望你们对这些保密，你要相信我在这个系统里干过，暂停一下……”他指的是录音。

他说的是在系统里干过，指的还是他在学校里做的学生工作。他再一次试图用那个低配版的官方语言表达体系来解释他所了解或者说希望了解的一切。

## 肮脏的 500 万

我们还交流了傲慢的问题。

“你默认这个世界上有些人是 loser，然后你要去拯救他，你不觉得你太傲慢了吗？”

“你们说我傲慢。但是我实事求是地说，我觉得你们傲慢。为什么我这么觉得呢。我吹一下牛，大言不惭一下。高层的，部级干部我没见过，厅级干部我见过得多了，最底层的这些人我也交流过。我自以为我能感受到他们的情绪，我能感受到他们的喜怒哀乐，我知道现实应该关心他们什么。就像这些学生，就是怕挂科，他解决不了挂科的问题，就是害怕。有些为这事吓破胆了，天天哭哭啼啼，惶惶不可终日，有些持续久了，放弃学习了。老子有一句话，是以圣人常善救人，故无弃人；常善救物，故无弃物，是谓袭明。我他妈的就不想让我的自己的师弟师妹，挂科了，没毕业证了，哪怕就是最后什么也混不出来，也能风风光光地拿到毕业证。”

“嗯，那我们的傲慢是什么呢？”

“你们只是在泛泛地谈道理，这种情况下，你还敢说，有些同学就是不爱学习。你居然说，我从大学里毕不了业，会是个正当的选择。”他质问我们。

“确实是这样。我想说一个人有主动选择的权力。他可以选择不接受你的辅导。主动性，永远是最重要的一个能力。你不能剥夺一个上了大学的人他主动选择不去学习的权利。”

“就跟你说一个外卖小哥，说 loser 这词可能不对，语言不对，人格低了。外卖小哥想不想要一个更体面的生活，能与不能要分析。社会结构，如果是个人给他定规划的话，到底哪些能学得来，这是具体问题。”

“外卖小哥跟你的大学同学不一样的地方在于，他拥有在社会中改变自己命运机会的多少。外卖小哥在社会中实际上要更被动一些。”

“是自己不想改变，还是社会不让他改变？”

“这里面还是我说的主动性的问题。他丧失了很多机会，他处于被动的状态。我们要做的是在他丧失机会之后，我们如何保护他。而一个 985 的大学生，他有相当强的主动性，就是他不是没有机会正常毕业，不是没有机会读研，但是他自己愿意放弃这个机会，放弃本身是应该尊重的一种权利……这是我们截然不同的地方。”

“什么放弃不放弃。我跟你说吧。如果说我从小没读过马列著作，如果父母没有那么好的学习机会，我从小就只不过是一个校园暴力的受害者。”

“你上大学和你是高中校园暴力的受害者之间，已经有了一个巨大的变化。这不一样的地方在哪儿呢，就是属于你的机会更多了。当你有更多选择的时候，你得到了某种程度上的解放，这就是你得到的尊重。”

“有些人有那么多选择吗？”

“对，外卖小哥没有那么多选择。”

“他为什么没有那么多选择呢？”

“这个是我们有共识的东西，是体制、制度和社会的结果。对于一个考上了 985 的学生来说，他有没有能力，他的意愿是不是可以尊重，是不是他学不会高数就是 loser，我们应该对他自己选择保持一种尊重。”

“他学不会就是他自己能力不行。”

“这就叫你的傲慢。”

“什么叫傲慢？他学不好高数，就是数学底子差，没有数学思维。”

我是在隔了很久之后，再听这段录音的时候，意识到这是两个“优绩主义者”的对话。英国工人阶级哲学家迈克尔·杨在 1958 年创造了 meritocracy 这个词，中文翻译为“优绩至上”或者“唯能体制”或者干脆就是翻译成“精英统治”。

迈克尔·桑德尔在《精英的傲慢》中说：

这种思维方式赋予我们力量，鼓励人们这样思考：自己对自己的命运负责，而不是成为自己无法控制的力量的受害者。但这种思维方式也有黑暗的一面。我们越是认为自己是白手起家、自给自足的，就越不可能关心那些比我们不幸的人的命运。如果我的成功是我自己努力实现的，那么他们的失败一定是他们自己的错。这种逻辑显示优绩至上原则侵蚀了人与人之间的共通性。对我们的命运负有个人责任的观念过于强烈，让我们很难换位思考。

我选择的态度是自己对自己的命运负责，隐含的就是那些不想好好学高数的同学，如果有一天真的流浪街头，那是他们自己的事——“失败是他们自己的错”。而杜斌选择的是：不能这样，你抓不住机会，你就是个 loser。

桑德尔回答，优绩制让那些未能向上流动的人自我怀疑，加深了人们对精英的怨恨。“今天，所有的人，无论多么卑微，都知道他们有过机会……难道他们没有义务承认自己地位低下，不像过去那样可以说因为自己被剥夺了机会，而是因为自己比别人差劲吗？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下等人没有现成的柱子来支撑自己的自尊。”

杜斌的父母以前在山东，保险公司的骨干业务员，体制内，六〇后最早接触市场化操作的公司，脑子聪明，又有学历背景和人脉，小有成就。

他妈妈有一位哥哥，在上海，哥哥的太太，也就是杜斌的舅妈，我们前面讲过她的故事，我们称她为温女士。

在温女士的“个人改革开放史”中，我们曾经提到过那个肮脏的 500 万。没错，按温女士的说法，这笔钱最后进入到杜斌的父母手中。拿了这笔钱之后不久，杜斌的父母选择从过去的公司离职，到了北京。

温女士的儿子俊杰介绍我们认识杜斌，“你们会对他感兴趣的”。

我们没有跟杜斌探讨 500 万的问题。

杜斌倒是说起过他的家庭和他舅舅也就是温女士的家庭的差异。温女士一家属于“有钱人”，杜斌家算得上中产。他对家庭财富了解得并不是很充分。

俊杰知道 500 万这件事，也知道关于这 500 万各有说法，是一个罗生门。他暗中比较了各方说辞，觉得妈妈所说为实话的概率最高：舅舅把这笔业务给山东八杆子打不着的亲戚，是知道有回扣的，并且希望这回扣是给妈妈的，这是俊杰大家庭内部的一次财富转移；但最终是杜斌家拿了 500 万回扣；因为这笔钱，他们从体制内的保险公司去了北京；这也是为了杜斌以后在北京的发展。不过，以上所有这些事他都不喜欢：不喜欢妈妈那边的亲戚，他们是商人，有商人的算计和俗气。当然更不喜欢“掠夺者”杜斌一家，这某种意义上拿走的也是俊杰未来可支配的财富。虽然不喜欢，但他不认为这里有什么让人意外的东西，他初中的时候已经认同这个社会本质就是黑暗的，大人的世界里都是这黑擦擦样子。因为回扣问题，造成理赔不及时，这是肮脏世界的一部分，他能想象得出来这可能意味着某个工地上受伤的农民工、家庭的顶梁柱哭告无门，他并不把这些都怪罪于杜斌父母的贪婪，他觉得自己的舅舅也一样，否则为什么会把属于公司股东的权益让给妈妈呢？还有他妈妈，打牌时的那些内部信息，不也是割散户韭菜的一种方式吗？

他也不喜欢“黑暗”这个词。生命本来的样子。他觉得商业的分配原则或者说漏洞里有这种安排，有人从中获得利益。

只是获得利益的是对此事毫不知情的杜斌，杜斌此刻正对资本恨得牙根痒痒，要解放全天下。



题图来自 [Shengpengpeng Cai](#) on Unsplash

## 非虚构 做题家张心怡的心理分析

伊险峰 | 田野中国

在她人生的各个关键节点上，  
尽可能用她精确算法，衡量评估所有选项。

张心怡语言组织能力很强，说话用词精准，回答我们的问题很爽利，不拖泥带水，不模棱两可，开始的时候我们认为这是长年文字训练表达的一个结果，后来发现不是，她不光说话如此，实际上精确是她的一种状态，或者说一种生活方式。

好比聊天，我们认为聊得火热，感觉意犹未尽又囿于时间到了不得不终止聊天的时候，跟她抱歉，她迅速结束话头，公事公办，就像被按了停止键：好，再见，下次再聊，结束。

是在说到高考的时候，我们意识到“精确”这个概念的重要性。她先是说高三的时候已经不在乎自己的年级排名，只在乎省排名，“一次联考有十三个学校参加，你就能估算出你在全省的一个排名”，她说她会看以前的录取榜，联考里的学生有多少进了大学，然后你差不多知道它对应的省排名，“推测下来，联考排名，乘以 2 或乘 2.5 就是你的全省排名”。

而且她估分很准，高考答案出来当天晚上她跟爸爸一起算分，跟实际分数比就差一分。如果你考虑到还有一些类似于作文这样的主观题，你会诧异于她估算的可能不止于分数，简直还有人性。

这时候你去揣摩她前面说的话，会发现更多的精确。

张心怡是湘潭人，在长沙读高中，湖南属于全省掐尖型，优秀生源聚集在长沙有四大名校。她所在的学校排名第五，她说当年北大有一个名额，长沙自主招生，需要自己考，有考试名额。她在高二的时候参加了一个夏令营，推荐全省 60 个人，她进前十名，这样高考有 30 分加分。高考正常发挥，全省排第 140，离北大差 10 分，离清华差 6 分，算上加分，她知道她可以上北大了。

上北大也算不上是多久远的梦，她原来对此并没有概念。她考进高中的时候分数是年级第一，但那时她不知道自己学习有多好，直到有一次年级排第一，在整个教育集团里排第二，她才意识到自己可以上个很好的大学。但什么是好，甚至什么是

一本二本，她依旧糊涂。“小时候我妈妈开过一个玩笑，如果我能考上北大，她做梦都会笑死。”你要是能考上，我就在街上摆流水席，因为有妈妈这句话，她理解这是件特别难的事，遥不可及。到了知道自己学习成绩好，开始算计这件事，把自己成绩换算一番，再算上自主招生，再算上加分，慢慢地，她就把目标就定成北大。

为什么学北大的地理专业，也是算出来的结果。这一次用的是排除法。她是理科生，她觉得她自己学不了数学，也学不了生物，实际上基础学科都兴趣不大，唯一例外是物理，高中时她物理学得特别好，如果不是不小心做错了一道最容易的选择题，她高考物理就是满分，但她又明白做题能力和基础物理学不是同样的东西。“我没有那个激情和毅力，没有那个心力在这个行业继续探索”，所以只剩下地理和环境。考上之后才知道数学物理还是必修课。

那时候刚开始流行“小镇做题家”这个词，张心怡回顾自己高中，觉得自己毫无疑问应该做一个称职的“做题家”，只是不是小镇，“算是省会做题家吧，介于人大附和小镇之间”，这是她给自己的一个更“精准”一点的定位。

“省会做题家”进了北大，蓬勃热情并没减弱，不再以高考为中心安排学习，她对学地理又没有多少归属感——“没有师门那种感觉”，就想读个双学位，选中了社会学。北大每个人都可以修双学位，有两个学位证，额外交钱，150 块钱一个学分。“要自己报名，通过本院系的考核，它要看你的绩点怎么样，如果太差也不行，因为你要证明你学有余力，另外一方面就是接受你的院系愿意接受你的申请”。这些都在她的把握之中——至少在这个时候，她的精准主导的学业和生活都有条不紊。

还有余裕，师姐介绍她进了北大的校媒，她做起了记者，也许是这行门槛不高，也许是张心怡迅速掌握了这一行当的技巧，很快她就成了这个校园媒体的负责人，赶上媒体业变革，她主导做了公众号，后来又做了小程序，独立 app，像是一个媒体矩阵的样子，她写了若干篇稿子，满足了她了解这个世界的好奇心——她认为与社会学的兴趣一脉相承。“我之所以做记者，没有去做社会学者，因为我虽然对社会学议题很有兴趣，但我没有那么多耐心。你要做一个社会学博士，确定一个议题，你要研究五年，完全坚持不了。像做记者，一个题最长也就做三个月吧，我觉得我可以完全可以。”还是要保持一种“精算”的态势。

张心怡在她人生的各个关键节点上，尽可能用她精确算法，衡量评估所有选项。精确的结果，也显而易见，就是冷静，她知道自己要什么，会得到什么，结果大体上会怎么样……冷静的结果，就是一切按部就班。

就这么说吧，当生活中大多数发生的事都在你预料之中和把握之中的时候，除了偶尔会感觉生活中有一点索然无味，还会让那些以往有着独特光环的存在变得黯淡。张心怡举了她父母的例子。

“那个时候，我明白他们很难帮到我什么。”在意识到她在湖南省的排名以及她意识到考上北大的可能性之后，她意识到了父母能力的边界。她知道未来的事可能更多地要依赖自己的判断和决策。

我爸爸是岳阳人。我妈妈是湘潭人。他是为了追我妈到了湘潭。他们俩怎么认识的，我不是很清楚。他们都是医生，七十年代生人。外公外婆都是村子里，不是单纯务农，做过销售做过厨师，什么都做过。我妈是做头颈外科。做得最多的是口腔癌，湖南人喜欢嚼槟榔嘛，特别多得口腔癌的。我爸以前是做心外的，后来做医院管理，不做临床了。就是新成立一个院区，他在市场化的院区，成立一个公司，公立医院的新院区，综合性的，还包括养老，他是那个公司的领导。我也不知道他们医院怎么样，医疗向大城市集中，但地方也有三甲。我们家条件在小城市里算中产。湘潭算四线城市吧。北京上海算一线。省里也不算特别好。

湘潭中学成绩可差了，你的市状元可能都录不了北大。长沙离湘潭又很近，被长沙吸纳得很厉害，很多生源一直向长沙流动。家里只有一个孩子。至少对于成绩好的人才会考虑去长沙。当时长沙最好的初中都是私立学校，只有私立学校可以跨市招生，一个学期要一两万。非常军事化管理。跟衡水一样。每当我们校长去衡水学习一次回来，纪律就会更严格一些。

我当时没有概念。初中不属于特别努力特别上进的那种。我是初三才显示出成绩特别好的迹象。而且班上有一个成绩特别好的女生，她才是好学生的担当。说成绩好，大家都会想到她，不会想到我。但你知道你自己不是最好的那一个，你知道最好的

那一个才能考上最好的大学。你就一直处于被老师冷落的状态。班上五六名，七八名。班上六十来个人。老师的注意力是有限的，我可能自尊心特别强，总希望老师关注我，老师没有特别关注我，我就觉得有点失落。就像高中的时候我违纪都不会被罚。其实我还挺佩服我妈，一狠心就把我送到长沙去了。我高三的时候也没有陪读，就周末来学校看看我这种。他们不是很操心我，我觉得我的发展是超过他们的预期的。

但佩服到此为止。张心怡在讲到这里的时候，开始审视父母扮演的角色。参加自主招主要准备很多资料，填很多表格，那也是高三时间最吃紧的时候，“最后的一模二模阶段”，她就让妈妈帮她填一些表格，结果后来发现都填错了。“他们不是像很多陪读的家长那样，帮孩子打点好一切，对高考特别特别了解，他们不是。我也不希望他们像那些家长一样，但我感觉到一点，我不可能太依赖他们了。”

“他们很难帮到我什么。他们做事还停留在做事要找关系这种。我因为到了比较大的城市嘛，知道做事要从遵守一定的规则出发。”张心怡与父母的关系进入到新篇章：“生活上无微不至，学业和事业上随我心意。我想转系啊，或者想考研究生啊，包括找工作，他们都无所谓，但在对生活上比较关心。”

这一番观察下来，她调整了对父母的预期，更残酷一点说，父母价值走低，这是一个大事件。与后面我们还会说到的一系列变故结合在一起，基本上奠定了父辈形象的坍塌——说是形象，实际上说的是功能，这是一个更大的事件。

### “不确定”和“对精确的反抗”

“精确”塑造了张心怡的生活。改变了她对一些人或者事的期待，比如父母。但更多的时候，随着生活中变量的增加，精确的解题思路会遭遇更复杂的问题，有时使她陷入到某种困境当中，有时又戏剧化了她的人生。“不确定”和“对精确的反抗”——有时被动、有时主动——张心怡生活开始从“做题家”模式走出：一个做题家，可以很容易通过反复练习，通过对题型、知识点的掌握像打游戏一样打怪升级通关，但生活不是打怪游戏。张心怡意识到“出题”与“解题”这种打怪模式不可能是未来生活的全部，甚至都不是最重要的生活常规动作。准确一点说，她开始真正的生活。

她意识到自己有一种“轻飘飘的感觉”的时候，已经把自己架到社会学那个“烤炉”上了——在大二接触那门社会学导论之后，突然萌发的对社会学的兴趣让她一头扎进韦伯涂尔干托克维尔们的世界，她开始以为这会是新一轮“出题”与“解题”的继续，好处在于这来自于她自己的兴趣。起初也确实如此：学到一些理论，老师也非常厉害，那些都是最优秀最有价值的学问，大师们的理论自然很高妙，老师课讲得也特别精彩……但是，课后，看原本——不管是原著还是中文版，发现自己看不懂，不像在课堂上被激情澎湃的老师引导时那种茅塞顿开的感觉。“你感觉自己像个肥皂泡一样往上飘，好像懂得了很多东西，但实际上没有，你的梦想和追求是太阳底下的肥皂泡。”第一次，她说她感觉什么也没有学到。

“你的能力跟不上。”张心怡说自己的痛苦之源，“本专业也是一样，我觉得我们教的地理那些东西都是高中地理的进阶版，就纯文科生的，让你背的那些东西。而这个行业里真正需要做研究学习的东西，比如什么软件、遥感、编程，这些是不会教的。你必须自己艰难摸索才能找到。如果你没有动力去学，你稍微迷茫，你有一课没有跟上的话，你就学不到东西。”

“其实四年的时间非常短暂……”她似乎不经意间说出这句话，这个认知超过绝大多数的本科生，正在上大学的人很少有能力这样体察正在消磨掉的时间，某种意义上，“精确”或者“冷静”意味着进入到“忘我”的状态，消除自我对时间、世间万物的感知，以他者的态度来观察。

“其实四年的时间非常短暂，你真的不能有迷茫的时间。”

张心怡当时意识到了自己的现实与困境：外因归结为北京大学教育不够扎实，内因是她的迷茫。不要问一个迷茫的人找到解决方案，她能做的只是自救，像一个就要睡着的人，时刻提醒自己“不要迷茫！不要迷茫！”她给出的自救方案是：“你没有觉醒的时候，你顺着一个规定好的路径去做。”

“毕竟是省会做题家出来的。”她说。她把这段逸出常轨的人生，依旧看作一道她得心应手的题：这道题，她不会做，似乎也没学过这个知识点，甚至连题型都可能

没见过，但解题的思路——“规定好的路径”——是她掌握的，姑且算是“人生应用题”吧。

事后（大学毕业之后）过了一年的时间，她可以重新看这个解题的自己，你可以理解成这是另外一种“估分”时刻。

“我当时很浮躁，心态不好。我当时真的很忙。我在媒体实习，还有校媒，本学位的课要学，还有社会学。我为了申请学位，那学期学了七门还是八门社会学的课。那时我的感觉就是跟朋友交流时说的，你在北大读一个本科，什么也没学到是一件很平常的事。”

“很多文科生觉得自己没有学到东西，是觉得自己没有学到有用的东西。我不考虑有用没用，就是没学到东西。然后，我觉得原因有一点，北大课程设置是这样，地理学、土壤学，上课教理论，有什么类型，有什么成分，考试的时候也考这些东西。但你要应用的话，你会的东西应该是遥感，但它不会教遥感，通过卫星做分类，波频来判断土壤。”

“它（遥感）不是上班之后实际接触，上手就一下子能学会的，它没有这么简单。学无止境。通过北大的期末考试是很容易的，考前背一背，北大学生应付考试是最擅长的，重点是什么，我一看就知道。”

“有一些同学，做研究，它真的可以变成 SCI，学社会学真的可能会出书。像项飘那样读本科时就出书的人，每年都有。这意味着你同学会做得很好。不是所有人都处于混沌的状态。我当时就很好奇一个问题，为什么大家都能这么快就找到自己想走的路。”

她可以从容处理考试的事。但浮躁与考试无关，找到自己想走的路也与考试无关。

“学前教育，发录取通知书，一个人来到北大，他就会有被选择的使命感。我怎么被选择了。这个很害人。你一旦觉得你是被选择的，你就会觉得自己不一样，你可就完了。”

一方面是驾轻就熟，生活变得简单，张心怡可以轻松应付种种可能性，基本上都在她的掌握之中，就像前面说的与父母之间的关系，直到“不确定”开始侵入她的生活，让她产生困惑；另一方面，则是她的主动出击，她厌倦了“精确”对她的按部就班生活的安排，她希望用不确定性的东西来打破常规生活。

“因为有吸引力了，你才会抗拒它，才有反作用力。”

你并不是很轻易就能弄明白这句话中，张心怡到底是想要表达什么，后来你听她越讲越多，你会发现越来越多“精确”生活之外的东西，娱乐圈的，做媒体——校媒、实习或者找工作，包括社会学，未遂的留学之路……生活轨迹之外，她试图用不确定性活跃她的生活，丰富她的生活。这是一个完全不一样的另外的世界，充满不确定性，甚至戏剧性。你可以理解成它是一种“打破”的冲动，也可以更平常一点去理解，它是通过发生更多的事，来求证可能性，它是更广泛意义上的“求解”。

我很少和现实生活中的朋友们提起我的追星故事，因为这会使我像个异类。我从小到大接受了最标准的应试精英教育，被灌输的目标是“让优秀成为一种习惯”，没有朋友会把这么多时间浪费在一件毫无“意义”的事情上。就算有时讨论到某个明星，我也不敢表现得对他们太了解，只能附和说：“对，我也真的记不清他们的脸。”

讲述上面这段话的人，是一名“站姐”，在 2016 年夏天到 2018 年夏天，这位站姐说她为 15 位艺人拍了两万多张照片，其中有约 1500 张曾经在微博上发布。她说，“无论是机场、演唱会还是节目录制现场，我总能找到办法进入到最靠近艺人的区域，然后举起相机，摁下快门”。这篇取名《三流站姐回忆录：我的追星之路是如何走到尽头的》的文章，在互联网上流传甚广，自称三流站姐的讲述者李满是张心怡的化名。

“对精确的反抗”，试图“打破”常规生活，实际上从她读高中时就已经开始了。她选择的突破点是“追星”，显然，在这个过程中她发挥了她审时度势的优势，迅速切入到核心。她成为了一个“站姐”。站姐是相对于“站子”的一个概念，站子是跟踪艺人行程发布艺人照片的社交媒体账号。“这套体系从韩国流传进来，迅速适应并改造了整个粉丝圈子”，张心怡说她迅速掌握了这一系列技能——对于她的智力来说，这当然算不上一道很难解的题。

我始终无法全身心地融入这个系统。尽管我成绩不错，考上了这所令人向往的名校，但面对激烈的竞争我总是感到苦闷，也表现得不太合群。上高中的时候，我被同班同学们排挤，午休时间没有人愿意和我说话，我就一个人呆在厕所浏览视频网站。就在这段时间里，因为一个演唱会视频，我成为了女团成员 A 的粉丝，她在台上闪闪发光、受人喜爱，在台下也标榜自己努力奋斗。

我太羡慕这样的状态了，开始在生活里模仿她。她握话筒的时候小拇指会不自觉地翘起，我没有话筒可以握，所以我拿起水瓶喝水的时候，也把小拇指翘起来，这个习惯到现在也没有改掉。

假期的时候，我会去参加她们团体的活动，即便是要横跨大半个中国。父母表示了支持，他们对我平时的刻苦用功一直很满意，觉得这作为紧张学习中的调剂非常合理。不能否认女团给了我很多拼搏的动力，她们宣扬着要为梦想付出汗水，这显然要比老师们陈旧的说教更有感召力。

这是从她高中开始一直持续到北大的“追星”生涯。那篇文章的评论五花八门，大多数人是跟她同样的粉丝，或者就是站姐，她们大都赞美张心怡的文笔，写得准确；有些同行会认为她追星生涯的结束证明了她的“背叛”——对偶像不是真爱；还有些超脱于此的人质疑了她选偶像的眼光，她在文章中披露了她的偶像的“不成器”，始终没有大红大紫。张心怡的文笔当然无可挑剔，她在文章中抒情：

首都国际机场是我最熟悉的场地，在很多个早晨或者傍晚，我要在这里等上两到三个小时来拍摄偶像登机或抵达的画面。

这种“不确定性”是对她过于平铺直叙的生活的一个奖赏。

她那篇文章中有这样一段描写：她拍偶像 A 的片子，微博私信给了偶像，A 的活跃粉丝并不多，因此记住了张心怡，A 有时在机场会主动跟她说话，问今天拍得怎么样，能不能把脸修小一点，拍了大概半年，有一天红眼航班，临近安检，A 把手机屏幕举到张心怡眼前，她写：

……上面是她微信二维码。我起初没懂她在干什么，明白了以后，耳边“嗡”地一声开始轰鸣。

我下意识地扫了码，看到她的微信主页，头像是一个流行的的表情包。我手指移到“添加到通讯录”按钮，心里犹豫了一下，没有点下去。

“我还有点事，先走了。”我把手机塞进口袋，转过头叫了一辆出租车，落荒而逃。脸在发烫，口袋里握着手机的手也发烫，耳鸣还在持续。司机问我三遍，去哪里？我随口答，去市中心。

调整了很久呼吸，我才有勇气去面对那个微信主页，迟疑了很久，点了返回。但我还是无法面对已经拍下的她的照片，我把相机存储卡拔出来，偷偷塞在出租车后座的缝里，下车之后即是永别。

我突然意识到，我和她的关系，完全建立在我是粉丝、她是偶像的基础上，建立在我自己对她形象的幻想和美化上。给我二维码的那一刻，对她来说是一种信任和示好的举动，对我来说，却打碎了我做了很久的梦。

偶像示好与告别偶像的决绝、出租车上的思想斗争、塞到后座缝隙里的存储卡，我们问张心怡这是不是有点过于偶像剧了？我们本来想把它当成一个写作上的伦理问题跟她探讨，她说那个动作是真的，而且还泪流满面了。“我的人生总是很戏剧化，”她自己总结原因，“我情感上是比较冲动的，丰富，什么都做得出来。我去年过生日，没跟爸妈说，一个人跑到日本去，看我偶像演唱会。”

“看演唱会的时候，收到我学校的 offer，这是我觉得很梦幻的地方。”学了社会学，又做了校媒，对娱乐文化有兴趣，想到一个东方偶像和西方偶像之间差异的题，这题够大，不是一篇报道文章所能承载的，她越想越投入，就思考要不要再念一个更高的学位。然后就申请，对于她这样一个资深做题家以及北大的本科背景来说，这算不上什么难事。申请成功，伦敦政经学院，在偶像的演唱会上她也收获一枚小小的成功，大约也是“给了很多拼搏动力”“为梦想付出汗水”的一种表现。

当然，也够戏剧化。

你可以理解成偶像这个成分出现的时候，她的生活戏剧化指数陡升，这让人上瘾。“有一段时间，很难抗拒。同时还有一点倔强，它也会产生反作用力。两种力量都在，我感觉到它对我的吸引力了，但我又不愿意放弃已经拥有的东西，我就会拒绝这份吸引力。”

我们说这听起来很像是出轨。

“就是这种感觉。”

“我那时是有精神病了，觉得生命中只有这么一件事。”她这么说，我们原本以为只是一种修辞，“我真的抑郁了。我一直追星，后来确诊了抑郁，开始吃药。”她没有忘记偶像带给她的戏剧化人生体验，“2019 年的 7 月 2 号，因为前一天 7 月 1 号是我 idol 的生日，然后我看到了她的信，获得了力量，第二天就去了医院。”

那时张心怡已经开始在那家时尚杂志做实习记者，写稿子，获得好反响，编辑鼓励她继续写。“你必须对这方面很感兴趣，这样才会持续下去，所以你就得不断校正自己的兴趣。我今天看了这个，很有趣，那就写，但你冷静下来，你就会发现你没有那么多兴趣，就不想继续写。”还有写完了的稿子，编辑没有时间编，一直拖着没发，就像有人把按部就班的工作按了一下暂停键，她的所有工作也都延宕下来，然后，有一天她发现，她什么事也做不下去，感觉日常生活进行不下去的样子。她给这个状态定义为“认知失调”。

爆发点是地理专业的一门课。大二时有个学术项目，她参加了，一直没做出成果来，到了大三，她上台去作论文报告。正讲着，老师就打断她，说，不要做了，你做不出来，我们不指导没有意义的论文。“我觉得他不应该这样，不应该当着所有人的面这么说。那计划是有补贴的，他说，我知道你就是想拿补贴。”

张心怡当时崩溃，跑到教学楼大厅里去哭，身边人来来往往，她也不在意。好在一个朋友看到了她，带着她离开，去食堂吃了一份黄焖鸡米饭，感觉稍微平复一点，再去求助中心，做一个长程咨询。“咨询不容易约，资源有限。我就夸大了我的病情，不过那时候也确实很严重的，我睡不醒。我每天都是下午两点醒，很冷漠，很淡漠。做自测，做自成像，做脑电，定位，我就是情绪障碍，我自测是重度抑郁，咨询意见是双向障碍二期，脑电显示工作记忆功能丧失，还有什么受损，当时真的觉得生活难以维继，起不来就是起不来，怎么都没用。我那学期从来没有上过课。”

“咨询师对我的情绪还是有安抚作用，”张心怡觉得北大学生服务中心的这个心理咨询还不错，虽然她已经不记得有什么建设性的意见，“好多大学的心理干预机构，不是真正的心理诊疗，它主要是防止你自杀，不要形成事件。有学生在校园里自杀，比较麻烦。要不你休学吧，要不你歇一段时间，其实就是不希望有人在学校里出事。”

我感觉人分两种。一种是找到自己心中所爱的东西，很幸运，有爱的；另一种是完全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我跟心理咨询师说我的人生感觉是在走钢索，感觉不到有力量在支撑着我。

张心怡至少提到有两个原因。她和杂志编辑都有的拖延症让她感到无所适从；专业课老师的当众羞辱。这些显而易见的诱因之外，还有什么？

她的“精确”生活的稳定感与不确定的现实、她有意引入的诸多变量……这些是否会促使某种心理状态的恶化？

到底是什么原因让她感觉不到支撑的力量？



题图来自 [BRUNO CERVERA](#) on Unsplash

## 非虚构 想像中的自由 | 做题家张心怡的心理分析②

伊险峰 | 田野中国

我们似乎接近了张心怡

种种困厄所指向的那个终极问题。

张心怡把“双向障碍二期”的消息告诉了父母。“确诊之后，决定开始吃药了，我才打电话告诉他们。我说你们需要知情。”如她所预料的，父母首先选择了“不信”，“一定是庸医误诊”，从老家跑过来把她抓到北医六院，动用了他们作为同样是医生的社会关系，找到了精神科很厉害的医生，这位医生再看一遍，确认，张心怡确实病了，劝她的父母接受现实。张心怡说她自己早就认清了现实，一是信任西医，二是生病确诊让她觉得有所宽慰——“状态不好是因为生病才这样，病好了就会摆脱掉这个状态”，从始至终都很平静。父母当时虽然平静下来，但后来又反复，觉得吃药不对，从“不信”转变为“快点停药”，根本不考虑疗程，骨子里还是不接受。“他们觉得是我自己的事情，心态调整，想开一点就好了”。

我们问张心怡，这算是一次典型的“感觉不到有力量在支撑”吗？

她想了一想，表示基本认可这种看法，但这是父亲形象坍塌和父辈价值讨论的一个余绪。她很快展开了更广泛的关于娱乐圈的话题。不过，我们倒是发现，这些话题之间存在着一些隐蔽的关联，正在把她的困惑或者说她感兴趣的那些东西拼接起来。

促使我想去念一个伦敦政经学院的是想做一个题。我感觉超前于他们（学术上）对流行文化的认知，就是东亚和集权文化里有一个不一样的流行文化。举最简单的例子，墙内饭圈支持限韩令，当时我还是很惊讶的。这是墙内饭圈和墙外饭圈不一样的地方。

我是一个反对文化壁垒的人，你都追韩娱明星了，你应该多希望偶像多多来到你身边，多活动，我觉得正常人都应该是这样一个逻辑。结果不是。

更早一点，当时豆瓣上最大的韩娱小组，发起一个投票，你是不是支持限韩令，结果90%以上都选择了支持。

后来我发现这是有渊源的。六九圣战，十年前追Super Junior的粉丝和帝吧有一次大规模的冲突。就是帝吧的人觉得追韩娱的人脑残。帝吧大多是男性，追韩大多是女性，这感觉很像是父权和国家权力的结合，欺压女性。

网络记载此事发生在2010年，圣战主体并非“帝吧”牵头，而是“魔兽世界吧”。不过，这只是记忆里的小失误，并不妨碍张心怡的思考和我们的震惊。这听起来很像一群蛮横的鲁莽男青年（后来被称为“国男”）对女性的蔑视、骚扰和霸凌。

男性为主嘛。所以他们有优先的男权。我是这么理解这件事情的，出现六九圣战之后，韩娱粉丝出现不认同男权的现象，我偏要反抗，她们会选择跟他们对战。当然还是女性被碾压。帝吧赢了。然后过了这么多年，你会发现，不知道为什么，女性这边变成了附和：她要证明自己作为韩娱粉丝真的低人一等，我追外面的明星，我是一个不爱国的人……

“我不要脸，我是一个人渣？女人被男人霸凌之后的一种对自己的羞辱？”尽管有所耳闻，但还是觉得这个现实有点残忍。

这就是我当时想要探讨的东西。她们特别想表现自己爱国，就越会觉得低人一等。不爱国越想证明自己爱国。她们证明爱国的方式，就是小粉红比例特别高。她们会抓住韩娱明星随便一句话，比如这个明星没来过内地，去过港澳台，她直播的时候说这么一句，“我好像没怎么去过中国”，就会被抓住，就变成港独台独，被批判。

我想做的研究就是，这些事情是怎么发生的。从帝吧打仗变成了给自己洗白，再到后来，她们现在比帝吧更小粉红，中间都发生了什么。

我们申请学校，就是提出这样一个议题，学校认为是有价值的，通过了，我还没有研究。

关于她一脚踏入的娱乐圈（按她的说法，她其实已经把这只脚又拔出来了）与她的社会学议题，她还有很多想法，感觉这是一个连接她的困惑、社会学的兴趣、自己存在的价值的重要节点……可能还不止。

疫情的时候我写过一篇饭圈救援2020，意识到饭圈是个力量，尤其是与官方比如共青团结合起来的时候。现在饭圈跟共青团之间是蜜月，不，应该是结婚了，特别恩爱。

但饭圈领袖并不直接跟共青团对接，饭圈领袖往往是自由派的，表现得不那么爱国，往往是下面的粉丝，会非常小粉红。共青团对接的是偶像。它控制偶像。

唔？她说的共青团是指微博上的共青团大V，她说的饭圈领袖，是指包括站姐、“大粉”在内有组织能力、替偶像做些粉丝管理、吹捧文章的人。不过，她很快就纠正了“自由派”这种说法。

也不能说她们是自由派的。大粉还是喜欢把偶像往爱国上带，偶像参加了国家组织的什么活动，我的偶像是正能量偶像，是根正苗红的。现在的小孩，粉丝里有好多是2005年以后出生的，她第一个接触到的不是政治，是饭圈，饭圈这种风格让她不由自主地就成为拥护者。

接下来张心怡的表述有点乱——只是从我们（以为常规、正常的）认知路径判断而言。她说：“饭圈和很多在线团体实现了中国人的结社自由。”她又说：“饭圈的权力结构是威权，是希望导向到个人崇拜。”她借用了一个教会和宗教革命的逻辑体系。

“饭圈应该进行宗教改革。现在大粉相当于教会，偶像是耶稣。耶稣什么样、上帝什么样是教会定义的，你不能左右耶稣应该是什么样的。宗教改革就是每个人都能接触到偶像，每个人都有自由定义偶像的权利，你想他是什么样，他就是什么样，并且勇敢地说出来。”

“现在有人自己解释偶像不可以吗？”我们问。

“不可以的。今天，肖战为什么会有举报这件事，一个人把肖战理解成站街女，大

部分不同意，背弃教义，这是不符合规范的，就要讨伐你。”

“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到航站楼门口等着显圣的吗？站姐或者大粉对一个人显示的权力是什么？我为什么要听她的？我自己是可以接触得到的啊。”

“偶像你是可以接触的，追星比起线下行为更是情感寄托。追星是情感上的。这个人是什么人设，是由大粉决定的。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你要更相信大粉的定义。”她好像是说，你接触到偶像看到真身不是终极目的，爱才是。感觉很深奥。

“所以，这里的解释权有一种霸凌在里面，大粉对偶像的解释是正确的，这是一种话语权。”我们暗暗用我们自己能理解的逻辑来体会这其中的微妙差别。

“追星很重要的归属感。”她也准确理解了我们的逻辑。

“就相当于大家都信仰马克思主义，我信仰就必须通过你的组织才能信，否则我就是反党了。这说明这里唯一有价值的东西是组织，组织是第一位的。这已经从马克思主义过渡到列宁主义了。但是，为什么追星要成立一个组织呢？”

“第一是要好办事。现在的明星对于运营的需求是很高的。给所有嘉宾送礼物。我现在要转发，要号召，最开始成为大粉的人。比如现在有个选秀节目，要出来一个偶像，最开始成为这个偶像的大粉的人有两类，一类是会花钱的人，另一类是懂规则的人。规则就是捧出一个新的偶像。他们两个可以成立一个后援会。现在后援会有很多是由官方背书的。跟明星的工作室是有联系的。只要抢到官方这个名头，你就无敌了。大家都认。”

张心怡有些大粉很厉害，“就是我跟你刚刚讲，追随大粉的人，比较下沉的人，大粉说我们今天要做数据，我们就做数据；大粉说今天要做评控，我们就做评控；大粉说我们今天要举报谁谁谁，我们就去举报。”在“内娱圈”里，有些大粉的知名度甚至超过了偶像，甚至与偶像反目，带着偶像的粉丝。这个我们倒是很能理解，从圣地回来的人，与领袖喝过茶的人，动辄就是百分之百纯正的人，如果本身又有克里斯玛气质，做到这一点并不难。

“饭圈始终有人在号召，让大家不要粉大粉，要粉偶像本人。就跟教廷会被崇拜、教皇会被崇拜一样。”

当然，不论是偶像还是有克里斯玛附体的大粉，最终还是要扮演小角色。他们部全都是“正能量”的手段或者工具。“饭圈做公益，开始是好心、积德行善。有钱做好事，粉丝也说我的钱就会很满足做好事了。共青团也想做公益，成立很多基金会，就会找饭圈组织，你反正都是做，饭圈提供钱提供人力，饭圈为官方公益项目背书。共青团可以向这群年轻人输出新形象，我也可以亲民，我也可以活泼，”她想了一下又补充，“不是形象问题，而是坚定地认为党跟我是一体的。偶像是向党的，我也要向党，是这样一种认知。”

“你刚才说的举报是怎么回事？”

现在举报已经很普遍了。印象深的是。一个韩国偶像，他服兵役入伍，粉丝送他礼物，就送了鞋垫，韩娱粉丝就说你是在给敌人军队送物资。然后就举报 idol 和他的粉丝。希望他永远消失。不要出现在中国。他们希望在中国封杀他。我印象特别深的帖子。

举报的那个人说她打举报电话，接电话的人特别温柔地接待了她，她觉得心里好温暖。就是这个帖子有很多人回复。就说真好啊，国家。

我觉得起源在 PGone 事件，2017 年吧？那件事情向粉丝展示了公权力的力量，一个艺人全部封杀，它所有的东西都封杀了。“家人”们就懂得了举报的威力，它可以消灭偶像讨厌的人。

我们与她相识的那一年，她放弃了去伦敦留学，本科毕业了，选择了一家媒体去写特稿，抑郁症看起来已经成了过去时。她的实习编辑介绍我们相识，她滔滔不绝地讲述很多她自己的故事，随时会因为时间关系停下来，没有感情色彩地告别，迅速回复到一种路人状态，让我们感受到空前的距离感。不过，我们很快就适应了这一点，她讲述自己时偶尔带出来的局外观察者的口气，告诉我们这种距离感并非因为我们，她与自己也始终保持着一个可能她觉得必要和安全的距离。

结果就是，我们了解到很多有关她的信息，但我们感觉似乎还是差点什么。

如果我们把张心怡做题生涯之外另一条线索整理一下：

上高中时不合群，没有人理她；

成绩好，为自己争得了一定的自由支配的时间；

开始看视频，追星，从明星身上学“为梦想付出努力”之类，投射到自己身上；

追星变成生活中最具刺激性充满变数的存在，你可以理解成是沉溺，也可以乐观地理解她对这种行为的驾驭能力；

“她们也是追星。这种追星跟我完全不一样。我就是相当于找到一个精神寄托，跟我养一只猫养一只狗差不多，就是一种爱好。”她甚至会这么说；

思考追星过程中自己的行为，她有一个“冷静”的优势，就是可以通过他者的视角去审视自己：她既可以客观去写自己的“三流站姐”的故事，也可以看到自己身上“戏剧化”的那一面——这同样是她者视角的一个结果；

这是张心怡智力优势的体现，表现结果就是自由出入某种非常规的状态。她会控制一个度；

第一次成功了，代表性的是那个戏剧化的瞬间，塞到出租车座位缝隙里的存储卡，这件事发生在高考之后的暑假；

到北大之后，显然她获得了更大的空间来处理她的学业之外的生活，例如媒体的工作，例如社会学的学习，她会用这些新技能重新观照她的娱乐国际遇；

她甚至找到了一个未来可能的研究方向，把娱乐圈的观察作为基石，重新布置她的事业和生活……

我们本来可以把它视为张心怡第二次“自由出入”非常规的状态，但这一次她看起来似乎失败了。

我们意识到可能把事情想得过于复杂了。张心怡面前铺陈开来的世界，越来越大、越来越丰富、越来越复杂，但做题家所形成的思维方式还在发挥作用，顽固地控制着她对学业、生活和未来的诸种可能性的把握，这会让她有力不从心之感。

那个“打怪”通关的过程，当生活中的那个“怪”难以以自己之力打掉的时候，怎么办？这是张心怡面对的一个巨大问题。我们经常会在各种心理和行为研究当中看到对擅长“打游戏”的一代人的行为方式的担忧，这一点可能忽略了：不论是做题家还是游戏玩家，过关是必经之路，而实际生活中有些“关”过不去，或者说它不被允许过。

我在上大学之后，开始关心公共事件，出于很朴素的感情，我对政治名词完全不感兴趣。我不像我有些大学同学，他们高中时的老师已经推荐他们读周濂了，我高中时就是青春阅读，看些很爹味儿的东西，国学，汪曾祺的散文，远离现实生活，不产生对现实的关切。上大学也是因为要做媒体，接触了更多的人，看了一本《夹边沟纪事》，对非虚构感兴趣，还看了《陆犯焉识》，震撼。我知道极权是害人的，人不应该被权力所害，人应该有基本的尊严和自由。这两本书很基本，给我很朴素的启发。我有搞政治哲学的同学，他们会比较，我们会讨论一些事情，会产生一致的看法。

大部分人不会有政治启蒙，即使在北大也是，大家都还是很幼稚的感觉，不关心。会被谈话的人是很少的。我不支持岳昕，她是恢复到毛时代嘛。但她不应该被如此对待。岳昕很偏激，但在我们学校里是没办法形成讨论的。没有地方可以讨论，线下就更敏感了。没有舆论场，是没办法碰到一起的。只有某个论坛里讨论，有一方反对岳昕的人，说中国应该去毛化，下面马上有人说，那你们抓岳昕干嘛？

我同学被带走的时候，离百年讲堂广场大概只有一百米，我看见了。后来放假回家，高中同学聚会，吃火锅，high 的时候，我说我的大学念得……这是我很失误的一个表现，我刚说完我有一个同学被带走的时候，我一个香港读书的同学，说我们的警察不能像你们学校的黑衣人那么厉害呢。她觉得香港应该更狠一点。其他人也无法理解我说的北大这件事。我那个同学在香港花旗银行做投资经理，学金融的嘛。

我也被打过电话，不是只有打电话这么简单。当时我实习的杂志要在北大办一个沙龙，要审批，我们校媒是学生会的一个部门嘛，它有资格去办活动。主讲嘉宾是我们杂志的编辑，就列上了他的作品，他的作品都亚文化、偏离社会主流。审批的团委老师就问能不能找点正能量的嘉宾来？然后就突然像审问一样，问我学生会的规则是什么，无时无刻不在审判一样。我就回答是为学生服务。

后来我们校媒发过一个摄影稿，在学校里拣垃圾的人，有点敏感吧。这个老师勒令我们删稿，他说的话我印象特别深刻。他说：汉奸就在我们身边。

后来删掉了。

我之前觉得北大是一个相对自由的地方，我知道外面的环境很差，但这个地方会保有一点自由。但之后，我对于北大的幻想就破灭了，我就很讨厌我的学校。

“事后有老师宽慰一下你这理想的破灭吗？”

“没有啊，他们大概会觉得你需要宽慰才是不正常的吧？是你自己的原因。我们北大还是一个很好的地方。”

“他们还会跟你说什么呢？‘北大不是你想的这个样子’，还是‘北大不是世外桃源，不要以为北大怎么样’？”

“接近于后面这种吧。”

## 控制

她用旁观者的视角审视父母，看他们在她生活中功能的逐渐弱化最后消失。

她看着父亲喝酒，吹牛，一样的话重复很多次，在他想象中的世界里纵横捭阖，如鱼得水。

她像说别人一样讲娱乐圈女性与男权之间的冲突，那其实也是她生活的一部分。

她的老师用严厉的语气在电话里恐吓她，只是为了保证他自己的政治安全。

她看到偶像和大粉们如何操弄权术，然后对更大的强权奴颜婢膝。

她意识到偶像娱乐文化在东西方语境里的不同，威权主义在身边无时不存在。

她看到同学在百年讲堂广场被带走。

她还会想到权力、尊严、与自由有关等等东西。

我们似乎接近了张心怡种种困厄所指向的那个终极问题。它既是问题本身，又是所有隐蔽关联的节点：那是一个巨大的来自于父亲（或者父辈，或者男性，或者强权）的阴影。

六年级时，张心怡喜欢足球明星卡卡，大概就是太爱了，忍不住跟妈妈表达。妈妈不以为然，随口说一句，他也不是什么好人。“她说不是好人，有两种情况，一种是了解卡卡不是好人，另一种是不了解。但她就是会贬低，很无厘头的。”张心怡失望又失落，从此追星是个私人话题。

爸爸更不会成为张心怡分享对象。“他是那种典型的中年男人，对世界有一套固有的认知，不太接受新东西。”张心怡觉得他们处于一种蒙昧的状态中，这蒙昧如何界定范围，她并不能解释得很清楚。换一个说法，他们的想法很正统，当他们很明确地不想支持的时候，也不会直接说出来，而是像卡卡那样，说卡卡也不怎么样，或者冷嘲热讽。对于她的一些显然很正常也不算太离谱的想法总是会有隐性的担忧，“他们并不了解我”，这是张心怡对父母“正统”的一个补充说明。举例子来说，她毕业之后第一份工作找了一家市场化媒体，她妈妈就会念叨女孩子应该找一个稳定的工作，媒体不稳定，而且还可能要不断跳槽，如果是媒体，干吗不去新华社？“他们就会很隐讳地说，新华社现在又招人了……他们总是这样。他们希望我去英国读书，但不会说，只是每次电话都会问，啥时候去读书啊，每天都会分享一些链接，类似于英国大学入学新需求这种。”

张心怡说跟他们不熟——上高中就离开湘潭，高中学业太忙，去北大之后离得太远，在媒体实习和工作，感觉有了了解他们的冲动，但机会也不多。“从他喝醉了的言论来了解，酒桌上，一群人吃饭，他喝多了，从应酬来看，以前在家时会带着我和全家，小地方，十来个人，今天谁谁谁有事，别人请他，他请别人，或者去坐陪，经常喝多，说很多话，重复说那些故事，年轻时的英勇事迹，就这些。不是太理解。”

“我爸还出轨。”

这不是我们第一次听到长辈的出轨故事。

张心怡高三的时候用老人机，回家的时候用爸爸的手机登陆QQ。她发现平时用微信的爸爸有一个还没退出的隐蔽的QQ号，看到了聊天内容。她看完了，“心情平静地全看完了。很长的一段话，有点老干部那种风格，就是今天看到你什么什么什么的，然后附上一枝玫瑰花。没有表情包。我不知道对方是什么人，对方可能跟老干部也差不多？发一些自拍，就是我觉得还好看，也不是很小，对方还有孩子。”

在张心怡的记忆中，那是高三的寒假，她默默地关掉QQ页面。她说那个时候她最强烈的感受是对家庭的失望，特别失望，她说她不会有很强烈的感情的爆发，记忆里甚至没对人生过什么气。她跟谁也没说，也没跟她妈妈说，也没打算问爸爸。“我

会缓慢地释放”。

后来，又有一次模考，她考得不好，心情更不好，回家想登陆一下QQ，然后又看到了，更新了，她说她当时不小心把聊天记录给删掉了，她爸爸很紧张，问她有没有看他手机的QQ，她不知道她爸爸最后怎么打消疑心的，后来没再问，可能以为自己喝多了搞丢了。

第二次看完出轨记录，张心怡继续考试，晚自习，到第二天，她跟她边上的男同学讲，我爸爸出轨了。男同学说没关系，我爸爸也出轨了。

后来，张心怡上大学之后，跟高中同学说了这事。“他说他爸爸也出轨。他要更惨一些，他是通过他妈妈知道的……”

张心怡说大家都不闹，大家都接受。“可能觉得成年人世界就这样，也没觉得脏兮兮，就正常。我对忠贞没有那么高的评价。我和同学之间也就是互相安慰一下。”张心怡说中年男人没有不出轨的。她想起大学同学的一个例子，男生，爸爸出轨了，非常戏剧化，他妈妈带着他去抓小三。然后，那个爸爸就回归家庭了。

回归家庭？这词满可笑的。

张心怡回忆起很小的时候，同样很戏剧化的场面。她五六岁，妈妈带着她去追爸爸坐的车。好像爸爸要跟着单位去旅游。戏剧化的场面就是，她妈妈带着她去追，那车绝情远去，妈妈骂了一句“畜生”。张心怡说当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但那一幕留在了记忆里。小学时，恍惚在记忆里的似乎还有非常激烈的冲突，她妈妈在不停地打电话，骂她爸爸，可能到了高中——她离家之后——他们似乎和解了，还会一起看电影。

“我小时候我爸每天晚上都出去打牌。高中之后就不怎么出去打牌了。我不知道他出轨有多长，不知道有几个人，持续多久。我不会跟他聊这个事。我们家属于暗流涌动（的那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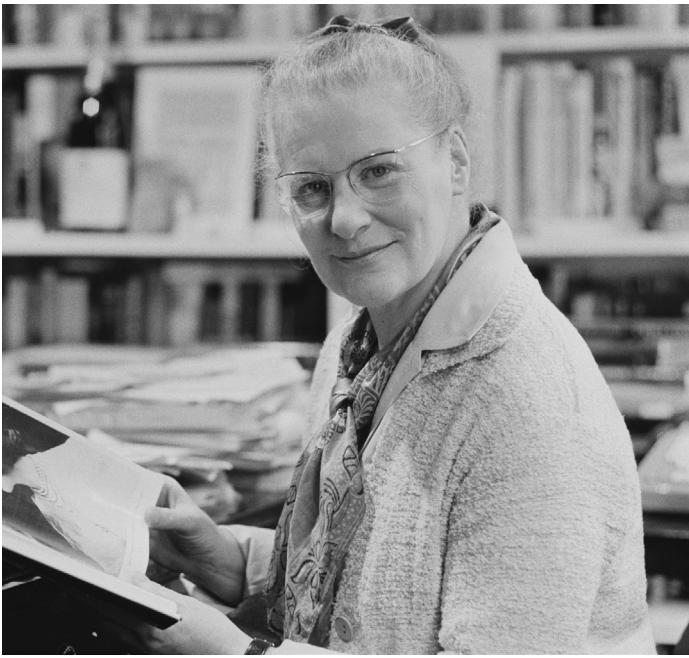


伊险峰

出生于辽宁海丰张，满族。人生第一份工作是在沈阳铁路局，大部分时间都在做媒体，也写东西。

## 田野中国

基于人类学家的田野调查，面向大众实践公共写作，用文字留住日益消减或者瞬间消失的各种现实。



题图为作者阿西尔

## 非虚构

# “未经删节”，20世纪最杰出的编辑回忆录

戴安娜·阿西尔 | 新书推荐

来自英国著名女编辑的“文学圈打工人实录”

戴安娜·阿西尔被誉为“20世纪最杰出的编辑之一”，曾负责出版过玛格丽特·阿特伍德最早的小说、彼得·本奇利的代表作《大白鲨》、杰克·凯鲁亚克及诺曼·梅勒的作品、V.S. 奈保尔的十八部作品、简·里斯的全部作品、菲利普·罗斯的前两部小说以及约翰·厄普代克的大部分作品等。

在这本回望工作往事的《未经删节》中，我们跟随阿西尔进入二战后一代文学巨匠的世界。第一部分讲述了阿西尔从牛津大学毕业后到BBC新闻部工作，随后认识了出版人安德烈·多伊奇，从而一同创立传奇的独立出版社——安德烈·多伊奇出版社的经历。她以独特的机智和罕见坦率的散文风格，讲述了她五十年漫长出版生涯中的点点滴滴；第二部分重点回忆了自己同包括奈保尔、简·里斯在内的六位作者的交往历程，详述了这些作者的经历以及性格特点，是真实有趣的名家轶事，也是对文学的宝贵贡献。



几年前，身兼作家和历史学家的美国出版商汤姆·鲍尔斯好心地对我说，我应该写一本关于自己五十年出版生涯的书，他还说：“你得把所有数字都写进去，人们想知道这个。”这些善意的话，导致本书差点在我提笔前就胎死腹中。

这一部分是由于家庭背景，这个我等下会解释，但我确定，更重要的是因为我心理上的某个怪毛病：我记不住数字。每次我回忆起在伦敦住过的各种房子时，我能看到前门的不同颜色、通往其间的台阶被磨损的不同样子、围绕着各块土地的不同栏杆，但全然不记得任何有关的数字。我的银行账号多年来一直没变过，但我每次写支票时，还是需要查阅支票簿才能写下账号。每次需要告诉一位作者他的书籍印量时，要是手头有材料，我就可以告诉他们；但要是三个月之后再来问我，到底是3000册还是5000册，我就知道了。我现在唯一记得的出版相关数字，是我们支付给简·里斯的小说《藻海无边》的出版期权那令人汗颜的25英镑，以及我们为弗朗茨·冯·巴本所写回忆录的连载版权支付的30000英镑，这个数字在当时令人印象深刻。

我当真能研究数字吗？

不，我做不到。

在安德烈·多伊奇出版社（自四十多年前成立以来我一直是该出版社的董事之一）于1985年被卖给汤姆·罗森塔尔后不久，汤姆就将这家出版社的全部档案卖给了俄克拉荷马州的塔尔萨大学，而我，既没有钱，也没有精力去塔尔萨钻那些小山一样高的纸堆。我承认我对自己这种能力欠缺还挺心存感激的，因为我其实还有一个不足，我知道优秀的研究人员都喜欢做研究，但我的确从未做过，而且我已经八十多岁，不打算再培养这种本事了。所以本书估计不会是汤姆·鲍尔斯感兴趣的那种有用的书，但也只能是这个样子了。

我为什么要写这本书？并不是因为我想写一本20世纪下半叶英国出版业的历史，而是因为我已经活不了多久了，当我离开人世，所有储存在我脑海里的经历也会消失，就像用个大橡皮一擦就没了。我内心深处有某些东西发出了尖叫：“哦，不！至少救回一部分吧！”这就像一种本能的抽搐，而非理性的意图，但具有相同的说服力。按照印刷厂的传统惯例，如果想要恢复已删除的文字，编辑会在该文字下方打一排小点，同时在页边空白处写上“未经删节”几个字。所以写这本书时，我试图以最原始的形式（很遗憾缺少数字）来对我的部分经验进行“未经删节”处理。已经有很多人对这个行业做出了更好的描写（尤其是杰里米·刘易斯在《志趣相投》中所描述的一切，不仅风趣宜人，还尽可能叙述了出版业所发生的所有事情及背后的原因）。而本书的全部内容，只是一个年老的前编辑的故事，她想象着哪怕只有几个人愿意去读，也可以让自己死得不那么彻底。

故事开始于我父亲告诉我：“你必须自己谋生。”这话从我童年时期，也就是从1917年开始，他就经常在说，但他这么说，暗示着谋生这件事并不很自然。我不记得自己曾对这个想法感到不满，但确实有点令人担忧。这是因为我外曾祖父，一位约克郡的自耕农兽医，当年赚了一笔大钱，但也可能是娶了个有钱老婆，然后在诺福克买了一幢带有1000英亩土地的漂亮房子。在我们这一代孩子们看来，这里仿佛自古以来就是“我们的”，正是因为这个地方，一直让我觉得自己属于母亲这边的家人。我父亲那边则基本没赚到钱，光亏钱，所以没能拥有让我们得以扎根的土地。他们在17世纪从诺福克出发去安提瓜搞甘蔗种植园，干得倒还不错，但最后生意失败，积蓄也花完了。所以到了我那个时代，阿西尔几代男人们已经将自己谋生视为理所当然。但即便他们有着更为脚踏实地的一面，将这一法则施用于女儿身上，我也还算是第一代。女儿们如果结婚，当然用不着自己去谋生，可是——当然这话他从没说过——这个时代的婚姻取决于没有嫁妆加持的“爱情”，所以结婚已经不再是绝对靠得住的谋生手段。

直到最近，步入晚年的我开始思考自己在出版业的职业生涯时，才意识到我的家庭背景所起到的很多决定性影响。

1952年，与安德烈·多伊奇在他的第一家出版社艾伦温盖特出版社工作了五年之后，我和他一起成为他的第二家出版社的创始董事，这家出版社以他的名字命名。因此，也可以说我近五十年来都是个出版商，但实际上我并不是，而且是我自己的出身阻碍了这一点。

我虽然一生都谈不上大富大贵，却继承了一个典型的“富贵病”：有强烈的懒惰倾向。我的内心深处潜伏着一个固执的生物，它觉得钱就应该像雨一样从天而降。如果事情不是这样，那太倒霉了：就像一个忍受干旱的农民，总得以某种方式渡过难

关，否则就要面临破产，这当然令人焦虑，但总比为金钱发愁而毁了自己的日子要好。我当然一直都知道，人不得不操心金钱，而且在某种程度上我也是这样做的，但仍然是能免则免。这意味着虽然我从未选择什么都不干，但确实也没有去做任何自己不想做的事。我不知道我到底是“做不到”还是“不愿意”，但感觉更像是“做不到”，而我做不到的事情里有很多都属于出版商必须去做的事。

出版是门复杂的生意，涉及买、卖、制作或让别人制作。它买卖的是人们想象力的产物，这是书籍的原材料，还有各种法定权益。它制作的产品各不相同。因此，出版商必须能理解和控制复杂的财务和技术结构；必须是聪明的谈判者，善于讨价还价；必须有一种精明的本能，知道什么时候该大方花钱，什么时候该锱铢必较；必须能有效地管理或找人管理人满为患的办公室；最重要的是，必须能兜售出自己那些各式各样的产品。但我正好相反，我只会花钱，讨厌责任感，讨厌告诉别人该怎么做；最重要的是，我无法向任何人兜售任何东西。我不是个傻瓜，很清楚我不能也不想掌握的这些方面非常重要，甚至也对这些方面了解不少。尽管我对自己的无能感到愧疚，但不得不承认，我唯一真正身心均想沉浸其间的，只有对书籍的选择和编辑。这当然是出版过程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但如果没其余的环节，它就一文不值。

所以我并不是出版商，我只是个编辑。但即使作为编辑，即使我非常喜欢这份工作，我也完全不能接受下班后工作，这充分暴露了我的“业余”本性。比如开早餐会以及周末把工作带回家，这两件被许多人视为热爱工作的必要证据的事，这两件让那位“天生的出版商”安德烈·多伊奇沉迷的事，我却深恶痛绝。在工作中结识的人极少能进入我的私人生活，当然这也因为办公室和我家相距甚远，而家是比办公室重要得多的地方。虽然我为自己在工作里的局限性感到羞愧，但我并不以将私人生活看得比工作重要而感到羞耻，在我看来，每个人都该这样。

尽管如此，编辑工作确实扩大和延展了我的生活，对此我深怀感激。它让我每天有事可干，能赚来足够的钱维持生活，它几乎总是令人愉快的，而且它也不断验证了关于出版业的一句老生常谈：你一定会遇到非常有趣的人。因此，本书的第一部分是关于我的日常工作，第二部分则是关于一些有趣的人。

.....

为了在回忆编辑的职责——那种无聊但仍需认真对待，必须对自己非擅长领域的书籍也尽心尽力的责任——之后恢复平衡，现在我想讲述一下所有工作中最吸引我的那类，比如与基塔·瑟伦利于1974年合作出版的《进入黑暗》。基塔的童年是在维也纳度过的，她父亲是匈牙利人，母亲是奥地利人，都不是犹太人。希特勒接管奥地利时，她刚十五岁，被送到法国上学，然后在那里遭遇了战争。在德国占领期间，她在巴黎和卢瓦尔河照顾被遗弃的儿童，后来前往美国。到了1945年，她在德国南部的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担任流离失所者营地的儿童福利官员。尽管许多孩子最终得以与家人团聚，但更多的孩子无处可去，无人可找，所有人都经历了无法言说的恐惧。怎么会有人选择让成千上万的孩子成为集中营和劳改营的受害者呢？他们都在十四岁以下，很多还不足十岁！

以下引自我们出版社1991年出版的《进入黑暗》平装本第一版的序言：“在纽伦堡审判的几个月里，我们与幸存者一起工作的时间日渐增加，这其中包括一些来自被占领的波兰的灭绝营幸存者，对这个灭绝营，那之前几乎无人知晓。对所犯下的恐怖事件了解得越多，我越觉得需要找一个人，来亲自解释我们认为的正常人怎么会被引导着去干那样的事情。”这个问题困扰着她，她开始觉得“至少应该深入透视一个与这种彻底邪恶有密切关系之人的个性，这非常重要。如果可以的话，对这么一个人的背景、童年及最终成年后的动机和反应进行评估，深入了解他所看到的，而不是我们希望或预先判定的东西，可能会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人类的邪恶在多大程度上是由他们的基因造成，在多大程度上是由其所处的社会和环境造成”。

人们有时会问，为什么基塔·瑟伦利这么习惯于书写关于邪恶的文章，但我觉得如果有人在自己生命早期就陷入了如此灼痛的知觉并受困于此，那么她擅长这类写作就并不令人惊讶。我们普通人只是因为太过害怕，就算有所思考也不想沉湎其中。一切使生命有价值的东西，都来源于人类与自身黑暗作战的渴望，试图了解邪恶也是这场战斗的一部分。诚然，为了与邪恶对抗而对之进行的了解，我们至今就算有了一些，也并不多，而且，面对可怕事物时，我们的恐惧和沮丧常常将可能有的兴奋掩饰了起来。但是，如果任由这些理由阻止我们去了解腐败发生的机制，那我们还有什么希望？在我看来，基塔在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经历了那一切的大约

二十五年后，依然想要一个解释，没有比深入透视这个特定邪恶人格更好的机会了。

她当时已经成为一名记者。1967年，她受《每日电讯报》的委托撰写了一系列关于联邦德国的文章，包括那时正在进行的纳粹战犯审判，因此她出席了对特雷布林卡的指挥官弗朗茨·施坦格尔的审判。特雷布林卡是德国占领波兰期间四个“灭绝营”（与“集中营”不同）之一，施坦格尔与其他三人一起，负有谋杀九十万的共同责任而被判无期徒刑。四人中一个已经死了，另外两个逃了，施坦格尔也曾逃到了巴西，但最终被追查归案。基塔意识到，他正是自己希望研究的对象，也觉得自己目前有能力承担这项任务。

她被允许探望监狱中的施坦格尔，在六个多星期里与他进行了长谈，在谈话的最后时刻，他触及自己罪恶的根源，并承认自己不该继续存在于世间。但他说的话里，还有个细节需要再次确认，所以她同意三天内再来一次。她再次回到监狱时，却被告知他已经死了，死于心力衰竭，不是自杀。随后，《电讯杂志》发表这些采访文章时，却拒绝将这一事实收录在内，声称没人会相信。

读完这些采访文章后，我们请基塔来办公室讨论出书的可能性，她告诉我们，她已经在为此做进一步工作了，很高兴让我们看看。我不记得是过了多久她将稿子（或更确切地说，将可以塑造这本书的原材料）带来的，但我永远不会忘记面前的那些手稿堆积成山的景象。

因为在办公室实在难以处理，我当天晚上就把稿件带回了家，铺满了整张桌子。除了对施坦格尔的采访这个核心内容之外，还至少涉及二十四个其他人的采访记录，其中许多篇幅很长，此外，还有很多能将这些材料焊接成整体的（但并非全部）描述和解释段落。

我从来没有读到过像那天晚上那样让我震惊的东西。看了在盟军到达贝尔森集中营后拍摄的纪实画面，我本以为自己已经了解了那些恶行的性质，但其实差得远呢。通过希特勒“安乐死计划”执行人的这堆惊人材料，我探索着这位普通、高效、雄心勃勃、害怕妻子的奥地利警察的人生过往，还有除了乌克兰人外，所有在灭绝营为他工作的其他人的经历，一切都非常有吸引力，同时也令人恐惧，因为我知道最终会走向哪里.....随后便走到了。有声音开始告诉我所发生的一切.....我记得我在房间里不停地走来走去，仿佛想要逃离那纸堆里的一切，那天晚上我彻夜无眠。在那种情境下，我做出了一个编辑决定：在这本书里，绝不或尽量少用形容词，诸如“恐怖”“残暴”“悲惨”“吓人”等字眼，与事实相比，这些词就像扔进熊熊燃烧的烈火中的纸片一样单薄。

基塔挖掘了大量原始材料，前往巴西、加拿大、美国、德国和奥地利进行采访。之后，她就陷入了如我刚刚瞥见的那种更深的黑暗之中，基塔已经快撑不住了。此刻，她很愿意得到一个编辑的支持，因为尽管她的英语很流利，但英语并不是她的第一语言，因此她并没有绝对的信心。的确，有时她会陷入略带日耳曼风格的文字节奏，句法也略微阐述过度。但最主要的原因是她已经精疲力竭，而且与材料距离太近，所以必须获得帮助。通常，我只要说“让我们把这一点放在这个位置”，她就会立即回答“不，不，这一部分必须放在那里”，但当她透过一个全新的视角重新审视自己的文字时，也能重塑某些段落。了”，或者“等一下，这里需要再次提醒，因为距离第一次出现有段时间了”。

很明显，对施坦格尔的采访是本书其他部分必须依附的主线，但要决定在哪里打破这条主线、引入其他声音不容易，比如他妻子或妻妹的声音、为他工作的手下们的声，那五个幸存者还有其他人的声音。我已经忘了我们到底为此花了多长工作时间，大约有好几个月吧。通常都在我的公寓里工作，为了这本书，我不得不经常连续几天离开办公室，而基塔则必须经常回到自己的打字机处去新增说明或扩展。我们不时陷入困境，因为经常会出现一份材料，本身很吸引人，但似乎放在哪里都不适合。“天哪，我们只好牺牲掉”，我会这么说，然后，又过了一会儿，整本书似乎会发生一些微妙的变化，然后，啊哈！之前有问题的材料被放了进来，完全合适。这类事几乎以不可思议的规律不断重复。基塔以为她只是收集了能找到的所有东西，但她在下意识里组织起来的书稿，条理越来越清晰。因为采访者终究控制着采访的方向，而她对施坦格尔的背景研究越深入，对所发现的关联性就越有把握。最后，我们确实压缩了书籍的长度，但并没有遗漏任何内容。我会指出哪些地方需要澄清，或压缩或扩展，我会说“但你在描述某某时已经说过这个这就是她在写这本书时所做的最厉害的事。在这个最复杂的过程中，即使她以为自己不知道，但其实她一直都知道自己所追求的方向是什么。这一点，连同她作为采访者的惊人力量，帮助她从人们身上汲取他们必须呈现的一切。另一个让我钦佩的点是，她没有一般作者的虚

荣心，她有时会对我建议的改动说“不”，理由是读起来不像她的话，但通常情况下，如果能让观点更简洁有力，她并不介意我是否改变了她的原话。她致力于将事情说出来，而不是给人留下文字雕琢匠的印象。

我可以详细写一篇有关《进入黑暗》的文章，但对那些还不知道这本书的读者来说，找原书来读一读会更有意义。我对其进行编辑工作，最重要的原因是它的主题完全吸引了我。直到现在，我仍然经常思考，那个毫不起眼的人是如何因为一连串是非选择而成了怪物，他的一些早期选择非常微不足道，他尊重的人里没有一个支持他选择正确的道路，而他尊敬的另外一些人，譬如高级官员、牧师、医生（他对“值得尊敬”的看法非常传统），则将错误的事情当作正确的来做，最典型的当然是“元首”。施坦格尔内心缺乏强大的中心，这很可能是被其沉闷枯燥的童年所剥夺的，所以他成了政权的产物。其他内心缺乏强大中心的人未必拥有和他一样的内在特性（这特性也许是缺乏想象力与野心的结合），或者只是程度的差异，但这一特性对那些选择他来干这项令人震惊的工作的人来说，一定非常显而易见。可以肯定的是，是环境而不是基因让他成为这个样子。

变老带来的一件好事，是可以不再那么在意人们对自己的看法。尽管大家都信奉不该自我吹嘘，但我仍然要引用基塔感谢我帮助的话语，因为这些话确实让我非常开心：“戴安娜·阿西尔编辑了《进入黑暗》。她将温暖、智慧、文字的流畅，以及我几乎无权期望的高质量投入，给予了这本书，给予了我。她最终成为我的朋友，对此我心怀感激。”当然我们两不相欠，因为我从始至终都很感激我的朋友基塔允许我参与其中。

这本书完成后不久，基塔就病了，是癌症，但谢天谢地，发现的时候还是早期，可以根除。我知道没有任何证据，但我一直坚信这是她怀着勇气紧紧追随那个男人进入他可怕的暗夜，



戴安娜·阿西尔

英国知名文学编辑、作家，1917年出生于英国诺福克，安德烈·多伊奇独立出版社的创始董事，被誉为“20世纪最杰出的编辑之一”。曾出版过玛格丽特·阿特伍德最早的三部小说、彼得·本奇利的代表作《大白鲨》、杰克·凯鲁亚克及诺曼·梅勒的作品、V.S. 奈保尔的十八部作品、简·里斯的全部作品、菲利普·罗斯的前两部小说以及约翰·厄普代克的大部分作品等。76岁退休后开始进行文学创作，撰写了小说及多部回忆录，其中《暮色将尽》获得科斯塔传记奖，从此声名远扬。她一生未婚，于2019年1月在伦敦一家临终关怀医院去世，享年101岁。

#### 新书试读

来自新近好书的试读章节，由小鸟文学编辑部从近期出版物中挑选而来。祝阅读愉快。



题图为电影《白日美人》(1967)剧照

## 非虚构 色情、权力、欲望..... 我们应该如何谈论性?

埃米娅·斯里尼瓦桑 | 新书推荐

这本书尖锐但极具人性地颠覆了我们讨论或避免讨论性问题和性政治的方式。

如果我的欲望必须被规训，那么谁来规训？

如果我的欲望拒绝被规训，那么我会经历什么？

《性权利：21世纪的女性主义》是牛津大学学术新星埃米娅·斯里尼瓦桑的处女作，尖锐但极具人性地颠覆了我们讨论或避免讨论性问题和性政治的方式，追溯了性在我们世界中的意义，以色情、权力、欲望为表征，对当代女性主义问题进行了阐释、拆解、质疑、思考和深化。这些文章讨论的是这个世界的性政治与伦理，而使它们得以成文的，是对一个与此不同的世界的期盼。

经雅众文化授权，我们选摘了《性权利》一章分享给读者。



2014年5月23日，22岁、从大学辍学的埃利奥特·罗杰(Elliot Rodger)成了全世界最著名的“非自愿独身者”(incel, 全称是 involuntary celibate)，在理论上

男女均适用，但实际上它不是指一般的没有性生活的男性，而是指特定类型的没有性生活的男性：那种深信别人欠他性生活、被剥夺了他性生活的女性所激怒的人。罗杰在他的两个舍友王伟汉(Weihan Wang)和洪晨元(Cheng Hong)，以及他们的朋友陈乔治(George Chen)进入他在加利福尼亚州伊斯拉维斯塔市塞维利亚路的公寓时，挥刀刺死了他们。几小时后，他驱车来到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校园附近的阿尔法斐联谊会会馆，在外面朝三名女性开枪，致两名女性凯瑟琳·库珀(Katherine Cooper)和薇罗妮卡·魏斯(Veronika Weiss)身亡。罗杰随后在伊斯拉维斯塔进行了疯狂的驾车枪击，在一家熟食店内的克里斯托弗·迈克尔斯-马丁内斯(Christopher Michaels-Martinez)被一颗子弹击中胸腔毙命，他也是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的学生，另有14人受伤。罗杰最终在向自己的头部开枪后，让他的宝马双门跑车撞向一辆停在路边的汽车。他被警察发现时已经死亡。

在公寓内杀死3名男子之后，开车去阿尔法斐之前的几个小时里，罗杰去了星巴克，点了咖啡，并在他的YouTube频道上传了一段视频，“埃利奥特·罗杰的报复”。他还通过邮件群发了一份10.7万字的回忆录兼宣言《我的扭曲世界：埃利奥特·罗杰的故事》，收件人包括他的父母和治疗师。这两份文件一起，透露了即将发生的残杀的细节及罗杰的动机。他在《我的扭曲世界》的开头解释：“我只想融入社会，过上幸福的生活，但我遭到了抛弃和拒绝，被迫忍受孤独与毫无意义的生活，这一切都是因为人类女性无法看到我的价值。”

他继而开始描述他在英国享有特权且幸福的童年生活——罗杰是一位成功的英国电影导演之子，随后是他在洛杉矶享有特权但不幸的青春期，他是个个子不高、不善运动、害羞、古怪、没有朋友的孩子，对变“酷”渴望极了。他写到染金发（他有一半白人血统，另一半是马来西亚华人；金发的人“要英俊得多”）；在游戏《光环》系列和《魔兽世界》中寻找庇护所；在夏令营里被一个漂亮姑娘推开（“这是我第一次经历女性的残酷，它给我带来了无尽的创伤”）；被同龄人的性生活激怒（“为什么一个低级的黑人丑男能搞到一个白人女孩？为什么不是我？我那么英俊，而且我自己也是半个白人。我是英国贵族的后代，他是奴隶的后代”）；连续从学校和社区大学辍学；以及他幻想中的政治秩序，世界由他统治，性被宣布非法（“所有的女人必须像瘟疫一样被隔离”）。罗杰说，这一切导致的必然结果是，他要发起“对女人的战争”，他要在这场战争中“惩罚所有的女性”，因为她们剥夺了他的性权利。他将把阿尔法斐联谊会当作攻击目标，“那是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里女孩最性感的联谊会”，因为这个会里有“体现了女性身上我所憎恨的一切的那种女孩……性感、漂亮的金发女孩……被惯出了毛病、冷酷无情、恶劣的贱女人”。他会向所有人证明他才是“更高一等的人”。

2017年末，在线讨论论坛Reddit关闭了其拥有4万名成员的“非自愿独身者”支持小组，这个小组是为那些缺少浪漫关系和性生活的人开的。在采取这一行动之前，Reddit引入了一项新政策，禁止“鼓励、美化、煽动或呼吁暴力”的内容。起初是为孤独和性绝缘之人提供支持的小组，后来已经变成了这样一个论坛：用户不仅对女性和跟女性睡觉的“非单身者”与“正常人”发泄愤怒，还频频鼓吹强奸。第二个非自愿独身者Reddit群组“真非自愿独身者”(Truecelbs)也在网站政策修改之后被禁。群组的侧边栏上写着：“不鼓励或煽动暴力或其他非法活动，如强奸等。但如强奸量刑应该减轻或强奸应该合法化，以及放荡女人活该被强奸这类发言当然没问题。”

在罗杰杀人事件发生后不久，非自愿独身者就到这个男性空间来解释：女人（和女权主义）最终要对发生的事情负责。但凡有一个“恶毒的贱女人”愿意跟埃利奥特·罗杰搞，他也不必非要去杀人。女权主义评论者很快指出了理应是明摆着的道理：没有女人有义务跟罗杰上床；他对于性权利理应得的感觉是父权意识形态的一个典型案例；他的行为是在这种理应得的感觉遭到挫败后可预见的反应，虽然十分极端。他们可能还会补充，女权主义远非罗杰的敌人，女权主义更可能是抵制那个让他因为自己矮、笨拙、缺乏男子气概、混种族而感到自己不如别人的体制的主要力量。他的宣言表明，欺负他的绝大多数是男孩，而不是女孩：他们把他塞到储物柜里，叫他“屌丝”，取笑他还是个处男。但是女孩剥夺了他的性权利，因此，必须死的是女孩。

是否也可以说，罗杰的不可睡性(unfuckability)是女性内化父权制下的男性性吸引力标准的一个征兆？这个问题的答案因两件事而变得复杂。第一，罗杰是个讨厌的人，促使他捅室友和他们的朋友总计134刀的，至少有一部分是他对自己审美、道德和种族优越性的坚持，以及他身上的另外一些东西，无论是什么，而不是他没能符合异性恋男性气质的要求，女人都离他远远的。第二，多得是没有杀人嗜好的

书呆子得到了性机会。事实上，父权制的不公正之处在于，它甚至使那些理应不具吸引力的男性类别都变得有吸引力了：怪胎、书呆子、柔弱的男人、老男人、长着一副“老爹身材”的男人，这是非自愿单身者和其他“男性权利运动者”注意不到的。同时也有性感女学生和性感教师，古灵精怪梦中女孩和辣妈，但她们都身材紧致并且火辣，只是同一标准范式经过微调的变体。〔我们能想象《智族》(GQ)登载一篇赞美“老妈身材”的文章吗？〕

就是说，罗杰想睡的那种女人——性感的联谊会金发女孩——一般来说不会与罗杰这号男人约会，甚至那些不讨人厌、不嗜杀的男人也够不上她们，至少直到他们在硅谷发迹之前是这样，这是事实。这与父权制所施加的严格的性别规范有关：甲等女都想找甲等男，这也是事实。同样是事实的是，罗杰的欲望——他对“被惯坏的、不可一世的金发荡妇”的色情执念——本身就是父权制运作的结果，“性感的金发荡妇”之所以成为所有女人的代名词也是如此。（男性空间中的许多人高兴地指出，罗杰甚至没有成功杀掉他渴望的那类女人，仿佛这最终确认了他末等的性地位：凯瑟琳·库珀和薇罗妮卡·魏斯不是来自德尔塔德尔塔联谊会的“性感金发女孩”，她们只是恰好路过阿尔法斐会馆。）在对埃利奥特·罗杰和更广泛的非自愿单身现象的女权主义评论中，已经有很多关于男性应得的性权利、物化和暴力的讨论。但到目前为止，关于欲望的分析还很少：男人的欲望、女人的欲望，以及意识形态对两者的塑造。

过去如果你想对欲望进行政治批判，你总会诉诸女权主义。几十年前，女权主义者几乎是唯一就性欲望——其对象与表达、癖好与幻想——如何受到压迫的塑造这一问题展开思考的。20世纪60年代末和70年代的激进女权主义者呼吁我们放弃弗洛伊德的观点，后者认为性欲是“一种沿生理性别的分界线划分的与生俱来的、基本的、天然的、前政治的、无条件的本能欲望”（凯瑟琳·麦金农语）。她们敦促我们认识到，是父权制塑造了我们当前所知的性行为：一种以男性支配和女性从属为特征的实践，其构成性情绪，按照麦金农的表述，是“敌意与轻蔑，或主人对奴隶的兴奋，以及畏惧与软弱或奴隶对主人的兴奋”。对所谓的“反性”女权主义者来说，竟有女人似乎能够在这样的境况之下获得快感，就说明了情况有多么糟糕。对她们中的许多人来说，解决方案在于拒绝跟男人做爱和结婚。例如，1969年由提-格雷丝·阿特金森(Ti-Grace Atkinson)在纽约成立的女性解放团体“女权主义者们”(The Feminists)就是这样，她们实施的一项组规是，只允许不超过1/3的成员处于婚姻状态或与男人同居。这一定额表明“女权主义者们”坚信，女权主义“不仅要处理女性想要什么的问题”，更需要“为女人想要什么带来改变”。细胞16(Cell 16)是1968年成立于波士顿的一个团体，该团体奉行性别分离和独身主义，练习空手道。入团的第一步就是读瓦莱丽·索拉纳斯的《灭绝男人协会宣言》，索拉纳斯宣称：

女性可以轻而易举地让性欲消除，让自己完全冷静、理智、自由，比她能想到的还要轻易……当女性超越了自己的身体……由生殖器构成自我的男性就会消失。

细胞16的创始人罗克珊·邓巴-奥尔蒂斯(Roxanne Dunbar-Ortiz)的观察与索拉纳斯相呼应，“经历过完整的性场景，随后因为选择和反感，成为独身主义者的人，是最清醒的人”。

虽然20世纪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的所有激进女权主义者都认为性是一种父权制建构，但一些人从一开始就反对女性的欲望必须与她们的政治观点保持一致的想法。如艾丽斯·埃科尔斯在她关于美国激进女权主义的研究《敢做坏女人》(Alice Echols, Daring to be Bad)中详细描述的那样，自称“支持女性”的女权主义者将跟男人做爱和结婚视为一种合理的欲望，同时对大多数女人来说，这也是一种战略需要——为了获取政治权力或单单只是生存——而不是父权思想灌输的征兆。女人需要的，不是从对异性恋婚姻的虚妄欲念中解放出来，而是异性恋婚姻能够以更平等的条件被重新构想。由舒拉米斯·费尔斯通和埃伦·威利斯于1969年成立的激进女权主义团体红袜子(Redstockings)的宣言坚称：“女性的屈从不是洗脑、愚蠢或精神疾病的结果，而是持续的、日常的来自男性的压力造成的。我们不需要改变自己，而是要改变男人。”因此，在红袜子和其他支持女性的女权主义者看来，应该拒绝“个人解决方案”(personal solutionism)，即认为革命的可能性包含在细胞16和“女权主义者们”等团体的分离主义做法当中。对支持女性的女权主义者来说，此类激进主义预设了一种虚假的划分，女人被分成了“真”女权与蒙昧无知的女性，后者在她

们与男人的关系中背叛了革命事业。在支持女性的女权主义者看来，所有女性都参与协商与调和的行为，真正的解放需要结构性的转变而非个人的转变。据报道，一位著名的红袜子曾在一次会议上宣称：“革命之前我们不会离开保留地！”（她们选择这个比喻，或许可以表明，像大多数激进女权团体一样，红袜子绝大多数都是白人。）

支持女性的女权主义者同样担心，反性的女权主义者在驱除父权的狂热中，会成为否定女性情欲的同谋。这并非毫无依据。埃伦·威利斯回忆，提-格雷丝·阿特金森在参加一次红袜子的会议时，以“非常高人一等”的语气说，性欲“只存在于我的脑子里”。不过，虽然她们坚持女性性欲是真实的，但支持女性的女权主义者对捍卫异性恋界限之外的欲望的合法性又兴趣索然。她们认为异性恋婚姻既是实际的需要，又是本能的渴望，并指控女同性恋是“性战场”的逃兵，在疏远主流女性。一位退出红袜子的女同性恋注意到，这个团体“在谈及女同性恋时，就没那么支持女性了”。

支持女性的女权主义者这种恐同倾向，一反常态地与反性女权主义者不谋而合，许多反性女权主义者将女同性恋视为“认同男性的”、对于其他女性的性威胁。当女同性恋女权主义者开始大声主张她们的性别身份与政治立场的一致性时，是在将女同性恋主义框定为一种政治团结问题，而非一种与生俱来的性取向。1971年在华盛顿特区成立的激进女同性恋团体“怒”(The Furies)宣称：“女同性恋主义并非性倾向问题，而是一个政治选择问题，是每个想要……结束男性至上主义的女性必须做的选择。”因此，反性女权主义者独身主义的情况被重新提出来作为女同性恋主义的支持论据，尽管是非常特殊的一种。随着政治上的女同性恋开始被视为妇女解放运动先锋，支持女性的女权主义者像曾经指控反性女权主义者一样，指控她们相比政治对抗，其实对个人转变更感兴趣。政治上的女同性恋则反过来指控支持女性的女权主义者在为男性权力提供支撑。

类似的模式也在英国上演。1970年，首届全国妇女解放运动会议在牛津的拉斯金学院举行。一开始，英国的第二波运动在智识上和政治上都由朱丽叶·米切尔(Juliet Mitchell)、萨利·亚历山大(Sally Alexander)和希拉·罗博特姆(Sheila Rowbotham)等社会主义女权主义者占主导，她们认为反对资本主义剥削是女性解放的核心，而男性左派则是重要的盟友，即使不够完美。一些女权主义者提出异议，建立了分离主义的妇女之家和团体。但直到1977年，社会主义女权主义者和那些将男人而非资本主义视为最主要敌人的女权主义者之间才出现了一次决定性的割裂。在召开于伦敦的第九次妇女解放运动会议上，希拉·杰弗里斯提交了一份题为《革命女权主义的需要》("The Need for Revolutionary Feminism")的论文，她在其中指责社会主义女权主义者没有认识到女性受压迫的基础是男性的暴力，而非资本主义的剥削，并指责她们提出诸如让社会提供儿童照料这样的“改良主义”的要求。“妇女解放运动是且应当被视为一种威胁，”杰弗里斯说，“我看不出把它搞得像男女混合的特百惠直销会，让参加的男人煮咖啡有什么用处。”少数发声的英国女权主义者聚集在杰弗里斯周围，组成了像利兹革命女权主义小组(Leeds Revolutionary Feminist Group)这样的分离主义团体，该团体因其小册子《政治女同性恋：反对异性恋的理由》("Political Lesbianism: The Case against Heterosexuality")而出名。在接下来一年于伯明翰召开的会议上，革命女权主义者提交了一份提案，建议废除妇女解放运动在此前会议上提出并致力的六项要求，理由是“我们向父权制国家——向男人，我们的敌人——提出任何要求都是非常荒谬的”。该提案被从全体会议的议程中删除——革命女权主义者声称这是有意的。它最终被朗读出来时，遭到了社会主义女权主义者的激烈反对，反过来，这又导致革命女权主义者以打断其他发言者和唱歌来抗议。两派人随后激烈地争吵，讨论男性性暴力是“男性至上主义”还是如阶级压迫等其他社会弊病所产生的症状，以及女同性恋的性行为是否应该得到女权主义者的特别保护。会议进行到后来，喊叫声中几乎听不清任何发言；麦克风被从发言者手中夺走；许多女性在沮丧和厌恶中离开。伯明翰会议是全国妇女解放运动的第十次，也是最后一次会议。

随着妇女解放运动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的展开，这些战线变得更加分明了。自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来，美国的反性女权主义者越来越关注色情问题，在一定程度上，英国的革命女权主义者也是，对一些女权主义者来说，这就象征了整个父权制。（反色情女权主义者延续了女权主义恐同的主题，总体上也带着恨意反对女同性恋虐恋，她们认为这是对父权制动力学的重述。）许多女权主义者发现对色情问题的过分关注令人不安，其中最著名的数埃伦·威利斯，其原因与支持女性的

女权主义者反对激进的独身主义类似：也就是说，这可能正中了压抑女性情欲倾向的下怀。但许多女权主义者也想与支持女性的路线保持距离，后者认为大多数女性理想的状态是单偶制的异性婚姻。威利斯穿行于支持女性和反性女权主义这两级之间，引领了后来被称为“支持性”或“性积极”的女权主义发展方向。在她 1981 年的经典文章《欲望视野：妇女运动是支持性的吗？》（“Lust Horizons: Is the Women's Movement Pro-Sex?”）当中，威利斯提出，支持女性和反性女权主义都强化了保守的观念，即男人渴望性，而女人只是忍受性，这种观念的“主要社会功能”是限制女性在卧室之外（或街巷）领域的自主权。威利斯写道，这两种形式的女权主义都要求“女性接受以一种虚假的道德优越感来替代性快感，接受以对男性性自由施加限制来替代真正的权力”。威利斯和其他支持性的女权主义者从同时代的 LGBT 权利运动中得到启发，坚持认为，女性本身就是性的主体，她们的同意行为——说是和不——在道德上具有决定性。

自威利斯开始，支持性的女权主义观点一直在获得诉诸交叉性的女权主义的支持。父权压迫是受种族和阶级影响的，对这一点的思考使女权主义者不愿制订普遍的解决办法，包括普遍的性政策。平等进入职场权利的要求，对白人中产女性来说更有共鸣，因为她们历来被期待留在家里，而黑人劳工阶级女性对此则没那么有共鸣，因为她们一直都被期待与男人一同工作。同样，在性关系中自我物化，对于凭借其白人身份已然遵循女性美貌范式的女性是一回事，对于黑皮肤、棕色皮肤的女性或跨性别女性又是另一回事。诉诸交叉性也加深了女权主义者对虚假意识思维的不安，所谓虚假意识，即认为与男人做爱、结婚的女人已经内化了父权制。大家普遍认为，当前最重要的是相信女性说的话。如果一个女人说她很享受在色情业工作，或享受收费跟男人做爱，或享受参与强奸幻想，或享受穿细高跟，甚至说她不仅享受这些事情，而且认为它们是解放的，是她的女权主义实践的一部分；那么许多女权主义者认为，我们必须信任她。这不仅仅是一种认识上的主张：一个女人讲述她自己的经历，给了我们强有力但并非不可辩驳、相信确实如此的理由。这也是，或者说主要是一种伦理主张：一种太随意地贩卖自欺欺人的概念的女权主义，可能会支配本该被它解放的主体。

到目前为止，威利斯在《欲望视野》中提出的观点依然保持着持久的生命力。20世纪 80 年代以降，不对女性性欲进行道德化，坚持这些欲望实施的行为只受到同意界限的道德约束的女权主义一直是潮流所向。性不再在道德上构成问题或不成问题：相反，它只关乎想要或不想要。在此意义上，性的规范就跟资本主义自由交换的规范一样。重要的不是什么条件产生了供求关系的动力学——为什么有些人需要出售他们的劳动，而另一些人则购买劳动；重要的只是买方和卖方都同意转让。不过，说性积极代表了自由主义对女权主义的收编，就有些太轻飘飘了。一代又一代的女权主义者和男女同性恋活动家，为将性从羞耻、污名、胁迫、虐待和不必要的痛苦中解放出来，进行了艰苦的斗争。对这一计划来说，重要的是强调，外部对性行为的理解是有限度的，性行为可以拥有不被公众视角所理解的私人含义，有些时候，我们必须相信某一次特定的性行为是可以的，即便在我们无法想象它有什么可能性的时候。因此，女权主义便发觉自己不但在质疑自由主义对公共与私人的区分，也在坚持这种区分。

然而，如果对性积极与自由主义之间的趋同视若无睹，不管多么无意，都太不真诚了，这两者有一种共同的不愿审视我们欲望形成过程的倾向。第三波女权主义者说，性工作就是工作，并可能是比大多数女性从事的体力劳动更好的工作，这是没错。性工作者需要的是法律和物质上的保护、安全和保障，而不是救援或改造，这也没错。但是，要理解性工作是什么样的工作——究竟是什么样的身体和心理行为被买卖，以及为什么付出劳动的绝大多数是女性，而支付报酬的绝大多数是男性——我们肯定要对男性欲望的政治形成做出解释。并且，我们肯定也要对其他形式的女性工作给出与之相关的解释：教书、护理、照料、母职。说性工作“只是工作”，是忘记了所有的工作——男人的工作、女人的工作——都从不只是工作：它也是有性别的。

威利斯在《欲望视野》中总结道，对她来说，“不言而喻的是，自主同意的伴侣有权利选择他们的性癖好”，女权主义中不应容许威权式道德主义存在”。然而她接着又说，“一场激进的运动必须让视野……超越选择权，继续关注根本的问题。我们为何要选择我们所选择的？如果我们拥有真正的选择，我们会选择什么？”这对威利斯来说似乎是一次非同寻常的逆转。在阐述了将我们自由选择性偏好的权利（无论它是什么）

当作不动点，不应受到道德审问的伦理理由之后，威利斯告诉我们，一种“真正激进的”女权主义追问的问题，恰恰可能是引发“威权式道德主义”的问题：如果女性能够真正自由地选择，她们的性选择会是什么样？有人可能会觉得威利斯在一方面往前推进了一步，另一方面又后退了一步。但或许，她对两个方面都有所推进。她告诉我们，女权主义的任务是：一方面，将我们自由做出性选择的权利当作不言而喻的；另一方面，正如“反性”和女同性恋女权主义者一直在说的，也要看到为什么这样的选择在父权制下几乎谈不上是自由的。我的意思是，在我们急于实施前者的时候，女权主义者可能会忘记后者。

当我们把同意看作对伦理上可行的性行为的唯一限制时，我们就被推向了对性偏好的自然化，在此前提下，强奸幻想就成了一种原始事实，而不是一种政治事实。但也不仅仅是强奸幻想。想想“性感金发荡妇”和东亚女人可睡性最高，相对而言黑人女性和亚洲男性没有可睡性这些说法，以及对黑人男性性能力的盲目痴迷和恐惧，对残疾人、跨性别者和肥胖身体表现出来的性厌恶。这些关于“可睡性”的事实都是政治事实，不是说谁的身体被视为在性的角度上可睡（在此意义上，黑人女性、跨性别女性和残疾女性都太有可睡性了），而是谁的身体能给那些跟他们睡的人带来地位。这些事实是一种真正关注交叉性的女权主义应当要求我们认真思考的。但是，脱离了威利斯对于关注矛盾性的呼吁，性积极的视角有可能使这些事实中立化，只将它们看作前政治的既定事实。换句话说，性积极的视角不仅有可能掩盖厌女症，还可能掩盖种族主义、残疾歧视、恐跨和其他压迫性的体制，这些体制都可以借由看似无辜的“个人选择”机制潜入卧室。

“Grindr 上的美好肉体大多是遮着脸的亚洲男人。”我的一个同性恋朋友说。第二天，我在 Facebook 上看到 Grindr 开始了一个叫“我擦？”（What the Flip?）的网络系列短视频。在三分钟的第一集里，一个相貌英俊、一头蓝发的东亚男人和一个衣着讲究、长相好看的白人男性互换了 Grindr 个人简介。结果不出所料地残酷。现在用着亚裔男简介的白男几乎无人问津，有人找他时，也是那种满嘴说着他们是“米饭皇后”（只喜欢亚裔男人的其他族裔的男同性恋），喜欢“擅长做 0”的亚裔男的男人。当他无视他们的信息时，随之而来的就是汹涌的谩骂。与此同时，亚洲男人的收件箱涌入了大量仰慕者。事后谈起，白男表达了他的震惊，而亚裔男无可奈何但强作轻松。“你可能不是每个人的菜，但你一定会是某个人的菜。”白男无力地说，随后他们抱了抱彼此。下一集是一个肌肉明显的瑞恩·高斯林型男人跟一个长相漂亮、圆胖身材的男人交换简介。另一集则是一个女性化的男人跟一个肌肉男互换简介。结果都没能出人所料。

在“我擦？”中，明显的讽刺是，Grindr 本质上鼓励其用户根据粗暴的身份标志将世界划分为可行的性对象和不可行的性对象——从性关系的“底线”与“要求”来思考。Grindr 这样做直接地加深了歧视的常规，我们的性欲原本就已经朝着这样的方向发展了。但线上约会——尤其是 Tinder 和 Grindr 的抽象界面，把吸引力压缩成一些基本要点：脸、身高、体重、年龄、种族、风趣幽默的个人标语——可以说是集目前的性关系形态中最糟的东西于一身，并在屏幕上将其制度化了。

“我擦？”的一个预设是，这是一个男同性恋特有的问题：男同社群太肤浅、太肉体法西斯主义、太爱评判了。我生活里的男同性恋总是在说类似这样的话：他们无论是实施者还是受害者（多数人认为自己两者都是），都对此感到难受。对此，我不以为然。我们能想象像 Bumble 或 Tinder 这样以异性恋为主的约会软件，创造出鼓励直人“社群”直面其性种族歧视或肥胖恐惧症的系列短视频吗？如果多半不可能，并非因为直人不是肉体法西斯主义者或性种族歧视者；而是因为直人（或者我是否应该说，身体健全的顺性别白种直人）并不习惯去思考他们的性行为有什么问题。相较之下，即便长相英俊、皮肤白皙、富有、身体健全，男同也都知道我们跟谁做爱，如何做爱，是一个政治问题。

当然，将我们的性偏好置于政治审查之下会带来危害。我们希望女权主义能够审视欲望的来源，但不应有荡妇羞辱、假正经或自我否定：不要告诉个体的女性，她们并不真正知道自己想要什么，或者不能在同意的界限内享受她们确实想要的东西。鉴于任何对欲望批判的开放都将不可避免地导致威权道德主义，一些女权主义者认为这是不可能的事。[我们可以认为，这样的女权主义者是在论证一种“恐惧的性积极”，就像朱迪丝·施克莱尔（Judith Shklar）论证“恐惧的自由主义”一样——也就是说，一种由对威权方案的恐惧所驱动的自由主义。] 但将欲望重新政治化也有风险，

这将鼓励一种应得的性权利的话语。谈论那些在性领域遭到不公正的边缘化或排挤的人，可能会引出这些人拥有性权利的想法，他们的权利被那些不愿与之做爱的人侵犯了。这种观点令人颇为恼火：没有人有义务与任何人做爱。这也是不言而喻的。当然，这也是埃利奥特罗杰，以及将其奉为烈士的愤怒的非自愿独身军团拒绝理解的。在现已解散的 Reddit 小组，一条标题为“非自愿单身者强奸女人应该合法化”的帖子解释说：“没有饥饿的人该为偷窃食物而入狱，也没有性饥渴的人该为强奸女人而入狱。”这是一种令人作呕的假逻辑等价，透露了存在于父权制核心的暴力的错误观念。一些男人出于政治上成问题的原因被排除出性领域——或许其中包括一些被驱使着在匿名论坛上发泄绝望的男人——但在他们的不幸变质为一种愤怒，怒火指向“拒绝”跟他们上床的女人，却不指向塑造欲望（他们自己的和其他人的）的体制时，他们就越过界线，进入了道德的丑恶与混乱之中。

丽贝卡·索尔尼特在她敏锐的文章《男人向我解释洛丽塔》（Rebecca Solnit, “Men Explain Lolita to Me”）中提醒我们，“除非别人想跟你做爱，否则你不能与其做爱”，正如“除非别人想跟你分享他们的三明治，否则你不能分享他们的三明治”。吃不到别人的三明治“也不是一种压迫”，索尔尼特说。这个类比阐明了问题，但同样让问题变得复杂。假设你上小学的孩子从学校回来告诉你，其他孩子都相互分享三明治，但没有人分给她。再进一步假设，你的孩子是棕色皮肤，或者胖，或者是残障者，或英语说得不怎么好，你猜测这可能是她被排除出分享三明治的原因。突然间，说其他孩子都没有义务跟你的孩子分享三明治似乎就不充分了，尽管这可能是事实。

性不是三明治。正如没有人会真心想要出于怜悯的性交（mercy fuck），肯定不想要来自种族主义者或恐跨者出于怜悯的性交——虽然你的孩子不希望别人分她三明治是出于怜悯，但我们不会认为老师鼓励其他学生分三明治给你女儿，或建立一套平等的分享政策是一种胁迫。但是，如果一个国家对其公民的性偏好与实践进行类似的干预，譬如鼓励我们平等地“分享”性，可能会被认为是十足的威权主义。〔乌托邦社会主义者夏尔·傅立叶（Charles Fourier）提议为每个人提供有保障的“最低性生活”，类似于有保障的基本收入，不论年龄或身体状况；傅立叶认为，只有当性剥夺被消除之后，浪漫关系才能真正自由。这种社会服务将由“多情的贵族”提供，傅立叶说，他们“知道如何将爱情让位于荣誉的要求”。〕当然，这些干预措施的形式很重要：例如，残疾活动家长长期以来一直呼吁在学校开展更具包容性的性教育，许多人支持能够保障广告和媒体内容多样性的法规出台。但认为这样的措施足以改变我们的性欲望，将其从歧视的习惯中完全解放出来，就天真了。虽然你可以合情合理地要求一群孩子包容地分享他们的三明治，但你不能对性采取同样的做法。在一种情况下可行的做法，在另一种情况中则未必。性不是三明治。实际上它跟任何其他东西都不相似。没有任何一件事如此因政治而撕裂，又那么私人，不可侵犯。无论好坏，我们都必须找到办法就性本身去看待性。

在当代女权主义当中，这些议题多联系跨性别女性进行讨论，她们通常面临来自同性恋顺性别女性的排斥，后者同时又主张严肃地将跨性别女性也视为女性。这种现象被跨性别色情片女演员、活动家德鲁德沃（Drew DeVeaux）命名为“棉天花板”——内裤的棉。如许多跨性别女性所注意到的，这个表述里包含着深切的悲哀。“玻璃天花板”意味着对女性基于其工作而获得晋升的权利的侵犯，“棉天花板”描述了一种权利的缺乏，但这并不是任何人有义务给予的。然而，单单对一名跨性别女性、一名残障女性或一个亚洲男人说，“没有人必须要跟你做爱”，是对一些关键问题的忽略。不存在“每个人都有权享有他想要的”那种应得的性权利，但个人偏好很少只是个人的——不要屌，不要娘，不要胖子，不要黑人，不要阿拉伯人，不要亚裔，不要印度人，猛男寻猛男。

在 2018 年给 n+1 杂志写的一篇文章中，女权主义者、跨性别理论家安德烈亚·朗朱（Andrea Long Chu）提出，跨性别的经验与我们惯常想象的完全相反，“表达的不是一种身份的真相，而是一种欲望的力量”。她说，做一个跨性别者，不是“关于我是谁，而是关于我想要什么”。她接着写道：

我为什么进行性别重置：为了八卦和恭维，口红和睫毛膏，为了能在看电影时哭，为了成为某个人的女朋友，为了让她付账或帮我拿包，为了银行出纳和有线电视工作人员仁慈的沙文主义（benevolent chauvinism），为了远距离女性友谊在电话中的亲密，为了在洗手间补妆时像基督一样两边各站一个罪人，为了性玩具，为了让自

己觉得性感，为了被 T 搭讪，为了探听到该小心哪个女同性恋这类秘密，为了超短牛仔裤、比基尼上衣和各种各样的裙子，还有，我的上帝，为了乳房。但你现在开始明白欲望的问题了：我们很少想要我们应该想要的东西。

朱清楚意识到，这一宣告有可能支持了反跨女权者的论点：跨性别女性所认为的女性身份就是传统女性身份的外在，并且将两者混在了一起，因此强化了父权制的支配力量。许多跨性别女性对这一指控的回应是，坚持跨性别与身份有关，而非与欲望有关：关于已经成为一个女人，而非想要成为一个女人。（一旦你将跨性别女人只当作女性看待，抱怨她们巩固了性别刻板印象，就开始显得招人怨愤了，因为你很少听到有人抱怨顺性别女性“过度女性化”。）与此相反，朱的回应是坚持跨性别女性源于一种想要拥有她们目前无法拥有的东西的欲望：不仅是某种形而上的女性类别的抽象成员资格，而且是一种文化所建构的、压迫性的女性气质的具体外在——超短牛仔裤、比基尼上衣和“仁慈的沙文主义”。在朱看来，跨性别女性的身份认同获得尊重并得到实际支持的权利，是建立在“强迫欲望符合政治原则没有任何好处”的前提下的。她说，这才是“政治女同性恋主义作为一个失败的方案真正的教训”。换言之，真正解放的女权主义，需要的是完全去除激进女权主义对欲望进行政治批判的企图。

这一论点是双向的。假如欲望必须被免于政治批判，那么排斥和边缘化跨性别女性的欲望也应如此：不仅是对某些类型身体的色情欲望，还有不与那些“错的”女人分享女性身份的欲望。如朱所表明的，身份与欲望的二元划分肯定是错误的：无论如何，跨性别者的权利不应以此为基础，就像同性恋者的权利不应建立在同性恋是天生的而非选择的这种观点上（这说的是谁是同性恋，而非同性恋想要什么）。但完全放弃对欲望进行政治批判的女权主义，对那些大概是最需要女权主义的女性所遭受的排斥与误认的不公待遇，也给出不出什么解释。

那么，问题就在于，如何停留在一个矛盾暧昧之处，让我们既能够承认没有人有义务对任何人有欲望，也没有人有权利被欲望，又能够承认谁被欲望、谁不被欲望依然是一个政治问题，一个通常被以更为普遍的支配与排斥的模式所回答的问题。对比显著但不令人意外的一点是，男性往往以主张对女性身体应得的权利来回应在性领域中的边缘化，而那些抗议他人在性领域中边缘化她们的女性，谈的不是权利，而是赋权。或者说，如果她们的确谈到了应得的权利，也是被尊重的权利，而不是对他人的身体的权利。也就是说，黑人、肥胖者和残障女性中的激进自爱运动（radical self-love movements）实际上是在要求我们不将性偏好视为完全固定。“黑即是美”和“大即是美”不仅仅是赋权的口号，也是对我们的价值观进行重估的建议。林迪·韦斯特（Lindy West）描述了她研究肥胖女性照片的经验，并自问在客观上认为这些身体都很美会是什么样的状态——这些身体此前让她充满了羞耻和自我厌恶。她说，这不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一个感知问题：一种侧眼观看某些身体的方式，有自己的，也有他人的，慢慢邀请和诱导一种从厌恶到欣赏的完全转变。激进自爱运动提出的问题不是我们是否有性的权利（没有），而是是否有义务尽我们所能，改变我们的欲望。

要认真对待这个问题，需要我们认识到，固定不变的性偏好这个观点本身是政治性的，不是形而上的。出于一种好的政治策略，我们将他人的偏好视作不可侵犯：我们理所当然地对谈论人们真正想要什么，或某个理想化版本的他们可能会想要什么保持警惕。我们知道，威权主义就潜存于此。在性领域当中尤其如此，一直以来都有人援引真实或理想的欲望来作为强奸女性和男同性恋的借口。但事实是，我们的性偏好可以改变，也确实在改变，有时是在我们意愿的作用之下——虽不是自动的，但也不可能。况且，性欲望并不总是干脆利落地遵循我们对它的感知，一代又一代的男女同性恋都证明了这一点。欲望可能令我们惊喜，将我们引向一个我们从未想过要去的地方，或者引向一个我们从未想过会对之萌生欲望或爱意的人。在最好的情况下——这样的情况或许是基于我们最好的期盼——欲望可以与政治为我们做的选择反其道而行，为自己做出选择。



埃米娅·斯里尼瓦桑

哲学家，牛津大学万灵学院社会及政治理论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政治哲学、女性主义理论和认识论。其作品散见于《纽约时报》《纽约客》《泰晤士报文学增刊》等媒体。她目前是《伦敦书评》的特约编辑。

**新书试读**

来自新近好书的试读章节，由小鸟文学编辑部从近期出版物中挑选而来。祝阅读愉快。



题图来自 [Annie Spratt](#) on Unsplash

## 非虚构

# 40天，550公里， 重走父亲的逃亡之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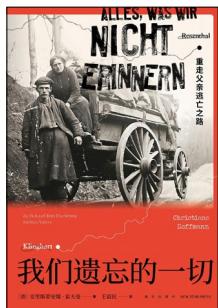
克里斯蒂安娜·霍夫曼 | 新书推荐

历史罅隙中的人们，  
驱逐与逃亡在他们身上留下了怎样的痕迹？

1945年1月，德军从波兰撤退，100多德国百姓、50多万德国军人撤回西欧，造成大量难民儿童。克里斯蒂安娜·霍夫曼即难民儿童的后代，其父母均为战中被逐出家乡的德裔难民。逃亡发生那年，父亲9岁，之后对此事只字不提，过去的村庄不仅换了名字，连所属国籍都由德意志划归波兰。75年后的同一时间，父亲病危，女儿重新踏上他们当年的逃亡之路……

《我们遗忘的一切》是一部家族离散史，也是一曲民族心灵悲歌。全书以西里西亚，这个三国交界的三角地带为中心，结合作者家人的经历、重走的沿途见闻，及亲历者的口述，历史的追踪与当下的记述、旅行与纪实结合，动人地重现了德一波-俄关系的矛盾与断层，用双脚重新丈量的方式提供了进入历史的另一种可能。

以下经新星出版社授权发布。



逃亡的队伍是在下午五点左右出发的，此时枪炮声已经一阵紧似一阵了。

格蕾特尔·科佐克在她的回忆录中写道：远处炮声隆隆，不时有炮弹飞过逃往洛森的车队的头顶，在路边的田野中爆炸。马匹受惊，后蹄蹬地立了起来，爸爸只好更用力地握紧缰绳。

七十五年后的今天，我的双脚正踩在从玫瑰谷到洛森的乡间柏油马路上。1945年的一个冬日，我的家人在这条路上开始了漫长的、指向西方的逃难之旅，这条路的终点是德国北部的一个小镇，我将在那里长大成人。强劲的风从西边吹过来，风像是要把我吹回东方的故乡。我在顶风行进。我不知道今天会走多远，也不晓得在哪里过夜。

我的徒步之旅不是逃亡，因为我没有受到任何威胁。我身后没有步步逼近的交战前线，没有喷射着怒火的战争恶魔；没有紧追的俄国人，也没有吆五喝六的纳粹镇长。没有什么让我感到不安，我知道我的丈夫和孩子身在何处——他们此时正围坐在柏林温暖的公寓里——我穿着质地优良的冬季徒步服，背着轻便的背包，里面只装了一些旅行必需品。路上也没有积雪。

我走在笔直的乡间公路上，柏油路湿漉漉的，冬天来临后变黄的小草像一群受惊的小鸡一样蜷缩在路边的沟里，路两边的白蜡树和我一同逆风倔强地挺立着。此刻，我身处玫瑰谷和洛森之间的乡间公路，头顶上灰色的天空如此辽阔，仿佛在提醒我人类的渺小与失落。我记得这条公路，我正在穿越回到自己童年的噩梦。

我和我的兄弟姐妹在一片草地上。飞机来了，然后又掉头飞走。我说，下一次它就会发现我们。我们跑啊跑啊，冲到田野上。我们跑得很快。我听到了飞机的轰鸣，是战斗机，它又一次向我们俯冲过来。左边有一条沟，沟旁是树，我们也许可以躲在树下面，可那只是几棵稀稀落落的果树，很难提供什么保护。我知道，这次我们完蛋了。

在噩梦中，我总是在逃亡的路上，有时步行，有时坐马车，四周大多是白雪皑皑的田野，光秃秃的树木，灰色的天空。我在躲避敌人，有时独自一人，有时与家人一起，有孩子，还有我的朋友。我要么找不到他们，要么在为失去他们担心。一切都混乱不堪，而敌人紧随身后。有时是男人，他们追在我的身后用言语威胁我；有时是其他某些充满敌意的东西，具体是什么，梦里并不清楚。梦中的逃亡总是永无尽头。我们都想逃到一个安全的地方。但哪里是安全的呢？这种逃亡很少在梦中画上完美的句号，即使逃脱了，或者能停住脚步稍稍喘息一下，也还是失去了自己的家。不安全感总是围绕着我，恐惧感从未消失，既害怕被他们再次追上，又担心自己不得不再次逃亡。

长大以后，我有时会鼓起勇气在梦中停住，不再逃跑。战胜恐惧需要巨大的努力。但有时我能成功，我停下逃跑的脚步，转过身来和他们拼斗。突然间我的手里有了把刀，我可以战斗了。在梦的尽头，我不知道自己有没有幸存下来，但至少拼过的感觉真好。我不只是一个逃亡者，我不只是一个受害者。

这些噩梦从未有过皆大欢喜的结局。

很长一段时间里，我搞不明白自己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梦。梦中的经历与爸爸妈妈爷爷奶奶讲给我的故事很相似，我在梦里看到的是你们逃难的场景，你和妈妈逃难的场景。妈妈四岁时从东普鲁士逃出来，她一辈子总是梦到那番场景。尽管如此，我对自己会梦到你们的噩梦还是难以置信。一个生活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安全无忧的西部德国的孩子，怎么会在梦中重温你们的噩梦？我童年的最不幸的经历，不过是你因为割草机事故受伤，不得不终止自己在汉堡保龄球馆的工作罢了。

噩梦也会遗传吗？那时我觉得自己的想法荒谬而可笑。但今天我明白了，心灵创伤会延续，逃亡和战争可以连续影响几代人，我们的父辈、祖父辈甚至曾祖父辈的战争会铭刻在我们身上。噩梦也会。

快到洛森的时候，一辆车在我跟前停下，司机询问要不要搭车。我道了谢，说自己宁愿步行。司机看上去有些惊讶，挥了挥手，踩下油门开走了。这里有很多友善的人，但停下来问我是否想要搭车的总是小微轿车，SUV、豪车、家庭面包车很少这样做。小微轿车总是菲亚特的熊猫牌或是欧宝的Corsa牌。

洛森是一个小市镇，实际上只能算是规模稍大的村庄。它有一条主街和一些小巷、步行道，镇里有一所农业学校、一座教堂，居然还有一座城堡。镇内有一个火车站，你哥哥曼弗雷德从那里乘坐火车去布里格的皮亚斯特高中上学或者学舞蹈。他在回忆录中写道，那些年他从未误过一次火车。可我去年夏天的第一次尝试就以失败告终。在这样的小城中，如果火车站位于主街的另一端，那么走到那里的路可能会很长。

这个市镇比那些村庄更荒凉，主街两侧的房屋前竖立着房屋出售的广告牌。房屋就这么明目昭彰地在镇子中心地带破败下去。房子大多是灰色的或者灰褐色的，偶尔间杂着一些颜色柔和的，如紫罗兰色、薄荷绿、杏色，以及颜色俗艳的房子，如天蓝色、柠檬黄、草绿色。所有这些，像一碗放进了各式各色佐料的燕麦粥。那些色彩艳丽的房子以其耀眼的勇气触动了我，它们发出无声的呐喊，表达着人们对抗忧伤的渴望。

在维基百科中，洛森从前的名字是 Lossen，有两个条目，一个是波兰语版本，另一个是德语版本，两个词条对历史的叙述迥然不同。波兰语条目几乎没有提及 1945 年之前的历史，即该地区由德国人居住的那几百年。1189 年，一位名为日罗斯瓦夫的主教首次提及这个地方，然后该词条直接转到了 1945 年，洛森该年被并入波兰。对 1945 年发生的事情，该词条也只字未提。德语条目则详细介绍了该地区几个世纪以来的历史，其德裔居民背景、人口数据、行政演化、教堂建设的情况。对 1945 年洛森并入波兰后的情况，该条目则鲜有提及，也同样没有提及 1945 年当年发生的事情。没有彼此认可的历史，没有共同的视角，每一方都在讲述自己的故事，津津乐道于己方的历史独白。德国人和波兰人背对着背，禁忌话题仍然无人提及，即使在事情发生七十五年后的今天。

我走在洛森的主街上，空气中充斥着褐煤燃烧后的气味，浓重而刺鼻，这是东欧地区冬天特有的。突然间，新鲜酵母糕点的甜味和香味扑面而来，像童话中那个捕鼠人吹奏的迷人笛声一样抓住了我，唤醒了我对过去的回忆，对苏联的记忆。那时，和物质丰富过剩的资本主义国家相比，气味有着完全不同甚至更了不得的意义。我记起自己在列宁格勒读大学的岁月，那是苏联，东方帝国，那里的气味就像那里杂货店的霓虹灯招牌一样粗糙而简单：牛奶、肉、面包、鱼。

那时的商店总是臭气熏天，你需要鼓足勇气才能走进去。商店入口扑面而来的总是裹挟着变质牛奶与臭鱼的气味，或者，最糟糕的是肉类柜台那里略带硫黄味道的臭味，这些气味总是与刺鼻的廉价洗涤用品混在一起。饥肠辘辘与嫌恶在彼此交战。我本能地警告自己，有这种味道的绝对不是什么好东西。可是人必须吃饭啊，你必须压抑自己的嫌恶才能搞到一点吃的。我想起了在集体农庄市场买到的橘子的香味。苏联的商店系统像一个黑手党组织，我们这些来自西方的大学生是无法置身其中的，你要有工作单位，还要仰赖关系。我们时常在空荡荡的商店排队，有时一站就是几个小时。农贸市场上的东西虽然价格高昂，但还承受得起，因为我们用卢布换了硬通货。一位来自乌兹别克的女小贩，围着花色头巾，身前是一堆堆成了金字塔状的橘子。我要了一公斤。当我剥开橘子，手指伸进多孔橘子皮的瞬间，水果像爆炸一样释放出香气，我流下了眼泪。我想起哥哥去列宁格勒郊区的宿舍来看我。那是一座十四层的楼房，因为建筑工人将竖井修歪了，电梯无法使用。来自芬兰湾方向的刺骨冷风从窗户缝吹进屋子，个头堪比煤球的蟑螂在屋里爬来爬去，我看到了哥哥眼中的迷惑与不解：你在这个鬼地方做什么？我记得那时自己对美是那么渴望。在为数不多仍然开放的教堂中，其中一座成了我的避难所，成了我在苏联灰冷的日常生活中的绿洲。我忆起教堂中香火和蜂蜡的气味，半明半暗中的圣像，唱诗班老妇人富有穿透力的歌声，单调而高亢。

对苏联面包店的记忆则迥然不同，它们散发着怡人的麦香，苏打面包或酵母的气味迎面扑向你，就像此时此刻，我站在洛森的主街上，面前就是一个面包店。如同跟随捕鼠人的笛声，我走进了面包店，从腰包里掏出兹罗提买了一个甜点，然后重新走向街上。结果和昔日并无二致：闻起来香，吃起来未必如此。

你们在米歇劳度过了逃难的第一个夜晚，村庄位于玫瑰谷以西仅十公里。到达的时候已经很晚了，你们身后传来前线的隆隆炮声，暗夜中能看到枪炮的光亮。也许你已经在马车上铺的干草上睡着了，也许无法入睡，因为天太冷了。逃难的人们分散住进了村里的农庄，人们松开马匹喂它们饲料。你们一家大概是睡在某个人家厨房麦草铺成的地铺上，没人知道奶奶那一夜是否入睡。你们希望明天不用再赶路，就在这里停下来，等待，然后返回玫瑰谷。在接下来的四十个夜晚，你们每晚都会燃起同样的希望，即使在那之后很久依然如此。可到了第二天早上，纳粹冲锋队的人喝令你们继续前进。有些人跑回玫瑰谷给牛挤奶，然后跑回来重新加入逃亡的队伍；有些人则自此断了联系。但你们一家人继续向西走，走过 Böhmischdorf、Groß-Jenkwitz、Herzogswaldau、Grottkau、Woiselsdorf……

在到达米歇劳之前，玫瑰谷的村民们先是穿过了耶申，这是一个只有四十户人家的小村庄，一条街道贯穿整个村庄，比玫瑰谷还要小。它现在的名字是耶西乌。

一个戴鸭舌帽的家伙和我搭话，一脸狐疑：你在这里做什么？

我在重走父亲当年的逃亡路。

徒步？

徒步。

一个人？

一个人。

现在他看起来明显友善了些。这里的人比较善待疯子。

村里还有人记得那时候的事情吗？他想了想，用手指向另一边的场院和房屋。那个农庄的老太婆已经死了很多年啦，旁边那个农场的老太婆去年夏天死的。你去找玛利亚吧，他最后说，右手边最后那所房子。你按门铃，她会给你开门的。

很快，我就坐在了玛利亚的厨房里。厨房的天花板低矮，有一个煤炉，屋里暖暖的。玛利亚的丈夫坐在厨房里的长凳上，一动不动，如同昨天就已经去世了的样子。厨房的小窗上透进微弱的光。屋里闻起来像有炖洋葱的味道，角落处的瓷砖炉子上放着炖锅，餐桌上放着一本电视指南杂志。

那家伙所言不虚，玛利亚听到门铃后马上打开了房门。她穿着拖鞋和马甲，风将她浓密的灰白头发吹得立了起来。没说上两三句，她就将我让进了家里。

玛利亚的老家位于乌克兰西部的沃里尼亞。她们一家是在 1945 年夏搬到这里的。人们让她们在奥珀伦下车，然后从那里步行前往耶申。

你们自己去挑一所房子吧，有人这么对她们说。

可那些德国人都还在那里呢。当时，耶申的大多数村民并没有为躲避苏联红军而逃难，有些人则是跑出去几天后又重新返回了村子。玛利亚一家和一户德国人一起住了一年，一家波兰人和一家德国人，德国人住在楼下，玛利亚和她的家人在楼上。她说这是她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光。那时的玛利亚只有六岁，德国人家里的女儿和她同龄。这个德国女孩有很多漂亮的玩具、洋娃娃和洋娃娃屋，她送给了玛利亚一个。因为总是一起玩，她们成了最好的朋友。后来这家德国人被赶走时，玛利亚伤心地哭了好几天，以至于妈妈不得不带她去看医生。

玛利亚脸上洋溢着小女孩似的微笑。她嘴里的牙齿已经不多了，毕竟已经年过八十。七十五年过去了，她仍然想念她幼时的德国玩伴。即使在东西隔离的铁幕年代，她们依然保持着联系。时至今日，玛利亚依然不允许别人说一句德国人的坏话。

那战争呢？是德国人入侵了波兰。

玛利亚惊讶地看着我。她的故事和内疚无关，只有友谊。

纳粹的罪行，大屠杀又怎么算？

我的父母从来没有说过德国人的坏话。

我们那时候都是穷人，玛利亚的丈夫在黑暗中突然插话道。这听上去像是一个理由。

玛利亚的叙述中，坏人不是德国人，而是俄国人。他们强征牛和谷物，晚上到村子里掳走德国女孩。那时的村子里只有女人、孩子和老人；而男人们，他们既有德裔也有波兰人，还没有从战争中回来。一个炎热的夏日，女人们正在用镰刀割麦子，而孩子们正用铁链敲打谷穗，俄国人来了，抢走了麦子。俄国人，总是俄国人。

玛利亚再也没能回到家乡沃里尼亞。她的兄弟去过一次，但父亲当年建的房子已经不在了。

玛利亚说，他们毁了鸟巢，这样鸟儿就不会飞回去啦。

村民们逃难的第三天。马在落满积雪的道路上挣扎着前进，有时会有马匹滑倒，它们很多都没有钉马掌。那些跌倒的马匹，人们会帮着它重新站起来。路边的沟里散落着家畜的尸体，向人们发出不祥的警告。

你们分散住进村里农民的农庄里，这样马匹得以在马厩里歇息，你们则可以在人家的厨房里暖和下身体。你们沿途受到了热情款待，路过村庄里的人们热心慷慨，他们也许已经预感到自己不久也将不得不在冰天雪地中跋涉吧。那干吗还要吝啬家里的东西呢？反正它们很快会落入俄国人的手里。

无论走到哪里，我们都会遇到许多乐于助人的人。格蕾特尔·科佐克在她的回忆录中写道。他们将帮助别人视作理所当然、顺理成章，而我们也坦然接受了他们的好意。在农舍里，女主人准备好了热气腾腾的饮料或汤，那时也还有足够的面包。

驾驭马车让奶奶费力劳神。她要照顾婆婆、瘸腿叔叔和你，暗地里独自为战事中

的丈夫与儿子担心，还要操心远在村中的农场和牲口：它们肯定饿得在叫唤，奶牛因为没人挤奶肯定也憋坏了。玫瑰谷的村民们仍然确信他们很快会回家的。人就是这样，往往沉溺于过分的自信而无法自拔。总有什么阻止我们看清自己的命运，无法了解自己的实际境遇究竟有多么糟糕。

逃亡路上的每一天都让他们离玫瑰谷更远一些。每天早上，人们都被催促着继续赶路、前进，好为后续来到的人腾地方，俄国人正追在身后呢。

俄国人。追在你们身后的那些俄国人究竟是谁？关于他们，你们了解些什么？在你们的想象中，他们是什么样子？

俄国人来了，我们就逃。

你们曾听到过奥得河对岸轰鸣的炮声，在黑暗中看到过炮弹爆炸时的闪光。那是肆虐的战争恶龙，那是战斗的前线。他们就是俄国人。只要战事一起，俄国人就会杀过来。俄国人就是战争。奶奶的名字奥尔加是一个俄罗斯名字，可她对俄国了解多少呢？一个波兰男人和一个乌克兰女人曾在你们的农场中打工，两人有时会在夜晚时分唱起忧伤的歌曲。他们是强制劳工，纳粹称他们为外籍工人。玫瑰谷的村民们从未亲眼见过那些“俄国人”，可他们抛家舍业、离乡背井就是为了逃避那些“俄国人”。在村民们的想象中，这些俄国人是怎样的？他们知道自己究竟在逃避什么吗？

俄国人来了，我们就逃。

也许俄国人就是你小时候大人们用来吓唬孩子的怪物吧。奶奶会在你拒绝喝粥时威胁说：不吃粥，俄国人就会来的。现在，俄国人来了。当时纳粹党的鼓噪宣传让你们知道了些什么呢？在他们嘴里，俄国人是低等斯拉夫人、半亚裔部落、亚洲洪水、红色野兽，是残忍、嗜血、野蛮、未开化的种族。你们那时知道什么是布尔什维克主义吗？纳粹“哲学家”阿尔弗雷德·罗森堡将之描述为蒙古人式的愤怒，对草原的渴望，游牧民族骨子里对人性的仇恨，颠覆欧洲的企图。这些来自奥得河对岸广袤森林、向你们步步逼近的，究竟是怎样的一群人？你们在聊天中很少提及奥得河以东的村庄，却永远对布里格、洛森、科彭和弗罗瑙这些地方念念不忘。奥得河东边的土壤是沙质的，不像西边这样肥沃，那里几乎没有村庄和耕地，大多是森林。你们可曾去过东边，去过俄国人蜂拥而来的那个地方？

在七山后面的这个小村庄里，人们也许对这些知之甚少，可听到的那些内容，已足够他们对即将到来的寻仇的俄国人存恐惧。玫瑰谷人是在逃避复仇的俄国人，村民至少对德国人在东边干下的勾当有所耳闻，他们晓得德国人摧毁了那里的一切。纳粹党卫军头目海因里希·希姆莱曾说过，俄国战役的目的是减少三千万斯拉夫人口。玫瑰谷人怎么可能指望人家的怜悯？

唯一了解俄国人的是你的父亲赫伯特。1945年春天时，他正在布雷斯劳，负责赶马车向前线战壕运送弹药。转年夏天德军投降后，他又被送往距此一千公里以东的哈尔科夫某处森林中的战俘营，并在接下来的三年里在那里伐木。爷爷被俘的地区如今在乌克兰境内，不过爷爷那时候分不清俄国人和乌克兰人。他被释放回德国后从未说过俄国人的坏话。你告诉过我，爷爷之所以能活下来是因为他有一副好嗓子。在战俘营里，爷爷会在夜晚的篝火边唱歌，看守们会因此在吃饭时给他多盛上一些，这个德国人可不能死，他们说。就这样，“俄国威胁”混合着“俄国灵魂”，这些相互矛盾的内容写入了我们家族的历史。我长大成人的过程中，俄国从未在我心中有过一个整体统一的形象。俄国是我们的宿命，是一个位于东方的大国。1945年1月苏联红军开始射击奥得河对岸的那一刻，我们家的生活与命运就此改变。俄国是一个致命的危险；他们是残忍的，他们杀戮、掠夺、强奸；他们是如此可怕，以至于你们为逃避他们而背井离乡向西逃亡了五百公里。与此同时，俄国人是有灵魂的，他们会被你父亲的歌声深深打动，那些俄国看守在自己挨饿的时候还会分一份面包给他。

1986年高中毕业后，我和姐姐第一次去苏联，这是我们从小就梦想的。在家乡，汉堡以西的小城韦德尔，我的朋友中没有一个对俄罗斯哪怕有一丁点儿兴趣。但我们姐妹俩却对苏联有一种迷恋。为何如此？当时的我们还不能明白。

我姐姐十几岁的时候开始读海因茨·G.孔萨利克的小说《斯大林格勒的医生》《俄罗斯交响曲》和《针叶林的爱情之夜》。她坐在旧沙发中，一边看一边流泪。我打开她的屋门探进头去时，几乎每次都会看到泪水顺着她的脸颊流下。我们一起读《日瓦戈医生》。当我们去探望外婆时，总是先跑到客厅的橱柜前，那里面放着一个播

放电影插曲的八音盒，是奥马·谢里夫扮演的日瓦戈医生穿着雪白的俄罗斯罩衫走在波浪般起伏的麦田中那一段。然后我们俩为以后谁继承这个音乐盒争论不休。我们不明所以地被俄罗斯迷住了，沉醉于一种既憧憬又战栗的浪漫情感中。

前往苏联的八年前，我第一次来到玫瑰谷，八年后我和姐姐在东柏林的弗里德里希大街上的火车站登上了开往莫斯科的夜行列车，去苏联，寻找你们被追赶、被驱逐的缘由。

那是我漫长求索的开始。当时，我甚至没意识到自己在寻找什么；我已经上路，可不知道为了什么，也不知道去向何方。我没有想到这条路会带我走回玫瑰谷，带我走上寻根之旅。只是在这个旅程开始的时候我绕了一个大圈，先是跑去了遥远的东部腹地。我学习俄语，这种柔和悦耳的语言一直让我着迷，听着它的发音，如同懒洋洋地泡在花香浓郁的温暖浴缸里那般舒适。我跟着著名翻译家斯维特拉娜·盖尔学习俄语。她从不讲解语法，认为人应该通过耳朵和心，用自己的直觉来学习语言，像孩子那样。她给我们听童谣，让我们跟读，即使我们还不理解童谣的含义；她还要求我们背诵普希金的诗体小说《尤金·奥涅金》中的章节。我学会了对我们家族施暴的语言，恶人的语言。这是爷爷在战俘营里面听到的语言，也是奶奶1945年夏天在地道里被强迫劳动时听到的语言。我总是想去俄罗斯，想居住在那里，想沉浸在如温暖浴缸般舒适悦耳的语言里，去感受这个国家，好像我肩负着去促成民族和解、缔造和平，你们那代人未能创造的和平的使命。我学习俄罗斯文学和历史，到东方旅行，长达数月住在那里，包括苏联解体的那年夏天。乌克兰独立时，我正在离基辅不远的某个小村庄给我乌克兰好友的奶奶拍照片，她面容慈祥宛如我的奶奶和外婆。后来我又在莫斯科做了四年的记者。这一切经历，我隐约感到和我的出身有关。可是直到辗转了千里万里，时间流逝了十几年后，我才再一次走进玫瑰谷。

我兜了一个多大的圈子啊，从俄罗斯到玫瑰谷，从西伯利亚到西里西亚。大概因为俄罗斯不仅是这片地区的地理中心，还是一个决定周边一切的强权吧，但也许仅仅只是因为我无法选择一条直接去玫瑰谷的路线。那样一切会变得太复杂，那么早地走进波兰也许会让寻根之旅开始得过于艰难。

年近四十时我才开始跑步。夜跑的时候，如果是在秋天，天色在傍晚就已经暗淡了下来。跑在宽阔的林间道时，头上的天空依然明亮，可两边的树木间已是一片黑暗，林间小径也几乎无法辨认。从林间空地转入树林，人就潜入了无尽的黑暗中。我独自一人，除了自己跑步的喘息声，以及脚下树叶的沙沙作响，听不到其他声响。偶尔从树林里传出动物的叫声，或者一头鹿横穿过小路，一只松鼠或一只乌鸦在林中窸窣窣窣。猎人来到森林里，敏捷地躲在狩猎小屋中。跑，有猎人，快跑！在黑暗中跑步是件令人毛骨悚然的事情，有些像逃亡，跑步的人像是在逃脱黑暗，逃脱身后正追逐的人。我环顾四周，什么也没有；但收回目光时，心中马上升腾起恐惧，对追逐自己的、并不现身的未知事物的恐惧。这令人心惊胆战，同时也让人乐此不疲，就像小时候玩老鹰捉小鸡，一个孩子追过来，我们四散跑掉。逃脱，不被人撞上的乐趣，一次又一次，奔跑，逃脱，惊恐间杂着快乐。那是对黑暗的恐惧，对战争、死亡的恐惧。

我自幼胆小怕事，整个童年都生活在对战争与俄国人恐惧中。俄国人就是战争，战争就是俄国人。我知道我们和俄国人之间有一堵墙，就像你们那时候和俄国人隔着一条奥得河一样。尽管我知道，那堵墙不是为了保护我们免受俄罗斯人的伤害而建，但在我童年的想象中，奥得河和柏林墙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柏林墙并没有减轻我的恐惧。

没有什么情绪能像恐惧那般影响人的行为和性格。如果一个人比其他人更容易焦虑恐惧，这一点在她很小的时候就会露出征兆，如此说来，焦虑恐惧很可能是先天的、遗传的。甚至在襁褓阶段，不同婴儿对陌生事物已经会做出迥异的反应。容易恐惧焦虑的婴儿往往会变成焦虑的孩子，随后成长为容易焦虑却格外能干的成年人。恐惧也许是很好的内驱力，恐惧焦虑的人总是倾向于必须做得更多、更好才有安全感。

我是一个焦虑的孩子。妈妈不在身边时，我就会害怕，妈妈也担心失去我这个她们期待已久的孩子。这孩子活不长，性情忧郁的奶奶在我出生后不久如此预言道。家里人给我取了中间名罗特劳特，那是我妈妈去世的妹妹的名字。那是一次事故，大人们当时没能看管好她。去世时，她只有三岁。她们竟然给我取了一个死去的孩子的名字，这不能说是一个好兆头，我长成了一个焦虑的孩子。我怕黑，不敢在冬夜离开明亮、温暖的客厅，不敢独自去自己的房间里拿东西；我害怕经过走廊时身后的灯光熄灭；其他孩子热衷的电影院也让我畏惧，因为害怕那宽大、黑漆漆的放

映厅，而电影画面似乎是我的噩梦；每周日播放的连续剧《作案现场》中瘆人的片头曲让我害怕；我担心撒哈拉沙漠会蔓延到德国北部，因为我在电视上看过一个叫《扩张的沙漠》的节目，可那明讲述的是非洲的事情；我担心爸爸会被红军旅绑架，尽管你信誓旦旦地向我保证说，他们不会抓你这样的小人物。然后，我继续担心那些红军旅的人会不会搞错，把你误认成一个重要人物。

不过，与对战争的恐惧相比，上面的一切又显得不值一提了。对战争的恐惧让我难以入睡，然后又伴我入睡。我央求妈妈把门留一道缝，不要将厅里的灯关掉，但这没什么用。我在寂静的夜晚仔细倾听着，听窗前白桦树的沙沙声，听远处每隔二十分钟驶过的有轨电车的隆隆声。我要小心提防着，那条战争恶龙是否仍在睡觉，我可不能入睡呢，我必须小心翼翼地监视它。

晚上躺在床上，我的脑子里会盘桓着“休战”一词，它散发出浓烈的恐怖气息，每当我出现的时候，我的恐慌便油然而生。休战，让人感觉仿佛战争仍未结束。我知道联邦德国和苏联之间并未签署和平条约，这是你讲给我的，双方只是处于休战状态。这种状态已经持续了三十年，可休战毕竟只是休战啊，比停火也好不到哪儿去，它暗示眼前的和平不过是暂时的、临时的，那些坦克车还停在战场上，一旦一声令下，明天一早它们就可以再次投入战斗，而你会被征召入伍。你一直自认为很走运，从未被征召入伍，也没有服兵役，更别提亲历战争了。你唯一的一次触碰武器，是那次试了下汉斯叔叔的猎枪。停战，意味着战争没有结束，只是短暂的中断。我那时最大的恐惧是那头战争恶龙并未被击败，它只是打盹休息、积蓄力量；战争永远不会结束，它会再次回来。



克里斯蒂安娜·霍夫曼

《明镜周刊》专栏作家。曾在弗赖堡、圣彼得堡和汉堡学习斯拉夫语言文学、东欧历史与新闻学，后为《法兰克福汇报》工作了近二十年，并以驻外记者的身份在莫斯科和德黑兰工作。她的父母均为二战后被驱逐并逃到西德的德裔难民，父亲一脉原生活在西里西亚地区（现属波兰、捷克等），母亲一脉原生活在东普鲁士地区（现属俄罗斯、波兰等）。

新书试读

来自新近好书的试读章节，由小鸟文学编辑部从近期出版物中挑选而来。祝阅读愉快。



题图来自 [Craig Ren](#) on Unsplash

当我们谈论中产阶级时，我们在谈论什么？这个术语的关键部分不在于“阶级”，而在于“中产”。它所引出的是一条逐级展开的光谱，人们在光谱的首尾之间来回移动。中产阶级的“居中”暗示了空间的存在：在社会和经济的意义上，我们相对于地位更低或更高的人群而移动，时而离这群人更近一寸，时而又向另一群人更近一分。它也隐含了时间中的运动，让我们意识到，我们会在自己的生命周期内上升或是下降。家族内连续数代的成员也会做相同的事，进一步驱动、延续或是改变我们上升或下降的轨道。我们持续不息的运动显示了不稳定性。中产阶级有时被形容为一个雄心勃勃的群体，被触手可及的成功牵引；有时又被形容为一个缺乏安全感的群体，时时陷入对坠落的恐惧。用社会批评家芭芭拉·艾伦瑞克（Barbara Ehrenreich）的话说，中产阶级是转瞬即逝的，需要持续不断的努力才能彰显和维持其社会地位。

和我们谈论中产阶级时强调的“中产”相比，“阶级”一词却被弱化了。事实上，“阶级”被消音的程度之深，已使一些理论家注意到，说起“中产阶级”几乎就像是在说“没有阶级”。他们指出，中产阶级既未唤起一种根深蒂固的身份认同（只需将其与种族、宗教、民族 / 国家、性别或性取向做个对比），亦未唤起对于同一族类在情感上的忠诚——即便人们承认这一群体的存在。造成这种现象的一个原因是，不同于奴隶与主人、农奴与地主或是更典型的工人与资本家这些对立范畴，中产阶级并没有一个清晰的对立阶级。相反，中产阶级用一幅彼此分离的众多个体所构成的图景，取代了具有凝聚力与边界的群体概念。在这幅图景中，每个个体都完整具备着个人的历史、欲望与命运，仿佛任何一种固定的定义都不可能把握住他们是谁、他们在做什么、他们将如何生活。

更有甚者，最近几十年，我们转而将社会理解为很简单地由中产阶级与其他人群所组成。按照这种理解，“中产阶级”代表了常态：他们是自食其力的个体，以常规的方式前进或是掉队——所谓常规，也就是有条不紊的、独立的和渐进的（除去例外情形），没有巨大的波动。人们认为这种常态反映了投资带来收益、懒惰遭到惩罚的标准性质。在大众的想象中，中产阶级之上悠游着无需努力上升也无坠落之虞的精英；而在中产阶级之下，如果我们将目光限于发达经济体，看到的将是依赖社会福利的下层社会与其他边缘人口；如果我们将目光放得更远，看到的将是广大的赤贫者。所有这些人群，与中产阶级与精英相比，似乎都被束缚在悲惨的境地中。

将中产阶级视为关于个体自主的不分阶级的常态，这种想法就是在否认“阶级”背后的含义。它否定了这样一种观念：间接、非个人的力量可能会限制我们在社会中的位置，或是预定我们将拥有何种机会、何种生活质量。和种族、性别和宗教等范畴相比，阶级更强烈地指向了决定我们生活的外部因素。这是因为，社会与经济机会正是阶级概念的题中之义（相反，对于某一种族或性别群体的一员，是特定地方、特定时代的种族主义或性别歧视为其分配了某种命运）。拒绝阶级或者主张中产阶级性（本质上是一回事）就是否定这样的观念：我们一生中取得成功的机会除了取决于自身的欲望、能力以及尤其重要的努力，还可能由其他因素决定。中产阶级在这条否定之路上走得很远。

人人皆有成为中产阶级的潜力，这一论断暗示了社会流动——无论上升还是下降——都是我们自己的事。我们很难找到“中产阶级”的指示物（referent），正是因为其边界是如此不固定。实际上，只有当中产阶级的边界是不固定的，才能成就上述的社会流动。“中产阶级”代表了一种开放的优绩主义（meritocracy），它向甘愿投入的人不断给出准入的承诺，并向不愿投入的人发出坠落的警告。延迟满足，牺牲部分消费以备将来之需，承担负债资产带来的风险与义务，投资教育、培训、房产、储蓄计划和养老金，这些都是中产阶级跃升和防止坠落的策略。中产阶级性暗示了人人皆可通过努力、行动力与牺牲实现上升，正如人人都会因浮躁、懒惰和胸无远志而走向滑落。它断言了我们是自己命运的主人和机遇的主宰。这一判断同样强有力地适用于我们在朋辈眼中的形象：如果我们成功了，那一定是因为我们在自己身上下了功夫；如果我们失败了，我们大概就没有下这样的功夫，除了自己，怨不得任何人。

如果这就是“中产阶级”的含义，那么它所服务的是何种目的？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可以先着眼于“中产阶级”的头号支持者，包括政客、政策专家、企业、营销公司、开发机构和金融机构——他们一同高唱着道德说教的宣言，称颂中产阶级是民主、进步和消费驱动型经济增长的先驱。当他们谋求扩张中产阶级的版图，或是为中产阶级的利益与脆弱性代言时，他们会各自持有大相径庭、有时相互冲突的情感与意图。但有一点他们是共通的，那就是他们都在事实上依附于资本主义（虽然很

## 非虚构

# 当我们谈论中产阶级时，我们在谈论什么

豪道斯·魏斯 | 新书推荐

中产阶级为何焦虑？新中产新在何处？

媒体中无所不在的中产阶级，有时被形容为一个雄心勃勃的群体，被触手可及的成功牵引；有时又被描述为一个缺乏安全感的群体，时时陷入坠落的恐惧。将他们团结起来的并不是繁荣，而是挥之不去的不安全感、负债资产和强制过劳。

当我们举债获得的财产的价值变得过于难以预测，当初决定投资时得到的关于未来的承诺显得不再可信时，我们就会迎来从中产阶级意识形态中觉醒的真正转折点。

不管中产阶级创造了何种关于“自力更生”的乐观说法，我们都不是——也从来不曾是——中产阶级。

在《我们从未中产过》一书中，人类学家魏斯通过对德国、以色列和美国等国的民族志调研，勾勒出中产阶级这种观念是如何在身份政治乃至私人生活中对普通人的家庭施压的。这项极富原创性的研究将人类学和批判理论的研究路径熔炼一炉，通过对资本主义世界中典型行动者的分析，重新阐释了资本主义。

以下经艺文志 eons 授权发布，为本书第一章。



少承认），这种依附性的最基本因素是，他们都依赖于资本主义的运行才能实现各自的目标。

关于所谓的资产阶级美德 (bourgeois virtues)，最博学的辩护来自经济学家迪尔德丽·麦克洛斯基 (Deirdre McCloskey) 卷帙浩繁的著作。她在中产阶级身上发现了各种美德，从诚实到更丰富的社会生活、情感生活甚至性灵生活，再到多样的身份选择。只要你造访过以夜不闭户为傲的富人区，就知道把特权说成道德是多么令人生厌。然而，像麦克洛斯基这么聪明的人，当她认为诸多美德与实践这些美德所需的大量特权不可分割时，她所秉持的是对资本主义的真诚信仰。她相信，这些禀赋与性情作为经济增长的红利，是我们所有人都有机会得到的——富有资产阶级美德的人越多，就会有越多人享有更富足的生活，正如据说已经捷足先登的数十亿人那样。

文艺评论家弗朗哥·莫莱蒂 (Franco Moretti) 将麦克洛斯基笔下的“资产阶级” (bourgeoisie) 调换为“中产阶级”。他使我们注意到，到十九世纪，由于能够更好地兼容“社会流动”的含义，“中产阶级”一词已经悄然取代了更早、更僵硬的范畴。记住这一点，我们便可理解麦克洛斯基真正想表达的是，中产阶级是资本主义的主角，这些角色的优点反映了资本主义本身的优点，他们的快速扩张标志着资本主义财富的扩张。莫莱蒂继而观察到，麦克洛斯基归于中产阶级个体的诚实品质多么完美地对应着资本主义市场的机巧：在一个经济体系中，理想型的行动者只需依规则行事来获得报酬，靠钻制度空子是得不到好处的。

从这一洞见出发，要想译解“中产阶级”这一范畴，一个显而易见的切入点就是考察资本主义的运行方式及其促成的结果。那么，请让我简要勾勒一下资本主义的部分面向，这些面向为身处其中的中产阶级预先描绘了目标。麦克洛斯基拒绝给出关于资本主义的其他定义，而是强调了围绕自利行为的老一套说辞：只要能自由参与健康的竞争，自利行为就会鼓舞进取和事业心，从而推动市场发展，形成巨大的溢出效应——也就是“水涨船高”的著名故事。一个信息量更大的讨论起点是资本主义的如下特质：除个别例外，资本主义所基于的生产过程都是没有中央计划和协调的。不同于另类或早期社会与经济体制下的生产活动，资本主义条件下，生产通常不是按照民主过程或专制法令所确定的部分或所有人的需求，去创造商品和服务；相反，资本主义假定每个人想生产什么就生产什么，生产者之间的竞争自会决定每桩事业的成败。

资本主义的拥护者喜欢说，上述成败最终反映了生产者在多大程度上满足了需求：如果人们没有足够的购买意愿，就不会有商品或服务被生产出来；要是它们被生产出来了，生产者就会关门大吉。人们对货品与服务的渴望向企业主发出了“有利可图”的信号，后者相应地生产出了符合需求的商品。虽然未经协调，但市场机制的自由运转在名义上满足了大众需求与欲望。这一推理过程略去不提的是，即便在充足购买力的坚实支撑下，大众需求可以划定任何一个企业主最终的生产界限，这一界限只有在生产成为既定事实后才会显现出来。换言之，在界限划定之前，已经有众多企业主被推向倒闭，已经浪费了大量的过剩商品，而诸多需求却仍未满足。

这里的关键在于，种种负面后果的形成并不是由于生产者未能精确预判需求。实际上，他们恰恰展示了资本主义制度的逻辑，正是这种逻辑造成了持续性的生产过剩。为了避免被挤出市场，生产者需要比竞争对手生产更多商品，并以更低的价格卖出。这一竞争压力也是驱动企业经营的动力。因此，生产出来的商品并不是为了满足需求或欲望。实际上，他们只是用来在市场上分一杯羹的工具，依靠的是对成本削减的耐受力，对涨价和更新换代的推动力，以及为产品之间的细微区别赋予个人意义、进而诱发需求的能力。由此形成的商品过剩——从不同品牌的生活用品、不同风格的娱乐产品到种类繁多的专业服务——争着让我们掏出钱包。我们经常用不上这些东西，更经常买不起太多东西，无论制造商和零售商多么迫切地想要把它们塞进我们手中。

当生产者们奋力要达到具有竞争优势的生产率，整个生产过程就改变了。新的生产过程吸收了技术革新，加快了产品的供给并使其多样化，同时也使大量工作成为多余，对于每个幸存的雇员则尽可能地压缩其工作量。这就解释了资本主义的活力，只需要越来越少的总体工作时间就能生产经济中过剩的商品。这也解释了以下事实，即当一些人几乎把和亲人见面的时间都悉数投入工作，更多具有相同技能的人却在承受失业、不充分就业和贫困的后果。如果我们把资本主义放在全球整体中思考，它的一大特质就是这样一种显著差异：一边是数量惊人的物品被生产，再被浪费，

另一边则是令人绝望的匮乏和试图挣得基本必需品的普遍挣扎；或者，一边是人们因过劳而不堪重负，另一边则是人们因失业而灰心丧气。

为了让生产的车轮持续转动（并持续雇佣工人、金融家、提供机械设备与各类服务的辅助供应商，来促进商品的生产、流通与销售），那些最初把车轮发动起来的人必须再投资自己的生意，才能不赔掉它。然而，他们也得有机会从生意中获利，才有动力为众多商业尝试付出辛劳、承担风险。因此，经济结构中必须有足够易得且可用的人力、物质与金融资源，来助推企业，激励工商业不同领域内的竞争。要保证这种可用性，就得不断积累全球剩余。

虽然无生命的系统并无某种主观意图，但就其似乎在持续推进某一目标而言，它又不乏一种内在动力。资本主义累积的过剩之所以被称为剩余 (surplus)，是因为从全球积累的资本并不能再次投资于造就它的经济活动而得利，或是重新流入造就它的社会、以任何形式为当地人口所享用。生产过剩总是会产生剩余，而将部分剩余据为利润是商业冒险的动力。反过来，人们可以获取、持有的货品与服务必须被限制，从而激发他们为这些东西展开竞争、产生剩余。同理，在利润或收入中，或是在对未来某一时刻利润或收入的预期中，必须体现出足够多的剩余，来促使人们再投资更多生产活动、制造更多商品。

资本主义市场的基本规则是不受强迫、不通过偷窃，将一件物品自由交换为另一件等值的物品。在自由和等价交换的情况下，剩余只能通过一种方式产生：使劳动者贡献的产品与服务的价值大于他们的收入所体现的价值。卡尔·马克思将这种方式称为剥削，因为，即使雇主从一开始就无意伤害任何人，即使雇主和雇员同喜同忧，劳动者的工作也没有得到完全的报偿。无论工作是低贱还是崇高，劳动者在参与生产的商品中所贡献的价值都大于他们能用薪水买到的东西的价值。并且，无论他们挣到了什么，哪怕他们挣了很多，都比不上他们对生产的贡献。否则，就没有人会雇佣他们、付他们薪水了。

此外，总体而言（但也存在一些众所周知的例外），工作所得收入都不足以让劳动者最终摆脱工作，否则就没有足够的劳动者来为经济生产剩余了。最后（此处依然存在例外），工作所得收入又得能够满足劳动者及其家人在食品、住所、健康、教育和培训上符合社会一般程度的需求，否则经济结构中的劳动力就无法胜任工作并产生剩余。劳动中未被补偿的价值，以及体现这部分价值的“利润”与“收入”，经过榨取，进入了资本主义的积累过程；但当这种积累被委婉地称为“增长”，背后的榨取环节就从人们的视野中消失了。这为剩余赋予了“进步”的光环，使人们忽视了劳动者在其中承受的代价。

独立生产者之间的竞争重塑了整个生产过程，减少了种种壁垒，以免其妨碍、拖累有利可图的货品和服务的生产与流通。小型产业要么扩张，要么消失。企业要么通过技术进步节省企业开支，要么就会因产品价高而被淘汰出局。各国经济被（不均衡地）整合进世界市场，从而生存下来；而对相对强大的经济体来说，这一整合过程也是为了和相对弱小的经济体做生意从而获利。由此带来的生产率提高使企业能够更廉价地生产出劳动者拿工钱购买的一切衣、食、住、行等货品与服务。如果劳动者可以花更少的钱买到想要的东西，雇主和客户也可以少付劳动者工资——不论是就名义总价还是相对价值而言。与此同时，劳动者的工作与服务为经济贡献了更多的剩余，因为它们产出的价值大于它们的价格。资本主义由此产生了集中于精英阶层、任其进行再投资的巨额财富，即便这一过程可能是缓慢或间断的。这是一条曲折前进的道路，某些地区、某些产业的劳动者或许可以通过成功的政治或个人行动改善其处境，或是赢得喘息之机，但总的来说，工作的价值在降低，就业状况变得越发艰难而脆弱。

如果臣服于资本主义的劳动者能从这一制度中得到的只有榨取剩余的工作，我们很难想象资本主义能够完好无损地一直运行至今，更不用说变得蒸蒸日上。工作不可能永远都是艰苦、报酬过低的，不可能既让劳动者与他们创造的大量财富无缘，又不让他们积蓄不满，以至于不断发起斗争来和资本主义一刀两断，或是用一种更加公平的生产与分配制度来取代它。从历史上看，当然劳动者经常试图这样做，但有些人回避集体斗争。这不仅是因为害怕受到反扑，更是因为他们感到自己会在反抗中失去些什么。如果劳动者最终能大量积累到他们创造的一部分社会剩余，他们就会面临这一重大考虑因素。

商品和服务往往是复合而成的，他们在不同阶段由众多的人与机器生产、组装、流通，各个阶段之间在时间和空间上相互独立。因此，我们很难精确计算一个人对

其经手的商品和服务做出了多大贡献，进而对比这些商品的价值与劳动者手中的支票所代表的购买力。通常，我们只会假定雇主或客户支付的是我们所做工作的竞争价值（competitive value）。虽然现实很少如此，至少在理论上，我们无疑拥有为自己的服务开出更高价格的自由，如果对方不买账，我们自可另谋高就。诚然，我们还是有可能意识到共同面临的困难而组织起来，反抗对我们不利的制度。然而，当遵循游戏规则能获得额外的好处，当这些好处的存在与价值独立于我们的工作，当获得这些好处可能使我们在与其他人的竞争中占得先机，当失去这些好处将会成为我们生活中的灾难，我们就有足够的理由对自己的真实处境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当马克思在其皇皇巨著《资本论》中探讨阶级时，他是在结构的意义上讨论这个范畴，认为它来自生产过程中有无物质资源所有权的群体之区分。在他看来，这一区分产生了资本与劳动的对立：支付给工人的越少，越多资源就能以剩余的形式累积起来，被资本收入囊中。反过来，工人的力量越大，就能为自己夺回更多剩余。马克思并没有在其研究中将劳动与资本对应于实际的工人阶级与资本家阶级。虽然他对工人的生存状况和阶级政治的形势做了重要思考，但他的研究路径更多是结构性而非历史性的，意在揭露资本主义制度遮蔽的逻辑。不过，如果我们想要采取一条偏重历史性的研究路径，我们将看到，劳动者其实已经被征召进与资本家相关联的议程之中，这一过程掩盖了马克思所描述的劳动与资本之间的对立。可以说，这就是“中产阶级”这一范畴所服务的真实目的。

我们可以获得和享有自己创造出的部分剩余，但与此同时，我们也受制于必须工作谋生的脆弱性，我们为创造剩余所付出的劳动也承受着剥削。给予我们好处的制度恰恰也是剥削我们的制度，它剥夺了我们赖以生存的工具：私有财产。如果我们生活在资本主义社会，唯一的选择就是在给定的条件下工作。这些条件是剥削性的，它使我们无法享受自己的工作所产生的剩余。我们不再靠公有的土地生存，也不再通过公共资源获得基本必需品。要想挣到钱来购买我们需要和欲求的东西，唯一的道路就是投入报酬小于实际价值的工作。

从大约十七世纪开始，共享、共有的资源逐渐被征用和瓜分。此类行动往往诉诸暴力来摆平激烈反抗，其结果是一小部分人拥有、控制了私有财产，包括土地和其他资源。在欧洲，这一进程是渐进式的；而在世界其他地方的殖民地，这一进程则是更为急剧的。资本主义的兴起及其全球扩张，离不开私有财产制度的暴力引入。过去，这种管理资源的方式在被殖民地要么不存在，要么不占主流。随着资本主义逐渐以私有财产的形式瓜分了全世界的资源，土地、原材料、生产工具和其他资源的新主人无论开出什么样的条件，人们都只能在相应的工作条件下谋生，别无选择。

然而，还有另一种理解财产的方式受到资本主义代理人或者代理机构的鼓吹，其基础是一套确认和保护每个人私人所有权的法律制度。根据这种理解进路，所有权的范围延伸至包括劳动者及其家庭渴望拥有的一切东西：从房、车等有形财产，到包括储蓄账户、保险单、养老金计划以及股票、证券和债券等在内的无形资产；把范围延伸得再广一些，我们还会看到大学文凭、专业技能、职业资格甚或社会关系网络，所有这些都被冠以“人力资本”之名。

我们在直觉上很容易理解拥有这些东西的作用。私有财产所代表的价值独立于我们在工作中挣得的价值。就人力资本而言，它可以帮助我们找到一份更好的工作。我们作为劳动者的机运（fortunes）可以通过作为财产所有者的机运来平衡。当两者分道扬镳时，这种平衡作用就显示出重要性。裁员、服务需求减少、健康或家庭问题，甚或仅仅是年龄的老去，都可能减少我们的收入。面对这些困境，拥有一处房产、一个储蓄账户、一份保险单、一张大学文凭就能争取到新的收入，从而减轻损失。或者，我们可能买过一处不动产、一只股票、一张职业资格证，市场的发展可以使它们升值。如此，上述财产就能帮助我们兑现一笔比工作收入更大的财富。

我们身兼劳动者和拥有财产者或渴望财产者两重身份，不会仅凭工作性质和收入来评估自己在社会中的地位（即使社会可能会将我们摆在某个位置）。我们也不会将彼此高度分化的机运最终归咎于作为劳动者的共同困境。相反，我们私人所有或者未来有望拥有的一切财富都牵动着我们的心思。作为劳动者，我们也许深知，大家领到的工资总额越少，资本的代理人和代理机构从我们身上攫取的利润就越多。但作为财产所有者，我们又处在与资本主义体制更复杂的关系之中。我们经常感到，只有支持国民经济的稳定与增长，才能利用自己拥有的东西来保障未来的生活，或是通过置办新的财产来改善发展前景。这种判断尤其适用于以下情况：我们名下的

房屋、资产的升值与国民经济的增长息息相关，即使这种增长到头来靠的是从我们的工资中积累剩余。一旦我们内化了上述判断，“积累”就把我们拉入了同一阵营。

这种视角的转变并不只是“学着喜欢资本主义”这么简单。作为必须以工作为生的人群，我们的工资收入和其他保障越少、越不可靠，我们就越是渴望拥有财产。但除非有幸继承一笔财产，我们对财产的追逐免不了付出艰辛和牺牲。我们必须比原先更努力、更有效率地工作，可能也要比其他人更努力、更有效率，才能给未来置办财产的计划挣到足够的钱。提前规划部分收入的用途，包括用于储蓄、用于获得文凭、用于房产或养老金计划，意味着我们不能把所有收入都花在当下想要的东西上。即便我们的确可以通过贷款、分期付款的方式即刻添置一份产业，这些债务也早晚需要偿还。最终，我们还是得更努力地工作，存下更多钱。我们有一个词来形容对财产的追求，那就是“投资”。我们在必需之外投入了更多的时间、精力和资源，目的就是为了今后能有一笔工作之外的潜在收入。我们将种种财产的投资视为一种工具，希望借此保护自己渡过可能发生的收入短缺的难关，以及让自己和子女未来不必再付出同样的辛劳。

“中产阶级”这一范畴在十九世纪晚期欧洲最发达经济体中日益流行，与家庭财产形式以及财产获取方式的激增密不可分。这一时期同时伴随着社会与政治动荡，后者危及了资本主义正在上升的力量和支配性。为了安抚不满的工人、缓和资本积累过程，工业增长产生的部分剩余开始向普罗大众开放。这些剩余化身为各类资源，使相当数量的工人能够以前所未有的方式享受到社会流动与物质保障。这种流动性与保障，或是对流动性与保障的承诺，将工人的精力从抗议转移到了投资上。心怀不满的工人可以慢慢积累那些他们害怕失去的东西，包括存款、房屋和文凭。他们还可以获得诸多物质与文化装备，来彰显自身的优势与成就。

积累带来的好处在于创造出了一群温顺、上进的劳动力，他们忙于争夺财产或是依赖于财产的收入，而无暇顾及和反抗他们共同受到的剥削。一些理论家注意到这一趋势，将中产阶级形容为一个在劳动与资本之间左右为难的角色。之所以说左右为难，是因为我们被迫以自身为敌：作为劳动者，无论我们的职业多么受尊敬、收入多高，我们都被剥削来创造剩余；与此同时，无论我们的职业多么卑微、收入多低，当我们拥有或者有希望拼得一笔存款、一座房子、一辆车、一份保险单或者一份文凭时，我们又将得益于和资本积累的动态过程持相同立场，后者可以保全乃至增加我们所有之物的价值。相应的，只要我们的幸福依然取决于对自己努力获得的资源的持续占有，以及通过这些资源储藏下来的价值，反抗资本积累就会使我们蒙受损失。

我们是以这样一种方式被归类的：它称许我们拥有良好的品性，能够看轻我们在当下工作中承受的条条框框，而着眼于今日之投资能在未来兑现为家产的腾飞或没落；它也称许我们能够忽视制度性约束，后者为保持自身的盈利能力，决定了我们的财产、工作与收入的价值，乃至决定了我们的命运。我们被称为中产阶级。这一名称向我们所有人敞开怀抱，无论我们是收入最高的专业人士、经理，是事业有成抑或奋斗中的企业主、自雇服务业者，还是地位最低的普通职员、端不稳饭碗的实习生。只要我们以工作为主要谋生手段，拥有或有机会拥有物质资源与人力资源，能够通过投资来维持、提升这些资源的价值，就适用“中产阶级”这一名称。它代表了我们的这样一种想象，即我们的财富与处境仿佛是个人选择与努力的自然结果。它进一步代表了我们“为未来做出牺牲”的责任，仿佛未来也仅仅取决于我们的选择与努力。

这种想法之所以如此难以抗拒，是因为：只要我们手头财产的价值不发生剧烈的波动，同时还能让我们比握有更少财产的人过得更好，或者比在没有这些财产的情况下更能抵御厄运，我们付出的努力往往能收到回报。这样，我们就可以有理有据地想象自己经历的痛苦并不是被迫失去，也不是孤注一掷，而是审慎的投资。我们越是发愤工作、学习、规划职业生涯，越是坚持为买房、为老年生活或者子女的教育而储蓄，我们就越是专注于这些努力，也越是倾向于将自己的财富归功于这些努力——高于其他任何因素。此外，我们越是为了更好的期望而延迟满足，我们就越不愿意贬低这种节制，认为它们是外部强加的、在个人层面上没有意义。我们不仅在投资，更以这些投资、以进行投资的自己为傲。

但是，请等一下。万一我们发现自己受够了拼搏、竞争和投资怎么办？万一某一天，我们认为自己很有希望依靠已经获得的财产过上想要的生活，认为是时候休息下来，收获曾经种下的东西，又会怎么样？经济学家将财产带来的收入称为“租金”

(rents)，将依靠租金生活的人称为“食利者”(rentiers)。他们将租金从劳动所得、企业利润中区分出来。按照对食利者悠闲生活的幻想，我们可以少工作、选择性地工作，或者干脆不工作，而是靠我们的财产生活下去。听起来，这对我们来说是件好事，但对资本主义则相反，因为它不利于资本主义所必需的积累过程。这样，私有财产制度很可能反噬资本主义：它所提供的不再是一套对于工作与投资的普遍激励，而是普遍抑制。

这还没完。考虑到每个生产周期只能产生有限的剩余，从潜在盈利能力的角度来看，除去工作家庭在逆境中赖以为生的现金或资产储备，还有多少剩余能分摊到世界各地家庭的账上？你会回想起，正是“经济活动的剩余可以转化为利润装进人们的口袋”这一承诺，能够激励生产活动的独立组织者、协调者和资金提供者冒着巨大的风险继续前进。一旦广大的人口具备了政治力量，要求以存款、房屋、社会保障、学历等私人所有物的形式收回部分剩余，即便他们中的大部分仍需靠工作谋生，也会严重拖累经济活动的盈利能力与增长率。自从家庭财产变得无处不在，经济学家就在探讨这种危险，他们提出的解决方案是诉诸有限的调整手段，抽走部分家庭财产，其工具包括通货膨胀和税收。但最为隐蔽而有害的一种解决方案是最近数十年形成的，在此之前，人类刚刚经历了一个财产所有权普及率空前增长、家庭资产与储蓄大量增殖的时代。

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全国性、区域性市场放松了管制，并被整合进一个全球金融市场中，从而便利了资本和信贷流向世界各地的政府和公司。这一变化有助于刺激竞争，同时让积累过程变得更平缓、更具韧性。资本跨越了社会与地理障碍，不断被提供给赚钱的企业。与此同时，经营状况不佳的企业无论对各国经济和区域人口有多大的重要性，都会失去资本的支持。新型金融机构允许将不同类型投资所附带的风险（比如币值和利率的波动）集中起来，进行分割，作为新的投资产品来定价和变卖。其结果是，贸易、企业的规模以及全球投资资本的体量都呈指数级增长，同时创造出新的风险和盈利机会。经济活动参与者(economic actors)面对日趋激烈的竞争和股东要求提升股价的压力，开始依赖于不断融资来生存和维持繁荣。这种依赖性是一把双刃剑，因为经济活动和竞争的强化会使全球金融市场承受更大压力，去提供信贷、债券和股票，促进投资，管控风险。

渴求利润的全球金融机构始终在狩猎新的投资机会。他们的猎物名单上，就包括那些曾经由税收、社会保险这类公共财产，或是由工作收入、银行存款等私人财产提供资金的产品与服务。工业资本主义已经让位给金融资本主义，这表明全球金融资本在公共和私人资金安排以及经济增长条件制定方面占据主导地位。

风险评估与定价向投资者指明了通往潜在利润或损失的道路。通过这种定价，金融开始管理、调节经济、政治与社会生活的所有方面。它的身影深藏于制度的运行方式之中，深藏于用来提供服务的基础设施之中，也深藏于各个经济体和大中企业为求生存所必须考量的选择之中。

用学术的话说，金融对经济和社会的支配就是所谓的“金融化”(financialization)。在发达经济体中，金融化契合了新自由主义下的其他经济趋势，其中主要的就是国家越来越缺乏意愿来分担风险，稳定收入，以及通过税收和社会保险提供产品与服务。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发达经济体中逐渐兴起的公共安全网，在所有国家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倒退。工资的上涨速度赶不上物价的上涨速度，劳动保护的撤销、劳工组织的弱化让就业变得更脆弱、更不稳定。一边是止步不前、靠不住的工作收入，一边是公共产品与服务的萎缩，两条线交汇在一起，在劳动者和公民中产生了一种迫切的需求：运用能拿到手的一切资源，来对抗与日俱增的危机和不安全感。

欢迎来到全球金融的世界。借助信用卡、分期付款、房屋按揭贷款、学生贷款和其他长期放款工具，加上对存款、保险和养老金的财务管理，金融机构争相迎合被培养起来的大众需求。于是，金融服务和金融工具在家庭经济学中日趋重要。这也向每一个被金融之网俘获的人提出了一项必须完成的目标，那就是掌握一定的金融知识，有能力发现投资机会、使用金融工具，同时承担风险、为自己投资（或者没有投资）的后果负责。在这份责任里，经常包括主动削减支出以平衡家庭预算，确保个体手上的资本能够可持续地流入和流出。

为了平抑持续不断的资本流通，银行、保险公司和养老基金等机构投资者充当了家庭与全球金融之间的媒介。这种媒介功能的具体形式，是提供和管理按揭贷款、养老金、其他长期存款产品、保险单以及消费信贷。金融机构将这些理财工具统筹的支付与偿还款项打包起来，批量定价，再卖给其他市场参与者。这样，家庭财产

所代表的价值又回流到市场上，成为更多投资的信用基础。由于被卷入了金融市场的潮起潮落，这些财产自身的价值也在起起伏伏。想想所有那些按揭买来的房子经过三十年的还款之后才能最终确定价值，而具体的还款数额反过来又随利率、币值而变动；想想你退休后能领到的养老金取决于用你养老金账户里的积蓄进行的投资，这些积蓄在数十年间被不断投向具有潜在波动性的股票和债券；再想想你的文凭，它的价格是以经年累月的偿还学生贷款计算的，而它的价值只有在风云变幻的就业市场上才能得到确认。价值不稳定的财产在不同收入水平的群体中都越发普及，这一趋势解除了“财产会提供过多安全感”或者“财产从经济中抽走了过多剩余”的危险。这种价值不稳定的财产要求付出真金白银的投资，带来的却是不固定的回报。除了最顶级的富人，其他所有人都无法想象彻底满足于当下所积累起来的资产。相反，很多人听到关于所有权的许诺后落入了圈套，最后发现，要想享受所有权带来的好处，就必须坚持不懈地投资。

从我们的角度来看，金融可以帮助我们购买仅凭工资收入买不起的东西。这听起来很棒，直到我们意识到家庭债务总是和低收入成对出现。我们越是习惯于通过信用卡、抵押合同和分期付款买东西（当商品过于昂贵时，这必然会发生），雇主需要发给我们的钱也就越少。这是金融化对我们强化剥削的一个方面。此外，金融化还将我们置于不利的投资地位：作为投资者，我们所依靠的是像房屋、养老金这样相对刚性、单一的资产，而我们所处的投资气候则是偏向速度和灵活性。还有一个方面是，金融化加剧了产业、企业和服务分支之间的竞争，为了适应这种竞争，他们中有许多会采取财政削减和裁员措施，从雇佣的劳动者身上榨取更多价值。金融化强化剥削的另外一个方面是，它让剥削变得如此抽象，以至于我们甚至不能怪雇主付的钱太少：一个无人格的市场向劳动者和资本家同时施加了压力，为众多不具名的股东提供价值的必要性又正当化了这种压力。

但我们还得面对压在头上的最后一座大山：在金融化的背景下，我们的投资对象之一正是对自身的剥削。银行和其他金融市场参与者对我们的每一笔支付或债务偿还款项进行了捆绑和重新打包，将其作为投资产品卖给公司实体和机构投资者。这些投资者很乐于在当下购买将来才会兑现的收入流，他们希望这笔收入流未来产生的总价值大于当下的售价。这种金融产品的价格是根据逾期无法偿还或无法足额偿还的风险确定的：风险越高，金融产品的价格就越低。为了对抗这一风险，各种财务投资者会将不相关的金融产品汇总为一个多样化的投资组合。多样化投资组合本身也会被定价，影响其价格的因素包括各种可能延缓或终结该投资组合整体收入来源的事件，如政治动荡、社会起义、债务人普遍无力偿还贷款。于是，集合投资产品向政府、企业发出了这样的信号：他们最好看住自己的国民、雇员和债务人，以免遭遇撤资及损失。

不管对此知不知情，我们一直在以退休金和其他长期存款产品的形式购买这类投资产品。管理这些资金的机构投资者之所以要买这些投资产品，是为了保证退休金能够按预期兑付，或者是为了使我们的储蓄计划及其他资产的价值最大化，当然，还为了他们自己的利润。我们依靠这些理财工具来攒下买房钱、学费和养老钱，而这些工具同时也被用来不计一切社会代价地维持剩余的积累。当我们认真、审慎地为家人的幸福投资时，我们也在投资一个支配我们的系统，它管理着我们的工作和各种资源，并由此削弱了我们作为劳动者和公民的力量。一些金融化的批评者将这一过程的产物称为金融化的食人属性，它将对每个人的剥削推广到了所有人身上。

正如我们手中金钱的价值无法脱离于资本的流通，我们也无法评估自己在积累过程中扮演的确切角色。面对工作条件的恶化、不安全感的激增，我们很难将这一进程追溯到自己与资本的某几次不幸的相遇，尤其是当我们的资产也被卷入其中时。相反，我们在日常经验中印象深刻的却是理财的低门槛。想想塞满我们信箱的信用卡申请表，想到到处发来的贷款邀请，想想我们的存款投向的具有抗通胀潜力的理财产品，想想引诱我们即刻到手、分期支付的贵重商品。我们仿佛被赋予了作为挣钱者、储户、所有者和投资者的权利与权力。我们当中有投资能力的人，会运用融资工具获得防御性的或是服务于个人抱负的资产，比如房屋、退休金和大学文凭。我们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承担着作为借款人、储户和家庭成员所要求的长期规划的重任。完成了所有这些，我们就可以忽略自己作为劳动者和公民的处境，而采取这些资产所代表的态度。我们可以自认为正在通过自主投资、审慎储蓄、承担个人责任和制定长期规划对自己的人生负责。我们可以称自己为中产阶级。

在众多投资机会中游走使我们在这场追逐游戏中越陷越深。当回报看起来近在眼

前，又无法轻易染指时，我们会全力以赴地接近它，即便初次尝试失败，也不灰心丧气，而是越挫越勇。信用贷款改变了我们与财产、投资之间的关系：它将我们梦寐以求的东西放在我们的指尖，同时迫使我们更努力地工作、花更多钱来抓住和拥有它们。当我们已经拥有的东西并未显示出我们期望中的价值时，我们同样被激励着继续工作、继续消费。我们在不断付出，而我们的牺牲换来的却是资本在我们身后不断积累。面对这一情形，我们依旧咬紧牙关，执着前行，因为中产阶级的自我认知鼓励我们这么做。

随着金融渗透进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新兴”或“发展中”经济体（按照人们对它们的通常叫法），这些地方的中产阶级自主意识变得尤为醒目。这些经济体正在向国际贸易和投资开放，向商品以及用来获取这些商品的金融工具的涌入开放，在这个意义上，他们都在经历自由化的过程。他们的大部分人口过去数十年间只是勉强过活，有些不得不节约度日，有些处境堪称悲惨，很少有什么私人财产。突然之间，许多人收到了贷款，可以用来购买曾经难以企及的东西。其结果是，这些地方的医疗卫生、教育、住房和交通成本如火箭般蹿升。一些人的生活方式驱使他们选用其中最有效率的服务，最终被高筑的债台所埋葬。他们不得不制定长期策略，管控风险，加倍工作，寻找新的收入来源，来偿还这笔债务。大多数情况下，他们在这条道路上要面对的是工作与保障的匮乏。新兴经济体的这些新晋投资者——如今获封崛起中的全球中产阶级的称号——接过了驾驭未来的缰绳，但他们很快发现，与这些缰绳紧紧缠绕在一起的，是金融化财产背后的经济、社会与情感代价。

我们最终意识到，谈论全世界一部分受压榨的中产阶级与谈论另一部分正在崛起的中产阶级毫无矛盾。如今，全球金融市场正在沿着两条路前进，一条是修复富裕国家的资产价值，一条是投资贫穷国家的新资产。对于已经积累了几十年的私有财产、公共资源和人力资本的人来说，忽然间，他们发现这些资产和保障要么暗含着更高的代价，要么本不具有可靠的价值，于是陷入了财务危机。而在另一些地方，人们原本几乎身无长物，却忽然有机会染指各式各样的财产、掌握获得这些财产的金融工具，由此被征召为新一批的进取投资者。“中产阶级”这一范畴具有足够的可塑性，可以将这些新人拉进一个普遍追逐奢华生活的世界。

经济学家布兰科·米兰诺维奇（Branko Milanovic）将上述两种人分别称为全球金融的输家和赢家，哀叹全球范围内收入增长的不平等分配。然而，比这种分配不平等更引人瞩目的，不是用在个人头上的收入的增长，而是剩余的增长。剩余的增长只会暂时性地惠及一些占据有利位置、能从租金或其他收入中捞到些好处的人，而在本质上，这些暂时的受益者和其他靠工作维持生计的人一样，都受到剩余的剥削，需要应对剥削带来的种种困境。

做一个中产阶级就意味着做一个好的士兵，而不要把目光放在更大的版图上。最有可能这么做的是这样一群劳动者，他们握有获得一些财产的工具，这些财产在他们身处的社会能够实实在在地改变他们的生活。一种中产阶级意识形态驱使他们投入更多的时间、劳动或资源，其数量超过了当下能够获得的回报，但他们关心的是未来。由于这种心态是如此有助于积累，那些工作和地位全仰赖资本主义制度的人们痛惜于他们所说的中产阶级的萎缩，想方设法地为那些由于投资的无常和徒劳无功而日渐萎靡的长期投资者重新注入能量。他们还赞颂全球中产阶级的崛起，为千千万万的人们而欢欣鼓舞。这些人被他们描绘成金融资本主义心甘情愿的投资者，而非金融资本主义向统治地位攀升之路上的不幸牺牲品。

虽然金融化为资本主义积累这一事业提供了诸多便利，它也暴露了积累过程的断层线。自发的社会流动这幅图景建立在“投资”观念的基础之上：我们当下牺牲的财产终将带来可靠的回报。正因如此，当我们把一些收入暂时放进存款账户或分期购买耐用品，而不是立刻在消费品上花光时，我们是把自己当成审慎而负责任的劳动者、公民和家庭成员，而不是鲁莽的投机者。人类学家大卫·格雷伯（David Graeber）捕捉到了投资的精神，他写道，中产阶级与一系列感觉相关联：感觉各种基本的社会制度是为我们的利益而存在，感觉我们只要遵守游戏规则就能预测结果，感觉只要游戏规则不变，我们甚至有能力谋划孩子的未来。但他的另一条论述没能命中靶心，那就是认为债务的重担会让我们的这些感觉摇摆不定。债本身不是问题所在。问题在于，我们虽然毫无疑问地承受着债的重压，却在继续举债，来阻止自己跌入深渊，或是更为毅然地向上攀爬。对许多劳动者来说，借钱是他们通向更好未来的唯一机会。即便明显处于较低社会阶层的人们也会将自己视为中产阶级，这种倾向证明了中产阶级意识形态有着不惧困境或难题的执着；加深这种执着的，

往往正是那些出于预防目的或是为了实现个人抱负而欠下的债务。我们之所以注定要挣扎以求生存，不是由于金融工具（比如借贷），而是由于操纵这些工具的资本主义本身。我们继续遭到剥削，在竞争中无计挣脱，任由那些不受我们掌控、却决定了我们投资对象的价值的力量所宰割。

当我们举债获得的财产的价值变得过于难以预测，当初决定投资时得到的关于未来的承诺显得不再可信，我们就会迎来从中产阶级意识形态中觉醒的真正转折点。这一变化并不意味着我们不再迷恋“成为中产阶级”的想法，或者不再那么倾向于投资财产以及与之相关的人力资本。但如果观察得足够仔细，我们的确能从这一变化中更清楚地看到自己所处的日趋严峻的困境。意识形态从来都不是真空包装的；相反，它需要在一系列特定的物质与社会条件之下才能令人信服。一种深度依赖“投资”这一观念的意识形态，自然要指望投资持续具有吸引力。凭借家庭财产的日渐普及，资本主义得以塑造人们作为“投资者”而非“劳动者”的身份认同。使用融资工具获得财产的可能性则鼓舞了全世界越来越多的人形成这样的自我认同。在发达经济体中，社会政策与规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几十年内向参与投资的国民顺利提供了预期的回报。只要劳动者的投资能按预期的方式得到回报，这种投资也就能自证其意义。这种情况下，劳动者的注意力就从不知不觉间发生的工作贬值上移开，即便这些工作依然是他们维持日常生计的首要途径。

随着金融化在世界范围内重塑社会，事情开始发生变化。造成家庭资产负债表恶化和投资收益波动的种种风险形成了一道道裂缝，我们可以从中看出，不管我们拥有何种保障、持有何种先入之见，这场游戏本身都是被操纵的。与之宣扬的花言巧语相反，构成我们经济系统的不是我们自利却又互惠的选择与努力，而是促进资本积累的强制要求，要求我们总是给予多于回报。看看今天的我们必须为自己未来的安全与幸福付出什么，再看看这些付出很可能得到的结果，我们会回过头发现自己一直被耍了。从资本主义初生之日起，我们的努力和投资就在被组织、利用于剩余的积累。唯一的区别是，如今，赏给我们的那点残羹冷炙变得更稀少、更难以持续。这一区别或许能让我们睁开双眼，面对现实：不管中产阶级性创造了何种关于“自力更生”的乐观说法，我们都不是——也从来不曾是——中产阶级。



豪道斯·魏斯

博士毕业于芝加哥大学人类学系，主攻中产阶级与当代资本主义研究，曾于德国、芬兰、匈牙利、以色列等地开展田野调查；先后供职于中欧大学高等研究院、德国马克斯-普朗克研究所、马德里高等研究院，现为洪堡大学亚非研究所研究助理。

新书试读

来自新近好书的试读章节，由小鸟文学编辑部从近期出版物中挑选而来。祝阅读愉快。



题图来自 ran liwen on Unsplash

## 非虚构

# 了解中国的现代性， 从晚清民国铁路入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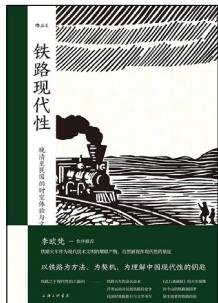
李思逸 | 新书推荐

以铁路为理解中国现代性的钥匙

《铁路现代性：晚清至民国的时空体验与文化想象》依据晚清至民国的时间顺序，围绕铁路与火车所引起的时空体验和文化想象的主题，通过大量的史料钩沉和文本分析来解读现代性之于铁路的派生方式：时空概念的演变、意识形态的争论、（乘坐在开行的）火车中的身体感受，以及文学文本再现的人物主观经验等。

作者以铁路为方法、为契机、为理解中国现代性的钥匙，分析 1840 年至 1937 年铁路进入中国之后引发的冲击与适应，探讨铁路在晚清民国的具体历史情境中是如何与现代的想象与经验勾连在一起的。

经后浪授权，我们节选了第一章《沿着语言概念的轨迹：铁路的命名故事》分享给读者。



火车变“火”车的灾难性事故到了民国时期仍有发生。比如 1924 年 1 月 18 日，济南开往青岛的二次旅客快车因车内旅客吸烟起火，烧毁客车三辆，公事车一辆，旅客死十人，伤四十五人。不过与晚清不同的是，民国的这种火车事故已是发生在铁

路现代性建立起的框架之内，火车变“火”车不仅是事故，也开始成为故事，披上了隐喻的外衣，担负起象征功能，进入到中国现代文学的作品中——这就是老舍创作于 1939 年的短篇小说《“火”车》。不过在进入这一文本之前，我们还是先来考察一下铁路与火车是如何生产，或如何协助生产出更为广泛的新词概念。

### 作为认知装置的铁路火车

德龄的《御香缥缈录》中有这样一段慈禧太后与铁路官员孟福祥的对话：

“究竟是什么东西使这辆火车行动的呢？”太后的第一个问题。“回太后回老佛爷，”孟福祥是有口吃病的，因此他的说话是很慢，而且断断续续地不能连贯，“就是车上这些役工们把火车开动的！”

“这还怕咱不知道吗！现在，只要问你，他们究竟是怎样把火车开动的？”

“奴才该死！奴才不知道！奴才不敢不妄回！”

“记得在前一站的时候，”他的答复虽然是这样的令人失望，可是太后偏要问他，“为着一件什么事情，我们的车子曾经往后面退过，你现在就告诉我，何以这些车轮既能望前面滚，又能望后面滚呢？”

“奴奴才知道！回太后！这是那司机的人弄的！”

“那么，他们又是怎样把这个车子停下来呢？”

“回太后！六个人从车上跳下来，奔到最后的那节车子里去，抓住了那个轮盘，只要他们尽力地抓住，这个车子就停下来了！”

尽管德龄记述的历史真实性一直备受质疑，我们也暂且悬搁慈禧太后此一人物所具有的特殊身份。虽然对话的真实性无法确定，可这一问一答却正体现了某一时期的中国人面对火车时的困惑：明明身体已感受到，却在知识分类上无法安然面对，只能通过原有的经验知识加以附会。如果孟福祥的回答是“火力”“蒸汽”的缘故，我们是否会觉得这样的回答更加科学？是否会觉得孟福祥更为现代，与我们的距离更加接近？事实上，即使我们能够给出“蒸汽”“火力”的答案，并非我们比孟福祥更为聪明，也不是因为我们都是火车专家，精通相应的科学技术——仅仅是依靠语言概念和知识经验的积累过程，让“火力”“蒸汽”这些对我们来说不算新奇，甚至反倒有些过时的概念脱口而出。今天火车的动力早已延伸至电力、磁悬浮，衍生出的种类也涵盖动车、地铁等不同类型，我们搭乘高速列车出门旅行，跟随地铁线上班返校，一切都是这样自然而然，我们并不会一直意识到这种现代技术之物与自然的疏离：物的自然化在日常生活经验里早已大功告成。这并不意味着火车进化为地铁，成了我们日常生活的背景，而是我们的日常生活早已由火车所塑造，我们早就已是置身于“火车”之中而习以为常的现代人了。

大多数的地铁线都是为了符合日常所需。不是由我们去选择要不要把它们保留在记忆里：我们是整个浸泡在里面，好像当兵的记忆一样。

让我们在搭地铁的路程中交叉对照的，正是我们自身的历史。我们今天的路线和昨天的路线彼此交错，聚集成生活的团块，而像行事后一般印在我们心里的地图路线图，只能让我们看到生活的一个切面，一个同时最具空间向度和时间规律的面向。



1876 年，吴淞铁路。这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条运营性铁路。图片来自 Wikimedia。

当然，科学技术名词也有自己的知识逻辑，但在日常生活中，它们更为显著的作用是使我们对技术感到安心，泰然处之 (Gelassenheit)。只有当技术失灵，或是被干扰、打断时，“人们突然清楚地意识到，技术的‘自然性’并非来自对技术的完全掌握，

而是习以为常和常用的结果”。我们可以经常在一些电影场景中看到（实际生活中也会遇到），当飞机或是机车快要失控、遇险的时候，驾驶者像对人一样祈求着机器之物能够“加把劲”坚持住”，然而危险一旦度过，受到赞誉、被称作英雄的永远是机长、司机等人，而之前的“祈求”也被解释为人在面对绝望时的无奈与非理性的表现——机器、技术不会回应人的祈求或是接受赞誉，在遵照自身规则而不矛盾这一点上，它们远比人更为“理性”。人们之所以很快忘掉技术、器物的危机，无非是因为有一个技术自然化的世界可以回去，其中对技术的泰然处之远胜于对技术的忧虑和怀疑。慈禧和孟福祥的问答正是发生在这一世界于晚清中国的建立之际，他们目击了火车作为物的自然化之起始。他们的对话在身处现代世界中的我们看来，固然显得愚昧、可笑，但这也仅仅是因为我们忘了这被视作理所当然的“世界”是如何建构起来的。仿照柄谷行人谈论“风景之于现代性”的句式，我们可以将其表述为：

火车是一种认识性装置，这个装置一旦形成，其起源就被忘却了。火车，似乎一开始就是存在于外部的客观之物。其实，这个客观之物，如同主观自我一样，都是在火车经验的自然化过程中确立起来的。

火轮船、火轮机今天已不再使用，格致、气学、火学都已湮灭在历史之中，唯独“火车”这一日常语言概念的幸存，使我们能够重新了解其背后真实的物的载体，相应的认知变化，以及层层堆积、相互覆盖的现代性经验。新与旧、中国与西方、传统与现代的对立统一都深埋在这累积的经验之中，时而历史地壳变动，旧的化石又被视作新的东西挖掘了出来。正是因为经验的含混与覆盖，我们才能既得出现代性、速度、交通技术导致了经验贬值的结论，又同时可以把火车、铁路等技术器物视作新经验的可能源泉。

事实上，铁路现代性派生的语言概念轨迹，并不局限于中自身的专有名词，同样包括我们日常生活中的其他词语，特别是“时间”。“时间”一词本身出自古汉语佛经译语，表示“立即”“一时”之意，由现代日语借去对译英文“time”一词后，又于晚清传回中国。比如佛经中有“如是时间，经五十小劫”“一刹那时间”等用法，其他古籍中有“时间尚在白衣，目下风云未遂”（《西厢记诸宫调》），“如果不，时间就打上灵霄宝殿，教他龙床定坐不成”（《西游记》第四回）等用法，都是表示时间极短，即刻之意。不过，“时间”一词在晚清的使用推广也并非一帆风顺，在对译“time”“space”方面，“时间”“空间”当时都有自己的竞争对手——“宙”和“宇”。“空间，时间，佛典译语，日本人沿用之。若依中国古义，则空间，宇也；时间，宙也。其语不尽通行，故用译语。”梁启超是从语言使用现象对此加以解释的，不过为什么“不尽通行”呢？要知道，在严复那些享有盛名的译著中可都是用“宙”和“宇”对应“time”和“space”的。

根据黄兴涛的发现，王国维在1905年的一篇文章《论新学语之输入》中，正好对严复用“宇”和“宙”来翻译“space”和“time”提出批评，认为不如“空间”和“时间”来得准确。因为严复的译法只能表达抽象、无限的空间和时间，未能涵盖具体的时间表征。“夫谓 infinite space（无限之空间）、infinite time（无限之时间）曰宇曰宙可矣。至于一孔之隙、一弹指之间，何莫非空间时间乎？空间时间之概念，足以该宇宙；而宇宙之概念，不足以该空间时间。”那么，王国维试图强调的具体、短暂、蕴含着速度节奏“一弹指之间”的时间又是指什么呢？虽然今天我们多是将“时间”作为抽象名词来使用，可在20世纪初，中国本土汉语从日本引回“时间”一词时，出现过既将“时间”视作表示抽象概念的名词，又用“时间”表示时间长度单位——等同于“小时”的现象。黄兴涛根据日本学者松井利彦的研究，指出这一现象背后的原因乃是现代日语用“时间”对译“time”一词时，就存在抽象概念与具体小时并用的双层含义。“从日本幕末兰学时期编译《厚生新编》一书起，表示时长的时间单位汉字词之‘时间’（意即小时）即已问世，明治之前和之初，独立使用、表示时长的非时间单位名词之‘时间’也已出现。前一用法，因1872年铁路的开通而迅速传播开来。”由此推论，王国维认为严复译法中所缺失的具体时间表征，那能表示短暂、即刻的意味，不恰恰是铁路火车所带来的具体时间单位内的现代性体验吗？“钟声一及时，顷刻不少留。虽有万钧杠，动如绕指柔。”“自火轮车迅驶，游人省唤渡头船。”“巧同缩地哄人游，斜日西沉尚未休。”“风樯阵马不及追，瞬息已经数十里。”在晚清中国，还有什么能比铁路火车更能给人以直接的快捷、迅速、时间短暂的经验感受呢？难道不正是铁路火车带来的这种速度和短暂即刻的时间，才让人们更愿意用能表征“一弹指之间”这样短暂、具体时间状态的“时间”一词对译“time”吗？

斯蒂文·埃里克森（Steven Ericson）对日本铁路的研究也足以证明这一点。他提到火车对精确时间的需求引入了一种现代性的新时间观念：“在终点，火车也许会整点出发，但是在中转站，出发和到达的时间就未必会是整点。这就引入了非常新的时间观念，一个更为精准的‘分钟’概念，这是以前日本人从未有过的。在铁路到来前，人们管理生活的最短时间单位是半小时。突然，铁路要求将这个最小单位减少到分，对于铁路使用者来说这确实是一个巨大的变化。”不论是佛典、古籍中的“时间”这一传统经验借助铁路火车这一现代器物得以复活，并融入新的经验，拥有了现代性的身份特征；还是铁路火车这一现代性经验融入传统语言概念“时间”中，保存并扩大其含义，都再次说明，传统和现代不仅不是相互隔绝，甚至也不能用对立统一、相辅相成来简单处理。传统和现代本身就是不同经验层次的累积与覆盖，通过对语言概念的挖掘，我们才得以看到彼此的交错与偶合。而“时间”，不论是其在古汉语里表示立即、片刻，还是在晚清民国曾被当成时间单位使用，或是在哲学等领域作为一个抽象的、形而上的概念，其本身就包含着不同历史时期的物与经验，同时亦在具体的物与经验中被重新塑造。列维—斯特劳斯（Lévi-Strauss）曾说：“要想对一个社会事实有适当的理解，必须从整体上去把握它。即从外部把它当成一个物体，一个包含了有意识及无意识的主观认知的物体。对此我们都有所了解，毕竟不可避免地生而为人，我们生活的事实更像是土生土长的原住民，而非在旁观察的民族志学者。”不论现代性的概念如何被挪用变换，其相关的历史事实、身体经验总是无法否定的：尽管我们只是在策略上将其“当成”一个物体，可只要置身其中——毕竟我们不是清醒旁观的民族志学者——策略就会和经验发生重合，经验也有可能成为新的策略。

### 概念的象征化：《“火”车》

老舍1939年的短篇小说《“火”车》对铁路火灾事故予以隐喻化的处理，其既和我们有关“火车”、“火”车的概念辨析相互呼应，且本身就是有关语言概念演变为故事叙述的生动例子。某种程度上，老舍这篇小说的诞生可看作铁路火车命名故事的完结宣言——或者说，它是以文学特有的反讽方式对概念认知的“正确”过程开玩笑。小说讲述的是除夕夜行进中的火车上，二等车内萍水相逢的张、乔两位先生因为大年三十同在列车上的“缘分”，结交聊天、喝酒抽烟，醉酒的张先生无意间引燃了隔壁几个蛮横的军人放置在车上的爆竹，从而导致了一场惨烈的火灾。

张先生醉酒抽烟当然是这场火灾的直接原因，但车上抽烟的不独他一人，尚有很多；蛮横的军人不按规定放置的爆竹可算诱因，可火灾发生时他们都已疲倦，倒也老实地睡着了；小说中唯一受到处罚、丢掉工作的看车夫老五恰恰在这个时候去餐车寻觅酒食去了，如此将责任全部推给他似乎也说不过去；车站的管理人员也逃不了干系——这也恰是情节最奇特之处，刚起火不久的火车进入第一个小站时，站上的人们虽然“微见火影”却“疑是眼花”，“全不想说什么”直到“心中那点火光渐息”，重新感到“天下极太平”；如果用更加现代的视角怪罪于制度不健全，也并非不可以，当火车驶入最后一站，已是“全车烧起，烟浓火烈”成为“最惨烈的火葬”，可站上的站长、办事员、书记、闲员等都只能干瞪眼，因为站上并没有救火设备——即使有也于事无补。我们似乎找不到该为这场火灾而被怪罪的具体对象，尽管什么都又像是要负上一定的责任。“事后检尸，得五十二具；沿路拾取，跳车而亡者又十一人。”在老舍不露褒贬、不陈善恶的叙述下面，与其说是悲悯或同情，更像是展现一种关于这场火灾根本的无谓以及因此痛苦死亡的无意义。为什么老舍要写一个发生在除夕夜、无意义的火车火灾故事？

我们刚才似乎只检查了情节内部，与火车空间有关的人、物等因素，漏掉了一个隐形的重要责任者，即阴历除夕本身。想想开篇那老舍特有的谈话式味道的倒装句：“除夕。阴历的，当然；国历的那个还未曾算过数尔”。除夕，不只是故事发生的时间背景，其本身就含有新旧交替、辞旧迎新的意味；而除夕作为一个独特的时间指标，也是与整个小说中火车所创造的新式空间、簇拥着的各式新派人物及相应的生活方式相区别的、唯一的传统中国的载体；而随着叙述情节的层层递进，我们恍然发现，原来“阴历除夕”才像是这场火灾的真正元凶。正是除夕，忙了一年本该在三十歇班的老五又要临时跑车，因此一路上的抱怨难免不和其对工作的懈怠有所关联；是除夕，所以上车的七八个军人才会抬着巨大的爆竹，“准是给曹旅长送去的”；是除夕，本来萍水相逢、彼此世故的张、乔二位先生才会有“大年三十交的朋友，前缘！”“好，

我舍命陪君子！”这样的对话；又是除夕，好像都看见起火的火车“火舌长曳，如悬百十火把”的站员们，却又“全不想说什么”，开始“群议如何守岁”，“乃放炮，吃酒，打牌”，仿佛“天下极太平”；因为除夕过年，事故调查员各方面请客，应酬很忙，只等“宴残事了，乃着手调查”；而“快去过年，还不到家！”这一感叹或祈愿，更是反复出现在火灾发生之前的叙述者画外音之中。也许，作家设置除夕这一时间境况的本意并不重要，因为在叙述进程的推动中，中国人过年的这一传统习惯一点一滴地与一场无谓的火灾灾难纠葛在一起，好像在新旧交替之际发生这样一场“火”车之灾也是无可奈何的必然。就这样有意无意之间，传统倒成了灾难本身的替罪羊。我们在此见证了一个微观层面上新与旧、传统与现代之对立的创建过程，火车变“火”车，从物与经验进入现代中国的叙述与象征层面。而在此过程中发生的意外或灾难，该责怪的往往都是旧与传统。比如小说中，一切人、物都与火灾脱不了干系，哪怕是阴历除夕，可唯独火车本身是无罪的。暂容我们不解风情地追问一句，为什么老舍的这篇小说不去怪罪火车本身呢？

王德威将《“火”车》视为一篇带有隐喻性质的小说，认为车厢中的故事暗指当时的中国社会，而“火车”也成为老舍对个人前途和国家命运紧张情感的症候——“在一个非理性的世界里，任何努力终归徒劳，这甚至无关战争”。更有俄国学者将小说中的借喻性形象与当时的社会现实做了更直接的对应：发生火灾的火车是暗喻当时的中华民国，管理火车的人员是指当时中国的统治集团，而火车上的个别事件则反映了当时错综复杂的社会矛盾。”这未尝不是一种阐释，但老舍毕竟不是矛盾，况且就算其中蕴含着对历史现实的反映及讽刺，硬要说它是对社会现实的深刻分析也略显牵强。因为老舍的短篇小说最重要的是其总有“传奇的气氛”，即它首先讲的是一个有关火车变“火”车的故事。故事的叙述总是把偶然的经验与物象织成一种必然的象征及符号。如同卢卡奇（Lukács）的经典论述：“关键的问题是，小说中的‘偶然’意味着什么？没有偶然，所有的叙述都是僵死而抽象的。如果排除掉意外，没有作家还能描绘生活。另一方面，在作家对生活的再现中，他必须超越各种粗糙的意外事故，将偶然提升为必然。”看车夫老五本该休假的时候上班是偶然，在火灾发生时前去乘车是巧合；张、乔二位在车上相遇本身就具有偶然性，而张先生醉酒抛出的火柴恰好点燃爆竹更是极为巧合；军人抬爆竹上车是偶发事件，排长因为疲倦空洞而发脾气拒绝老五将花炮搬到上面的请求亦是偶然；其他等偶然与意外不消多说。而正是老舍以逼真的细节、变幻的节奏、紧凑的叙事，将火车上的这些种种巧合与偶然，转化为一场无谓、无意义却又必然发生的灾难，才让其本身拥有了多层内涵以及不同的象征意味。不过任何一种蕴含必然的叙述或象征本身依旧是众多偶然经验中的一者。1924年济南至青岛的火车火灾是历史上偶然的事故，而《“火”车》讲述的故事却带有一种必然的象征。这并非寻求一种新的反映论，或试图在历史与文学中建构某种对应关系。只有在把握了偶然与必然的关联之基础上，我们才能理解并引入塞尔托有关“文学是对历史的理论表述”这一论点，因为“文学的虚构使历史可以被思考”。

我们可以读出《“火”车》蕴含着对传统的批判与揶揄，或是接受其反映、讽刺了当时中国的社会现实，却很难有阐释出其对物的思考、对技术进行反省的可能。事实上，火车在老舍笔下亦非完全被动供人驱使的“死”物，反而是一再用拟人、借喻的手法对此加以描绘，比如“车悲鸣，客轻叹”“跑，跑，不喘气，飞驰”等。当我们问《“火”车》为什么不去要求火车本身为火灾负责时，如果这一问题显得愚蠢，那并不是我们对文本本身提出了过分而可笑的要求，而是忽略了具体历史经验施加于其理论表述对象——文学文本上的感受。因为这一发问也可以被阐释为在质疑这篇小说为什么不具有某种现代性的批判，对技术、器物本身的反思。对比来看，在西方语境里，铁路、火车事故尽管往往也是人为引发，但在叙述象征层面常意喻现代性和技术的阴暗面——破坏、邪恶的那一面，而这也是为我们所广泛接受的。依据这种西方语境中的现代性论述策略，我们去怪罪铁路、火车器物本身，对技术展开批判显得如此理所当然、自然而然。如果我们觉得两者在认识论上有高低、优劣之分，无疑是因为我们已经默认了某一种现代性论述作为参照。从更广阔的范围上来看，一个合理的解释也许只是物与经验的显现方式在此时此地与彼时彼地的具体历史情境中总存在着差异。因此，我们并不是要依照某种论述为现代性找寻对应的历史对象，恰恰相反，从火车到“火”车这一具体的变换历程——无论是基于历史经验还是文本叙事——才是在晚清民国语境中创造现代性论述、铺展各种想象的资源和前提。

除此之外，老舍在这篇小说中对火车的描写在整个晚清至民国的文学作品中都是独树一帜的。一方面，作家大量使用短促有力的句子，配合繁多而有力的动词制造

出一种配合火车运行的节奏感：

快去过年，还不到家！快去过年，还不到家！轮声这样催动。可是跑得很慢。星天起伏，山树村坟集团的往后急退，冲开一片黑暗，奔入另一片黑暗；上面灰烟火星急躁的冒出，后退；下面水点白气流落，落在后边；跑，跑，不喘气，飞驰。一片黑，黑得复杂，过去了；一边黑，黑得空洞，过去了。一片积雪，一列小山，明一下，暗一下，过去了。但是，还慢，还慢，快去过年，还不到家！车上，灯明，气暖，人焦躁；没有睡意，快去过年，还不到家！……车外，黑影，黑影，星天起伏，积雪高低，没有人声，没有车马，全无所见，一片退不完，走不尽的黑影，抱着扯着一列灯明气暖的车，似永不撒手，快去过年，还不到家……

而这其中很多简单句，都是以主谓语句型构成，呈现出“物+动词”的形象。除了开篇的“火车开了。车悲鸣，客轻叹”，中间段落描写火灾场景时更为明快：“……玻璃碎，风入，火狂……车疾走，呼，呼，呼，风；拍，拍，拍，爆竹；苟先生狂奔……车出站，加速度。风火交响，星花四落，夜黑如漆，车走如长灯，火舌吞吐。”事实上，通过这种形象鲜明、结构紧凑的叙述，小说中非人的“物”无意间获得了与人一样的阐释地位。所以在上一段有关火车奔驰的画面中，我们很难说叙述者是采取了何种主体视角进行描绘（乘客？观察者？），因为从观察视角的进入，对乘客的心声渲染，和作为运动着的火车是同时交融在一起的。一般意义上人的主体地位和物的客体地位已经被打散了。

另一方面，整篇小说描写火车的基调也极为独特：一直在抱怨“车走得多慢！”。晚清有关火车的文本作品中，不论态度是抵制或者接受，谁也无法否认其速度之快的事实。到了民国新感觉派作家那里，仍然是称颂机车速度之快，甚至将其视为现代性的象征加以膜拜。唯独到了《“火”车》这里，似乎是已被速度宠坏了的旅客在“快去过年，还不到家”的心境中埋怨着火车跑得太慢。只有当速度成为习惯时，慢才得以被察觉。现代性并不是只有和速度、快感联系在一起，感觉到慢，因为慢而焦躁、不耐烦，恰恰是身处现代性之中的明证。小说中，火车不再是新奇的代表，而是日常生活中平常使用的物品，甚至会遭人埋怨。在这个世界里，现代器物、技术的自然化过程已经完成，快速、加速是理所当然的，慢才是不自然、需要克服的障碍，而慢的感受在文本中一次次出现无不提醒着——铁路尚有加速的可能；其实火车本可以更快；如果不是这么慢的话，火灾也许就不会发生。从“火车”到《“火”车》正是认知概念向象征修辞转化的过程，在其中的我们亦不知不觉进入铁路所带来的现代世界。



李思逸

香港中文大学文化及宗教研究系哲学博士，哈佛燕京学社访问学者；曾任教于香港不同高校，发表研究论文数篇，著有《铁路现代性：晚清至民国的时空体验与文化想象》《文学与电影十讲》。

#### 新书试读

来自新近好书的试读章节，由小鸟文学编辑部从近期出版物中挑选而来。祝阅读愉快。



图为电影《西伯利亚的理发师》(1998)剧照

## 专栏

# 如何在苏联体制下写出好小说

陈冠中 | 作家之爱

“但现实就是继续坏下去。作家能做的就是写出来。”

本文是2023年3月23日香港城市大学中文及历史学系城市文学讲座的文字稿。  
讲座主持人廖伟棠，讲者陈冠中。本文由讲者陈冠中授权。

**廖伟棠：**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香港城市大学中文及历史学系主办的城市文学讲座的第一讲。今天是由陈冠中先生来主讲，我是主持人廖伟棠。今天的题目是：如何在苏联体制下写出好小说。这个题目在今天来讲，非常恰逢其时，因为正如大家众所周知的原因，俄罗斯又成为了世界的焦点。从他的所作所为，一举一动我们可以看出，苏联作为一个幽灵，苏联的幽灵，他的余威犹存。当然我们也能看到，在俄罗斯依然也还有良知没有泯灭的作家还在用写作来回应这个纷乱的世界，以及他们国家所面对的问题。

那今天我们就请来了著名的作家，我想大家都不需要太多介绍，来自香港，现在生活在北京香港两地的小说家陈冠中先生，来跟大家分享他心目中苏联一直到俄罗斯，在过去100年来，文学是怎样突围，又怎样在严酷的历史下幸存的？我们的讲座是持续一个半小时，之后是提问环节，我现在先把画面交给陈冠中先生，如果大家有什么想到的问题想要提问的，请大家先放到聊天室上。

**陈冠中：**好的，谢谢伟棠，大家晚上好。谢谢大家来听这堂课，知道这个题材还进来的，我相信都是对小说真的有兴趣的。我自己也是个写小说的人，我是想从写小说的人这个角度去跟大家分享，为什么说有些苏联时期的小说是好小说，然后大家应该去看。我知道很多人在开始看小说的时候首先都会看自己语文的小说，在我们的情况是华文小说，然后也会知道有些外文小说是值得看的，也会去看翻译小说，除非能够直接去看某一种外文。大家也会慢慢听到说好像俄罗斯小说挺厉害的，没错，俄罗斯小说是挺厉害的。在很多人的印象中俄罗斯小说往往是指19世纪的俄文小说。但我今天这堂课

第一个想让大家记住的就是，其实俄文小说在20世纪也很厉害。20世纪里面有大概70年是苏联时期，所以苏联时期的小说也是非常值得去看的。我待会儿会引用很多材料，我也相信大家能听得进去，我希望其中有几句话是大家在一个半小时后还能记得的，那就是其实20世纪的俄文小说，包括苏联时期的一些小说，都是很值得好好去看的。

苏联时期离我们有点远了，有一些基本的关键词，我先说明一下。

今天的题目是《如何在苏联体制下写出好小说？》

“苏联是什么意思呢？”苏联一般来说是从1917年11月开始的。俄罗斯有个十月革命，俄罗斯历是10月，但西历是11月。在十月革命之后成立了苏俄，全称是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那个时候还不包括后来的乌克兰、白俄罗斯、外高加索的地方，真正的苏维埃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的建立是在1922年，但今天我将1917年一直到苏联1991年解体这个时期都称之为苏联时期。苏维埃可能大家也比较陌生，苏维埃简单说就是工人阶层选出来的议会，是这个政权的最高管治单位，管治着共和国，这个议会就叫苏维埃。其他比如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等等，我都不多解释了。

苏联时期里也有很多变化和分期的，为了方便之后说到的一些例子，大致上我这样划分：第一就是苏联的开创时期。就是大概从1917年到1927年或更晚后一点，其中头几年，就是十月革命之后的头几年，苏联境内是有内战的，大概是从1917年到1923年，内战双方，反对苏维埃的叫白军，支持苏维埃的叫红军。第二个时期就是斯大林时期。一般来说就是从1927年到1953年他死的那一年。其实斯大林在1922年已经做总书记了，但当时他上面还有威望很高的列宁，列宁1924年才死。到1927年的时候，斯大林在苏共党的十五大上把对手清掉了，变成了一个独夫，可以控制整个苏联，所以一般就开始叫这个时期为斯大林时期。斯大林死后赫鲁晓夫上台，有过几年实行集体领导，而到1956年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对斯大林做了一个大批判。从赫鲁晓夫在任的1956年开始大约到1964年他被解除职务下台，有一个稍微开放的时期，被叫做赫鲁晓夫“解冻时期”。解冻时期名称来自1954年苏联出版的一部小说《解冻》，代表解冻的最早作品是1956年在《莫斯科文学》这个刊物上刊登的小说《不单单是为了面包》。但是虽然叫做解冻时期，管控还是相当严的，1958年诺贝尔文学奖给了苏联作家帕斯捷尔纳克的《日瓦戈医生》，而当时苏联是很批判这部作品的，以致于帕斯捷尔纳克根本不敢去领奖。但是赫鲁晓夫时期实际还是比之前的所谓斯大林时期稍微好了一点。1962年的时候索尔仁尼琴这个作家有一本重要著作《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一天》，赫鲁晓夫是同意出版的。但同一时期，赫鲁晓夫也在骂艺术上的先锋派是狗屎。所以这个时期一方面说是有点宽松解冻，其实管控还是挺多的，但是比起后面的勃列日涅夫时期也还是好一点。1964年到1984年这个时期是勃列日涅夫等人领导的“停滞时期”。1984年戈尔巴乔夫上台了，他推行一种开放新思维，所以1985年到1991年的苏联就比赫鲁晓夫解冻时期更开放，以前许多出不了的作品都会在那几年出版，然后到1991年苏联就解体了。



总之1917年到1991年就统称做苏联时期。那什么叫苏联小说呢？前面解释过苏联时期，那个时期苏联的国土比今天的俄罗斯国土更大，有很多民族，这些民族有的是拥有他们自己的语文的，而且也有以他们自己的语文创作小说的，比如苏联境内犹太人在20年代用意第绪语写的小说。苏联在早期鼓励各民族使用他们自己的语文，后来才转向俄罗斯化。本来这个时期苏境内所有语文的小说，都应该叫苏联小说，只是因为能力所限我这次只着重在俄文小说。

但是什么叫好小说呢？每个地方都有它的体制跟意识形态。意识形态这个词我也不多解释了。当时在苏联官方的眼中，他们的体制下，他们的好小说，是有自己一套标准的，一方面有官方的审查，另外也有官方的奖励，比如说他们最高的奖是斯大林奖。他们的

作家如果写得比较出色的，会被邀请加入他们的作家协会。苏联作协 1932 年成立的时候只有 1500 人。其中 300 人是投票会员。到 1991 年苏联解体前一两年，这个作家协会的成员有 1 万人，其中有 300 人过的是跟高官一样好生活，其他会员大概都可以过着中等官员一样不错的生活。作家成了作协会员，受国家资养，在苏联是能享有比较好的生活的。俄罗斯本身从 19 世纪开始小说地位是很高的，还有斯大林这个苏联最高领导人，他自己是看小说的。所以有的小说家，会因为他受贬斥甚至枪毙，有的则因为为他而保住性命，甚至享受到荣华富贵。斯大林是真的会在小说上写划批注的，不但会看小说出版的单行本，甚至在文学刊物上登的小说他也会去看，所以大家可以理解在当时的苏联写小说是多么受重视的一个事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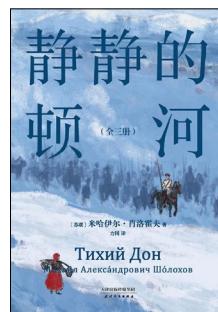
大致上 19 世纪以来俄文小说的传统和主流都是现实主义的。但这个现实主义从 20 世纪 20 年代开始，已经开始有些特别的框框了。比如高尔基这位德高望重的作家，就会劝一些年轻的作家，说你们不要写得太自然主义。什么叫自然主义呢，在当时苏联语境就是写得太真实，写了不该写的现实。到了 1930 年代初苏共中央确定了一个指导原则，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来创作，不光是小说，其他的艺术也要这样，要在这个原则下创作。现实主义加了个社会主义在前面，就是要表扬社会主义，歌颂革命等等以正向配合政府的政策，所以很多人说这不是现实主义。这是一种浪漫主义，革命浪漫主义，或是社会主义浪漫主义。这些词也就是这样来的。

二战后那个时候苏联的阵营跟以美国带头的阵营是处于冷战状态的。当时的世界除了这两个阵营之外，还有其它的没有那么结盟的国家。但这两个阵营的力量都很大，他们是互相在斗法的，虽然斗而不破。很多苏联官方认为是好的小说，在外面另外一边的世界，可能并不认同。外面那个世界，非苏联的世界，是美国和西欧国家带头的世界，他们又有自己的一种标准。这个标准虽然是比较的多样化，而且没有严格的界定，经常也有很多争议，但实际上还是形成了一种跨国的标准，存在一个所谓“世界文人共和国”，一个松散的“全球文学空间”。他们有自己的一些共识，也有自己的鄙视链。他们将某些小说经典化了（经典化的英文是 canonize，经典是 canon），就是把某些小说确认为是好小说，这些小说可以传世，传下去流转让更多的人看到。暂时我把这个称之为全球文学空间的标准。经由他们松散的共识，判断认可的好小说，跟苏联官方的认同是不一样的。我现在在这里说的所谓好小说，是比较接近这个全球文学空间经典化出来的一些小说，这既是我自己的选择，也是在苏联解体之后，更加普遍的一个标准。有些小说虽然早年没有得到完全的共识，但是慢慢地会被认为是经典，在今天的演讲里我列举的好小说也会包括这些比较新近的经典。回头看写出这些小说的作家，我们发觉虽然有例外，但绝大部分都付出了极大的个人代价，这些小说的出版也都有过很大的波折。但即使这样也并不等于说，只要苏联官方不喜欢的就是好小说，不是这样的，就算一个作家受到再多磨难，也不一定能写出好小说，最后还是需要作家个人有才华，才能完成好的小说。但这些官方不一定认同的好小说在苏联时期是存在的。我在最后的部分还会重复谈到这一点，而且会探讨有没有可能在某种官方也同意的情况下，写出以全球文学空间的标准也认可的好小说，有没有两种标准重叠的可能。

我知道我很多朋友都会说，苏联时期怎么说都不能跟 19 世纪比较，哪怕包括那些当时不见得受官方喜欢的作家和作品。的确，19 世纪的俄罗斯作家是非常优秀的，从普希金开始到果戈里、莱蒙托夫、屠格涅夫、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契诃夫等等。有一位我非常尊敬的前辈蓝英年先生，他是俄文小说的翻译大家，我很敬佩他。2014 年蓝先生在一个访谈中这样说：“我把俄罗斯文学与苏联文学分开，俄罗斯文学作品与世界各国名著相比绝不逊色，苏联文学是遵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的，主要是歌颂现实，歌颂苏维埃政权，歌颂斯大林，当然他们还有些好书，受到批判，无法出版。”蓝先生的看法也是很多上一辈华文读者都有的看法。但我现在想在这里做一点补充一点修正，就是苏联时期受批判受打压的小说数目很多，里面有很多很优秀的好小说，都是属于苏联时期的创作，有些在苏联体制内出版过，更多要到苏联晚期或解体后才出版。可以说这些小说之所以有这样的成就，是因为他们面对的正是苏联的现实，而苏联的现实成就了这些小说的内容。苏联小说在 20 世纪占了 70 年时间，加上苏联之前之后另外的 30 年，整个 20 世纪的俄文小说其实成就是非常高的。上世纪七十年代，西方一些文学名人曾以讥笑苏联体制下没有好小说为乐，这一方面是他们一厢情愿的妄语，另方面也是因为苏联的好小说当时在境内被禁，尚没为外人知。其实以苏联小说为主的 20 世纪俄文小说跟世界任何一国同期小说比较一点都不逊色。这也是我今天要强调的另外一个点，希望大家记得，就是根据以上的界定，苏联时期也曾经有过不少非常好的俄文小说。关于这点以下我会列举八个作家，来说明苏联小说有哪些优秀的作品，

这其中三个是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其实好作家远远不止这八个。

第一个就是大家熟知的帕斯捷尔纳克，他本身是个诗人，也是个翻译家。他的小说《日瓦戈医生》被偷偷带出苏联，1957 年在意大利出版，58 年就拿到诺贝尔奖。然后受到全苏作家、文化界人的攻击和政府的叛国指控，所以他不敢也不能去领奖，1960 年就过世了。帕斯捷尔纳克出席时数以千计的莫斯科市民自发为他送葬。如果大家没有看过这本书，可能也知道《日瓦戈医生》同名的电影，是英国导演大卫·里恩的电影，大家可以去看一看。



第二个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是肖洛霍夫，作品是《静静的顿河》。这部小说在 1958 年《日瓦戈医生》获诺奖之后的 1965 年就得奖了，不过这个奖在当年是引起过很大争议的。当年参加那次诺贝尔文学奖竞逐的有什么人呢？有纳博科夫、博尔赫斯、毛姆、E.M. 福斯特、安德烈·马尔罗、三岛由纪夫、奥登、庞德、贝克特、川端康成。这些作家里只有后面的三位在 1965 年之后陆续得了诺奖，前面那些作家终生没拿到过诺奖。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是他 1928 年发表的一部旧作，而在帕斯捷尔纳克得奖的时候，肖洛霍夫参加过批判帕斯捷尔纳克，也骂过诺奖，现在才几年后就把奖发给了他。当然肖洛霍夫得奖，全苏联都支持庆祝，非常高兴。所以全球很多人反而觉得诺奖是不是有问题啊，为什么不给其他人而反要给肖洛霍夫的一个旧作品，而这个人前几年刚骂过诺奖。帕斯捷尔纳克得奖当时苏联外交人员也曾公开表示你们不要把这个奖给这个帕斯捷尔纳克，应该给肖洛霍夫。是不是诺奖想将功赎罪、讨好苏联？多年后瑞典学院的档案公开，看到原来那一年是全部委员一致通过地把文学奖给肖洛霍夫的，不见得有明显的外在的指引给他们这样做。不过当时公开的档案中还看到另外一个信息，就是那年的奖本来在肖洛霍夫之外还要同时给另外一个苏联作家就是女诗人阿赫玛托娃的。阿赫玛托娃是苏联当局很不待见的一个诗人，苏联主管意识形态的国家领导人日丹诺夫在 40 年代曾发动全力批阿赫玛托娃，斥骂她是半个尼姑半个荡妇。阿赫玛托娃的丈夫当年是白银时代的领军诗人古米廖夫，后来被枪决了，他们的独子受牵连在 30 年代两度坐牢，阿赫玛托娃为此写下了《安魂曲》这样一部至今仍举世知名的叙事长诗，但这个作品直到她 1966 年死后二十多年才得以在苏联发表。那届诺贝尔奖委员会最终还是决定把这个奖不给阿赫玛托娃了，只给肖洛霍夫，所以是肖洛霍夫一个人拿奖，苏联官方不喜欢的作家这次就没有奖了。诺奖宣布得主后马上又发生一个争议事件，一些作家包括索尔仁尼琴，他们指责肖洛霍夫的这本得奖小说是抄袭剽窃的，这是《静静的顿河》最早在 1928 年第一卷出版的时候就有的非议。当时有一位母亲站出来，说这个手稿是她那内战时期失踪的儿子写的，不是肖洛霍夫的创作，她儿子才是原创者。有些编辑过肖洛霍夫之前著作的人也说，肖洛霍夫之前的作品很平庸，怎么一下子写得这么好？但怎么说都没法确实鉴定这小说是不是肖洛霍夫写的。《静静的顿河》在 1928 年出版后是大卖的，在德国的翻译版销路都超过了雷马克的《西线无战事》。前三卷当时就陆续出版了，而第 4 卷却要到 1940 年才写成出版。肖洛霍夫这部书能经过相当残酷的 30 年代的大清洗而留在苏联完整出版，可以说是很例外的。他自己也有功劳，就是在 1930 年的时候，他得到了斯大林召见，被当面质问为什么他要这样写，而他为自己的写法做了辩护。肖洛霍夫这个小说并不完全是以苏共倡导的社会主义现实手法写的。他写的是顿河地区的哥萨克人长河历史，写到后面顿河的哥萨克人是抵抗苏军红军的。所以或许这本书确实是更早写成的，是那个母亲所说的失踪的儿子在内战前写的，当时苏维埃的开创期还有相对更宽松些的环境，可以写这样的不符合后来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小说。肖洛霍夫他能有机会在斯大林面前为自己的小说辩护，据说表现坚定，最后斯大林也接受了他的自辩，不光是允许了这小说继续出版，留在书店书架上，还让他进入体制加入了苏联作协，从此他变成了体制内被追捧的作家，所以才在

《日瓦戈医生》得奖的时候，他也要跳出来骂诺奖。但是他是不是一个完全不能写的作家呢？他后来写过一些可以的作品，比如《一个人的遭遇》，是在 1956 年写的，那是一本抵抗纳粹的苏联卫国战争的小说，所以也说不准之前《静静的顿河》小说确是他写的。

第三个得诺奖的苏联作家是索尔仁尼琴。大家可能都知道他，因为他是西方最出名的异议分子”。他在斯大林的劳改营古拉格里面度过八年，到赫鲁晓夫时期的 1956 年把他放出来后才出版了他的第一本和第二本小说。但第二本小说《癌症病房》一出版就被禁了，后来在苏联以外重新发表。1968 年他在境外出版了《第一圈》这本小说，1970 年获诺贝尔文学奖。索尔仁尼琴 1973 年还写了一部非虚构作品《古拉格群岛》，完全在苏联地下流传，然后 1974 年苏联政府就剥夺了他的公民身份，把他赶走了，直到苏联解体前两年才允许他回苏联。这些大家都熟悉。

还有两个在苏联时期拿到诺贝尔文学奖的俄文作家我没提，一个是普宁，伊凡·普宁，他在十月革命后不久，1920 年就流亡到海外了，1933 年得诺奖，很多创作是在苏联境外写的，所以我不把它算做苏联小说家。另外一个是著名的诗人和文章家布罗茨基，他是 1972 年离开苏联的，1987 年得到诺奖。因为他不是以小说著称，所以我也没有把他归到这次列举的苏联小说家里面。

我这里继续特别要谈到苏联时期的两个奇才作家。一个是伊萨克·巴别尔，他的《红色骑兵军》又叫《骑兵军》是 1923 年写的，写的是刚结束不久的苏联跟波兰战争中一次大规模惨烈的骑兵会战，在苏联出了单行本，非常受欢迎但被攻击，还好文学界大佬高尔基帮他说话。巴别尔有一句自辩的名言是：作家是有权写坏作品的。他的作品也曾受到博尔赫斯、海明威、卡尔维诺和约翰·厄普代克的激赏。但他在 1939 年苏联大清洗时受指控为间谍，1940 年被枪毙了。他的出生地是现在大家所熟知的敖德萨，是属于乌克兰在黑海的一个港口城市。这个敖德萨在历史上也是非常有名的。1905 年当时沙俄的黑海舰队装甲舰波将金号在敖德萨叛变，声援罢工的工人，开启了沙俄的末路。1925 年著名导演爱森斯坦为此拍过一个电影，就叫《波将金战舰》，是一部经典影片，蒙太奇手法就是从那部片开始的。另外敖德萨也是现代犹太文学的发源地，出了很多犹太文学家。巴别尔也是犹太族作家。苏联时期有所谓敖德萨派作家群，有很多犹太族作家在里面。



《波将金战舰》电影海报

另外一个奇才就是尤金·扎米亚京。他是个造船的工程师，十月革命后没多久，他就写出一本叫做《我们》这样的科幻小说，苏联当局认为不能发表，是拿到国外发表的，发表后当局就把他给禁了，还把他赶出国，他在相当贫穷的情况下在法国去世。有人说《我们》是苏联开始禁书的第一本。扎米亚京这本小说的苏联版本一直要到戈尔巴乔夫时期的 1988 年才得以出版。大家可能知道这本小说，它被认为是反乌托邦小说三经典中的第一本，完成于 1921 年。第二本是 1932 年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第三本是 1949 年奥威尔的《1984》。奥威尔说过他是受到《我们》这本书的影响的，还说《美丽新世界》的作者赫胥黎也是受这本书影响，但赫胥黎说，其实他 1932 年写《美丽新世界》的时候，没有看过这本书。这是公认的三本反乌托邦小说的经典，而扎米亚京是反乌托邦这种科幻小说类型的先驱。

还有三个小说家他们可能是更晚近一些才被大家认识到其作品的经典性。首先是布尔加科夫。布尔加科夫 1891 年在乌克兰的基辅出生，1923 年写了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白卫军》，写的是十月革命后 1918 年乌克兰基辅的争夺战。当时参加争夺的是什么人呢？有沙俄的白军、德国人波兰人、苏维埃的红军和乌克兰的民族军，他们几方都在争夺基辅，就好像各种军阀都在争夺府城一样。书中的主人公图尔宾一家人，他们是生活富裕的俄族中产阶级，是倾向于白军的，同时有点反犹、反乌克兰独立、反红军的倾向。所以这个小说就算在苏联早期那个时期，也只是报刊连载了几期就被停掉了，最后还是当年流落在巴黎的那些白俄逃亡分子帮它全文出版，而它的一个简化的删掉了很多内容的版本要到赫鲁晓夫解冻晚期才能在苏联出版。但最奇妙的是，布尔加科夫在写小说的同时也写了同一题材的话剧剧本《图尔宾一家》，却一直都能在苏联上演，据说是由于这个话剧大获成功，自己至少看了 15 次，也有报道说看了 20 次，而斯大林在 1930 年还亲自与布尔加科夫通过电话。但是尽管如此，布尔加科夫之后写的很多精彩的小说，都不能通过审查出版，比如《狗心》，还有最重要的一本是他从 1928 年开始写的《大师与玛格丽特》。他写完以后，自己又把手稿烧掉了，后来想想又重新写。这本书在所有的 20 世纪伟大小说书单上大概都会出现，差不多是现象级的，很多影音媒体都想要改编这本小说但都没有很成功。很多流行歌手都以其中的情节作曲演唱，膜拜的人特别多。现在莫斯科他的旧居原址，成立了两个竞争性的布尔加科夫博物馆，而且还有布尔加科夫式莫斯科一日游。我自己在欧洲的时候碰到一些德国朋友，他们说他们 70 年代还年轻的时候，最爱看的就是《大师与玛格丽特》。前一阵子我在推特上看到，有人说他认识一个俄罗斯的年轻人被征兵了，他随身只带了《大师与玛格丽特》这本书就出发了。这是一本到今天还有很多人很着迷的小说。



第二个作家就是格罗斯曼。格罗斯曼是个犹太人，1905 年出生在乌克兰北边别尔基切夫这个城市。这是一座历史名城，另一个大作家就是《黑暗的心》的约瑟夫·康拉德也出生在这里。二战时纳粹德军控制这个乌克兰城市的时期，屠杀了当地 2 万多犹太居民，包括格罗斯曼的妈妈。格罗斯曼自己是一个是非常出色的苏联军事报纸的记者，他差不多是第一个报道纳粹在波兰和乌克兰的种族灭绝集中营的，他收集的大量资料后来都成了纽伦堡大审判的证据和材料。二战后苏联当局不准他发表屠杀犹太人和他所做的乌克兰大饥荒的记录，不让谈论这些犯禁议题，所以他只能秘密的去把这一切改写成小说，这就是在 1959 年已经完成的《生活与命运》这部著名的长篇历史小说。这本小说以一个家庭在斯大林格勒的战争期间的经历，串联起很多人物和事件，尽现历史创痛和现实积弊碾压之下人的艰难，也有批评当时苏联军队的领导。当年在苏联这本书还没有出版，就有克格勃去格罗斯曼家把所有书稿与相关的一切都抄走，虽然那时还是在赫鲁晓夫解冻时期，出版也这么艰难。他写信给赫鲁晓夫也没用，因为赫鲁晓夫其实很讨厌他。但是幸好他把两份手稿分别藏在两个朋友家，其中一个一个是作家朋友，后来用微缩胶片把整个小说翻拍偷送出国，1980 年终于在瑞士出版俄文版，之后英、法、德文版也相继出版，在欧美引起轰动，而直到 1988 年《生活与命运》才得以在苏联刊载出版。这本书出版后，纽约时报评论说这是 20 世纪以来最令人印象深刻的小说。更重要的是苏联国内很多人评论说，我们的卫国战争这么伟大，我们一直在等一部卫国战争的《战争与和平》，我们终于等到了《生活与命运》，这是 20 世纪的《战争与和平》，一本非常重要的书。但格罗斯曼看不到，他 1964 年就死掉了。这本书的大陆简体版的长序是梁文道写的。格罗斯曼生前最后一本书是《一切都在流动》，也是一本我自己很喜欢也很受启发的小说。

最后第八个作家是普拉东诺夫。普拉东诺夫是谁，大家好像不大听说过。前面谈到的得过诺奖的作家布罗茨基曾说过，他心目中 20 世纪最重要的六位作家是普鲁斯特、卡

夫卡、福克纳、贝克特、奥地利作家穆齐尔，而其中第六个作家就是普拉东诺夫。另外有一个出名的评论家齐泽克也推崇普拉东诺夫，认为二十世纪就三个伟大的小说家或者说作家，一个是贝克特。一个是卡夫卡，还有一个就是普拉东诺夫。他们是不是有点过誉就不说了，但是很多人都知道，前面提到的作家都是 20 世纪早就被经典化了的，只有这个普拉东诺夫仍不大为人所知。其实在之前我们定义过的全球文学空间里面，有些人已经把他归类为 20 世纪最重要的作家之一了。普拉东诺夫 1899 年出生在一个铁路工人家庭，1917 年十月革命时他刚刚成年，是个很希望投身革命拥抱革命的青年，他想通过写小说来帮助这场大革命，但是他的大部分作品其实生前都不能通过出版审查。他年轻时曾写过一篇小说发表在文学刊物上被斯大林看到，斯大林在旁边写上了“渣”两个字，还叫后来的作协主席法捷耶夫要好好地鞭打他。他的重要的小说《基坑》是 1929 年完成的，要到戈尔巴乔夫苏联最后的时间才出版。1933 年写的《幸福的莫斯科娃》也是 1991 年才出版。那他怎么办呢，写的东西都发表不了，不过当时还有些朋友是非常欣赏他的，比如高尔基就想帮他一下。作协每年都要组织作家出去采风的，有一年组织了一百多个作家去土库曼斯坦，高尔基就把他的名字加进去了。采风回来他也像大家一样写了一篇歌功颂德的作品，然后也被编进了官方合集，所以也算是终于有所发表了，但是第二年他自己又自费去了土库曼斯坦考察，回来后在 1935 年完成了一部很灰暗的小说《灵魂》或《心灵》，英文翻译成 Soul，这本小说要到 1999 年才完整出版。卫国战争时期，格罗斯曼推荐他去做战地记者，写了一些报道，战后他也创作了一些短篇小说、剧本以及儿童文学作品，却因为 46 年在刊物发表的一个讲述战争给家庭带来的灾难和创伤的短篇小说《回归》而被当局认定是污蔑苏联人民和家庭的毒草，受到批判，儿子因替他鸣不平被抓去坐牢得肺病而死，而他自己因为陪伴儿子也染上肺病，几年后也死了。他的葬礼上，格罗斯曼当时是致悼词者。普拉东诺夫小说的“苏联性”是最强的，他很想对革命有贡献，然后他也愿意用他心目中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手法去写作，但是他写出来的东西就是不能通过官方的法眼，就是和官方的调子不一样，所以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例子。这位作家并不是要反对苏联，其实他是苏联现实下产生的作家，并不是对抗性的或想排除苏联性的。我们可以说布尔加科夫可能有点不同，他的青年时期是在革命前，他可能有白俄思想，对苏联有怀疑，他在乌克兰基辅生长，看到自己所属的俄族中产阶级生活好好的，后来被搞乱了。但是普拉东诺夫并不是这样，他真的是革命的儿子，他真的想为革命写出好小说，但是恰恰因为他要写出真的好小说，他的小说就不能发表，而且一生都非常悲惨。

上面我列举的八位是苏联时期曾经写出过非常好的俄文小说的作家。如果我推前一下到苏联时期开始之前的 20 世纪初，即 1900—1920 年，就还有个被称作白银时代的时期，那是一个俄罗斯诗歌特别厉害的文学高光时刻，出现了伟棠特别熟悉的曼德尔施塔姆、吉皮乌斯、阿赫玛托娃、茨维塔耶娃等诗人。那也是他们脱离了现实主义，想用现代主义包括象征主义写作的时候。诗歌之外，当时就有安德烈·别雷的象征主义小说《彼得堡》的出版。《彼得堡》被纳博科夫认为是二十世纪最重要的俄罗斯小说，是可以跟世界其他三大作家乔伊斯的《尤里西斯》、卡夫卡的《变形记》和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相提并论媲美的。

苏联在开创期那个阶段，其实还有别的一些应该提到的现代主义小说，比如皮利尼亞克 1922 年的《裸年》，也叫《荒年》，尤里·阿廖沙 1927 年的《羡慕》，加上巴比尔独特的《红色骑兵军》，这些小说都是出现在苏联相对宽松、不同风格还被容许的开创期。那段时间除了现实主义创作之外，还有苏维埃的前卫派、先锋派、无产阶级文化派的作品出现，也有个叫列夫派或拉普派，里面包括著名的诗人马雅可夫斯基，导演爱森斯坦。这些跟欧洲同时期的先锋主义是有很多关系的，对当时欧洲的未来主义，构成主义都有吸纳，帕斯捷尔纳克也是他们其中的一员。值得一提的是拉普派的一个大将特列季亚科夫，他对当时先锋电影和剧场都有重要参与，1924 年他正好在北京写作，当年长江上游四川的万县发生了一件大事，当地一个码头工人跟外国商人发生争执的时候，外国人死了，英国就派了军舰威胁要炮轰万县。特列季亚科夫为此写了《怒吼吧中国》这个剧本。没想到两年后另一次华洋冲突，英国军舰真的炮轰万县，造成很多无辜的华人死亡。《怒吼吧中国》这部剧可以说是名副其实的“全球剧场”，因为除了在莫斯科演出外，也去了美国百老汇演出，是百老汇第一部背景是中国，而且大多是亚裔的演员出演剧中华人的作品。这部剧全世界到处都曾公演过，上海 1933 年在租界也演过。台湾作家杨逵也改编过，堪称是世界级的舞台剧。但是特列季亚科夫在 1937 年被斯大林枪毙了。现在中国很多人还会知道这出剧，可能是因为中国老一辈木刻大家李桦，他在 1935 年用

同样的名字《怒吼吧中国》做了一个广为流传的木刻创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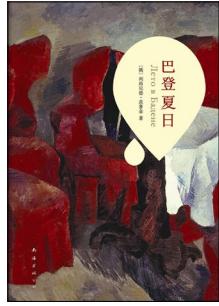
苏联先锋主义到斯大林时期受到“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教条逐步扼杀。1934 年一个叫日丹诺夫的人在升任苏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做了文化的头，主管意识形态，他是斯大林的得力助手，在建立斯大林模式的文化体制过程中，推动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也叫日丹诺夫主义确定为官方的立场。这个时间出现的文艺作品必须是官方认同的，管得非常严，必须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所要求的东西。我的很多在大陆的同龄朋友，看的苏联时期的小说，其实都是这个情况下出来的。但苏联当局会追溯到把高尔基 1906 年的《母亲》也算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风格。其他国人最熟悉的就是《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青年近卫军》这些。卫国战争抵抗纳粹是非常主流的重大题材，很多作家写过，包括中国这边特别知道的《卓雅与舒拉的故事》《这里的黎明静悄悄》。别的类型还有当时得过斯大林奖，也风靡中国大学校园的小说《大学生》。在中国 1949 年后一面倒向苏联到六十年代初中苏交恶前这段时期，中国人看了很多苏联官方认可出版的主流小说。《大学生》的作者叫特里丰诺夫。他自己后来说过，《大学生》这本书是他自己以后都不会重看的书，他后悔写过这样的书。60 年代中苏交恶之后就不能再公开推崇这些苏联小说了。不过文革年代还有很多“皮书”出版，皮书就是白皮书黄皮书蓝皮书黑皮书，是供内部参考的非公开发行的出版物，里面翻译了很多当时的苏联小说，比如伊凡·沙米亚金的《多雪的冬天》之类的，比如《人世间》《你到底要什么》，连索尔仁尼琴的《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也在皮书里出版过。因为说是给内部做参考用，所以也会把一些西方的、认为不好的小说翻译出来，比如《麦田的守望者》《局外人》《在路上》这些小说，翻译给内部做批判阅读。



苏联时期还有一些名词需要再解释一下，比如 1936 年到 1938 年的大清洗。跟大清洗经常连在一起的就是西伯利亚，流放，还有他们的劳改营，叫古拉格。当时还有一些在境外被分别归类的文学作品与作家，不同意官方立场的文学叫异议文学，还有很多只能在地下流传的文学，叫地下文学。你们看英文文献的时候，经常看到一个词叫 samizdat，就是地下文学。另外还有一类叫流亡文学，就是作家离开国境后在外面写的作品，比如瓦西里·阿克肖诺夫的《克里米亚岛》，流亡文学我就不多说了。但是另外还有一类是回归作家。回归作家很多是先流亡出去后又返回苏联，包括一些在白银时代就出名的作家，譬如被布罗茨基赞誉为 20 世纪最伟大的俄罗斯诗人的茨维塔耶娃。他们有的回来后过得比较好，比如高尔基，比如亚历克赛·托尔斯泰、瓦连京·卡达耶夫，但是也有些很惨，比如茨维塔耶娃。茨维塔耶娃在国外本来已经很好，没有停止创作，认识了国外文化圈所有名人，但是她 1939 年决定返回苏联，回来之后的遭遇特别惨，诗集得不到出版，无以为生，丈夫被枪毙，女儿坐牢自杀，儿子送上战场战死，她自己被流放到流放地之后自杀，很悲惨的收场。另外再稍微讲一下后苏联小说和离散小说，后苏联小说就是 91 年苏联解体之后继续写前苏联的小说，特别多出色女性作家在这时候出现。在全球出名的俄文女性作家出现得比较多的时期，一个是白银时代，一个就是这个后苏联时期。离散小说不属于苏联小说，作者曾经是苏联人，移民去到境外的地方，很多改用当地语言来写作，比如阿西莫夫、纳博科夫、安·兰德都是选用英语写作的，不用俄文写作，人也不在苏联境内，都不算在今天所说的苏联小说这个话题范围内，这个有必要跟大家解释一下。

然后有两类作家我要特别再提一下。一个是女性作家，有一个叫苔菲的女作家，本来在十月革命前的白银时代就已经非常非常红的了，她也欢迎革命，但后来 1920 年她觉察不对，就流亡海外了。她一直有写作，有大量作品也在外面出版了。在戈尔巴乔夫最后几年，也就是苏联的最后几年，她的书又能在苏联出版了，兴起了一阵苔菲热，就是说在苏联 1920 年前有个苔菲热，到 1988 年后又有一个苔菲热。这个情况有点像我们华文作家张爱玲的情况。苔菲与张爱玲在故地分两段受追捧的情况很接近。

另外苏联时期最重要的回忆录，就是把自己经历写出来的这种非虚构书写，其中有两本是女性作家写的，非常具震撼力。一个是叶夫根尼娅·索罗莫诺夫娜·金茨堡的《旋风中央》，国内译作《陡峭的征途》。金茨堡在苏联最东北角的一个叫马卡丹的地方劳改和流放 18 年，流放回来后她写了这个回忆录。她和第一任丈夫有个仅存的儿子就是苏联晚期走红的作家瓦西里·巴甫洛维奇·阿克肖诺夫，母亲被流放母子曾分开十几年。然后另一个女性作家克斯诺夫斯卡娅，写了一本传记《人值多少钱？》是她被劳改 12 年时期的作品。她不光在流放期写了回忆录，还在纸上画了 600 幅画，记录当时的情况，她的画现在网上还能看得到。这两个苏联时期的女性作家的传记很重要。至于前面提到的白银时代也多产出色的女诗人，如阿赫玛托娃，但因为最重要的作品是诗作，所以我都没把她们归入这次的苏联小说家之列。苏联时期当然有官方认可的女作家，但很少有被外界推崇的作品。苏联解体以后，却马上出现很多出色的女性小说家，比如《美狄亚和她的孩子们》的作者柳德米拉·乌利茨卡娅，《野猫精》的作者塔季扬娜·托尔斯泰娅，《祖列依哈睁开了眼睛》的作者古泽尔·雅希纳等等。这也是后苏联时期小说创作的一个现象。



刚才在前面罗列了好多苏联时期的小说家都是犹太族作家，有一批是出自敖德萨的。犹太苏联小说家的其中一个有代表性的晚期例子就是茨普金，茨普金写了一部小说《巴登夏日》，1977 动笔，80 年完成的，那时是勃列日涅夫的停滞时期，也是苏联反犹太主义的高峰时间，所以他虽然写完了这部小说也不能公开拿出来发表，是典型的“抽屉文学”。《巴登夏日》要到 82 年茨普金死前一周，才在海外的一个反苏联杂志上发表，到 2001 年才整理翻译成英文正式出版，纽约知识分子苏珊·桑塔格写了非常详细的前言，而且重新肯定了茨普金的文学地位。

我们今天的讲题是“如何在苏联体制下写出好小说”，那么这些苏联时期的作家要怎么写作的呢？他可能要想尽办法用各种写作策略去写。首先因为有审查制度，官方认同才能发表，然后官方有确定的主旋律你要清楚，而就算你不是写主旋律题材，也还要当时的读者叫好买账，这才是写作的主流。得到官方认可兼成为主流，很多作家都是在这个范围里写作。也有少数非常独立的个别作家，他们用主流以外的方法，我只能叫他们是另类了，刚刚提到的作家很多都是另类的。另类写作的作家有时候也想要作品能够出版，但要看时间点、看方法、看运气。有时他们会利用各种有利的小说类型和出版时机以便过审。举雷巴科夫的例子，他本来是写儿童书的，但是到了赫鲁晓夫的 60 年代，他觉得出版放松一点了，就以现实主义手法写了一本《阿尔巴特街的儿女》，这本小说写的是 30 年代斯大林的大清洗那个时期在莫斯科的一些青年群体，资讯量非常大。苏联小说里最普遍的写作手法还是现实主义，现实主义小说的好处就是认知功能非常的强，雷巴科夫他这个小说就对看待当时 30 年代的情况很有价值，但是到他的小说在 66 年都宣布要出版的时候，又被告知不能发表了。赫鲁晓夫时期永远是这样的开一点又关一点。直到苏联末期，这本小说才能在苏联出版。

一些写严肃小说的作家，到苏联后期当地艺术界早已推崇概念艺术的时期，也会受到境外后现代文学潮流的影响，比如萨沙·索科洛夫 1992 年的《愚人学校》。这小说是要到 92 年苏联刚刚解体后才出版，但也可以归到苏联时期作品这一块。

另外一种写作出路是寄情于通俗类型文学，比如科幻小说。科幻文学在苏联其实是一种非常流行的文体，有人说苏联才是俄文科幻小说的黄金时代，那里面特别多写硬核科学的硬科幻小说，也有很多是写不久的未来，就是关于即将来到的共产主义理想社会这样的乌托邦小说。这两种进路的科幻小说是能出版的，所以当时科幻小说非常多。但是也有写科幻小说出事的，比如科尔扎诺夫斯基的《未来记忆》，这本小说是 1920 年代写的，其实他写的时候是苏维埃开创期，是文学艺术管控比较松散、创作比较多样



化的时候。那位小说作家书写什么呢？他写有人发明了一部时光机器，可以回到过去，所以大家都想抢着回去，回到哪个过去呢，回到十月革命之前。他们说要去银行把钱提出来，要跟家人逃到国外，所以都想要回去。结果当然就不行了，小说马上就变成禁书了。另外很多人是写志怪，即推想小说的写法，比如布尔加科夫的《狗心》《大师与玛格丽特》。《大师与玛格丽特》里面有撒旦，撒旦带着他的伙伴，搭伴大闹莫斯科，耍弄作协官员把他们搞惨。这样的志怪推想小说，往往也过不了关。

另一组写作类型是历史小说、传记小说、战争小说，尤其是战争小说。刚才说了卫国战争出了一大批既被官方认同，又被读者叫好的小说。但是战争小说也是会给作者带来麻烦的，就像格罗斯曼的《生活与命运》这种。格罗斯曼的书很真实地把各方面犯的错误都写出来，那就不行了，所以格罗斯曼《生活与命运》在他生前也出版不了。

比较安全的是儿童文学，当时很多的作家写儿童文学。在苏联时期还有很多人写间谍小说。但间谍小说很难出好小说，因为都要预设立场。还有昙花一现的青春小说。苏联中后期才崛起的年轻作家瓦西里·巴甫洛维奇·阿克肖诺夫，他的母亲就是前面说过的叶夫根尼娅·金茨堡，他在 1961 年趁解冻窗口出了一本小说《带星星的火车票》，就是像美国的《在路上》这种苏版青春反叛小说。这小说在中国也被曾列入内部发行的黄皮书翻译出版，当时有些年轻人通过地下流传看得十分着迷。阿克肖诺夫后来也被赶出国了，出国以后就开始写流亡小说，包括前面我本来想介绍的 1981 年写的《克里米亚岛》，但是他在苏联境内的时候是写过这种青春小说的，而且非常流行。

前面也说过，10 月革命后开创期的时候，苏维埃政府是鼓励地方发扬各地的文化的，所以之前是有各种地方民俗、语文小说的，后来一百八十度改变成反地方主义。另外开创期也允许一些浪漫的异国风情小说，比如亚历山大·格林 1923 年发表的《红帆》，1928 年的《踏浪的女人》，后来都不被容许了，到 30 年代就更很难出版这类小说了。

苏联时期作家为了通过审查、发表作品，尝试各种写作策略、方法和类型，上面稍为涉及到了。其实我更想做一个推测，就是如果苏联没有在 1991 年轰然解体，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改革得以延续下去，比如说再延续 30 年，通过石油贸易等等，苏联的社会经济生活大大改善了，那个时候一定会出现很多不一样的苏联小说的，我现在只能把我推测会出现的这种小说称为未竟的苏联小说，未竟就是没有实现的意思。打个比喻大家想象一下，本来有一个铁屋，铁屋里面有头大象和人们挤在一起，然后铁屋里首先搞了一点改革，四面打了几个窗子，人们可以看多到一些外面了，铁屋的实际空间还没有变大，但人们意识的空间扩大了。跟着，铁屋真的扩大了空间，这头大象还在，就是人们感觉上它变小了，就是说审查制度等等都在，但是话题放宽了，创作空间也多了。如果用岁月静好来形容这样的情形的话，有很多不同的小说是会出现的，比如说会有伤痕文学，会有跟西方同步的先锋小说、魔幻现实、后现代小说，也会有历史的戏说，有网上的各种剑仙神怪穿越、霸道总裁、职场浪漫等各种爽小说，另外更可以有很美很文艺的鸳鸯蝴蝶小说。空间这么多，作家可以闪躲着不碰大象，在大象身体占据的空间之外写自己的小说变成有可为。这样的扩大空间可能会出现一些不一样的小说，不光是官方允许出版，官方喜不喜欢都起码可以出版，有主流读者喜欢的，甚至也有另类读者追捧的。同时在全球文学空间里面，也会有评论人觉得这些小说好，成为全球文学空间认定的好小说，以至可能跟苏联官方评价上出现重叠也说不定，就是说有些官方容许出版甚至赞赏的小说也会在境外受到好评。总之条件就是空间大了，大象相对小了。想想看，如果苏联能在戈尔巴乔夫新思维的改革开放下再延续 30 年，解决了所谓短缺经济让苏联富裕起来，做艺术、文学的钱就多了很多，连新巴洛克这种类型都可以出现。巴洛克当年就是罗马教会为了反对新教的宗教改革，想吸引信徒，所以叫艺术家在绘画、建筑、剧场用很豪华耀眼包装来吸引受众，包括用掩眼法、特技、视觉的幻觉来吸引一般人回归到罗马教会，这是 17 世纪巴洛克艺术的官方出发点，当初罗马教会“反宗教改革”想做的事。那时拉丁欧洲几个民族国家刚刚成形，也都分别想用这种豪华耀眼包装的手法，把自己

关于国家建构的故事宣扬出去。如果苏联后来经济能持续好转，更多人先富起来，国家有钱投文化了，这样的巴洛克包装的艺术和小说都会出现。我们也记得当时苏联有部电影叫《拿破仑》，拿到国外放映的时候大家都非常惊讶，场面极大，调用了军队参与拍摄，那场面好莱坞都做不到。这样的巴洛克作品在苏联时期是有过的但属例外，可是如果后来他们经济好转，他们的主旋律作品，娱乐性就会提高，他们的大象都可以跳舞了，还都得是豪华耀眼版本的。这些官方推动的作品，大概率能受到苏联大众的认同喜爱，甚至可以输出境外。不过这个巴洛克时期在现实的苏联没有出现。

我已经说到最后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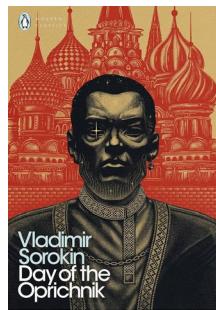
其实今天我主要想说什么呢？我就是想说，俄罗斯小说整体值得大家去看，而 20 世纪包括苏联时期的俄文小说也同样很值得看，是有很好的东西的。他们的作家是在很不容易的体制下写出来好小说的，可惜的是只有很少是当时苏联官方认同而在世界文学空间也绝对算是好小说的作品，而很多作家为了创作经过了相当大的磨难，即便出版也是一波三折，甚至不少作家的作品在他们身后才得以面世。但是我们现在很幸运，我们都能看到这些作品，大概“作家不幸说部幸”要说的就是这种情形吧。作家或许因为创作表达遭遇不幸，但是小说这个整体是幸运的。因为不是这样的苏联现实和苏联的经历，那些苏联作家的好小说就不会以现在的样子呈现出来，让我们看到那样人类阶段的好小说。



最后我建议大家，如果有兴趣读一点苏联小说的话，我推荐三本：第一本是布尔加科夫的《大师与玛格丽特》，第二本是普拉东诺夫的一个中篇叫《基坑》，这些书现在简体版都能找得到，第三本我本来想推荐格罗斯曼的《生活与命运》，但那本书太厚了，我想了想还是改成另外一本，就是请大家去看扎米亚京的《我们》。谢谢大家。

**廖伟棠：**谢谢冠中讲的非常精彩。我觉得你还可以再多讲一会儿。没关系，你讲的可能有点累了，我们来接力一下。首先欢迎大家继续提问题，已经有一些问题了。但就在大家没有提到更多问题前，我先就我自己一路听下来，我的想法来跟冠中交流一下。接着这个“作家不幸说部幸”来说，我们这个中国传统也有说时代不幸、国家不幸诗家幸，就好像文学和现实之间都有一种这样吊诡的关系。放到这几位作家里面呢？我突然在目前这个世界背景上看，他们还有另一种痛苦，我们当时可能还没有意识到。我们现在看，尤其是布尔加科夫和格鲁斯曼。他们身上有乌克兰的民族性的存在，他们既是乌克兰作家，也是苏联作家。像布尔加科夫他的《白卫军》，是写基辅的，是发生在基辅的故事，但是他的《大师与玛格丽特》是写莫斯科的，他的故事发生在莫斯科的一个晚上。这样的故事像格鲁斯曼就更加尖锐了，触及到乌克兰大饥荒等等问题。这种分裂在整个苏联的过程中，就是俄罗斯作为苏联的主流，是占据了话语权的一个民族跟旁边的民族之间的冲突，导致很多伟大的作家不能用自己的母语去创作，这必然有一种良心的煎熬。但是我不知道目前前后苏联或者后俄罗斯的时代吧，还有没有这种良心作家存在？在俄罗斯本土，在俄罗斯侵乌战争中，好像没有发现有重要的作家表态，是不是陈冠中先生？

**陈冠中：**我其实也没有跟进得太紧。有一个作家叫……我现在忘记名字了，他去参加乌军了，是一个俄罗斯作家，但我不特别确认这个情况。我刚才也讲到苏联时期有很多年轻一点的作家，他们都在反思苏联的事情。比如说有一本小说叫《特辖军的一天》（也译作《禁卫军的一天》）。这个作家叫弗拉基米尔·索罗金。这是个未来幻想小说，写新帝俄的特权阶层特辖军即禁卫队。小说中的俄罗斯已经回到帝制，经济上非常依赖中国了，其时的中国非常强大，新的帝俄完全靠中国，有点像是在指涉今天的俄罗斯。太多小说了，我不太知道俄罗斯文学出版的最近情况。



**廖伟棠：**我觉得他们的抗争还是一种在策略上抗争的一个阶段。毕竟普京时代可能有过之而无不及，相对于苏联的某些时期来说。另外就这个题目，我记得去年有一位知识分子。一位俄罗斯学者吧，他提出一个命题是我们之前没有留意过的。他说其实俄罗斯的文学，俄罗斯的文化，一向都有一种对苦难的一种品味，对苦难的一种沉浸，不能自拔。就是说他们的民众好像已经习惯了，俄罗斯的命运就是如此之悲惨也好，戏剧性也好，他们的文化也都是像陀思妥耶夫斯基那样会在这个苦难里面寻找意义，慢慢就变成了一种对苦难的纵容，或者说对现实的一种忍受吧。就像刚才说的那位士兵，他带着《大师与玛格丽特》，但他还是去当兵了，没有发生像在美国可能会有人逃避征兵令，这种良心反抗性的作法。不知道你有没有类似的感受呢？俄罗斯文学特别吸引我们的，就是他那种苦难性，但是慢慢慢慢我们也沉浸在这种苦难里面的时候，有没有可能从里面觉醒出一些什么东西。

**陈冠中：**其实我不是太同意这种整体性或者整体主义的说法，就是 totalize 的说法，比如说俄罗斯小说就是 A、B、C 什么什么的，不然我也不需要用一个半小时来解释 20 世纪其中 70 年的小说。可能大家印象中 19 世纪的俄罗斯小说特别是以陀思妥耶夫斯基为代表的，对苦难有一种特别的自虐的被吸引的感觉。其实 20 世纪的小说，不管是从白银时代的别雷的《彼得堡》或之后的布尔加科夫很不一样。布尔加科夫小说里面都是充满了幽默、戏谑、讽刺，并没有觉得他有享受苦难这种感觉。刚刚说的普拉东诺夫，他是很想参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建设，但是他太忠于自己了，每次写出来东西都是不对的。格罗斯曼我不觉得他是想歌颂苦难，他是看到真正的苦难，在卫国战争中的斯大林格勒战场双方的人的死亡，他是真的看到这种苦难而不是将苦难形而上化。英文里有一个词叫 bloodland，他看到的是从俄罗斯到乌克兰到白俄罗斯到波兰，有时候是德国人坏，有时候是俄罗斯人坏，有时候是当地的民众杀犹太人，是各种屠杀的发生。格罗斯曼他记录了那些，但我不觉得他是爱苦难，所以才创作这样的文学。我不觉得这种爱苦难的说法是对的，而且实证大概也不够。有些作家可能是这样，但肯定不是大多数的作家。既然我们是要学文学，还是要分辨一下，不要整天相信那种华文世界特别喜欢的、大而化之的整体主义或全称式的话语。

**廖伟棠：**谢谢！刚才有一位听众，第一个提问的。他说请问陈先生为什么在苏联体制下科幻小说特别流行，科幻作为一种文体跟集权的政治与社会现实存在着怎样的互动关系？



**陈冠中：**刚才我说了，苏联时期被认为是俄罗斯科幻小说的黄金时期，他们很多作家都写科幻小说，而且是能出版的，有市场有读者，官方也认同的。但是他们的题材往往跟硬科学有关、一方面是科普，一方面是很未来的世界，里面有很多科学的知识的。科学是苏联非常相信的事情，虽然他们实行起来不见得根据科学原则，但是他们非常推崇科学，对技术也是相当崇拜的。另外一种就是写歌颂共产主义，歌颂不久的未来的小说。这两类小说的写作在苏联写可以说是安全的，而且是可以被读者接受的，所以特别多的作家是写这个。但是也有一些比较另类的作家。他们也是借着这个类型，比如说扎

米亚京的《我们》，1921年就写出来了，差不多是最早的之一。他可能也不是真的要反苏，但他就是感觉到未来可能就是会这样子的就写出来了。写出来官方就不高兴了，因为他是反乌托邦小说，不是乌托邦小说。刚才我提到另外一位写《未来记忆》的作家，是写人们能回到过去，谁知道他们回到过去的愿望都是回到革命前，就是回到解放前了，那官方就很不高兴了，所以作家也惹祸了。可以说大部分科幻小说在苏联时期非常受欢迎，不光是苏联时期，苏联解体之后有很多年，俄罗斯仍一年有几百本科幻小说出来，读者就继续喜欢科幻小说。这是俄罗斯文学的一个情况，就是科幻小说在90年代还是非常受欢迎的，有一年出版了好像有700本这样子的。

**廖伟棠：**我突然想起来，就是最有名的美国俄裔科幻小说家阿西莫夫，不知道他对苏联体制是怎样一个态度呢？我觉得他有一些科幻小说也带有一些影射，虽然他没有生活在苏联。

**陈冠中：**对，他也是俄裔的，我把它放在非苏联小说，作为离散小说的一个范例，其实他写的小说大家都已经意识到他是什么族裔的了，比如《我，机器人》都已经是后人类的东西了，所以我没有特别研究他对苏联的态度，但是他既然在苏联以外可能是有态度的，但这个我就说不准了。

**廖伟棠：**有一位听众提出从创作技巧看，要写出一本经典小说，什么是最难解决的？这位听众问的是很大的一个范畴，我想具体怎么解决这个，真是见仁见智。那他又问怎么能判断经典永恒小说的文艺标准？我觉得也没有唯一标准。但我觉得陈老师也可以谈一谈。你对经典小说有没有一些基本的要求？

**陈冠中：**首先我回答不了这个问题，如果我真的知道我也去写了。但我前面说了所谓好小说的标准，首先不是苏联官方定的标准，而是基于一个更暧昧的标准，有人说它是全球文学空间，或有人说文人共和国，这是一个比较精英的概念，就是精英文人他们的共和国。他们之间有很多争议，很多摩擦，互相争来骂去，但是慢慢他们也会把某些小说，包括已经被大家忘记的，或不被注意的小说拿出来，把它慢慢捧上去，所谓经典化，canonize。20世纪已经有一些canon出来了，大家已经知道哪些是真的经典了。但是在21世纪当下的，谁也说不准，所以我也没办法跟进。但是20世纪的上半叶，很多大家名作已经出来了。比较惊讶的是有些人把以前苏联时期比较晚才有英译本的小说，比如说普拉东诺夫的小说，已经提到这么高。当然我们知道全球文学空间里面有很多鄙视链，里面有偏见也有权力问题。比如说某些学院、有些奖项比较有权，他们有自己的体制，有些杂志的书评、报刊的书评也比较有自己的地位，这些慢慢形成了一种新的就算不是共识也是风评，有些好的出版社就愿意选用出版，以不同的语文出版，这样就形成了一些准经典，或许再过几十年就更清楚。如果要谈过去的小说，什么是好小说，这大概是一个方法。如果是出版编辑，我需要做出判断今天你给我的稿子好不好，那就更难了，我也不知道他们用什么标准，烂小说出得也很多，所以很难说。但的确没有一个原则这么简单，我刚才也说到，就算一个作家因为作品被折磨，出版艰难不等于说他写了好小说，这是两回事。虽然在苏联的情况很多好小说当时出不了，作家受尽磨难，但不等于所有这些作家都是好作家，并不是这样等同的，还是需要看他们个人的才华。所以这个很难判断，我相信永远都不会有一个唯一标准。我们需要很多特别厉害的超级读者，以前我在别的演讲里也讲过这点。我们需要这些超级读者，他们在大概知道大多小说的好坏评价准则之后，能够比较有判断力，这种超级读者，我们现在是非常需要的。有些社会这种读者越来越少，没人知道什么是好小说，有些社会比较幸运，有一两个很有见地的批评家，当你以为自己写得很好，他把你骂得一文不值，然后他说另外那个不知名的作家作品很好。有些这样的人，最后他们是对的。我们需要这样的一些人，他有他的直觉和他主观的标准。所以很难说有什么客观的单一的标准。



**廖伟棠：**有一位普拉东诺夫的粉丝，比较罕见哦。他说布罗茨基写普拉东诺夫的文章《空心灾难》写的特别好。他读过很多次，他也喜欢普拉东诺夫，尤其是《美好而狂暴的世界》这一本。但他说国内对普拉东诺夫，其实关注很少，出版物也不多，他想请问你能不能介绍一下这位作家，他在华语地区的情况，比如说大陆港台有没有注意他，如果要对他进一步的研究的话有什么相关的建议给他？

**陈冠中：**国内普拉东诺夫小说集的译者徐先生，他也是八十年代在海外偶然知道了这位作家，一看不得了才翻译的。的确之前很少人知道普拉东诺夫，在英语世界也很少，就不要说在华语世界了。幸好徐先生自己挑选了一些小说译成中文，出了一本合集，取名其中一个短篇《美好与狂暴的世界》。这本小说集里面有很多很重要的短篇，比如《回归》《第三个儿子》等等，但还有一个重要的中篇，就是《基坑》。徐先生说他不可能把所有重要的小说都收在里面保留，但是这已经很好了。这本书大家是买得到的。在大陆地区的书店和网上都买得到，海外我不确定。当然还有一些其他的普拉东诺夫作品，据我所知到今天还没有华文翻译，比如《幸福的莫斯科娃》，但是另外还有一些短篇收入了别的选集。我之前介绍过，普拉东诺夫是一个工程师，工人出身，他特别拥抱革命，然后特别失望。比如他去了土库曼斯坦采风很久，然后回来写了一篇特别极简灰色的小说《灵魂》，竟然是这样，而其他下去采风的作家，回来都是歌颂土库曼斯坦的社会主义建设。土库曼斯坦当时建了个运河，是苏联时期特别有名的，把人当奴隶一样用，驱使当地人硬建成的一条运河，其实过程是非常惨的事情，但是去采风的作家都不会谈到的。普拉东诺夫他也不是正面谈，他是想出版的，但是他写出来的就是不一样，是很令人震惊的一个文本，他写的是很有契诃夫风格的。他其实是个诗人，很特别的，虽然大陆地区并没有特别地注意他，不像格罗斯曼，有知名的理想国出版了他的书，而且请知名度很高的梁文道作了长序推介，所以一出版就被更多人注意到了，把格罗斯曼的巨著比喻成20世纪的《战争与和平》，就更容易理解。格罗斯曼这本书当然是非常厉害的，但我自己也很喜欢格罗斯曼的另外那一本《一切都在流动》，是他死前的最后一本书。他是一边写小说一边写论文，两个他要结合起来，我非常喜欢他这样的一种做法，对我自己都是一个鼓舞。所以就算看不了《生活与命运》这么厚的小说，也可以看这个薄的一本。当然你要心理有准备，这不是一般文学欣赏课意义上的所谓好看小说，好小说有时候并不是很好看的。

**廖伟棠：**我想陈老师今天提到了这些书，大家都真的要把握机会，先买下来再说。因为随着这个风云变换，今天可以出版的，明天可能就是禁书了。现在有一位读者，他提的问题是我们一直没有谈到的一个角度。他感觉苏联时期的文学整体偏向阳刚气质，即使是女作家，也更偏向于国家民族历史苦难的宏大课题，那么个人主义的心理关注性别多样性气质的小说有没有呢，就像类似他举例普鲁斯特和三岛由纪夫这样的，阳刚气质和阴柔气质丰富交融的，在苏联小说里有没有类似这样子的？

**陈冠中：**我刚刚说，以现象来说苏联之前的白银时期有好多女诗人，到了苏联解体之后，也有很多出色的女小说家，而在苏联时期，一般女作家当然有，儿童文学就有很多女性作者，但没有很多优秀的女性小说家出现，就我所知，现在能拿出来谈论的小说作品比较少。当然也有，比如前面介绍过的塔菲，她1920年就走了，离开苏联去到欧洲了。塔菲的小说后来在苏联最后期开放的情况又被翻炒而大红，掀起塔菲热。塔菲的小说就不是大家想象的很苦难的、阳刚的，她是幽默的、讽刺的小说，可能像上海日据时期的某些女性作家的感觉。但是其他男作家是不是就是阳刚一路的，我也不敢说一定就是这样。比如说普拉东诺夫，他从来没有办法阳刚，他作品里面的人都是犹豫不决的，最后就吃亏这样子的。真的阳刚的，大概是日丹诺夫主义之下塑造的卫国战争的各种英雄，比如说法捷耶夫的《青年近卫军》，当时跟德国纳粹打仗的战场就是现在的顿巴斯，现在乌克兰正在打仗打得很厉害的顿巴斯。然后比如《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这个故事背景是在俄罗斯的黑海城市索契，就是14年冬奥会的地点。很多中国人去索契访问都会说，嗯，我看《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那个时期也有很多女性写卫国战争的，比如《卓雅和舒拉的故事》是很多人都看过的小说，就是用战争来写女性母性等等，这就是把女性定位在某种责任的一种小说。不过阿赫玛托娃在苏联时期也有创作的，虽然是诗，但是更出名，像《安魂曲》那是一个人可以顶起苏联半个文学江山的。但是我相信所谓雄性沙文主义，在苏联时期是相当强的，甚至在前沙俄时期或今天的俄罗斯时期，都是一种相当强的意识形态。

**廖伟棠：**对，我也想补充一下，就是安德烈·别雷的《彼得堡》。《彼得堡》是一部满纨绔子弟式的小说，变化多端，绝对不是那种刻板印象的男性女性在里面的活动。另外很

伟大的《日瓦戈医生》里面对女性的刻画也是非常体贴入微的，可以看出帕斯捷尔纳克并不是雄性的国家主义者那种做派。

另外有一位读者提的第 2 个问题是，既然苏联文学有很大一部分是些苦难，甚至是深刻的苦难，为什么在现实中引起的回响并没有直接对话现实。他大概的意思就是，是不是那些因为接纳了文学的读者，他会把这个投射对象进行了一种巧妙的替换。我猜他的意思就是说，他们把文学和现实分的很开，就是把这些东西都扔给文学解决了，现实他们好像就说没有真的要去改变。

**陈冠中：**我也不太知道怎么回答这个问题，就好像是在说确有这么直接的关系，好像小说是鸦片，你可以躲在另外一个世界，在小说里得到发泄，逃避掉现实这种被动主义的态度。我不太愿意把小说的功能当成这样的功能，尤其是对苦难。刚才谈到索尔仁尼琴，他写的是集中营，当然对我们从现代的文明人的角度来看，都是非常苦难的。是的，他写出来是很有大震撼的，他的小说在地下流传了很久，都是有心人冒险去传的，你说他一定是对苏联的解体没有关系吗？也不好说，不能说直接有关系，但是营造了一些不同的思想跟氛围，改变了一些人的态度，我相信一定是有。所以不见得他们写苦难的人只顾写，但现实就是继续坏下去。作家能做的就是写出来。

**廖伟棠：**对。而且这个时间是有一个比较漫长的过程。就是这种潜移默化的过程。就像我们刚才讲座里，陈老师也反复提到中国作家，尤其是 50 后作家也深受苏联文学影响。但是他们受影响之余也有创作伤痕文学，这种是蛮明显的受苏联文学影响，但是苏联文学滋养出来的那种反乌托邦和所谓的恶托邦、乌托邦这种的写作却没有，在 80 年代的中国有呼应的东西，但是却慢慢慢慢过了二三十年，在近年来的某些科幻小说，我们才看到了一个回声对不对？其实是对这种反乌托邦小说的一个回声。

**陈冠中：**是啊，我刚刚解说过一点，就是苏联基本上一直到解体还是在一个短缺经济的年代。举个例子，比如说《1984》这个小说里面的主人公，要想买一个刀片来刮胡子买不到，是这样的一个状况。如果我们尝试看《美丽新世界》这样的反乌托邦小说，它世界的物质是很充裕的。如果当时苏联在戈尔巴乔夫改革之下，或他的继承人一直有各种的改革开放，经济能好一点，比如有些人先富起来，就会出现一个岁月静好的空间，这个岁月静好可能只是对作家来说，他们就会写一些新的题材了。比如学外国写魔幻现实，写一些后设小说，也可以写一些性别议题小说。题材多了，说不定有些人写的不错，这些题材说不定在国外也有人有兴趣。尤其是青春小说。比如说中国改开后，出现的《上海宝贝》这类小说，都公开发行过，很多小说类型都可能出现。对这类小说，全球文学空间可能会觉得，这些苏联小说跟他们自己的小说也差不多，挺好的，写情欲写女性，他们也都可能会接受。所以只要是那间房间够大，大象虽仍在但不是那么庞大到躲不开的话，就可以写很多不同的小说。可是苏联没有这个际遇，没这个时期。

**廖伟棠：**对，我刚才听您讲这一部分的时候，就想起了您的小说就是一个平行历史里的另一个国家。另一个苏联假如有一个平行的，架空历史的苏联，那可能就是我们读者的幸运了。有一个同学问了一个比较大胆的反思性质的问题，虽然他好像没有很多的理论支撑。他请问，苏联文学又或者大家所谈论的苏联美学，是不是被体制塑造的成分比较大呢，他说这些艺术作品里并不是没有民族性，但相对于民族特征反而是集权体制起的说教作用更大。我们目前接触到的苏联文学会不会是这种体制塑造的产品。我觉得这里面需要厘清一下。

**陈冠中：**首先我在刚才的谈话里也特别说到，苏联也有几个起起伏伏的时期。在它的开创时期，拥有相对多样性，到日丹诺夫时期，30 年代开始就只有一言堂跟一种风格了，直到斯大林 1953 年死后，之后日丹诺夫主义虽然没有再那么权倾一时，但是他这种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立场其实一直延续到 80 年代，就是戈尔巴乔夫之前。所以我们也可以在苏联的不同时间看到不同的作品。大部分的体制小说，其实我今天没有强调，我今天提到的基本是在苏联体制下没有得宠的小说。这么巧，这类小说在苏联之后的世界有些被认为是好小说。体制内的小说是更多的，非常多的，它们是比较接近一些官方立场和引导的意识形态，但是恰恰人们现在不觉得它们有意思。而比较有个性的独特的小说，往往恰恰都是那些体制不太待见的东西。所以刚才这位朋友说很多小说都是受体制塑造的，很多也是要迎合这个体制而写的，这是肯定的，尤其是体制非常紧的时候，比如 30 年代到 80 年代，而苏联刚开创的时期、中间的解冻时期，还有戈尔巴乔夫的时期，体制相对宽松的时期，作家写的东西就会比较不一样。比如刚才说的雷巴科夫的《阿尔巴特街的儿女》，虽然写的是 30 年代，但就是要到苏联最后的时期才能出版，所以说苏联时期小说都是受体制影响的。不过今天我们看到的，在那种松散的全球文学空间里慢慢磨合认同出来的新的经典，除了某些例外，多数恰恰不是当年

受苏联体制表扬的那些小说。

**廖伟棠：**有一个同学问了一个问题，请问您可不可以给我们推荐一些研究体制对文学影响的论述吗？我想他指的是文学理论方面的，作品或者说文学史方面的作品。

陈冠中：体制对文学的影响，我相信是有很多研究的。比如说审查制度、极权体制怎么影响个人心理的书西方曾经出过很多，但是现在好像没有这么多了，好像没有什么人注意了，觉得这个时代已经过了。虽然我不觉得是过了，但很多人觉得苏联是一个过去的事了，现存的社会主义苏联已经不存在了，现在是另外一个世界。这些研究的书是有的。另外在这里我想补充一个理论的现象，就是在开创时期，前卫主义、先锋主义很盛的时候，苏联的评论界也是非常强的。现在一般叫做形式主义的评论，苏联当时自己有很多这方面领先的理论家，这些苏联理论家影响到后来捷克的结构主义，后来又影响到法国的结构主义，都是从苏联开始的。其中什克洛夫斯基是非常重要的，影响到很多后来对文学机制的研究，影响到后来德国的布莱希特。他提出了陌生化这个文学演变的概念，就是每一代都要写一些别人没写过的东西，就是要把文学陌生化才会有推进，才会有新的发展，从而迫使读者重新观看世界等等。他们这一形式主义理论也受到日丹诺夫主义的压制，其中一个批评者就是什克洛夫斯基自己。苏联开创时期的头十年他自己逃出苏联两次，他每写完一些争议性的东西，就出国了，出国看看没事又回来了，但最后第三次回来的时候他就转阵营了，转到了日丹诺夫那边去了，就回头骂自己的那些当时在搞形式主义理论的朋友，包括骂阿廖沙写的小说，骂特尼利亚诺夫的理论等等。什克洛夫斯基是一个很关键的人，他一直活了很久，也帮过普拉东诺夫，保护过他，这是一个很复杂的人。但是在三十年代他转了阵营，把那些现代派小说和形式主义理论叫作苏联巴洛克，苏联巴洛克就是他提出来的。他骂他昔日的朋友们不跟着日丹诺夫主义的线性史观，搞乱历史方向，乱写时空交错的叙事，而且著作布满细节，不知道哪个重要。他就骂他们这些，把他们叫作苏联巴洛克风格。但是我认为如果苏联能改善经济存活到今天的话，这种巴洛克风格也会把很多他们官方主旋律的东西包装得非常有娱乐性，非常豪华，用来吸引大众。可能没有回答那个同学朋友的问题，但是我只能回答到这里。

**廖伟棠：**很有启发。有一位朋友问了一个很专业的问题。他说陈老师，你觉得苏联早期的文学故事叙事的破产，比如说《卓雅与舒拉的故事》后来被揭穿是虚构的，因为很多高大全形象的塑造。这种破产对苏共的管制合法性有没有什么影响？

**陈冠中：**苏联后来有部分精英，知识精英，对所有官方的论述都不太相信了，他们的犬儒化或者他们的怀疑主义，当然也会削弱苏联的合法性，但是最后苏联的解体，不管从深层的结构原因，还是从最表面的现实发生的政变等等，其实可能跟这些都无关，这些知识分子的态度可能是不足以把这个苏联政体弄倒的。

**廖伟棠：**我们的时间只剩两分钟了。我就再挑选一条问题来问吧。还有好几条问题。毕竟我们是一个关于苏联文学的讲座，我们就回到文学上去。有位朋友问苏联文学在这个时期华人圈的汉语翻译者有没有特别优秀的？翻译者和研究者，陈老师可以推荐一两位吗？

**陈冠中：**其实有很多大家都是翻译俄文作品的，比如文学和诗。刚刚提到的蓝英年先生，德高望重，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翻译家。其他的我这里随便拿起一本刚才提到的书，译者都是很重要的。徐振亚先生，力冈先生都是特别的好手。而且从民国之后翻译俄文著作在当代中国已成为传统，从 49 年到中苏交恶之前的翻译，到交恶之后的皮书，传承没断。上海那边的皮书翻译者，在改革开放后又重新找到苏联和俄罗斯文学来翻译，是很强的一个传统，其实是中国出版界非常强的亮眼的队伍。

**廖伟棠：**我想毕竟我们的很多创作者，不懂俄语，这些翻译家他充当了这些俄语作家的一个汉语面目，出现在我们面前。所以我们感受到的所谓的俄罗斯美学，苏联美学，很大程度也是因为这些人的汉语塑造的。所以我想从冠中先生到还有比冠中先生年纪更大的一些前辈，都深受这些熏陶，一直到我们这一代的华语作者。我想作为俄罗斯，作为是我们的一个强邻，苏联是我们的一个强邻。在这样的前提下，我们如何受他们的影响，我们去接受他们哪一方面的影响，我们要如何去吸收去反刍。我们怎样把它用在面对我们的现实上？其实今天有很多听众有提问这方面，但我想这个问题真的要我们自己设身处地。用我们自己的文字，我们的创作去解决的。那今天我们的讲座就要准时结束，因为已经相当晚了。再次感谢陈冠中先生。

**陈冠中：**谢谢大家，谢谢伟棠。

**廖伟棠：**也谢谢朋友们同学们今天有 200 多名听众来参与，而且有很多来自不同地方，有来自内地，甚至有来自台湾的听众参与，谢谢大家，谢谢，希望大家继续留意我们这个讲座系列。接下来我们还有骆以军，还有香港的作家李智良，年轻作家陈春成的系列讲座，我们都会在接下来的两三个月陆续推出，谢谢大家。



陈冠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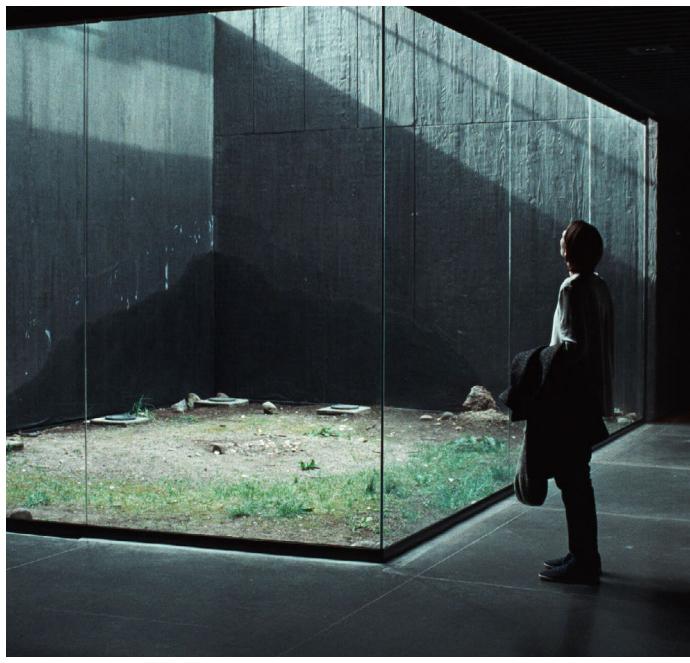
原籍宁波，上海出生，香港长大，曾住台北六年，现居北京。七六年创办香港《号外》杂志，

并曾在九十年代中任《读书》海外出版人。

栏目简介：这不是一个书评栏目，作者只是谈谈他们是如何“爱”上另一位作家，以及他们和他们的作品是如何成为自己的一部分。这个栏目和作家的私人阅读体验有关。

#### 新书试读

来自新近好书的试读章节，由小鸟文学编辑部从近期出版物中挑选而来。祝阅读愉快。



题图为电影《记忆》(2021)剧照

这些事情出现的契机，有点像贺子珂的生活的不同延长线，就是那种“一旦时机成熟了迟早会出现”的事情。

比如“云上贵州”。早在贺子珂从中央美院毕业那会儿她就想做这个项目，但她只有意向，直到苹果的数据中心放在了贵州，而作为一个贵州人，这戳中了她的某条神经，她知道自己得回贵州做些调研，但具体要做什么她并不知道。



## 专栏

# 086 贺子珂 一个人探索记忆存储之地， 可能会被带向哪里？

杨樱 | 接力访问

她说，

这片土地本身便是一个更大的数据中心。

贺子珂的魅力，可能在于她对不常规的事物抱有某种理解的愿望，而且这愿望的最终目的并非是把这些事物重新归于正常。这些事物里也包括她自己。作为一个艺术家，她在5年的创作时间里开展了诸多项目，迄今为止全部处于进行状态——并非是停滞——若是按照很多人的标准，这些项目完成过展览和公众交流，多少也算有了结果。但贺子珂是个固执的人，当她认为一个项目没有结束的时候，这个项目就不算结束，尽管她也承受着这种多线程的生活/工作状态带来的心理压力。

在见到贺子珂之前，我知道她是艺术家，“云上贵州”的发起人之一，如果去看合作过的结构介绍，她会说自己关注“在多种叙事处理与信息组织下的认知混乱和错觉，以及个体在应对世界复杂性之下的困惑。媒介包括影像、装置、计算机程序等。”她是董吗子推荐的接力对象，吗子在推荐的时候说不清楚贺子珂的项目都是什么，让我自己去看网上的介绍，然后他说，这个人“活得平常，但又很奇妙”。

和贺子珂聊了之后，我觉得吗子的评价公允。我和贺子珂在上海一家咖啡面包店见面，她一边切割着一只羊角面包一边和我聊天，羊角过了热乎劲儿，有点软塌，喝了一口拿铁之后，嘴角留下白色的奶沫，她哪个都不太在意。她那天去了上海徐汇区档案馆，找到了曾祖母学校的年刊，这些资料会告诉贺子珂1925年的学校生活是怎样的。她说自己原来是学电影的，所以找资料的时候会尽可能补齐想象中还缺少的东西。她手里握着的线索只有学校的名字和年份，现在，她知道了曾祖母的同学是谁，老师是谁，校园生活是什么样子。

她已经为这个家族史项目东奔西走了一年，算上这个，她目前还有四五个事情在做。

这里要先说一下贺子珂的专业和她的毕业作品。贺子珂研究生学“未来媒体艺术”，这个专业鼓励人思考技术和人的关系，然后用艺术表达的方式探索一些技术的可能。贺子珂对“当下存在的和过去存在的技术”感兴趣，也想知道“它们和这个世界的关系”。

因此她的毕业作品做了一个人工智能程序。当时ChatGPT还没有出现，但2018年，大数据和机器学习已经具备了相当的普及性。贺子珂开始在一门课程时了解了神经网络有关的知识，并开始思考语言程序的运作，“突然觉得挺着迷的，机器一直在计算，然后突然它说话了。”贺子珂最感兴趣的部分，恰恰不在于人工智能的准确性，而是它的失误——“语言库里有不同的信息，程序在处理之后可能说了一句特别没头没脑的话，或者，一句你觉得好像有点道理的话，又或者，因为模型没有做好，它一直在说111111，就很像个傻子”。贺子珂说，“我觉得它很像人在不同的精神状况下的状态。”

这个毕业作品具体来说，是一个基于模型学习自动生成故事的程序，技术的部分由一个微软的工程师负责，此人是贺子珂找到的一个合作者。模型语料库来自当时贺子珂搜集的每日英语新闻。“所有我能搜到的英文媒体，当时做英文会稍微容易一点。而且我觉得这事也有点像，因为我们看不到国外新闻，所以这些信息用某种方式计算过之后，变成了一堆其实你很难理解、有点莫名其妙的内容。这很像信息在我们这个世界不断被扭曲、不断重新被诠释的状态。”

不过，因为模型有点（可能是很多）瑕疵，这个叙事程序最后说的话还是非常莫名。贺子珂本人可以容忍这种莫名，她觉得很有意思，是创造性的一种，但对很多人来说，这更像“作品没有设计好”，瑕疵就是瑕疵。这个程序一直在运行，一开始用了自己训练的模型，用谷歌翻译加以修正，后来ChatGPT出现，贺子珂和工程师用ChatGPT加以替换，程序开始说更理智的话。在大多数人期待的“正常”出现的时候，贺子珂多少有点失望，因为她觉得“好像更无聊了一点”。

贺子珂为这个程序（这堆代码）花了不少钱：包括微软工程师的费用——他后来没有继续跟进，贺子珂自学编程，技术水准仅限于调试程序，但这样就够了——以及服务器。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她发现服务器这个东西和具体的地域绑定在一起，“华东区”“华南区”之类，付款的时候就可以看到。后来，苹果宣布推出“云上贵州”，中国用户数据都会放在“云上贵州”里。贺子珂说，这样一来，很多事情都串联在一起了。她对数据所在基础设施的兴趣，和一个拥有复杂生态与私人记忆的地点叠加在了一起。

那个时候她有一个创作方案，叫“乱码城市”——具备她所有项目的两个特点：一开始并不知道自己的创作最终会表现为什么，以及，一直持续到了现在。“乱码城市”有一个明确的故事脚本，并计划围绕数据基础设施展开生态、地质和气候上的调研。也许会做纪录片和短片。她把方案提交给学校，申请后者资助艺术家的小额计划，每月1000

元，为期一年。贺子珂没申请上。被否决的原因是学校认为计划没有真正介入到技术的使用之中。而贺子珂认为，调研没有开始之前，所谓的技术使用是不可规划的。不过后来，这个方案有了其他机构支持者。



《乱码城市》

这些契机重合起来，逐渐催生了“云下贵州”。这个项目是贺子珂和另一个策展人龙星如合作的。俩人的兴趣有相当程度的互补性。龙星如想做一个中国科技地图。中国国土上那些正在发生和科技革新有关的项目的地点，都可能被纳入其中，比如海底光缆的登陆点，比如合肥科学岛。借助一次策展的机会，贺子珂和龙星如获得了第一年的调研资金，她们以团队的形式，对中国科技基础设施发起了调研和策展。

所谓团队，就是每次调研（迄今为止两次，可能也只会有两次）都会有类似兴趣的人参与，人数设定为 10 个，但每次都会出现二三十人，其中不少人自掏腰包。到目前为止，调研覆盖的内容包括数据中心的地质基础、气候基础、生态环境等等，对象包括机构、公司和个人，比如贵州师范大学、喀斯特地质研究所和探险家。

让贺子珂印象深刻的是他们如何去看了华为数据中心的某个展厅——那个过程，不是展厅本身。说一波三折倒也不至于。但正如贺子珂常说的“有趣的人一定会相遇”，她得到了帮助。

最初的联系是华为在数字博览会上的展位，贺子珂去加上了工作人员微信，得知以学校的名义，可以去参观一个展示厅。在那个展示厅里看完很正统的展示之后，那天展厅的工作人员问贺子珂，你们到底在做什么。贺子珂如实相告，对方特别开心：你知道吗，我对这种东西特别感兴趣，但是公司里没人理解我。

这个平时爱写科幻小说的华为员工为贺子珂他们申请，去一个新建的园区里去看数据中心的展示厅，和贺子珂保持联系到现在。除了写小说，他还有一个兴趣是做算法实验，“用一种不实用的方式探究技术问题”。

第一期的调研结束之后，贺子珂和龙星如策划了一期展览，展出和调研线索有关的作品，只是有关，并非发生在调研的具体地点，也不是由调研对象提供。比如说有一个卫星作品，设想很简单，来自荷兰艺术家 Daniela de Paulis。该作品准确来说是一个显示屏，不管在哪里展出，都会搜索当地的卫星云图投送到展厅。这个作品背后的复杂性，其实在于需要业余无线电设备，因为当天的卫星云图不能来自公开资源。这就会牵引出一个特殊的群体，即无线电爱好者，他们会用 DIY 或者其他非官方设备获取某些信息。“其实有一些技术政治性”，贺子珂说。

Daniela 要求贺子珂和龙星如帮忙，找到中国的无线电支持者。俩人都很发愁：在中国这样的人吗？有，而且很多，其中不少是天文系的学生、天文台的研究员，业余喜欢研究无线电。

“云下贵州积累了大量素材，其中一部分最终回到了乱码城市，你可以搜到同名的影像，那是贺子珂以调研素材为线索去各地拍摄的。你大概率看到的是预告片，不过即便如此，你也会想起《路边野餐》之类的作品。可能是因为贵州话——贺子珂会补充，《路边野餐》是凯里话，她的是贵阳话。可能是因为光线和叙事的节奏。关于叙事，贺子珂还在琢磨，她并不希望这个影像有剧情片一样直白的推进方式，但也不希望观众迷失其中。



路边野餐

从贺子珂做的各种事情里，你大致能看到相似的兴趣走向。她自己也有总结：我对存储（或者说记忆）感兴趣，对语言和叙事也感兴趣。

贺子珂 2023 年年初的时候，在上海复兴西路修道院公寓做过一次表演演讲（或者叫实验性演讲，她自己也不是很确认到底应该用哪种称谓）。你可以视为一次表演，因为现场的灯光和叙事气氛全部被设定到了有助于你进入某个故事情节的程度，但演讲者贺子珂讲述的内容是真实的。这确实是一次演讲。故事从修道院公寓二楼这个叫花厅的地方的主人说起，她举办了一场沙龙，其中一位年轻的女客，如何从名媛的身份里走出，在“激烈的社会和历史洪流中，走向了另一种人生”。2000 年，这位女士在距离上海 1800 公里外的家中去世。

贺子珂的讲述里会出现昔日的上海租界路名，月份牌上模特和沪江大学商业管理科，还有刚刚出现的折叠照相机。这些信息来自于她在当时刚刚开始着手进行的一项工作，调查家庭史。那位沙龙里出现的女士，是她的曾祖母。

人对家庭史的热衷非常普遍，想知道自己其来有自似乎是一种本能，不过贺子珂的注意力似乎不仅仅是家族脉络和身份这么简单，她希望了解全部过往。不仅仅是人的过往，还有社会的过往。就好像一场电影。后来我们说起阿彼察邦的电影《记忆》，快结束的时候，Tilda Swinton 触摸着各种物体，物体中蕴含的记忆——进入她的脑海（以及观众的视野）。贺子珂说，她觉得自己现在进行的工作和这个场景有点类似。或者说，她希望有这样的效果。

最初的时候，贺子珂手上有一些“好看的照片”，还知道患阿尔兹海默症的祖母还会说英文。贺子珂 1990 年出生在贵阳，祖母 1939 年出生在上海，六岁的时候因为二战避难来到贵阳，从此在这里扎根。奶奶家族枝繁叶茂，贺子珂从小节庆日都和这一脉亲戚过，热闹普通，大家都有一些共识，比如早前奶奶从上海来，除此之外就什么都不记得。

贺子珂从一些学校、年份、建筑物的名字入手开始搜索过往。最初她在外滩发现了一些线索，第一个电话打给奶奶，问她你还记得上海的家在哪里吗？奶奶不记得了。连问三个问题，都不记得了。于是贺子珂就换一个亲戚去问。现在贺子珂已经可以很熟练地说出来，奶奶小时候住在哪里，她的父母在哪里工作。

她成了掌握最完整家族信息的那个人。

“这是一种什么感觉？比如说你告诉你奶奶你小时候怎样怎样。”

贺子珂没有直接回答我，她只是说她突然发现贵州很强大，奶奶已经完全不说上海话，饮食口味也完全是贵州化的。但奶奶还记得自己从上海话转入贵州话的心态：必须和班里小朋友交流，必须说本地话。

“为什么这些事情大家都一直处于无知无觉的状态，因为线索都只有一点点。它虽然绝对发生过，但又那么不真实。”

就像《冷战》作者约翰·加迪斯说的，他和学生说起“冷战”，效果和对他们说“伯罗奔尼撒战争”差不多。

贺子珂把线索推进到曾祖母的生活，也就是奶奶的母亲。在我们见面的那一天，她去了上海徐汇区档案馆，查到了曾祖母曾经上过学的学校，老师和同学的名字，还有当时学校生活的日常。《校刊》都记录了这些内容。

查资料这件事充满挑战，并非是权限之类的问题，而是注意力。就好像你本来要去搜索一种火柴的生产商，最后发现自己站在一座桥上，正在看它的铭牌。预期之外的信息会把你带到形形色色的地方，有的时候，贺子珂会泪流满面，有的时候，她会忘记自己到底是在查什么，但也有的时候，偶然出现的名词会和自己仅有的一些线索重合起来。

“比如花厅演讲那次，我发现花厅主人从美国来上海，来上海之前先去了贵州。他写过一份游记，记录 1917 年在贵州的游历。他从西南带了很多矿物出来，因此发财，从一个面粉公司职员变成了矿石大亨，中间还当过美国金属公司的代表，操控亚洲的银金属的市场价格。与此同时，我的太祖父当时在南京造币厂造银元，他会在当时的上海交通银行活动，在外滩 14 号。”

贺子珂想把家族史写成一本书，介绍很诱人，“从一部家庭相册出发，搜集晚年患有遗忘症的曾祖母散失的记忆。通过照片、遗物和私人讲述，展现一位爱好摄影的现代女性所经历的悲欢离合，以及这个家庭如何涉过时间的河流，在 1908–2000 年踏出一条跨越半个中国的迁徙之路。”出版人敏锐，已经和贺子珂签下了合约，但她还在琢磨书的结构，并继续跋涉在看似绵绵不绝的资料里。这个过程琐碎漫长，其实和她做的其他项目的性质都有点像。与此同时，家庭史的调研也会把她引向对于旧媒体和旧技术的考察，因为其中涉及到关于早期电影、摄影的技术考古，以及胶片媒介的兴衰。

贺子珂提起一个概念，“冷数据”。做“云下贵州”的时候，这就是她感兴趣的话题。“最

终我们认为这片土地本身便是一个更大的数据中心，不论是‘乱码城市’中的鸿雁与贺宁，远古的贝壳，还是从这里延伸到上海的‘河流’，都是被遗忘的冷数据中的一些碎片而已。最终它们都关于记忆的储存，以及记忆为何物的探讨。”贺子珂说。

之前有另一个艺术家问过她一个问题：你做这些，有什么目的？

我想那个艺术家大约是想揣摩贺子珂的热情发源于何处。他得到的回答是：没有什么目的。

贺子珂和我聊天的时候回忆起这个对话，她说，现在依然没有什么目的。

**Q: 你最近遇到了什么有意思的事情？**

A：我想说说业余无线电那个人，他其实是云南天文台的一个博士生，大家不太会理解他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或者是，单位就有很好的望远镜，为什么自己去 DIY。其实就是觉得有趣，他就很享受自己能够搭建一个电台，发送一条信息，可能对方花了好几天才能收到。或者发送一个信息到月球，再反射回来。我觉得他们的状态和艺术家很像。这个人也写科幻小说。

**Q: 你最近想解决什么问题？**

A：专注度的问题吧。我的工作方式不像别人。很多人去跟我说，你这个事你都展出了，你都已经算是做完了，你就交稿了、交活了这样。我自己觉得做完了才算做完。我觉得做作品不是打卡，我不是在做一个 collection，所以要多花一点时间去把一个事情做到自己觉得开心（的程度）。

**Q: 你想找谁来接力？**

A：云南天文台的沈发新，他是我们通过 Daniela 的作品寻找到的业余无线电团体的负责人，我很喜欢他写的科幻小说。



题图：临收摊前，要是有孩子来，细维就会再等他们看会书

## 专栏

# 087 廖细雄 一个在小区里 摆公共借阅书摊的人

杨樱 | 接力访问

把这事做好，性格得是什么样的？

廖细雄是一个做什么事都全力以赴的人。这样其实有点可怕，起码会吓到同事，而她恰好还是有同事的。登记每日工时，她写：十三四个小时。这已经是“尽可能真实”的数据，换句话说，是自我控制过的，“以前大概十六七个钟头”。廖细雄负责一家公益机构的沟通工作，白天把精力像雪片一样撒在 100 多个微信群里，还不包括临时工作群，晚上集中精力弄一些大活，比如数据统计和日志整理。她发朋友圈总结 2023 年，字数有折叠，一打开，1500 来字，就这样发在朋友圈里，行文口气让我想起我们的聊天，各种热情扑面而来。

有同事尝试理解廖细雄在干什么，琢磨了半天，想到一个说法：细雄在织网。廖细雄把这个说法转述给我听，又说，“对，我是用我自己的线把各种东西连起来，把要断掉的连起来。我是那种人：一件事情一旦有人做又能做好，就可以完全不关注它，但这个地方一旦没有人，我就会立马补位，非常快地去完成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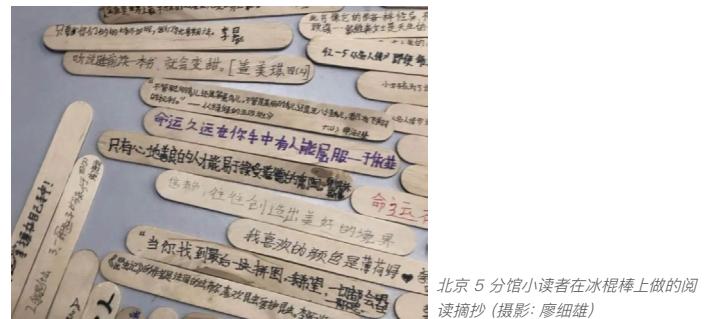
这事积极地说叫热心肠乐于助人眼里有活，搁在另一个语境里，就是另一层意思。廖细雄遇到什么样的语境，全看她当时在干什么，但不管她干什么，她都一样的不管不顾，做了再说。事后她自己总结，很多东西最后变成人生积累，你终将做事的时候总能派上用场。

廖细雄 1982 年生在湖南娄底，去北京服装学院上了大学，本来要学艺术，后来学了自己也很莫名的自动化。读了研，读研的时候在一家钢材公司实习，工作认真，把学习也撂下了。后来工作，在一个服务代理公司，遇到一个“三不管”老板，管得粗但支持多，全力以赴的性格得到充分发挥，一做就是十年。

但是在这十年的末尾，廖细雄开始重新调整自己的人生的方向。她想去做公益和教育。

她用了三年的时间做准备——考虑到她工作的忙碌程度，这准备应该也进行得不那么轻松。有一些是财务上的，过往的独立生活还得继续下去，还要给家里寄钱；有一些是精神上的，她和家人朋友乃至老板反复沟通自己的意愿，希望得到某种支持，至少试图避免某种“战争”；还有一些可遇不可求的机缘，就是她得找到自己想去的地方。

这个机缘在 2017 年 10 月出现了，当时她已经辞职。一个叫“微澜图书馆”的公益项目对外招募工作人员。这其实是一个叫做“新公民计划”公益项目的行动之一，后者的创办者致力于服务流动工人，早在 2007 年北京奥运前夕就筹资办学，邀请公立学校老师来交流，以便让流动工人家庭得以在北京这样的地方安置下来。不过到了 2016 年，外部环境变化，“新公民计划”需要转型，大家在思考如何行动的时候，就有了“微澜图书馆”这个项目。如今你登陆微澜社区网站，可以看到遍布全国的密密麻麻的社区图书馆，还有各个志愿者上传的工作日志。在廖细雄看到招募的时候，三个社区图书馆已经建立，不过她当时对于工作时间有点顾虑，最终在 11 月底第二次招募的时候报了名，在微澜北京 5 馆工作。5 馆一直坚持到了 2022 年 6 月，最终因为所在学校拆除而被迫搬迁。



北京 5 分馆小读者在冰棍棒上做的阅读摘抄（摄影：廖细雄）

正如她的工作方式，廖细雄的工作项目巨细靡遗，尽管现在已经分出去很多，还是涉及到各种各样的传播和沟通。不过这些工作都有一个核心，就是书。应该看什么，应该怎么买，有了应该怎么管理。“微澜”从一开始就有透明的内部沟通机制，包括志愿者来图书馆的通勤时间要不要算在服务时间之内这种问题，都会在一个叫做“联席会议”的组织里讨论。参与者有每个馆的馆长、核心馆员两名，还有一些负责其他事务的同事。廖细雄很喜欢这个工作机制，这是她想要的平等和透明。

从某个角度说，廖细雄是个理想主义者。她为自己认可的事情付出尽可能多的时间。在她不同的成长阶段，她认可的事情也不尽相同。

廖细雄的人生转变要从央视主持人芮成钢 2014 年入狱算起。她喜欢、信任芮成钢，追随他的书和活动。“他会说澳大利亚总统是他朋友”，“这种平等性很激励我，因为我自己是不太有等级观念的”。芮成钢一夜之间出事，廖细雄备受打击，但因为一篇相关的文章知道了作者许知远，又从许知远知道了单向街，继而了解了刘瑜，《东方历史评论》以及（之前读过但并没深究的）汉娜·阿伦特。

这一串了解让廖细雄进入了“疯狂看书”的时间。她买了刘瑜在《观念的水位》里提到的所有可以买到的中文书，从 2015 年 9 月开始，每个周末都去参加《东方历史评论》各种沙龙，一直到 2017 年他们慢慢停办为止。

而在大学的时候，廖细雄做过安利，因为后者宣传的“人格尊严和自由”很打动她。她强调说，当时有很多社会成功人士都会进入她所在的社群，“每天都会受到激励，关于怎样成为一个更有尊严的人，更平等的人，所以当时把学业也荒废了，很多老师都成了我的客户”。“其实我觉得我有很疯狂的一面，那时候可以做很多事，坐一下公交车就会认识陌生人。”但后来，廖细雄发现社群变大了，进来了“一部分只是为了挣钱的人”，于是“马上跌入另外一个极端”。她不再做安利了。

廖细雄的全力以赴，全看热情的出口指向哪里。

2014 年是对廖细雄很重要的年份，不仅是新知识、新偶像的涌入，还有“对国家封闭的担忧”。她对芮成钢的消失耿耿于怀，想起自己高中的时候，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被炸，她写了一篇日记，认为政府应该让民众自由讨论这件事，“应该有这样的训练，这样他们碰到大的事情的时候可以自己判断是非，就不会有大的混乱”。

她认为自己后来从事公益和教育的原因，就出于类似“改良土壤”的目的。“我们国家没有创造那种环境，还是什么事情都瞒着你，就像家长一样，越瞒着小孩，小孩遇到问题就越不知道怎么处理。”

这种“家长 - 小孩”式的比喻套在政府和民众身上其实并不合适，但我大概明白廖细

雄的意思。她有自己很在意的东西，其中包括独立、尊重和透明。在类似的环境里，她的行动力就可以得到发挥，而她在行动的时候，也会把这些作为行事标准。

2022年，廖细雄服务的微澜北京5馆被迫搬迁，她也处于极不稳定的日常之中。疫情管控导致她无法正常去北京工作，还得连续不断做核酸。

“我住香河这边，这是河北，然后我窗外是天津，三公里外是北京。所以我的手机信号一直是北京、天津和河北漫游的。我每天都在收到消息，收到弹窗，反正哪里都不能去。我应该在8月去了一趟北京，然后就一直进不了城，也去不了学校服务，少数几个开的馆我也去不了。到了9月，我们应该是参加北京图书市集，已经约好了一些好几年没有见面的伙伴，还有作者来签售，都安排好了，我就坚持一两个星期每天投诉，终于把自己的行程码弹窗取消了。然后我高兴了一个晚上都不到，第二天早上，又跳出来了，就在我即将出门的时候。”

“我没崩溃，我很冷静，但我心里非常愤怒。我即便愤怒也很冷静。然后我脑子里冒出来一个声音，为什么我要等到别人允许我才行动，我为什么不能在小区里就开始做事。”

廖细雄解释说，她平时日常就会买很多童书，如果觉得合适就会捐到微澜的图书馆里。那段时间，她无法值班，买的书也只能放在家里，就这么积攒了一两百本。于是她就拉着一辆小车——后来用了两个月就坏掉了——拿纸箱装了书，塞进两条床单，直接在小区地上一铺，开了书摊。

[在Jack邀请廖细雄来接力的时候](#)，我读过她[在小区摆书摊的访问故事](#)。她主动向小区住户介绍这是图书馆的书，可以借阅，在家长说孩子太小没办法看书的时候，就示范如何给小朋友朗读绘本。那个时候廖细雄和微澜北京5馆的理事商量，借用后者的借阅系统，把她自己买的书录入到馆藏图书里，这样小区的住户就可以用系统借书。



9月16日，书摊开摊第一天  
和借出去的书

和廖细雄聊天之后，才知道即便是小区摆书摊这样的事情，其实也涉及到很多人情世故和做事规则。

“其实在摆书摊的时候，你就会知道很多妈妈和孩子都太需要支持了。”“妈妈们需要离开妈妈的身份，有一个喘息的地方，有一个公共的空间，可以闲聊或者不闲聊都可以，她只是来待一待，不要处理家务事，就很放松。”

书摊摆出来，廖细雄发现自己无意之中创造了一个公共空间。天气渐冷的时候，她从小区挪到地下室，每天晚上从7点摆到10点。就这样两三个小时，甚至是临收摊前半小时，会有人来诉说自己的生活经历。后来有的时候她走在路上，会有来过书摊的妈妈抓住她“诉苦”——隔着口罩廖细雄根本没有认出来对方是谁——讲的都是婆媳家事。这是她做公共图书馆/书摊没有想到的状况。

这样的公共空间让人安慰，不仅是小区里的人，还有廖细雄线上的朋友。“一些比较紧密的伙伴，在那两年都很抑郁，所以我会在那段时间发每天出摊的朋友圈。”

“我后来开图书馆的时候，我也跟图书馆给我提供场地的幼儿园老师讲，我说要让图书馆长久的开下去，就得居民之间避免互相猜测和猜疑。所有的内容细节都公开，给大家一个安全的环境。”

廖细雄解释说，会有人问她，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钱从哪里来，是不是以及怎么不为自己谋利益。在她希望读者留下的时候，她会当面回答所有类似的问题，包括为什么要做公益，做了几年，现在是工作人员的身份，有工资（其他志愿者没有工资），也包括最近买书的钱来自图书馆的资助，如此等等……

廖细雄所在的小区有10栋楼，住户身份各有不同，大部分都是在本地打工，也有在北京的上班族，也有北京退休的，市里房子出租了，自己住在这里。疫情期间的书摊已经变成了独立的分馆，每个月会有一百二三十个孩子和家长到馆，和廖细雄见至少一次以上的面。她在摆摊的时候有个细节让我记忆深刻，如果一个家长带着两个孩子出现，

年龄较小的孩子没有被关照到阅读需求，廖细雄就会单独问这个小孩，你希望和哥哥/姐姐看同一本书，还是希望自己选一本呀？她能做到这样的细致。

最初的时候，她希望图书摊可以有居民共建，后来她发现这个过程没有那么容易，捐书的家庭渐渐多了起来，捐款的倒是还不多。还有一些借阅者，借了喜欢的书可能长时间都不归还。在这种情况下，廖细雄也不能直接批评，但有需要有所回应。又比如大家成立了借阅群，但基本只有事务性的对话，并没有公开讨论，反倒是线下的场合，会有关于二胎家庭教育，或者是女性议题的探讨。

廖细雄说，和书有关的公共讨论很少发生，真正关心公共议题还愿意付出时间的，或者行动的同样很少。但她觉得，有一些改变是会有的，哪怕是一个只想要占有东西的人开始关心一些他人的利益，开始产生一些羞耻心反省自己不能占用公物，就已经是好的变化。

“这种进步需要在很多人之间发生，社会才会发生真的变革。”

#### **Q: 你最近遇到了什么有趣的事情？**

A: 有一个小朋友，三年级，他每次来都会问，馆长你今天给我推荐什么书？我说昨天的阿姨没有给你推荐吗？他说也有，但是我想听你推荐。上个星期我推荐的书《9个哲学家给孩子写的幸福课》，漫画版，但其实内容还蛮难的，三本书里头他选择了这一本……有一次这个小朋友在讨论问题的时候发言，里面有一部分是关于他妈妈的，他说，我妈妈以前要做一个伟大的人，这个伟大，那个伟大的，她现在不也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程序员？……我之前知道他一直阅读很好，我也给他推荐，但是我从来没有了解过他的家庭是什么样。

#### **Q: 你最近想解决什么问题？**

A: 最近在做数据报告，看怎么通过数据来了解自己的运营。比如很多时候，大家都会觉得“我要买很多书”，“我平均馆藏要达到多少”，但我可能会更希望大家去关注你服务的孩子有多少，他借阅有多少，潜在的读者是谁，然后通过这种去挖掘，再购买图书馆的新书。这样就会有一个有效循环，而不是停留在有和没有的焦虑上面。

#### **Q: 你想推荐谁接力？**

A: 岑锦苗，她是阳江人，大概2016年的时候，我在广州待了20多天，参加了一个公益组织的教育活动，她当时说了一句话特别打动我，大概意思就是说，虽然这个社会有那么多令人失望的地方，但是还是很可爱的、值得努力的，只要努力还是会改善。我当时一下就击中我了。



本文图片来自大风书店公众号 *windydays bookstore*；长题图出镜者：紫瑶

你在外面做事情的逻辑去做事，不然的话，你在这没法带来新的东西”。

牟昌非做乡村戏剧节这事，给了 Luly 很大的鼓励，不过她觉得自己没那么勇敢，在自家门口开展文艺工作，开书店这事她也没跟同事说，就连发朋友圈也分了组。

爸妈一开始不知道 Luly 到底想干什么，装修的时候，爸爸觉得这就是一个茶室，让她摆几张桌子，到时候他也可以在这里招待客人。装修完了，Luly 去周边商户串门。隔壁邻居问她是做什么的，她说书店，对方特别了然，“儿童绘本馆是吧？”Luly 赶紧说，大人的书店。对方再次了然，“成人高考辅导是吗？”



摄影：子叶

## 专栏

### 088 Luly

## 如果不在老家开这个书店， 我的生活没法继续

杨樱 | 接力访问

“我觉得没有第二个选项”。

2023 年 8 月 17 日，山东潍坊有了一家大风书店。独立书店，开在市中心，但不沿街，而是在一个写字楼的 7 楼。周围主要是居民区，还有个人气挺好的菜场。

开书店的 Luly 是本地人，工作日白天要上班，书店只有晚上和周末开门。不过开业之初来的人要比 Luly 预期中多很多，销售额也是。她其实没什么预期，就好像 8 月 17 日这个日子，也就是偶然来了一个朋友，她觉得来过了人，就算可以开张了，就发了写好的公众号，书店就算开了。

从生活状态的角度看，Luly 过过两种生活。一种是之前在北京。她第一份工作是在一家动画公司，因为对接戛纳电视展相关的项目，入职了第二家，专职做电影相关的策展放映工作。疫情越来越重的时候，公司业务规模缩小，父母又惦记，她就回了家；第二种就是回到潍坊之后，她在一个纺织品贸易公司上班，公司开了 20 多年，无论业务、同事还是文化都老成持重，她感觉能聊天的人突然变少，有点孤独。

这两种生活之间其实还有一小段过渡。借着上一份工作的交接，她老从潍坊跑去北京。那时候她和北京的朋友还有紧密联系，手头还有书稿在翻译，如此跑来跑去，“就好像维持一种在文艺世界、在北京还有事干的一种假象”。后来事情渐渐收尾，“假象”破裂，Luly 不得不面对一个之前逃避的问题：你想在潍坊如何生活？

Luly 和家人关系很好，她只是不舍得那种围绕精神生活构建起来的社交关系。如果不离开这个书店，她大概率是去潍坊的西西弗书店，自己看书看电影，上上豆瓣，再跑到其他地方去参加各种活动。不过她决定开一个书店，房租不高离家近，这都是重要的前提。另一个重要的前提是，邀请她来接力的牟昌非说，“你不能被这个环境限制住，要以

小时候，Luly 常去潍坊的京广书城看书，一个装修没那么好的西西弗。我们聊起书店这种东西，只要书不过分糟糕，给人的感觉总差不到哪里去。用 Luly 的说法，总有书“会让你进入各种各样不一样的世界”。不过要论好的书店，这里面可就有太多门道。在这一点上，Luly 没有太多的负担，因为她最重要的诉求，是让可以一起聊天的人汇聚到一起。

她看过一些类似的书店，有些去过，有些在网上了解过，比如成都的那几家。她之前没有“公共空间”这个概念，看了别人的书店，觉得自己心里想的也是这样的东西，所以开业的时候就邀请各种人参与书店的建设，后来又开始做一个分享活动，叫“大风”，邀请各种人来潍坊讲不同的话题。一切都朝着有模有样的方向慢慢在发展。我和 Luly 聊了聊大风书店的缘起和目前的状态，感受到了她内心的富足稳定。从这个角度说，Luly 的首要目的达到了。

以下是 Luly 的口述。

在这种小一点的城市，独立书店可能和在大城市意义完全不一样。它（在这里）就有特别猛烈的聚集效应。我发了公众账号的第二天晚上，就有好多人加我微信，然后第二天就特别多人来，那天晚上我卖了 1000 多块钱的书，就是我这么一个小书店，一晚上能卖 1000 多块钱，对我来说是一个特别震撼的事情。

然后你就发现其实大家可能都在等这么一个地方，大家确实没有这种场域去交流，或者是没有这种场域去聚在一起。

我开始动手（做书店）的时候，我就非常确定，我希望它是一个大家能在一起的地方，不光是卖多少书或者是卖什么样的书的问题。我希望它是一个公共空间。

在北京的时候，我感觉好像还真没太有我很喜欢的地方。我在北京每次都会去的书店，叫 Jetlag，然后还有一个 Post Post，好像也被您访问过。都是那种去了之后觉得很精彩，风格很鲜明、很酷的书店。刚开始的时候我就想，如果我能弄一个这么酷的书店就好了，但是做着做着你就发现，很多事情是你模仿不来的，这东西可能很好，但不是你心里有的东西的话，你做着做着就会偏离。你没法去模仿一个你没有的东西，只会变得不伦不类。

所以我慢慢就发现，其实我没必要去模仿任何东西。我觉得应该怎么做，那就怎么做。这样可能最后反而变成一个什么都有点、但是很独特的书店，属于我的书店。

很多人会对书店有一种自然而然的信任。好多好多朋友过来之后，不但在这儿买书，甚至会把自己的书拿过来。我们有一张桌子，大家把自己家的画册、大部头什么的拿过

来，放在这儿大家一起翻。甚至有的人往这儿拿的书比在这儿买的书还要多。这张桌子上的书是不卖的，是一个像图书馆一样的地方。常来的朋友在聊天的时提到的书，也会成为书店的进货参考，然后他们会在旁边手写推荐语，这些都让我感觉挺温暖的。



摄影：子叶

“大风吹”是这样，我们开业了一周的时候，开始想做线下活动，但不知道该从何下手，恰好认识了一位学哲学的朋友，就一起商量着开始了。最初我想要有线下活动，是想要请北京之前的朋友过来，开这个书店很大的一个动力，就是我想跟之前的朋友保持联系。这样的话，其实挺多朋友来潍坊找我玩什么的，可能就仅限于观光。其实这些人都是很出色的人，有很多可以分享的东西。我觉得如果有这么一个地方，他们来的话就可以分享，也可以认识这儿的朋友。但逐渐地，在做活动的过程中，我也发现原来潍坊本地就有那么多精彩的人，做着各种各样的研究和创作，这些人也给了我一个认识潍坊的新角度。

“大风吹”每次的参与者可能就二三十个人，最多的时候，少的时候至少也十几个人。

北京的活动……我不知道，可能因为这样的活动比较多，大家怎么说，比较骄傲，那种氛围让你感觉坐在那很有压力。在这儿，我就觉得大家很珍惜这种活动，都特别认真。基本很少有人提前离场，二三个小时的那种中间都没人走，偶尔有那么几个要走的，都觉得很抱歉，给你发个信息单独说“今天真的是身体不太舒服”什么的。而且许多人在活动结束之后会特地写很长很长的感受分享给你，这是我在北京没有经历过的，就是大家特别认真对待这个事情。

“大风吹”的分享活动基本都是一个人讲、大家一起听的那种模式。当时我就想发展成大家都能说话、能讨论的地方。现在慢慢也可以了，因为我之前没有开过店，开了店之后建立一个读者群，我还在学习怎么在读者群里自在地说话。

最近有一个放映，是店里进了周梦蝶的诗集，叫《梦蝶 66 首》。之后做了一个放映活动，《他们在岛屿写作》，其中有周梦蝶的（那集）纪录片。放完了之后，有几个朋友在这儿，大家一起读周梦蝶的诗。本来就是想简单聊一聊，可能很快就结束了。然后当时有一个阿姨忽然讲起别的事情，提到了一句，说起在北大卖猪肉那个人。另一个人就说，我觉得艺术让人非常宽广，北大毕业卖猪肉又未尝不可；又有一个人就说，明明是个大悲剧，你怎么能这样说！大家就这个问题开始吵，“北大出来卖猪肉是好事，还是一个悲剧”，一直吵到晚上 12 点多。这是我印象比较深刻的讨论。

我也想过要不要树一些话题，大家来聊聊那种，但是现在还没有勇气这样做。我怕氛围太激烈之后无法控制。我的能力还没有强到“可能也不需要把控，大家在这自己聊就可以”的地步。因为对我来说这也是一个相对陌生的事情。

我对“公共”的理解，就是大家都说话，大家带着自己的身份说话，从自己的经验、感受或者做的事情出发去分享自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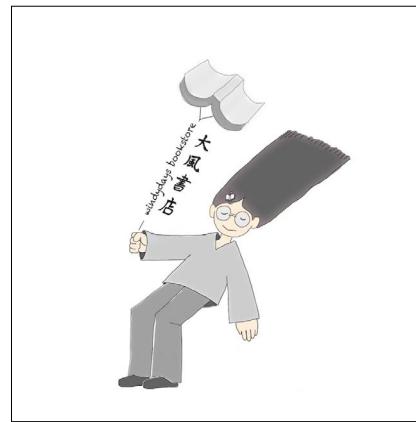
你可能信任一个地方的时候，你才会放松下来，放松的时候，你才能打开自己，然后有很多的交流，我还是想做一个这样的促进者。一个像客厅一样的地方，但又不是说大家在这躺一下，或者大家在这歇着什么的，而是放松地去交流，不是剑拔弩张的那种状态。

书店的客人其实范围挺广的，各个年龄段各行各业的人都有。学生，自己开店的店主，律师，公务员，老师，然后还有已经退休的比较年长的顾客。有一个住在附近的大爷，自己写诗，第一次来书店的时候就来找里尔克的诗集。后来我就给他进了一本，他就等我这个书，也不会说从网上买什么的。他说，请你去进这个书。就这点也让我特别感动，因为我觉得其实现在大家买书的途径其实是很多的，但他还是很信任你，就觉得我要在你的书店买书。

我回来其实有很大的原因是因为爸爸妈妈。他们对我是很重要的人，我希望多点时间跟他们在一起。尤其这两年，你慢慢意识到你作为一个孩子，对爸妈来说是一个怎样的事情，从前可能不是特别能意识到这个事儿，但慢慢就感觉到爸妈的状态，包括跟你

说话的时候，那种难以抑制的期望，希望你一个人活得开心，但又希望你能承担起很多责任。

我觉得没有第二个选项。可能一开始我觉得，我要在乎这个东西吗？我也只能活一次而已。但是后来觉得，你唯一能越过这个事情的可能性，就是去面对它，在这个限度里再去想一想新的办法，创造出来新的办法。



大风吹的 logo，设计者：动画导演、艺术家陈熹

我看书其实不是特别多，我妈妈非常多，她喜欢俄罗斯文学。从小我家有很多书，后来去北京做文艺工作，认识很多编辑什么的，你就觉得跟书很亲近，物理上的亲近。你身边老有这个东西。其实我自己看书不是特别深入的，所以开书店反而比较自在，不会滑进那种处理工作的轨道。

这部分东西在北京，你可能不觉得是什么，因为浓度太高了，你觉得理所当然。一旦回到潍坊，你就会感觉没有这个东西其实跟有是很不一样的，反而显出来了。

有时候经常来的顾客，可能路过这儿，看到灯亮着，就会上来看一下什么的，这种我觉得还挺温暖的。我很难指着它赚钱或者怎么样，但这就是不得不做的一件事情，感觉我只有这个选项，不做这个事情，我就没法继续下去。

自从开了书店之后，我整个人焕然一新，而且因此认识了很多很珍贵的朋友，人生忽然变得特别开阔。我也没有任何要抱怨的事情了，我觉得任何事情都可以以一个比较好的心态去面对，因为我感觉能做这个事情已经非常幸运了，没有什么让我觉得特别难的事儿了。

#### **Q: 最近有什么有趣的事情？**

A: 前段时间去日本，刚好在大阪的阪急百货有一个岁末古书市，我就在那翻了翻。古书室里面的书都保存得特别好，都是一九四几年一九五几年的书，都包着书皮儿。我就翻到了一本，买这本书的人当时记载了一下，他购买这本书的时间地点什么的。我觉得特别感动。

这个书可能是一九四几年的书，过了几十年之后，依然能被别人这样翻到，让我觉得书店真的是一个很好的场所，对我的书店也有了一些新的希望，觉得这个事情其实可以细水长流慢慢做下去。我就期待着可能过几十年，有人在这儿买的书，在后面盖了大风书店的章，或者他写过什么，也有一天被别人这样翻到。

#### **Q: 最近想解决什么问题？**

A: 没有什么巨大的问题。感恩。

#### **Q: 想找谁来接力？**

A: 曹柳莺，电影自媒体深焦 DeepFocus 的联合创始人之一，我特别佩服的一个女生，现在定居德国，常年奔波在各大国际影展之间，是国内独立影片走向国际影展的重要推手。

还有“大风吹”的分享人之一孙福建老师，他在工作之余用闲暇时间做潍坊的地方志研究工作，自己牵头众筹出了十几本古籍文献，让很多年轻人开始关注地方历史。



题图为受访者蔡所

你大约可以明白，这个电影制片厂是住在西三村的艺术家的主意，目的是把创作和自己身处的社会联系起来。这个社会不大不小，恰好就是每日面对的西三村。郑宏彬是西三电影制片厂的发起人之一，他在演讲中提及的建筑垃圾，是西三村旧改的结果。记录一个城中村本身的日常其实已经很丰富，如果叠加旧改，就会变成一席演讲里郑宏彬说的那句话：我想问问，为什么城市化进程里面，村庄都会必经这样一个过程？



影片拍摄



影片展出

## 专栏

### 089 蔡所

## 生活这事不可规划，但你的内在需要会牵引它的走向

杨樱 | 接力访问

他说，“生命最高处应该是那样的”。

蔡所搬到西三村住是在 2015 年。西三村这个地方，按照蔡所的搭档 / 朋友 [郑宏彬在“席”演讲里的说法](#)，到处都是建筑垃圾，半夜三四点你可能会被臭水沟上的鸡档里的鸡叫醒，或者早上被隔壁高档小区排出的污水臭醒。那是 2016 年，郑宏彬晚蔡所一年住进这个广州番禺区西北角的村子，它附近最知名的地标，就是广州“大铜钱”。

蔡所搬到西三村的原因是因为这里更适合做画室，这里安静便宜，最关键的是，画不用楼上楼下搬来搬去。他从广州美院油画系毕业，那个时候，画画还是蔡所的主业，是他“推演世界”的方式。后来这事变得不一样，画画变成了一种自我疗愈，在做了很多社会性项目之后，他会去画画——这一点倒是和以前一样，画完一张画他就会高兴好多天。

如果展开讲讲“社会性项目”这件事，会有很多很多可说。[邀请蔡所接力的 A 鬼](#)，以及[邀请 A 鬼接力的武老白](#)，以及[邀请武老白接力的徐雅珺](#)，再往上推的满宇……基本上每个人都可以从自己的角度把“什么是以及我做了什么社会性项目”拓展一遍。到了蔡所这边，你可能需要了解的就是一个叫做“西三电影制片厂”的存在，以及它的延伸功能“西三歌队”。

“西三电影制片厂”不是一个常规的影视公司。它的四条原则可以说明这一点：

- 一、制片厂制作的每一部影片里，都至少应该包含西三村的一个问题；
- 二、西三村的村民是制片厂的专属观众；
- 三、我们要将制作的影片视为可以流转于村落的公共消息，或者说我们要在村里面做一个草根的第三方媒体；
- 四、我们要联合村民一起去拍摄和制片。

作为制片厂的一部分，“西三歌队”这个实践“平台”也有着独特的创作方法：将话筒和麦克风递向受访者，通过观察和访谈收集他们的问题、遭遇、诉求，将菜农、大排档老板的口述改编成歌曲，用吉他弹唱的方式唱出村民们的故事。后来，创作范围扩张，“西三歌队”去深圳举办演唱会，邀请打工者一起演唱打工人之歌。



《村民记深港城市建筑双年展·临时艺术社区·清水河演唱会 现场者》截图

蔡所和他的朋友们，都会关心这个问题，也对如何探究这个问题充满创造性的兴趣。蔡所就是在那时候做了“西三歌队”的吉他手兼主唱。“西三歌队”有三个固定的乐手，除了蔡所，还有鼓手刘浩和尺八贝斯周洋。但歌队的“写手”众多，制片厂的谢剑波、周磊、黎燕明、刘声、喻旭东、郑宏彬、吴焕松等都通过调研和实践，为歌队提供歌词。此外，歌队的策划兼编辑的常乐，他更是目前重要的写手。他另一个爱好，吉他，顺利地成为了工作方式。他聊天的时候跟我说，小时候问爷爷要钱买吉他，爷爷问，你不是画画吗，又要画画又要吉他，这两个能一起用吗？

蔡所是广东阳江人，1979 年生，家在农村，走几百米就可以到海边。在田里插秧的时候，抬头就可以看到山，这让他对山很感兴趣，经常幻想山后面是什么。但就算小时候抱个西瓜和同学一起爬山，也不能完全明白山这个存在。那时候他见识的东西不多，之所以会画画，是因为在村里祠堂看到了手绘瓷器，觉得上面的花鸟好看，又或者同学带的画册里的稀罕水果，也觉得好，就想画下来，时间久了就进入了学画的轨道，一直到考上广美。

吉他是蔡所迷恋的东西，声音一响起，他就觉得特别好。那时候教蔡所画画的老师也教他吉他，但是他建议蔡所画画考学，吉他也放下了。一直到了西三村，吉他都是蔡所的个人爱好。只不过有一次，他给朋友的小孩写了一首歌，放的时候正好郑宏彬也在，当时他们还不熟，现场也没聊什么音乐的事情。隔了一阵子，蔡所收到了去西安“做项目”的邀请，当时郑宏彬在西安美术馆工作，那是他第一次用音乐的方式参与社会议题。

然后就是“居民”。“居民”是满宇、刘伟伟与郑宏彬一起发起的，邀请 30 多位艺术家，

针对珠三角一带城市化后的居民生存境况和权益等社会问题，进行考察和实践。项目完成后，在深圳华侨城的展出被禁，但调研时个体的生活境况以及村中存在的公共问题没有消失——这其实是“西三电影制片厂”的前序。

蔡所说，在做这些事情之前，他就意识到音乐和画画其实都是他探讨问题的不同路径，二者其实互为一体。只不过如何互相结合，他当时心里没什么概念。一直到了“做项目”的时候，他才渐渐明白画画和音乐各自的分工，爷爷当年问的那个问题，似乎也隔空得到了答案。

每一个“项目”都是对社会现实问题的一次介入。每一次社会现实问题的指向，都是不同身份的弱势群体。A 鬼和蔡所都提到了他们在阳春的“床上演出”。这是重金属乐队全国巡演的一站，把社会现实编入词曲之中，现场表演，邀请当地人参与，再发布出去，这样来，更多人会知道阳春的铜泥污染对当地人生活的巨大影响。

阳春属于阳江，但在做项目之前，蔡所不知道还有这么一个“藏污纳垢”的存在。他很朴素地感到愤怒。聊天的时候我们说到了这些东西，他说他一般情况下不会对现实特别惊讶，因为他知道事情总会更糟糕。如果事情更糟糕，或者在电视里看到又有谁在装模作样胡说八道，他就会避开这些东西，等到情绪过去的时候，又忍不住会去了解。

阳春这件事对他的影响要格外大，一个原因是蔡所和 A 鬼组成的“土壤改良”乐队在 2021 年抵达那里的时候，以疫情防控的名义被联合执法围在酒店，以至于所有人像列侬和小野洋子一样在床上完成了表演，然后被“押送”到高铁站离开；第二个原因，当然就是那种不自觉的家乡意识。

不过蔡所在回忆的时候，还说了一些别的东西。

“我会特别感同身受的共情在，但在作曲的过程中，卧槽，我又有悲凉感在里面。恰恰我们去了那里，村民就要准备去现场了，我们只能困在一个旅馆的房间里，在床上做了现场。排练的时候我就有点大喊，主唱是 A 鬼，我作为一个和声，我用阳江话去唱的时候，那种撕心裂肺的感觉直接就把我嗓子给喊哑了。就等于说，你对生命的一种认识，一种共情，会让身体超出局限，而你自己是不知道的。结束之后我就不能说话了。”

“后来回去的路上，他们在车上还拍了一些东西，让我唱，我说我唱不了。但我还是要嘶吼，一样要嘶吼，就把那种清晰给带出来。我的声音已经那样了，已经吼得不行了，才达成那个方式。”

“我觉得最感动的是，你在当时想象不到别的东西，只能在音乐里，在现场中，莫名其妙被一个东西牵引着用生命去呐喊。在唱的时候，它变成一种很美妙的东西——我表达不出，没有词去形容——很自然的东西，你和那些村民的遭遇是同在的，你在歌声中成为了他们的一份子。”

蔡所说，乐队那天不知道谁嘲笑了他，“操，看那谁，流眼泪了”。“其实他自己也流眼泪了。”

蔡所和朋友们做的事情并不难看到，正如他们计划的，项目最终会以各种形式发布出来。但是，“图啥呢”这个问题，不同人有不同的答案。对于蔡所，我想知道这样的生活方式是如何出现在他身上的，是什么让他乐在其中或者说难以割舍，哪怕阻力和困境一而再再而三地出现，而且也谈不上有任何物质意义的回馈。“共情”是个光谱，每个人提到的时候，其介入程度并不一定相同。每个“做项目”的人，是如何走到这一步的呢？



实践图

蔡所给的理由，第一个有点浑不吝。他说每每做这样的项目，会遇到什么都不可预测，以至于“时间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比如说，谁知道万事俱备却会被困在酒店床上呢。这听上去很肾上腺素。预案可能需要全部推翻，新的行动方案可能需要在很有限的时间里准备好。没有什么是固定的，一个项目会不会“有意思”，在项目真正执行之前谁都不知道。在这种情况下，劳累和压力都是可以被忽略的，“完事儿之后我就喝点酒睡觉，每天都这么循环。所以我已经不做计划了，因为你的人生必须长时间有规律才可以做计划。我只能想到近两天我要做什么，这就够了。”

但他会想比“长远”更抽象的问题。

“西三乐队”有个公众号，其中一篇推文叫《我们究竟应该面对谁去歌唱》，提到艺术家应该“回到地方，回到现场，让个体发声”。推文还提到一组对话，周云蓬去台湾演出，好朋友陈升说，“你那个不叫音乐，只是意识形态罢了”。周云蓬回答，我在大陆只能写出这样的歌，你在台湾，也写不出来《中国孩子》这样的作品。

蔡所说他想过这个问题。一个做艺术的人，做的到底是什么艺术。

“西三电影制片厂这样的东西，它好像迎合了我们某种自身需要，你会觉得它是特别自然的，做这件事会贯穿在你的生命之中……我考油画系的时候，在那个年代是接触新的思想，就和后来的行为、影像一样，是一种先锋。但语境会变化，我现在对自己的一个追问，包括以前也追过，就是我们学的这些东西其实都来自西方，虽然每个人的输出不一样。当代艺术，我理解就是你对具体的环境，中国发生的这些事情作出回应，只要你把事情做了，记录了，全世界都是不可以模仿的。这就是当代艺术很重要的一点，只要你进入现场，它就是不一样的。只要把事情做出来了，它已经很当代，它就有它的力量。”

但这只是一个艺术层面的问题吗？

“而我们选择做当代艺术，只是因为它符合我们自身的需要。做这件事让我觉得自己更加合理，如果没有这种内在，就不会有这样的举动。”

蔡所提到了自己的毕业作品。红色黑色混为一体的画面上，核心是一个舞台，台下山崩地裂，仿佛有无数骷髅在呐喊。做完重金属乐队巡演的时候，蔡所发了一个朋友圈，“多年之后，我终于实现了这个想法”。

“从 2004 年毕业，到 2018 年，我花了很长时间去达成这个想法，但我没有太刻意。我当时是这么想的，我可能在回归自身的某种感动。”在和我复述阳春演出的时候，他又一次提到了类似的情感，“后来回看纪录片，我能感到一种生命的悲悯会通过一些方式自己绽放出来，你在这一个生存环境里可以共情到别人的遭遇，那是特别震撼的。它并不是属于思考‘我要做什么’的那种震撼，而是你会觉得，生命最高处应该是那样的，有一种悲悯在里面。那是无与伦比的。”

刚从美院毕业的时候，蔡所去过一阵子郑州，一个是朋友说这里可以做高考美术培训，赚点钱，条件和在广州差不多；第二个是可以看到北方的雪。蔡所特别想知道，雪里的红色是什么样的。原本只打算过了冬天就回广州，结果一住住了一年多，中间带一个大专学生去太行山写生，从此迷恋上了太行山，回了广州又反复再去。

红色在雪里到底是什么样子，蔡所没有说。他说他作为一个广东人，在郑州明白了什么叫做“二月春风似剪刀”，春风在郑州有不一样的魔法。他把这些东西放进画里，这是 2006 年那会儿的事情。那时候他打定主意要做个艺术家，只不过不知道是一个怎样的艺术家。

#### Q: 最近有什么有趣的事情？

A: 2023 年最有意思的还是有时间能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又有一种进入工作状态的感觉。包括 12 月在从化做丰年庆的演出，感觉踏实了一点。

#### Q: 最近想解决什么问题？

A: 蛮多的。想重新弹一下吉他，再学一下。“土壤改良”巡演可能马上就要开始了，我就重新捡起这个事儿。我昨天弹了一下电吉他，我发现我不会，拉下的时间太多了，需要重新补充一些知识，这是最迫切的。当然还有家里的一些状况，比如要回家陪陪父母。

#### Q: 爸妈知道你在做什么吗？

A: 不太清楚。我妈看到我做音乐有关的事情，就说，“你又要参加比赛了，你有没有拿第一？”有些东西是长期目标，为了达成愿望而去达成，不是我希望的样子。

#### Q: 想推荐谁来接力？

A: 谢剑波，艺术家，西三电影制片厂发起人之一。



杨樱

以《第一财经周刊》记者和编辑作为职业生涯起点，联合创办“好奇心日报”，现在是“小鸟文学”创始人和主编。

**接力访问**

到了我们找到彼此的时候。



小鸟文学出品  
卷三十七，2024.1  
可以留档  
请勿商用  
有事联系  
[info@aves.art](mailto:info@aves.art)